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HOICE-MAKING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ZHENG BINGH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8

**CHOICE-MAKING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ZHENG BINGHAN

2008

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

**CHOICE-MAKING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郑冰寒

ZHENG BINGH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08

谢 辞

放眼远眺这神明般的宁静，
是对你沉思后多么美好的回报！
——瓦雷里《海滨墓园》

一直幻想，博士论文收尾的一刹那，会有一道神圣的光芒洒落书桌，刻镂下一个永恒的纪念，那一刻，我会流泪，祭奠这段逝去的岁月。也曾在无数个难以入眠的子夜，设想在论文的谢辞里，我该如何收拾这段回忆，记录这些痛并快乐着的日子；我该如何下笔，感谢那些曾给予我关爱和帮助的师长、朋友和亲人。可是，真正轮到撰写谢辞的时候，我却迟迟难以落墨。

我知道，我在用静默的方式与这段岁月道别，我在用无声的语言向一些人表示感谢……

回忆以蒙太奇的方式，将镜头切换到九年前，彼时的我尚在港城的宁波大学研读英语语言文学。在那个以“经世致用”为校训的大学，我却对文学翻译倾注了无穷的兴趣；我选择以诗歌翻译批评作为学士论文题目，当时的导师则是许渊冲先生的大弟子张明林教授。应该说九年前的这场“错爱”为我今后的求学生涯按下了最初的注脚，我就这样在翻译研究的领域“一错再错”下去。七年前，怀着向往与喜悦的心情，迈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这座神圣的学术殿堂，师从潘文国教授攻读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学位。潘先生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广博的学术修养，开启了我蒙昧的学术生涯。在他门下，我较为系统地接受了理论语言学各个领域的学术训练，对英汉语对比与翻译有了深入的思考和领悟。2004年7月，我以一篇被评为优秀

的硕士学位论文结束了申城三年的求学历程，再次收拾行囊，背负着光荣与梦想，开始了三年半的拼“博”岁月。这一次，我的落脚点在异国他乡的南洋理工大学。

坐落在狮城最西边的南大算是一方学术净土，环绕校园的高速公路隔离了熙来攘往的人群、商店和霓虹灯。在这个纯净的校园里，我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我深知博士论文对日后学术生涯的意义和影响，选择这个课题，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这个题目属于翻译过程的研究领域，而翻译过程在学界长期以来被当作“黑匣子”处理，其研究一直未有长足发展。西方学者在1980年代率先借用心理学的有声思维法开始了探索翻译心理过程的艰难旅程，二十多年来，获得了许多具有较高可信度的成果。尽管如此，中国学者却很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我希望在英汉翻译过程研究领域做一名开拓者，于是义无反顾地知难而进。

三年的寂寞旅程中，首先要感谢伴我走过的两位导师。谭慧敏博士是我在南大中文系的第一位导师，她带我在学术上起步，帮我克服论文选题、开题、大纲的形成、数据的收集以及论证和分析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她以言传和身教，让我体会到治学所需的严谨、踏实、刻苦甚至拼命的态度。感谢导师高虹博士对这篇论文的悉心指点和精心斧正。高老师于瑞典名校Lund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多伦多大学认知发展实验室的研究主任，有着深厚的语言学 and 心理学理论背景及在中国多年的语言教学经验。跟她的每一次交流，我都收获了很多学问之道。在论文修改阶段，她非常认真地审阅、修改了全文的初稿、二稿和定稿，从认知语言学、实验心理学和翻译学等角度对论文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感谢王宏志教授在学业和生活上对我的鞭策和关心。在他的课堂上，我深深感受到他无比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厚的人文关怀；他教导我们，不要抱怨客观条件的不足，学问是用心去做的。他也很关心我的论文进展，鼓励我把学问做扎实。对于王老师的教诲和勉励，学生铭感于心。

感谢李元瑾主任、柯思仁主任这些年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帮助。感谢南大中文系的每一位老师，郭淑云老师、周善策老师、游俊豪老师、刘晓鹏老师、蓝适齐老师、潘秋平老师、衣若芬老师、魏月萍老师、关诗珮老师、吴元华老师、梁

文福老师、陈日辉老师、庄钦永博士、陈乐博士，无论是平时的交流，还是研讨会时的讨论，你们的真知灼见都让我受益良多。

感谢引领我踏入翻译学和语言学学术殿堂的硕士导师潘文国教授。三年的悉心栽培与言传身教，受益匪浅。初到南大的半年，恰潘先生也在南大任职，每逢周末与节日，他和师母总邀我相聚，让我在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这些年来，潘老师也始终关心着我的学习和生活。山高水远，师恩浩荡，敢不尽绵力于学以报师恩？

傅惠生教授是我在硕士期间的老师，在他身上，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他渊博的学识、认真的学术态度，还有他那十年磨一剑的执著。傅老师在南大任教的两个月，我得以有更多机会向他请教，或在他的公寓，品一壶清茶，谈论文架构，或在南大校园，漫步小径，论研究方法。傅老师对我的帮助和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感谢广外贸的赵军峰教授，我们因为共同的志趣在相识的短短三个月里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以丰富的翻译教学和实践经验、扎实的语言学知识为本论文提供了很多建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南大国立教育学院林万菁教授、南大心理系居维宁教授、中国海事大学左飏教授、台湾政治大学竺家宁教授、日本明海大学史有为教授、上海大学方梦之教授等多位老师都曾给予悉心教导，为我指点迷津、理清思路。诸位老师的教诲我将永志不忘。

论文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了一些国际知名教授的指点。有幸在香港会议中认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 Wolfgang Lörcher 教授，他不但耐心地解答了我在方法论方面的疑惑，还在会后为我寄来他最新的研究成果。芬兰 Joensuu 大学教授 Riitta Jääskeläinen 在笔者为数据转写和赋码犯愁时，通过电邮告诉我目前学者的处理方法，并鼓励我设计出更为详实的转写规范。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 Arnt Lykke Jakobsen 教授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学者，在辅仁大学召开的第十届台湾口笔译教学研讨会上，他不但慷慨地与我分享他发明的 Translog 软件，还专门指导我在程序安装与操作上的注意事项，是他培养了我对电脑击键记录技术的无限热情。在此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感谢所有参加本项研究，并提供宝贵实验数据的 26 位被试；感谢两位译文评阅者和一位辅助研究者。没有他们，本研究根本不可能完成。

感谢南大中文系的师兄姐妹们（王一敏、李乾耀、王黎、孔新人、张海洁、张一冰、陈丽娟、邹宇欣、崔峰、许原泰、陈晞哲、陈涛、刘静、高坤翠），英语系的郑杰、杨柳，心理系的黄宗伟，复旦大学的唐欣玉，台湾中山大学的杨雁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方建军，他们都曾给过我热忱无私的帮助和鼓励。感谢中文系的行政人员，陈慧雅、王淑娟、曾惠琳、何宣桦、陈美莲，他们为我的学习、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后勤服务。

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岳父、岳母、妈妈和姐姐，因为他们的宽容，我才能安心在这里完成这篇博士论文。已经连续三年没回家了，欠他们的感情太多，太多了。

感谢我在天国的父亲。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三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愿去碰触“父亲”这个字眼。但是我知道，他从小根植在我心底的寄托和理想，是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原动力。希望我今天的成绩，能够给他些许安慰。

最后，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陈瑶。这些年来，我们分别在岛国两所最好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生活上的相互扶持姑且不提，为了我的论文，她牺牲了很多休息的时间，也耽搁了她自己的研究进展。对于她的付出，我只能回报以更努力的工作。

博士论文的完成，为我三年半的博士生涯和二十多年的求学生涯同时划上了句号。在为这个期盼已久的结果而欣喜的同时，也深知这只是学术旅途上的一个路标。所谓的终点，不过是另一个起点。在学术研究的漫漫征途上，所有的句点都只不过是过程中的一个个驿站，我相信，我会永远在路上。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为学的至高境界，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2008年元月

星洲西海岸丽景花园

目 录

谢辞	I
图表目录	X
中文摘要	XIV
英文摘要	XVI
绪论	1
第一章 文献回顾	7
第一节 翻译过程研究的基本概念	8
1.1.1 过程与结果	8
1.1.2 过程与程序	9
1.1.3 翻译过程的广义与狭义之分	10
1.1.4 翻译过程的思辨与实证研究	12
第二节 翻译过程思辨研究回顾	15
1.2.1 文艺学派论翻译过程	15
1.2.2 翻译“科学”派论翻译过程	16
1.2.3 翻译研究学派论翻译过程	19
1.2.4 解构学派论翻译过程	21
1.2.5 其它翻译流派论翻译过程	21
1.2.6 中国学者论翻译过程	23
第三节 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概况	27
1.3.1 西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综述	27
1.3.2 西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分述	31

1.3.3 中国学者对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	43
第二章 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理论概述	49
第一节 翻译是“作选择”的过程	50
2.1.1 翻译是问题解决的过程	50
2.1.2 翻译是“作决策”的过程	53
2.1.3 选择行为的语用学解释	55
2.1.4 中外学者对选择行为的研究	58
第二节 选择行为的特点	61
2.2.1 博弈性	61
2.2.2 适应性	61
2.2.3 指标性	63
2.2.4 体验性	63
第三节 选择行为的研究层面	66
2.3.1 翻译单位的选择	66
2.3.2 决策过程的选择	68
2.3.3 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	69
2.3.4 翻译策略模式的选择	7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73
第一节 有声思维法与翻译过程研究	74
3.1.1 有声思维法概述	74
3.1.2 翻译研究中常用的三种有声思维法分析	76
3.1.3 TAPs 翻译研究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82
3.1.4 TAPs 翻译研究的可信度保障条款	86
第二节 电脑击键记录技术及其在英译汉研究中的可行性.....	89

3.2.1 电脑击键记录技术概述	89
3.2.2 几种常用击键记录技术分析	89
3.2.3 击键记录技术在英译汉研究中的可行性分析.....	94
第三节 本研究采用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96
3.3.1 三元数据分析模式概述	96
3.3.2 本研究采用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97
第四章 实验前测、设计与数据	100
第一节 实验前测	100
4.1.1 关于实验培训的作用	101
4.1.2 翻译方向问题	104
4.1.3 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整	106
4.1.4 前测翻译过程的定性描写	107
第二节 实验设计	110
4.2.1 实验被试	110
4.2.2 实验原文	114
4.2.3 实验过程	117
4.2.4 问卷与采访	118
4.2.5 译文评估	120
4.2.6 TAPs数据誊写	121
4.2.7 关于可信度保障条款的说明	124
第五章 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 实验分析	126
第一节 翻译单位的选择	126
5.1.1 TAPs 翻译单位研究的回顾	126
5.1.2 翻译单位的实验分析	129
5.1.3 英译汉翻译单位实证分析的思考	137

第二节 决策过程的选择	140
5.2.1 翻译问题特征	143
5.2.2 选项数量与决策过程特征	151
5.2.3 选择结果的选项分布特征	164
第三节 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	171
5.3.1 TAPs 翻译工具研究的回顾	171
5.3.2 翻译工具的实验分析	173
5.3.3 翻译工具帮助解决的问题	186
5.3.4 本节研究成果在教学和实践中的意义	189
第六章 翻译过程策略模式	190
第一节 翻译策略模式的构成	190
6.1.1 翻译策略元素	191
6.1.2 Lörcher 的翻译策略结构	197
第二节 策略结构与策略结果	199
6.2.1 翻译策略结构比较	199
6.2.2 翻译策略结果比较	237
第三节 翻译过程策略模式	240
第七章 结论	244
参考文献	255
附录一、实验说明	276
附录二、前测实验文本	278
附录三、实验文本	279

附录四、实时观察记录实例.....	280
附录五、调查问卷	281
附录六、采访提要	283
附录七、译文更改记录实例	284
附录八、TAPs 数据图 (Protocol Diagrams)	285
附录九、TAPs 翻译过程研究文献	294

图表目录

图 1.1: 译文功能、篇章结构与翻译过程关系图	20
图 1.2: 叶子南关于翻译过程的模式图	25
图 2.1: Lasswell 的传播学模型	54
图 3.1: 本研究采用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97
图 5.1: 三类译者选用的各级主观翻译单位百分比均值柱状图	134
图 5.2: 三类译者选用的各级客观翻译单位百分比均值柱状图	134
图 5.3: 语境的分类	158
图 5.4: 两篇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工具的查询次数	173
图 5.5: 翻译工具各类查询目的的比例	176
图 5.6: 翻译工具各查询手段的比例	179
图 5.7: 三类被试对于翻译工具的“查询满意度”统计	185
图 6.1: 被试 S18 (Professional) 文本一第三段 TAPs 数据图	197
图 6.2: 翻译过程策略模式图	241
表 1.1: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论著统计 (1982-2006)	28
表 1.2: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论著发表使用的语言 (1982-2006)	29
表 1.3: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论著发表数量前十位研究者 (1982-2006) ...	30
表 1.4: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历年发表的论著统计 (1982-2006)	30
表 1.5: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发展期 (1990-1999) 的研究内容	36
表 1.6: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发展期的被试情况 (被试为 10 人以上的文献)	38
表 1.7: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突破期 (2000-2006) 的研究内容	42

表 1.8: 中国译界 TAPs 翻译过程研究论著统计	43
表 1.9: 中国译界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内容	43
表 1.10: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中所考察的语言种类 (1982-2006)	45
表 1.11: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中位于前五位的语言对 (1982-2006) ...	45
表 4.1: 实验前测被试的背景信息 (被试编号: P1-P6)	100
表 4.2: 被试背景信息 (被试编号: S1-S18)	113
表 4.3: 两篇实验原文基本信息 (单位: 个)	116
表 4.4: 被试对自己翻译能力的自信程度—问卷第 10 题回答情况	119
表 4.5: 有声报告是否影响翻译过程—问卷第 11 题回答情况	119
表 4.6: 汇报出多少关于思维过程的信息—问卷第 12 题回答情况	119
表 4.7: 实验数据的可信度—问卷第 13 题回答情况	119
表 4.8: TEM8 英译汉评分标准 (2000)	120
表 4.9: 译文一各项评估成绩总平均.....	121
表 4.10: 译文二各项评估成绩总平均	121
表 4.11: Englund Dimotrova (2005:80) 的 TAPs 数据誊写规范	122
表 4.12: 本研究的 TAPs 数据誊写规范	122
表 4.13: 翻译耗时、译文字数和 TAPs 文本字数 (按被试个人统计)	123
表 4.14: 翻译耗时、译文字数和 TAPs 文本字数 (按被试类别统计)	123
表 5.1: 关于翻译单位的 TAPs 实验研究的相关信息	127
表 5.2: TAPs 文本各翻译单位次数统计样本	131
表 5.3: TAPs 文本各翻译单位数量统计表	132
表 5.4: 翻译单位选择次数百分比	133
表 5.5: 三类译者选用的各级主、客观翻译单位百分比均值	134
表 5.6: 调查问卷中被试关于翻译单位的回答	136
表 5.7: 三组被试两种文本的翻译问题数量	143
表 5.8: 三类被试两种文本的翻译问题数量百分比	144
表 5.9: 常规任务文本的翻译问题数量	144
表 5.10: 非常规任务文本的翻译问题数量	145

表 5.11: 各翻译问题层级占问题总数的百分比	149
表 5.12: 文本一和文本二各问题层级百分比总均值	149
表 5.13: 文本一、二选项数量类型的出现次数	151
表 5.14: 三类译者选项数量类型的出现次数百分比(频率)	152
表 5.15: 三类译者文本一、二选项数量类型出现次数百分比(频率)总均值	152
表 5.16: 决策过程中译者所参考的各层级语境: TAPs 实例	159
表 5.17: 三类被试文本一翻译过程中各类语境的参考频率	161
表 5.18: 三类被试文本二翻译过程中各类语境的参考频率	161
表 5.19: 三类被试两种文本翻译过程中各类语境的参考频率均值	162
表 5.20: 二选型问题的选择结果在选项间的分布	165
表 5.21: 多选型问题的选择结果在选项间的分布	165
表 5.22: 三类被试二选型问题的选择结果在选项间的分布比例	166
表 5.23: 三类被试多选型问题的选择结果在选项间的分布比例	166
表 5.24: 翻译工具的 TAPs 实证研究回顾	171
表 5.25: 翻译工具查询目的的说明和 TAPs 例证	175
表 5.26: 翻译工具各类查询目的的比例	176
表 5.27: 查询手段的说明	178
表 5.28: 翻译工具各查询手段的比例	178
表 5.29: 翻译工具查询决策的说明和 TAPs 例证	181
表 5.30: 翻译工具各查询决策的使用频率	182
表 5.31: 针对识解难点词语的翻译工具查询次数、目的、决策和满意度 ...	187
表 5.32: 针对表述难点词语的翻译工具查询次数、目的、决策和满意度 ...	187
表 5.33: 针对识解兼表述难点词语的翻译工具查询次数、目的、决策和满意度	188
表 6.1: Færch 关于口语表达的潜在策略标记	192
表 6.2: Krings 关于翻译策略的标记	192
表 6.3: Lörcher 的翻译策略元素	192

表 6.4: 本研究采用的翻译策略元素标记及注解	193
表 6.5: 被试 S18 (Professional) 文本一第三段翻译过程的 TAPs 数据及说明	194
表 6.6: Lörcher (1991a) 翻译策略的基本结构	197
表 6.7: 策略结构对比—语义表述与完善	200
表 6.8: 策略结构对比—语义辨析与搭配	201
表 6.9: 策略结构对比—语义润饰与修辞	204
表 6.10: 词典查询的四种策略结构统计	206
表 6.11: 意义层面评估成绩总平均分	207
表 6.12: 策略结构对比—衔接手段的处理—词汇衔接	210
表 6.13: 策略结构对比—衔接手段的处理—连接词“though”	212
表 6.14: 策略结构对比—语篇连贯与结构调整	214
表 6.15: 结构层面评估成绩总平均分	218
表 6.16: 三类被试在文本一翻译过程中考虑翻译述要的次数	222
表 6.17: 三类被试在文本一翻译过程中考虑译文期望结构的次数	224
表 6.18: 调查问卷显示的被试的决策依据	226
表 6.19: 功能层面评估成绩总平均分	227
表 6.20: 策略结构对比—监控策略结构	229
表 6.21: 三类被试在文本一第三段翻译过程中使用翻译理论与原则的次数与频率	233
表 6.22: 三位被试 (S2、S9、S18) 译文、评估成绩与翻译耗时	237
表 6.23: 18 位被试的译文评估成绩与翻译耗时对照表	238
表 6.24: 三类被试的译文评估成绩与翻译耗时统计	238

中文摘要

本研究题为“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运用实证方法，探讨译者在英译汉过程中的选择行为。

翻译是“作选择”的过程，具备选择行为的博弈性、顺应性、指标性和体验性等特点。通过比较与分析翻译过程研究的几种常用方法，本文总结出最适合英译汉过程研究的，由即时TAPs、实时观察记录、问卷采访和译文评估等构成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在实验设计方面，本研究的有效被试共18人，依其背景分为职业译者、半职业译者和翻译初学者三组，每组6人；所有被试均执行两篇短文的英译汉TAPs实验任务，收取样本共36份；被试在完成实验后均填写问卷并接受采访。两位专业翻译评审人员匿名评阅所有被试的译文，构成译文评估数据。

在实验数据基础上，本文主要采用定量统计的方法，深入探讨了翻译单位的选择、决策过程的选择、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综合这三部分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职业译者的选择行为在各方面都体现了所谓“宏观”倾向。在翻译单位层面，无论是主观翻译单位还是客观翻译单位，职业译者的选择均比非职业译者更宏观。在翻译问题特征上，尽管职业译者的问题数量最少，但其考虑的翻译问题最宏观，参考宏观语境的频率也最高。译者运用翻译工具时呈现的特征与翻译单位特征、翻译问题特征等是一致的：职业译者关注的翻译单位较大，关注的翻译问题的层级较高，因此对于一些意义难以确定的语汇，不急于借助翻译工具来解决，体现出职业译者运用翻译工具的“高风险”特征，具体表现为求助翻译工具的次数很少。职业译者选择行为的这种“宏观”倾向，基于其自上而下的认知模式，即在整体把握语篇意义的大前提下，有目的、有计划地关注具体细节。

其次，半职业译者的大部分翻译行为特征介于职业译者和初学者之间，但具体偏向哪一类译者，情况比较复杂。在翻译单位大小、翻译问题的层级大小，以及解决问题时参考的语境层级大小等方面，半职业译者的行为特征明显偏向初学者；而在考虑翻译述要、译文期望结构以及翻译理论与原则等方面，半职业译者的特征却明显偏向职业译者。文章指出：译者在提高翻译理论和实践能力过程中，不同阶段难度有别。初学者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知识非常薄弱，翻译实践缺乏理论指导；而半职业译者所习得的理论和技巧往往能充分体现于实践，因此那些涉及翻译理论或技巧的行为特征，半职业译者自然与初学者拉开了距离。但是职业译者能把握更大的翻译单位（特别是客观翻译单位）、关注更宏观的翻译问题，耗费较少的时间译出高质量的译文，这些行为特征，是其技能意识和翻译实践结合的成果，是其在强烈的技能意识指导下，就正于实践的体验和经验的启迪，锲而不舍所获得的成就；这些方面，半职业译者尚需实践的磨炼。

本文亦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不同译者处理翻译问题时的差别进行了比较，归纳出职业译者的策略结构特征，进而结合TAPs、译文评估或问卷采访等定量统计数据对各种策略结构特征进行验证。翻译过程策略模式表明：翻译过程策略系统从翻译问题序列出发，通过意义层面策略结构、结构层面策略结构、功能层面策略结构和监控策略结构四方面的决策过程，产生翻译结果，或反馈到翻译问题序列进行再次决策循环。该模式强调了翻译技能意识对职业译者决策行为的辅助作用：职业译者在实施意义、结构、功能甚至监控策略结构时，其行为背后的依据往往是翻译技能意识，即根据自己掌握的翻译理论知识和长期实践总结的原则进行决策与选择。同时，“极小极大原则”（*minimax principle*）始终对职业译者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进行操控：一方面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不同层面的抉择与取舍提供原则性依据；一方面为译者的整体翻译行为提供效率参考。

Abstract

This thesis entitled *Choice-making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applies empirical method to examine translators' behavior of choice-making in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ng.

An argument is put forth that translating is a choice-making process,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optimality, adaptability, indexing and experiencing. A triangulation pattern is proposed as the main method of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process, combining concurrent TAPs, observation notes,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target text evaluation, etc.

There are 18 subjects under this study, divided into 3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backgrounds in translation and provided with prior trainings on TAPs experiment. Each subject is required to carry out two think-aloud translating tasks, tape-recorded, and then is ask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and an interview. Afterwards, all translation versions are marked and rated anonymously by two experts in translation.

The kernel part of the study examines how the subjects carry through choice-makings on the translation units, th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instruments. The major findings in this chapt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generally professionals perform the so-called "macro-control" strategy in most choice-making behaviors. Compared with non-professionals, they select larger language units whether to subjective translation units or to objective translation units, take more consideration of global problems and refer to more macro-context when facing problems.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erformances in applying translation instruments. They belong to 'high-risk-takers' and seldom seek help from dictionar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rofessionals' cognitive mode is likely to be "top-down" when translating, which means they take the whole text meaning as the first priority, and focus on details purposefully.

Secondly, semi-professionals' behaviors resembles those of professionals in the aspect of considering translation brief, referring to translation expectation structure,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whereas they are more similar to novices in aspects of the translation units they apply, the types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they consider and the types of context they refer. It thus can be concluded that for translation trainees, theories are easy to be equipped, while the practical competences can hardly be greatly developed in a short period. Translation trainees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in translation practicing in order to gain sufficient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Based on comparisons of typical samples from the three types of subject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optimal strategies in layers of meaning, structure, function and monitoring, and verifies them via quantitative comprising among all samples. A translator first of all faces the sequences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akes decisions in the above four layers, and then resolves problems and generates the translation by using different strategie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a translator uses translation theories or principles as the guidanc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during choice-makings or decision-makings. And furthermore, the "Minimax Principle" is always virtually running as the foundation and reference for a translator during his/her choice-makings in translating.

绪 论

一、研究方向

本论文题目为“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从研究方向来看，属于翻译过程研究；借用James Holmes（1988:72）的术语，是“过程导向的翻译研究”（Proces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或者还可以更具体地说是“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为什么要研究翻译过程？这是笔者选题之初遇到的首要问题。翻译作为一种语言转换和文化交流的活动形式在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将翻译确立为一门学科，正式成立翻译学（Translatology）或者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则是上个世纪末的事情。应该说，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辄待探讨的课题不胜枚举，很多时期的翻译史实有待描述，很多翻译名家及其翻译行为需要研究，很多新兴的语言学、哲学理论可以用于解释翻译现象，甚至也可以借用语料库（主要是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方法来描写、分析和解释一些翻译规范……笔者为何独独选择翻译过程研究这样一个棘手的课题？

回顾选题之初，笔者确定这个研究方向主要受到James Holmes一些观点的启发和影响。1972年，Holmes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研讨会上发表了里程碑式的文章《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在历史上第一次勾勒出了翻译学学科的结构框架。该文中，Holmes提出了翻译学的两大目标，其中一个就是描写我们身处的经验世界里出现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这类现象（Holmes 1988:71）。按理说，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都是翻译研究应当描写的对象，其受重视的程度不可偏废。但事实上，翻译理论研究历来偏重对翻译结果的探讨。无论是1960年代以来盛行的对翻译等值、等效现象的考察，还是后来对翻译转移（translation shifts）的考量，继而从目标语文化角度来解释译作的生成等，本质上都属于翻译结果的研究；研究方法也是大同小异，通常从分析

源语和目的语着手，进而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即对两种结果进行比较（a product to product comparison）。这种状况大概是由于翻译界悠久的语言学和文学传统所致（比如 Peter Newmark 等学者就认为，翻译理论发端于比较语言学，主要属于语义学范畴）。

但是，从翻译研究的目的以及建立翻译学的目标而言，仅仅研究翻译结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探讨翻译活动的过程，必须对语言转换的复杂过程进行剖析，对出现的种种问题及其可行的解决办法和操作系统作出系统的描述和说明。Holmes 是较早关注并重视翻译过程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不但在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划分出“过程导向”的翻译研究，还针对翻译界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专门指出：“学者们不能因为（结果和过程之间）存在差异，就忽视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结果’是‘过程’的结果；缺乏对‘过程’本质的了解和把握，‘结果’的本质也不会明了”（James Holmes 1978:81）。Holmes的这段论述彰显了“过程”和“结果”的因果关系，指明了“翻译过程”是“翻译结果”产生和存在的必要前提，进而说明了解和把握“翻译过程”的重要意义。因为，即便只是从探求翻译结果本质的目的出发，也必须了解和把握翻译过程的本质，更何况，翻译学的目标是既要描述翻译结果，又要描述翻译过程，两者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确定以翻译过程为研究方向之后，笔者还需要限定翻译过程的范围。翻译过程的研究本质上需要探讨译者的心理过程，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对心理过程的界定并不一致，不同的翻译学流派对翻译过程的范围也有不同的划分，比较常见的划分是“广义翻译过程”和“狭义翻译过程”。本研究采纳了翻译过程较为狭义的界定，即“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翻译过程起始于研究者提供原文文本给译者（被试），最好附带翻译述要，结束于译者（被试）提交其译文给客户或研究者”（Jääskeläinen 2002: 108）。

二、研究方法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各翻译流派对翻译过程作出了一些思辨性的论述和探索，不少学者还尝试构建翻译的过程模式（cf. Lörscher 1991a: 7-26）。但是，由于翻译过程直接关系到译者大脑的思维过程，不像翻译结果那样直接明了，切实可触。翻译过程的这种“不透明性”导致了早期人们对于翻译过程的认识难以得到长足发展；而由此得出的一些翻译过程模式，与其说是基于对实际翻译过程的观察、分析和归纳，不如说是这些翻译理论家的主观推测和假设，“均未付诸任何实际情况的检验”（Toury 1995: 233）。

不过，尽管二十世纪以来翻译过程的思辨研究发展缓慢，成就平凡，它却为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作好充分的理论铺垫。到了1980年代，西方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随着“有声思维报告法”¹的运用，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该研究在1990年代更是发展迅猛，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也有很大改进。Andrew Chesterman曾对1990年代的翻译研究进行了如下总结：“过去十年来翻译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显著的趋向：一种是研究兴趣上从注重翻译本身的研究拓展到注重译员及其翻译决策的研究；另一种是从规定性的方法转向描述性的方法；而我认为最重要的趋向，则是从哲学的概念分析转向实证研究”（Chesterman 1998:201）。这一观察得到了另一位学者的正面回应，Mary Snell-Hornby在其最新著作《翻译研究的转向——全新范式还是视点转移》（*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Snell-Hornby 2006）中也提出类似的看法：翻译研究在1980年代出现的是“文化转向”，而在1990年代体现的是“实证转向”和“全球化转向”；“文化转向”使翻译学在方式上侧重于描述性的研究，“实证转向”则在研究兴趣上偏向于探讨译者本身，在方法上侧重实证研究（Snell-Hornby 2006: 115）。

笔者通过对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西方学者发表的144篇（本）TAPs翻译过程研究文献的梳理，将西方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划分为探索期、发展期和突破期三个阶段，并总结出每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笔者总结出以有声思

¹关于“有声思维报告法”的具体介绍，参见第三章第一节。

维法、电脑击键记录软件以及问卷调查和译文评估等构成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²，是目前最为理想的翻译过程研究方法，并尝试将该模式运用于本研究。

当然，三元数据分析模式在本研究中主要用于获取实验数据，对于数据的编码和分析，还需要结合特定的研究目标。具体而言，在第五章讨论翻译单位的选择、决策过程的选择和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时，笔者主要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赋码后的TAPs数据进行统计、归类与比较，并选取TAPs文本作为实例辅助说明定量分析的结果。第六章讨论翻译过程的策略模式时，笔者主要以定性分析的方法比较不同译者在解决翻译问题时选择的翻译策略元素和策略结构，归纳出其中的最佳策略结构，并结合TAPs数据和译文评估数据的定量统计对上述结构进行验证。总之，在数据分析时，笔者悬以为鹄者，是根据不同研究内容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分析方法。

三、语言对象

刘宓庆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体系。翻译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如什么叫‘翻译’、什么是‘语际转换的实质’、翻译中的‘二元对立项’（binaries）是什么、什么叫‘可译性限度’等等。这类普遍的问题（即 What）通常是适用于各语种的转换的。但一旦牵涉到‘为什么’或‘如何’转换、‘如何’解释，（即 Why 和 How）的时候，各语种的翻译理论（尤其是应用理论）就应该各师各法，甚至分道扬镳了。因此，世界译论论坛应该是百花争妍的园圃，而不是什么一枝独秀的盆栽”（刘宓庆 2001:150）。这种看法指出了翻译理论存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时也表明，是无论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法来研究翻译理论，语言事实一定不能忽视，翻译理论必须建基于具体的语言对象。因为翻译活动首先依靠语言来进行，它必须以特定的语言作为源语，以特定的语言作为译语，语言作为中介符号贯穿翻译全过程。而特定的源语与译语又无不具备各自的语言特色，世界上还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一种包容各种语言特征的自然语言。同样在翻译过程的研究中，必然涉及

²关于“三元数据分析模式”的具体介绍，参见第三章第三节。

语言对象的问题，基于不同的语言对（language pairs）获得的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成果，理论上应该存在共同的特征和各自的差异。当然共性和个性都是实证研究的有用结论：通过对共性的总结，可以得出描写译学孜孜以求的原则系统，即翻译规范，最终建立翻译的普遍法则（general laws），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差异之处则可以用来指导具体语言对之间的翻译实践。

本研究的语言对象为英语和汉语，或者加上翻译方向可以更确切地说，是探讨不同类型的译者将英语翻译成汉语的过程³。在语言对象和翻译方向上确定这样的研究范围，一方面因为笔者有较为丰富英汉翻译实践和教学经验，能够在分析具体现象时快速准确地发现问题；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罕见以英汉翻译为考察对象，而英汉翻译作为非亲属语言翻译的典型代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两点构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深入研究英汉翻译的过程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四、研究目标

Riitta Jääskeläinen在《翻译的有声思维研究：有注释的参考文献》（“Think-aloud Protocol Studies into Transl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一文中收集了1982-2001年间西方TAPs翻译过程研究的论著108篇（本），并指出TAPs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是“研究目标从过去的全面综合转向具体明确，包括检验和测试一些具体的假设”（Jääskeläinen 2002: 109）。这种趋势提醒笔者，进行翻译过程研究时，必须有较为明确而具体的研究目标，否则如果大题小作，分析与讨论时就容易流于表面，泛泛而谈。这一趋势也表明，翻译过程研究应当遵循“宏观摸索→微观探索→宏观总结”的发展轨迹，而目前正处于微观探索阶段，需要各国学者基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过程研究，深入分析过程中微观而具体的内容，为将来对于翻译过程模式等的宏观总结打下坚实基础。

³ 配合实验需要，本研究只收集了英译汉的实验数据，因此对于汉译英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暂不在本研究讨论范围。

在此前提下，笔者格外关注以往文献的研究内容，寻求最有价值的研究目标。笔者发现，现有文献尚未对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作出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描述⁴，而选择行为之于翻译过程研究非常重要，正如Tirkkonen-Condit所言：“选择与决策行为在翻译过程中是如此地重要，几乎所有理论型或调研型研究都与之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Tirkkonen-Condit 1993:8）。从翻译过程的研究范围来看，无论是广义翻译过程还是狭义翻译过程，选择与决策行为无处不在；从翻译过程的研究方法来看，无论是思辨性研究还是实证性研究，选择与决策行为也都是研究者观察、描写、分析、阐释的焦点。然而，学界目前对翻译过程选择行为的认识是比较肤浅而零散的，在有限的研究中，思辨性的论述又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从实证的角度对于翻译过程选择行为的系统描述相当缺乏。基于这样的事实，本研究的目标锁定在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上，运用实证手段对此进行较为系统而深入的讨论。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翻译单位的选择、决策过程的选择、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和翻译策略模式的选择四个方面⁵。基于这四方面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在结论部分指出，从方法论层面看，指导不同类型译者进行问题解决的选择行为主要有“规范指导型选择”和“语感指导型选择”，前者是翻译教学的主要任务，后者则属于语言教学范畴；从认识论层面来看，翻译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是多重因素影响与制约的结果，译者在平衡各种影响与制约因素时遵循的依据则是极小极大原则；而从本体论层面看，选择行为是翻译过程的构成性行为，是翻译过程内在固有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⁴ 有些研究或只论及选择行为的某一方面，或没有从选择的角度分析翻译过程中的问题。

⁵ 选择行为还包括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但由于该选择行为不在本研究界定的狭义翻译过程的范围之内，因此不作探讨。

第一章 文献回顾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oduct and the process) cannot give the scholar leave to ignore the self-evident fact that the one is the result of the other, an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product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a comprehens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process.

学者们不能因为（结果和过程之间）存在差异，就忽视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结果”是“过程”的结果；缺乏对“过程”本质的了解和把握，“结果”的本质也不会明了。

——James Holmes (1978:81)

本章第一节从辨析翻译过程研究的基本概念入手，包括过程与结果、过程与程序、翻译过程的广义与狭义之分、翻译过程的思辨与实证研究，为本研究的一些重要概念作了必要的说明。第二节主要回顾了西方各翻译流派对翻译过程的思辨性研究，以及中国学者的贡献，为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理论铺垫。第三节是文献回顾的核心部分，笔者首先对西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全貌进行了综述，整理出1982年至2006年发表的主要运用“有声思维报告法”（Think Aloud Protocols，简称TAPs）的翻译过程研究文献144篇（本）。在此基础上，笔者分探索期、发展期和突破期三个时段，详尽地探讨了西方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并总结出每个时期的方法论特点和研究重点。本章最后概述了近年来中国学者进行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并指出中国学者从事英汉翻译实证研究的意义。

第一节 翻译过程研究的基本概念

1.1.1 过程与结果

翻译本身可以分为“结果”和“过程”两个方面。英国语言学家 Henry G. Widdowson 指出，“结果”与“过程”之分非常重要（Widdowson 1979:71）。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意识到译论研究的偏差与缺陷，同时又能为我们全面认识翻译的本质提供一种可能（吴义诚 1997:2）。前苏联翻译理论家 Barkhudarov 也在《语言与翻译》（巴尔胡达罗夫 1985）中提出，人们使用的“翻译”一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定过程的结果”，即译文本身；二是指“翻译过程本身”，即翻译这一动词表示的行为。英国翻译理论家 Roger T. Bell 更是拓展了翻译本身的内涵，认为“翻译”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三相术语，它可以指“翻译的过程”，也可以指“翻译过程的产物”，还可以指“既包括具体的翻译过程又包括翻译过程的产物”的抽象概念。系统的翻译理论既要努力描写翻译结果，又要努力解释翻译过程。要建立完整的翻译理论，就必须区分翻译的“过程”与“结果”；在建立翻译过程模式的基础上创建翻译理论（Bell 1991:13）。

Eugene Nida 在《新编奈达论翻译》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和谭教授之所以合作，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应用语言学的诸多问题上，彼此观点十分一致。其一，我们深信翻译理论必须以翻译实践作为基础。即是说，翻译工作如何开展，有关指导原则必须能够反应出令人称道的翻译家们实际上是如何翻译的。其二，我们认为，对语际交流活动进行分析，必须把语境因素考虑进来。就是说，不仅要认真分析原文的一切用词，还要分析原文产生的原因，以及分析人们是怎么去理解原文的。任何一篇原文都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才有意义可言。其三，我们认为，有必要明确区分翻译的实际工作和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语言和文化因素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

作，亦即区分翻译和翻译研究，不可把这二者混为一谈。”（谭载喜 1999: VIII）

许钧（2003:77）指出：Nida的三点看法，反复强调了对翻译过程的关注，即探索翻译动态过程的必要性，如第一点“翻译家们实际上是如何翻译的”；第二点“对话际交流活动进行分析”及“怎么去理解原文”的分析；第三点“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语言和文化因素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Nida 的观点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无论是对翻译进行微观的研究，还是将翻译置于文化交流大背景下进行宏观的探索，都涉及对翻译过程的认识。许多问题若不放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加以考察，便难以作出合理的判断和有效的分析。研究翻译过程，既有理论上的意义，又有实践上的意义。这些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深入了解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本质，很大部分体现在译者翻译时的思维转换上；因此，借助翻译过程的研究成果，可以深入了解翻译的一些本质问题。

第二、有助于翻译培训和教学——翻译是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目的、原文及译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可以说翻译过程的原则是死的，但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步骤又是活的，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初学者只有首先认识并掌握过程的基本规范、基本模式，方能在实践中活学活用，得出一套适合自己的翻译过程模式。

第三、有助于提高译文质量——过程和结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译文则是一定翻译过程的必然结果。译者了解越多翻译过程知识，越能在决策过程中作出明智的选择，译文质量也就能随之得到提高。

第四、有助于发展翻译能力和策略——翻译过程研究往往通过实验手段收集不同被试数据，并对此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职业译者翻译过程的研究，了解其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策略和技巧，可以为翻译实践提供更多的应用理论。

1.1.2 过程与程序

《译学辞典》是这样定义翻译过程的：“翻译过程（process of translation）指翻译活动所经过的程序，一般认为包括三个阶段：理解原文、用目的语表达、校验修

改译文。其中，理解是表达的基础或前提，表达是理解的结果。……总的来说，翻译过程主要是理解与表达的过程，即认识与实践、分析与综合的过程，它们既是同一过程，彼此衔接；又是互有交叉、互臻完善的两个阶段，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方梦之 2004:15）。孙致礼也把翻译过程等同于程序，并且认为理解、表达、审校的三阶段划分比较合理，对中国学生学习翻译更有指导意义（孙致礼 2003:15）。然而我们认为，“过程”与“程序”等同的现象恰体现了翻译界目前对翻译过程缺乏深入研究。许钧指出，前者（翻译过程）指抽象意义的整个过程，后者（翻译程序）是指比较具体的一个步骤或一种方法、手段……两者有一种差别，主要在于‘过程’为统称，而‘程序’一般指具体步骤（许钧 2003b:33）。虽然在相关中文资料中，我们常可见到‘过程’与‘程序’可以相互代用的现象，但是若对二者加以区分，便可以在很多语境中避免涵义的混淆。本文将专门探讨“英译汉过程”。

1.1.3 翻译过程的广义与狭义之分

许钧（2003a:79-80）指出：“‘过程’一词是指翻译的动态意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过程一般理解为翻译者对具体文本的转换活动过程。具体地说，就是在翻译者选择了一个要翻译的文本之后，将该文本由出发语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而广义的过程，则不仅包含狭义的语言转换活动，还包括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生成和文本生命的历程等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本的复译现象，可在翻译的广义过程中加以审视和考察。”本研究采纳许钧的提法，从文本的经历和译者的行为两方面对翻译过程作广义和狭义的区别。

第一、广义翻译过程是翻译行为过程以及行为结果介入的翻译活动过程的集合，是一个动态、立体、开放的整体。翻译行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翻译活动的结束，而是翻译活动得以继续的开始。

《圣经》翻译是一项非常宏大的工程，Nida 提出的《圣经》翻译过程涉及十个不同而又互为联系的部分，包括：①不合适的翻译程序；②译前准备；③翻译小组的结构；④审稿结构；⑤辅助人员；⑥翻译程序，即各种翻译队伍中所采取的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⑦对译文进行检验；⑧校对清样；⑨行政管理工作的程序；⑩

译本出版以后的工作。Nida 指出,这十个方面并非适用于每一位《圣经》翻译工作者,但却涵盖了翻译各阶段的工作;不仅涵盖了狭义的翻译过程,还包含了有关译文的出版和文本流传的广义过程(参见谭载喜 1999:281-303)。译经大师玄奘主持“译场”活动也是广义的翻译过程。《读高僧传》记载,玄奘对译经的过程及分工非常严格明确,包括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和监护大使等 11 项(参见陈福康 1992:43-44)。1980 年代中期,译林出版社组织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其基本程序也体现了广义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和严密性: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确定翻译人选;组织高水平的专家研读全书,编写各卷内容提要、人名地名译名表、作品人物关系表和有关重要注释;制定“校译工作的几点要求”;开译后多次组织译者经验交流,相互传阅和评点部分译文;就书名的翻译、风格的再现问题专门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法语语言文学界的著名学者和全书的翻译人员进行专题讨论;交稿后编辑认真校译,并邀请有关专家抽校译文,有问题的译文重新修改;全书出版后,还组织国际研讨会总结翻译经验(许钧 2003a: 84-85)。因此,按照广义的翻译过程,一部原著从开始翻译到译作与读者见面,开始其新的生命历程,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它涉及到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研究、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文本的生成、文本的接受等紧密相联、环环相扣的过程。

第二、狭义翻译过程是指翻译行为过程,是译者发挥主体能动性,调动语言知识与非语言知识,经由理解机制从原文中获取信息,通过内在言语外化以及本位这一内部评价体系的协调下获得译本的过程。翻译理论家 Wolfram Wilss (1980) 对狭义翻译过程的认识,在德国译界是具有代表性的:“翻译过程是一个选择、决定的过程,是选择、决定与某一原文单位相对应的或相似的译语表达的过程”¹。这是对翻译过程较为深入细致的界定。桂乾元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点补充意见:“翻译过程首先是理解过程,然后才是选择、决定过程;还需补充创造,即翻译过程是一个选择、决定、创造的过程,是选择、决定、创造与某一原文单位相对应的或相似的译语表达的过程”(桂乾元 2004:60)。

¹ 参见桂乾元(2004),页 60。

桂乾元（2004）把翻译过程分成“翻译大过程”和“翻译小过程”：翻译大过程指长篇原著的翻译过程（如《红与黑》的翻译），包括 2 大步骤、4 个阶段、14 个环节；翻译小过程指短文、句子、甚至一个词语的翻译（如广告语、品牌名、影片名、术语等翻译），可分为 3 大步、10 小步。我们认为，“翻译大过程”虽然在结构上比“翻译小过程”复杂，步骤、阶段和环节更为丰富，但本质上还是属于狭义翻译过程，两大步骤归纳而言即“理解”与“表达”，14 个环节从“熟悉译者”到“认真打印”，均属于译者的个人翻译行为，未涉及翻译活动的外在因素。

1.1.4 翻译过程的思辨与实证研究

根据方法论划分，翻译过程研究可以从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进行。因为翻译学作为一门既包含艺术又包含科学特性的学科，有着人文的成分，也有科学的因素，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人文思辨加科学分析的多重认识与探索……在理论方法之外，实证方法也是重要的研究手段（姜秋霞、杨平 2005:23）。

思辨研究源于哲学母体，谭鑫田主编的《西方哲学辞典》有这样的解释：“思辨在西方哲学中源于拉丁语 *speculum*（镜子），是不涉及感性只借助概念进行抽象的理论思维，它或是在一般的思维方法，或是在哲学的推论方法的意义上使用”（谭鑫田 1991:454）。彭克宏主编的《社会科学大辞典》认为思辨“同‘经验的思考’相对，指不依赖于任何经验只进行纯概念和纯理论的思考。进行这种思考的哲学家称为思辨哲学家，如莱布尼茨、沃尔夫、黑格尔等”（彭克宏 1989:85-86）。朱智贤等在《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中将思辨方法分为古代和现代两种：古代的思辨方法是以观察为基础和运用了原始的归纳与演绎方法所构成的方法；而现代的思辨研究则是以经验和资料（他人的研究为主）为基础，并运用哲学的逻辑方法搞思辨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包括直观经验、周密的猜测和逻辑推理三个方面（朱智贤等 1991:60-61）。可见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在思辨概念上存在分歧，前者关注“思维是否依据事实”，即思辨方法不考虑事实和材料，而直接以理性的概念进行思维和推论；后者则把重心放在事实或经验的可靠性上，考察经验或事实可靠与否，即认为，如果经验不可靠，思考和推论就不科学。我们认为：思辨研究旨在揭示某一概念、假设、理论的本质、结构及机制，其重心是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不

大重视支持这些理论的事实证据。如果一个研究，完全不使用科学事实或数据，这种研究属于思辨研究；如果一个研究中使用了科学证据，但研究重心不是获得科学证据，那我们仍将其看成思辨研究。

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正好相反，它以科学的方法获得客观事实或经验，以这些客观事实或经验为基础来论证某种观点，描述某种规律。实证研究通常包括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²，其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³和现象学⁴。有人认为既然实验是科学实证的最有效、最典型的方法，那么实证研究就应该等同于实验研究，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实验研究是实证研究的下属范畴，实证研究除了实验研究之外，还包括描述性研究等。

在翻译过程研究上，思辨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研究方法比较成熟；相比之下，实证研究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研究方法出现，还是二十世纪末的事情⁵。这两种方法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了探讨。当然，作为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存在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研究课题不同：翻译过程的思辨研究通常分析一些较为复杂、概括性高、较难操控的抽象问题（如翻译过程的模式，翻译过程的实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等）；实证研究则通常选一些简单、概括性相对低、可操控性强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第二、引证资料不同：翻译过程的思辨研究引证的主要是著名学者、翻译家的观点、个案或经验，认为个人事实是普遍事实的缩影，名家的观点、典型的案例

² 根据传统观点，实验法属于量的研究的典型代表，而观察法和访谈法等则属于比较典型的质的研究。

³ 实证主义是 19 世纪中叶由法国哲学家 August Comte 倡导的一种哲学思潮，产生的哲学背景是对传统哲学以抽象思辨为基础、探讨认识本原的一种不满，受科学精神的启示，主张建立一个以主观经验为基础、旨在揭示现象之间规律的科学哲学体系。

⁴ 现象学虽然也十分重视经验事实，把经验事实作为分析解释的基础，但对经验事实的态度与实证主义不同。

⁵ 我们虽然不能否认在两千多年的翻译史中有实证研究的存在，如对翻译问题的认识最早源自对翻译具体现象和实例的分析，但在 20 世纪以前，翻译的实证研究只能算是一种思想意识，未形成科学的方法论体系。

是说明问题最有力的论据；实证研究者引证的是概率论类型或数量化倾向的研究证据，认为人有较大的个体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事物也可能作出不同的反映，个人难以代表群体，只有概率或数据才能说明某一现象的趋势。

第三、思维方式不同：翻译过程的思辨研究多用演绎逻辑，从公认的翻译理论出发，推出结论，三段论式的形式较多，推理严密；实证研究惯于归纳，从翻译过程的事实出发，归纳出结论，强调概率。

第四、研究手段不同：早期的思辨研究主要运用规定性手段，通过对翻译或翻译现象的价值阐释和评估，来回答“翻译过程是什么”或“应该如何译”等问题。实证研究主要运用描述性手段，遵循价值祛除，情感中立，为解释而研究，认为存在就是事实，主要靠科学理性说服人。随着理论方法的不断扩展，思辨研究中也出现了描述性手段，但是思辨研究中的描述属于非限定性描述，即在理论的指导下寻找相应的数据说明，数据具有随意性，功能在于例证而不是检验某一结论；实证研究的描述属于限定性描述，所描述的数据是独立、系统、完整的客观现象群体。

第二节 翻译过程思辨研究回顾

西方学者对翻译过程的思辨研究经历了从对传统经验的总结转向理性探索的过程。其鲜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翻译流派借助不同的理论，从特定的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思辨分析，使得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得到了持续深入的思考。鉴于目前对西方翻译流派存在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在下文论述中，主要参考 Edwin Gentzler (1993) 的分类，同时也对 Gentzler 未作明确说明的流派进行了归纳，从文艺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研究学派、解构学派、其它翻译流派和中国学者的研究六个方面来梳理翻译过程的思辨研究。

1.2.1 文艺学派论翻译过程

翻译的文艺学派（或语文学派）主要由一批哲学家、语文学家、作家、诗人和翻译家组成，他们对翻译过程的认识源于个体实践经验的总结，从狭义的翻译过程来论述，其中最普遍的认识便是把翻译过程划分为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理解包括分析原文，把握原文的确切意思；表达则是在译入语中把原文的意思说出来。例如美国早期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 Herbert C. Tolman 在《翻译的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ng*）中指出，翻译的心理过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必须以正确的方法理解原文，即从原作者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译者的观点出发去理解原文；第二，必须如实反映原文的思想和风格（参见谭载喜 1991: 223）。

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重实践、轻理论，重个人实践经验总结，可以归入文艺学派讨论。该学派出现于 1960 年代，兴起于 1970 年代，沿袭了英国新批评学派代表人物 Ivor A. Richards 于 1920 年代应用的阅读研讨班的方法，重视实践，不谈理论，因此翻译研讨班对文学翻译理论并无太多贡献。他们的贡献不是在翻译对等之类的概念方面，而是在语义的联想、认知和乐感等方面，在揭示翻译过程中大脑运作的“黑匣子”方面。Gentzler (1993: 34) 认为：翻译研讨班关于翻译过程研究的影响首先在 John Felstiner 的《翻译聂鲁达：通向马克丘·皮克丘之路》（*Translating*

Neruda: The Way to Macchu Picchu, 1980) 中得到体现, 并在 Robert Bly 的《翻译八步》(*The Eight Stages of Translation*, 1984) 和 Edwin Honig 的《诗人翻译家的心声: 关于文学翻译的对话》(*The Poet's Other Voice: Conversation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1985) 中得以继续, 他们都探讨了翻译过程。

如果 60 年代的翻译研讨班和翻译家们还不屑于多谈翻译理论的话, 进入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 翻译家们开始意识到翻译理论的重要性, 并对自己翻译实践的过程进行了更为理性的思索。在 John Biguenet 和 Rainer Schulte 主编的《翻译技巧》(*The Craft of Translation*) (Biguenet & Schulte 1989) 中, 有多篇论文从不同层面揭示翻译的复杂过程。编者在导言中概括指出: “在这些文章中, 翻译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作出决定的程序上, 而正是这些决定构成了翻译。在他们总结自己翻译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在他们重构翻译过程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们如何逐步形成自己的翻译方法。这些方法不仅是翻译实践的关键, 也是阅读和理解的关键。尽管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 但他们得出的关于翻译本质的概念则是一致的。这些文章是译者和文本对话的记录。通过对话, 译者与文本接触; 通过译者和文本的交际, 形成了译者对翻译本质的看法” (Biguenet & Schulte 1989: viii)。翻译家们通过对自己翻译历程的客观记录, 大大加深了我们对翻译技巧和翻译过程复杂性的理解和认识。

1.2.2 翻译“科学”派论翻译过程

翻译“科学”派主要以语言学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基础, 强调翻译活动的科学性。根据 Gentzler (1993) 的看法, 该学派可以包括语言学派、德国功能目的学派等。

1959 年 Roman Jakobson 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翻译的语言观》(“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不但揭开了现代翻译学序幕, 也奠定了翻译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基础。到了六、七十年代, 在美国和英国分别出现了 Nida 的《翻译科学探索》和 Catford 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在德国则出现了以 Wilss 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 标志着“翻译理论”走上历史舞台。然而无一例外, 这些理论依托的背景都是当时的语言学理论 (潘文国 2002:33)。Nida 提出的

过程模式在西方影响很大，该模式探讨了狭义翻译过程，包括①分析——从语法和语义两方面对原文的信息进行分析；②传译——把经过分析的信息在脑子里从源语转换成译语；③重组——把传递过来的信息重组成符合要求的译语；④检验——对比原文意义与译语意义是否对等（Nida 1969:484）。该模式从译者拿到一篇原文开始，通过对其进行语义、语法、风格等层次的分析，把经过分析的材料转换成译文语言，然后对这些转换过来的东西进行重新组织，使其符合译文要求，最后拿这篇译文同原文进行对照检查，使其在最大程度上切近原文信息，同时又做到行文自然。虽然 Nida 的过程模式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缺乏心理效度（psychological validity），也就是说，该模式不能如实地反映翻译过程，连某一篇章的某个译者都不能如实反映，更不用说普遍反映了（Toury 1995: 233）。谭载喜也指出，“这四步模式较为具体，比较能说明翻译的操作过程，至少能使人对翻译过程感到不那么抽象、难以捉摸。但它的弱点仍然是没能从心理学上解释清楚怎样进行转语。此外，它的第四步即对译文进行检验的那步，在许多方面涉及超语言现象的实际调查，例如，通过朗读译文、解释内容等方式征求读者意见，收集读者反应，因而已超越了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而最好被视为实际翻译时可能采取的操作手段。换言之，这类模式与其说反映了翻译的心理过程，毋宁说只是说明了翻译的实际操作过程”（谭载喜 2000:36）。另外，该模式为了更清楚地描写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内容，专门划分了翻译过程的四个逐步展开的步骤，但是在翻译实践中，有些步骤往往同时发生。尤其是职业译者，由于程序的高度自动化，其翻译步骤的界限更显模糊。

Dinda L. Gorlee（1994）从跨学科的角度对 Charles S. Peirce 符号学理论与翻译理论的相互作用进行了阐述，书中指出，翻译过程作为一个思想过程首先被不明推论解释，尽管不明推论所依靠的是它猜测的本能，它的假设在解释事实时还是比较正确的。然后，不明推论通过归纳来检验，归纳通过试验寻求事实，这个试验将证明假设所指的事实。最后，归纳为演绎准备了场所，规则的发展控制着事实。R.Daniel Shaw（1988）主张把翻译过程分为两步：①确定源语信息的意义；②运用各种翻译手段把文本意义传译到接受语文化中去。这样做，我们必须把人类学和翻译原则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忠实的翻译”。我们的目标是跨文化翻译，即在接受

语文化的背景下，传达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形式，使译文自然，流畅、易懂。Shaw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满足译文读者的文化期望，使整个翻译的概念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跨文化翻译之于交际的非语言因素，犹如翻译之于交际的语言因素，两者都是有效翻译所必须的。

Bell (1991) 试图用一个系统的语言学模式来描述翻译过程，这一模式被置于人类交际行为这一更大的领域，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求助于心理学及语言学。这就一方面需要熟悉心理学及心理语言学关于记忆及信息处理的模式，另一方面需要了解最广义的‘意义’的语言学模式，包括‘超越句子’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Bell在书中将‘模式’、‘意义’及‘记忆’作为论述的重点，并将译者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以不少的篇幅来回答“译者是什么”这个问题；在研究译者及其能力的基础上，对翻译过程提出了六点设想，将翻译过程分为“分析”和“综合”两大阶段，每个阶段又包含“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Bell 为自己的翻译过程构拟出相当复杂的模式图（Bell 1991:59），在进行文字分析时，运用了近50个图式对翻译过程、翻译活动因素、翻译具体步骤（包括分析程序、综合程序、文本再现与合成程序）、意义与意义关系、意义的生成、文本信息处理、文本处理技巧等作了直观的展示，充分显示了他试图将翻译研究导向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努力。据何自然介绍，“在近年的西方翻译理论文献中，要数纽马克的理论和贝尔的最为流行，只是两家分属形式语言学翻译理论和功能语言学翻译理论而已”（何自然 1997:192）。吴义诚称Bell的著作是“一部试图对翻译过程进行系统、客观描述的开山之作”，称Bell是“一位在探索人类双语转换时心理奥秘道路上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先锋”（吴义诚 1998:55-56）。Bell的理论打开了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缺口，为当前译论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极大地丰富了译论研究方法，代表了未来翻译过程研究的趋势。

德国功能目的学派和语言学派有一定的渊源，兴起于对等理论盛行的1970年代。它吸取了语言学派的合理内核，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西方以语言学派为主导的翻译理论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在实际应用中，因其更贴近实际，所以比“对等”翻译法表现出更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该派代表人物 Hans J. Vermeer 认为，从狭义的翻译行为角度来看，目的这个概念可用于三个方面，因而有三层意

思：谈翻译过程时，指过程的目标；谈翻译结果时，指译文的功能；谈翻译模式时，指模式的意图（Vermeer 2000: 224）。功能目的学派虽然从狭义的翻译过程出发，提出了跨文化传译的过程模式，但是，该学派首要关注的显然是“目的论”（skopos theory）。其理论的三个核心则是：①阐释翻译的定义及实质；②分析翻译过程参与者的角色；③提出功能的原则。因此，目的学派在论述翻译过程模式的时候，主要关注翻译过程的参与者及其扮演的角色，至于翻译过程本身究竟是怎么回事，广义的翻译活动过程包括哪些程序，狭义的翻译行为过程有怎样的心理指导，目的学派都没有进行论述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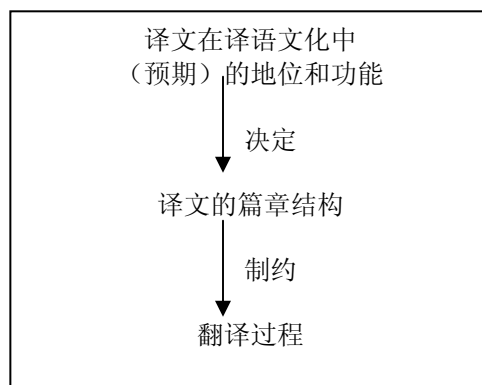
1.2.3 翻译研究学派论翻译过程

James Holmes 是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者，对该学派的兴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认为翻译研究是一门经验学科，并确定了翻译研究的两大目标：①描写我们身处的经验世界里出现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这类现象；②建立可以赖以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普遍原则。Holmes 把翻译研究分成描写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三大分支，其中描写性翻译研究包括产品导向（Product-oriented）、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和功能导向（Function-oriented）三部分，这里的过程导向研究即关注翻译行为本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创造一个全新的但又多多少少与原文吻合的译文？他大脑里的小“黑匣子”是如何运作的？此领域研究极少有人问津，因为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Holmes 是较早关注到翻译过程的学者，他深受 Jiri Levy 《翻译作为决定过程》（“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一文的影响，认为翻译是一个作决定的过程，一个决定接着一个决定，到了某点以后，翻译就产生了自己的一套规则，有的决定已不需要考虑就可以得出，而且往往可以看出原来看不到问题。因此不管翻译的结果怎么样，换一个人照样还可以翻译，不一定更好或更差，但肯定不同。其不同决定于翻译者本身的素养、最初的选择等。他还指出，翻译过程所作的抉择和决定都是主观的，有时往往出于意外（Holmes 1988:59-60）。作为翻译研究派的创始人，Holmes 的研究侧重理论体系的全面构建，而团结在他周围的研究者也都各有侧重，例如 Itamar

Even-Zohar 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Gideon Toury 发展了描写译学，Andre Lefevere 推动了翻译文化学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理论均形成了相应的学派。

描写学派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分支流派，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针对传统译学⁶强调原文与译文的对等关系，而忽略译文跟译语读者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关系而提出来的。在方法论上，描写译学主张以经验方法来进行翻译研究，使译学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经验方法的基础是“观察、描写和解释”。就译学而言，翻译过程、译作以及译作在译语文化中的功能都是客观现象，因此，客观地去观察和描写这些现象，以期建立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理论体系，正是描写译学的目标（Holmes 1988; Toury 1995）。描写的对象包括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功能、译文的篇章结构以及翻译过程，三者关系见图 1.1:

图 1.1: 译文功能、篇章结构与翻译过程关系图 (Toury 1995:13)



描写学派从广义的翻译过程出发，指出：不用经验方法（empirical method）去研究翻译过程，研究译文和译文的社会文化功能，恐怕不仅无法妥当地描写和解释这些现象，而且很难将译学成功地发展成一门可与其它学科学术地位媲美的当之无愧的独立学科，这就是描写学派创导者的观点（cf. Holmes 1988; Toury 1995）。

⁶ 传统译学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注重的是译文如何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跟原文相一致，其宗旨是界定翻译作品的属性和厘定翻译的标准，回答“何谓翻译”和“如何翻译”这样的问题。然而，翻译标准和翻译作品的属性跟译者、译语、译语文化、译语读者，以及译语社会的经济、政治、心理、历史和现状有关。因此，“何谓翻译”和“如何翻译”并无同一答案，而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描写学派主张翻译研究要注重译者与译语读者、译文与译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和译文的独立价值与功能。

1.2.4 解构学派论翻译过程

1960年代中期兴起的解构（deconstruction）思潮，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法国的 Jacques Derrida、Michel Foucault 和 Roland Barthes，以及耶鲁大学的 Paul De Man 等学者，将解构主义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中，给翻译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但是，诚如 Gentzler（1993:165）所言，他们谈翻译，并不是要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模式，或具体探讨翻译过程，或具体分析翻译作品，而是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他们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虽然这些解构主义哲学家没有论及翻译过程，但是在 Margaret Sayers Peden 的论述中，我们却看到解构的影子。她这样描述：“我喜欢把原作看成一块冰。在翻译过程中，冰块溶解了。在液体的状态下每个分子的位置都变动了；没有一个分子能维持和其它分子原来的关系。然后开始第二种语言的重构。原有的分子会逃逸，新的分子加入以填补空缺，但重构的痕迹不会显露。在第二种语言里出现的译作是一块新的冰块——与原来的冰块不一样了，但表面上看去是一样的……要创造美，必须先破坏；也就是说，必须先破坏，才能再创造。这个先破坏后创造的过程最能确切地描述文学翻译的过程。没有对原作的先破坏，就无法进行翻译。我们必须先破坏——先解构（de-struct），然后才能再重构（re-construct）”（Peden 1989:13-14）。尽管她在文中声明不想用 Derrida 的解构术语，但其论述的翻译过程充分体现了解构主义的一些思想。

1.2.5 其它翻译流派论翻译过程

从18世纪开始，德国学者便运用阐释学来分析翻译过程。Andre Schleiermacher 的翻译理论明显地体现了阐释学派的基本概念：真正的理解是对语篇作出“创造性的重新阐释”（参见涂纪亮 1994:105）。之后，George Steiner在其经典著作《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Steiner 1992）更是深入探索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成就了一套全面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在这本书中，Steiner论证了阅读是一种阐释，翻译也是一种阐释，所以，翻译过程便是阐释的过程。译者从理解原作内容到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经过了“信任”、“攻占”、“吸纳”和“补偿”四个步骤；在翻译过程中，译

者无可避免地将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了原文，使翻译变成了对原文的再创造。从表面上看，这四步与“翻译过程”似乎毫无瓜葛，不像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谈的翻译的文本由出发语向目的语转变的实施过程，倒是其字面上所凸现的某种“伦理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个意义上，Steiner 是将翻译的语言转换过程置于社会与文化的层面加以考察。Steiner (1992) 的第五章还特别指出：“如此这般地把翻译看作为‘信任’、‘攻占’、‘吸纳’和‘补偿’的一个阐释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一直以来充斥在翻译史和翻译理论中了无新意的三分法。长久以来，要在直译、意译、拟作中间划清界限，本来就是错误：既有偏差，又无哲学基础。这个三分法忽视了一个重点：在观念上，在实际情况中，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说的四类‘诠释’ (hermeneia) (即话语通过诠释，才能发挥它的指涉作用)，即使在最零碎的翻译活动中，仍然存在” (参见陈德鸿 2000:37)。必须承认，Steiner 的四个翻译步骤从理论层面进行了高度阐发，具有深奥的哲理性，然而这些论述是散点式的，书中也没有系统阐述翻译的目的、性质、实际操作过程等基本的翻译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完整的翻译理论。因此，这一翻译过程的论述对把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来加以建设的贡献也就很受局限了。

法国释意学派 (Ecole de Sens) 的主要理论研究也是围绕翻译过程展开的。主要代表人 Marianne Lederer 对翻译过程作了高度的概括：“释意派翻译理论建立的翻译过程是：理解原文，脱离源语语言形式、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领悟到的情感。……简而论之，翻译行为的第一步为‘理解’一个‘文本’，第二步为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这一‘文本’。这几个词所指的活动极其复杂，需要逐一加以研究。‘理解’涉及语言及语言外知识。‘重新表达’的质量有赖于译者的目的语水平和执笔的才能，同时也取决于他对主题的了解水平” (Lederer 1994:13)。此外，Lederer 和 Danica Seleskovitch 两位学者在“理解”和“重新表达”这两个基本步骤中，又突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脱离源语语言形式”，或翻译界通常所说“脱离源语语言外壳”。于是，“理解”、“脱离源语语言形式”和“重新表达”成了释意派理论所建立的翻译过程的三个基本程序。而围绕着这三个基本程序所展开的研究已取得一系列

重要成果⁷。在《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的中文版前言中，Lederer还提出了翻译过程的普遍性观点，“无论是哪种语言，也无论是何种文本，优秀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程序就其根本而言是相同的。所有翻译的共同点是：辨析意义和重新表达”（Lederer 2001: VIII）。虽然释意学派的理论强调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性，但在研究中并不囿于对翻译过程的剖析，而是“从译者的翻译过程出发研究翻译”，以翻译过程研究为基础，对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探索。

语料库翻译研究（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于1990年代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在翻译研究的大阵营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并引起翻译理论界的重视。该研究领域的出现和发展主要受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和描述翻译研究的影响，其主要研究目标是探索翻译的普遍性（the 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应该说语料库翻译研究和描写译学之间的合作是非常理想的研究途径：语料库作为描写的对象，描写作为语料库研究的手段。目前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语料库主要是双语平行语料库⁸，研究者可以进行原文和译文的对照描写，揭示译文受原文影响的多寡，从而看出译文的翻译过程；也可以对同一译者不同时期翻译的同一作品进行对照描写，揭示不同的翻译过程以及不同的篇章结构是如何影响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的（何元建 2003:5-6）。因此，对描写学派而言，建立翻译作品语料库是势在必行的办法；而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也将为翻译学科发展为经验科学奠定基础。

1.2.6 中国学者论翻译过程

近十年来，受西方译论的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始在论著中探讨翻译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填补空缺的作用。

许钧非常关注翻译过程的研究，他在《翻译论》绪论中指出：“翻译具有两重意义，一是静态的意义，指翻译的结果，二是动态的意义，指翻译的过程。翻译研究应该加强对翻译过程的动态研究。翻译不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的过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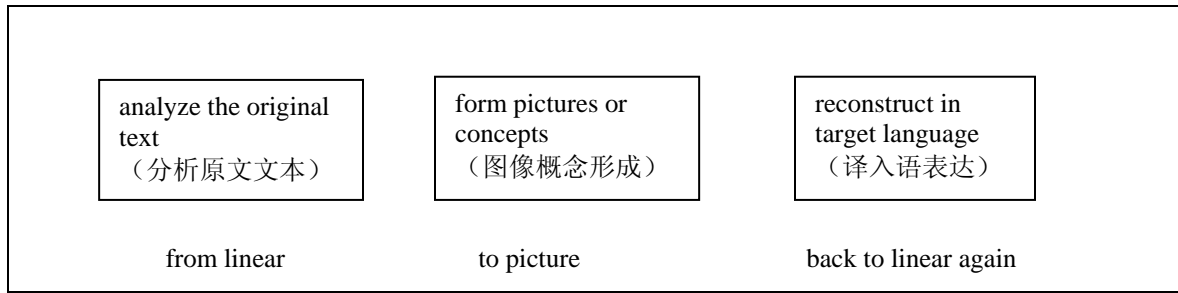
⁷参见许钧，袁筱一等编著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

⁸关于双语平行语料库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可参见 Laviosa, Sara.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Findings, Applications*.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2.

跳出以往较为狭隘的视野，从历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去认识翻译活动，解释翻译现象，不仅研究‘怎么译’，更要注意探讨‘为什么这么译’”（许钧 2003a:16）。许钧的翻译过程论包括五个部分：①翻译过程的实际体验与总结，②翻译过程的理论探索，③阐释的空间与限度，④翻译的历史性，⑤文本生命的拓展与延伸；结论部分指出：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取决于我们对翻译过程的认识，若我们突破翻译的技术的层面，从人类理解和交流行为的深层去加以把握，从文化积累与文本生命历程的角度去考察翻译过程，我们便有可能在理论上深化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在实践中更好处理翻译过程中所可能面对的矛盾（许钧 2003a:130）。许钧在其构建的过程论中，以思辨的方法分析了广义翻译过程，探讨的问题相对比较宏观。

谭载喜在《翻译学》（谭载喜 2000）中把研究翻译过程作为翻译研究的基本任务：“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其任务是对翻译过程和这个过程出现的问题进行客观的描写，揭示翻译中具有共性的、带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上升为能客观反映翻译实质的理论。同时，它又把通过描写和归纳而上升为理论的东西作为某种准则，以便指导具体的翻译工作。这就是译学理论的两个功能即它的描写功能和规范功能，同时也是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所在。……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应当包括五个组成部分：①阐明翻译实质；②描述翻译的过程；③厘定翻译的原则和标准；④描绘翻译的方法；⑤说明翻译中的各类矛盾。其中，第一至第三是基本部分，第四和第五是辅助部分”（谭载喜 2000:25-26）。虽然《翻译学》一书提出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这么重要的部分，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述。或许因为作者的研究重点是构建翻译学理论框架，没有更多的篇幅留给分门别类的论述。因此在《翻译学》一书中，关于翻译过程的深入论述，读者只能保留一份期待。

叶子南在《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叶子南 2001）的第四章论述了翻译的过程，包括翻译过程的不同模式、分析理解原文、头脑中图像的形成、译入语表达四个方面。作者参考了理解与表达的两阶段模式和Nida的三阶段模式，结合指导实践的需要，提出“分析理解→图像概念形成→译入语表达”的过程模式。

图1.2：叶子南关于翻译过程的模式图（叶子南 2001:61）⁹

该模式沿袭了语言学派尤其是 Nida 的翻译过程模式，从狭义翻译过程的角度来建构。虽然叶子南反对传统模式忽略在理解和表达之间的转换过程，但是该过程具体怎样，他只用了图像概念形成来描述，对于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缺乏深入讨论。

龚光明的《翻译思维学》（龚光明 2004）以思维学为经，以翻译学为纬，以文体学为枢机，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博采相关学科前沿理论成果，营构理论大厦，从某种意义上，纠偏传统译论并填补当前译论空白。该文提出翻译是动态的语用过程，理解和表达均是动态的，充满变数的，其中既有客观因素，更有主观特点；即使是最终呈现的译文本，以读者的接受阅读来说，也充满未定性和空白点，需要读者的创造性参与。该书主要以信息传播过程来描写翻译过程，在论述理解和解释的目的性认知时，运用了阐释学和 Bell 的功能语言学观点来分析。

台湾学者黄宣范对翻译过程有这样的论述：“翻译的过程表面上是把原文（source language）的里层结构直接转为译出语言（target language）的表层结构，其实这并未能正确地刻画出从事翻译的人所经历的语言心理过程。从语言心理的运作上看，翻译者必须先将原文语法及语义两个层面深层结构了解，并分析成若干语法及语义单位，然后把这些单位一一转换成目的语言的语法及语义单位，最后经过重整组合的手续才成为译作。所以翻译在我构想的理论系统中有而且必须有三个步骤：分析、转换与组合。这很象渡河者想从河的这一边渡到对岸，如果河深流急，就不该冒然涉水而过。最好的办法是迂回绕道先行走到下游浅滩渡口处，走过去，再到上游对岸原来的目的地。渡口是转换处，也是语言中的深层结构。不经过渡

⁹ 该图的中文内容为笔者添加。

口，而强行直接渡河过去，概念上等于字字对译法，而字字对译法一般已经公认为错误的翻译方式”（黄宣范 1976:220）。黄宣范专注于认知语意学研究，谈的翻译理论自然离不开语义学。可惜以上论述只道出了翻译的程序或步骤，至于如何转换的关键过程，却在文中一笔带过了。

在翻译过程的研究上，西方学者比中国学者更为积极，这与东西方翻译研究传统是密切相关的。在西方翻译传统中，翻译过程同认识翻译本质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翻译本质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中国的传统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支流，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脉络发展，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罗新璋 1984:18-19）。在该体系的代表作《翻译论集》（罗新璋 1984）中，我们能找到关于翻译标准、原则、方法、技巧、结果等的论述，唯独缺少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1990 年代以降，中国学者谈论翻译过程的论著逐渐增加，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不及西方学者的研究。

第三节 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概况

人类对翻译时大脑运作机制的兴趣几乎与有记载的翻译研究史一样悠久（Jääskeläinen 1998:265），碍于研究手段的缺乏，翻译过程研究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随着“有声思维报告法”的运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九十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其研究方法也在最近十多年有了很大突破。以TAPs为主要手段研究翻译过程的学者，因其关注译者翻译过程的语言处理、认知行为和认知心理，被刘宓庆（2005）称为“西方当代译论的认知心理学派”，其基本理论思想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并预言“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派”。

对于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当前主要的方法是实验性研究和动态描述，数据收集的方法在实证研究前期以TAPs为主，近年来较为热门的是三元数据分析模式。目前也有一些学者（以欧洲的EYE-to-IT研究小组为代表）尝试用最先进的科技，如眼动仪（eye-tracking）、脑电（EEG; electroencephalographic）及功能性磁共振造影（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等属于神经科学领域的技术来研究翻译过程，并得出了一些初步性的研究成果（cf. O'BRIEN 2006; Grabner 2007）。但从是整体而言，眼动仪等高新技术在翻译中的适用性还处于方法论上的探索阶段。

下文主要分三个部分对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进行回顾。

1.3.1 西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综述

Riitta Jääskeläinen 的文章《翻译的有声思维研究：有注释的参考文献》（“Think-aloud Protocol Studies into Transl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是目前已出版的 TAPs 翻译过程研究最完整的文献总结，文中收集了 1982-2001 年间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论著 108 篇（本）。该文首先界定了二十年来 TAPs 翻译研

究的一些概念，强调一些 TAPs 研究的发现，并指出该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在文献整理上，遵循了下列标准：

①文章需以翻译过程为研究对象，不包括以翻译为数据来论述语言处理过程的文章；

②文章需以分析 TAPs 数据为主，包括一些采用合作翻译数据（对话口语报告或群体讨论）或反省法数据的研究；

③不包括会议论文；

④包括 TAPs 研究综述、TAPs 方法论探讨和少数即将发表的重要文章。

当然，这篇参考文献是开放性的。Jääskeläinen（2002）指出，该文献是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首次梳理，以后的版本将包括更多论著，期待读者提供修改意见并附加文献。

笔者在参阅该文及其他文献的基础上，对1982至2006的二十多年TAPs翻译过程研究的文献作了重新整理。整理包括两部分：1、删除Jääskeläinen（2002）第17条和39条文献¹⁰，添加其中疏漏的2001年以前的文献12条，2001—2006年正式发表的文献26条，整理出西方以TAPs为主要方法的翻译过程研究文献144条；2、添加近年来中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共22条，虽然论著不多，且多数为书评、评介、文献综述等，但是弥补了1998年以前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失语”状态。我们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量化统计的方法分析了现有文献的具体研究内容（如考察的变量、语言对、被试性质、被试人数、实验设计、实验结果等）。

表 1.1: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论著统计（1982—2006）

类别	专著	论文集 论文	学位 / 证书论文 共 16 (篇/本)			期刊论文 共 45 (篇/本)			共计
			博士 论文	硕士 论文	证书 论文	<i>Meta</i>	<i>Target</i>	其它 期刊	
数量 (篇/本)	5	78	7	7	2	20	8	17	144
百分比 (%)	3.47	54.17	4.86	4.86	1.38	13.89	5.56	11.81	100
			11.1			31.26			

¹⁰文献统计时不包括论文集本身，只统计论文集中相关的单篇论文；Jääskeläinen（2002）的文献第17条为论文集书名，第39条为Jakobsen作为会议论文发表的文章，故而略去。

上表显示, 1982-2006 年间发表的TAPs翻译过程相关论著, 主要收集在论文集中, 共 78 篇, 占 54.17%。其次是发表在翻译学、语言学等期刊上的文章, 共 45 篇, 占 31.26%, 这部分论文在学界有较大影响, 特别是发表在国际翻译学会会刊 *Target* 和加拿大译学期刊 *Meta* 上的论文, 引用率相当高; 其中 *Meta* 还在 1996 年第 41 期和 2005 年第 50 期开辟了《翻译过程研究》专号, 发表了多篇TAPs翻译过程研究的文章。学位/证书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 共计 16 本, 占 11.1%, 这是因为高校往往有良好的研究条件(比如设备和经费), 而且具备相当数量的被试(相对于其它独立的研究机构)¹¹。正式出版的专著仅 5 部, 只占 3.47%, 且 Krings (1986b) 和 Kiraly (1995) 的专著改自博士论文, Kussmaul (1995) 的专著只有部分内容论及TAPs翻译过程研究。

144 篇文献中, 有 81.25% 用英语发表, 12.5% 用德语发表, 少数用西班牙语、法语等发表¹²。

表 1.2: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论著发表使用的语言 (1982-2006)

语言	英语	德语	西班牙语	法语	瑞典语	芬兰语	丹麦语	合计
数量(篇/本)	117	18	3	2	1	2	1	144
百分比 (%)	81.25	12.5	2.08	1.39	0.7	1.39	0.7	100

我们还统计了论著发表数量位居前十的研究者。前三位分别是芬兰 Joensuu 大学的 Jääskeläinen、Tirkkonen-Condit 和德国 Leipzig 大学的 Wolfgang Lörcher。前十位研究者中, 德国学者占了半数, 这跟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端于德国大有关系。北欧的芬兰在该领域也有突出的成绩, 尤其是 Joensuu 大学的 Savonlinna 高级翻译学院, 其科研重点就是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

¹¹TAPs实验的被试通常是具备一定条件(双语或多语, 部分有翻译实践经验)的语言专业学生、翻译学生或职业译者, 从社会上募集符合这些条件的被试有一定困难, 而高校语言院系可以提供大量合格的被试。这也可以解释TAPs研究初期(1982-1989)的论著多以语言专业学生或翻译学生为被试的原因。

¹²研究者为了让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 尽可能地选择英语来呈现研究设计和报告。

表 1.3: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论著发表数量前十位研究者 (1982—2006)

作者	R. Jääskeläinen	S.Tirkkonen- Condit	W. Lörcher	C. Séguinot	P. Kussmaul	J. Fraser	H.P. Krings	F.G. Königs	J. Laukkanen	H.G. Hömig
数量 (篇/本)	16	13	9	8	7	7	6	4	4	4
国籍	芬兰	芬兰	德国	加拿大	德国	英国	德国	德国	芬兰	德国

统计分析的总体印象是：专著数量不多，论文考察对象比较零散，对于个别变量如翻译单位、翻译策略、参考资料运用、情感因素、自动化过程等的考察，还不足以构建翻译认知心理过程的理论模式，尚需更多成体系的实验研究和更广泛的考察对象。近年来，国际上涌现出不少以实证方法探讨翻译过程的研究小组，包括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 TRAP 小组、西班牙巴塞罗那独立大学的 PACTE 小组、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 PRONIT 小组、瑞典斯德哥尔摩及乌普萨拉地区大学教员组成的 TRAPROS 小组、芬兰 Joensuu 大学萨翁林纳翻译研究学院，以及在挪威成立的从事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国际组织 EXPERTISE。这些组织均由数名在翻译过程实证研究领域成绩显著的学者领衔，具备一定的研究经费，有较为明确的研究目标和计划，其研究成果将会给翻译理论界提供新的启示。

通过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整体描述，我们尝试按时期划分西方二十多年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以便深入探讨该研究领域不同时期的关注重点及发展趋势。

表 1.4: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历年发表的论著统计 (1982—2006)

时期	探索期 (1982—1989)					发展期 (1990—1999)											突破期 (2000—2006)					总计	
	82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2000	01	02	03	04	05		
数量 (篇/本)	1	8	8	8	8	3	9	4	8	4	6	19	7	3	9	12	1	4	9	1	12	144	
合计 (篇/本)	33					72											39						
百分比 (%)	22.92					50											27.08						100

1.3.2 西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分述

1.3.2.1 探索期（1982-1989）：探索实验方法，分析基本变量

探索期主要有两方面特点：第一、学者全面探索了有声思维法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因此大多数论著均有研究者对方法论、实验设计、被试类型、原文选择、变量控制等问题的探讨。第二、研究内容主要是翻译单位、翻译策略等基本变量。回顾探索期的研究，我们或许会发现很多方面的不足与缺陷，但是不能否认，该时期的研究成果对于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意义重大。

探索期的研究还得从题为“*Thinking-aloud Protocols*”(TAPs)-*Ein Instrument zur Dekomposition des Komplexen Prozesses “übersetzen”*¹³的博士论文提起。该论文是 Ursula Sandrock 于1982年在德国 Kassel 大学完成的，研究对象是高校英语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作者本人也是被试之一），其笔译过程的TAPs数据收集于一次小型研讨会。实验原文选自德国十年级学生的阅读教材，被试可以查字典，时限为15分钟。分析范围包括自发检索、自我修改和词汇搜索策略。作者还分别记录了每个翻译单元中被试用于思考和言语表达的时间，用于区分译文生产过程中的口述部分。通过数据分析，作者得出下列结论：①句子是翻译的基本单位；②被试一旦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倾向于保留这种方案；③被试通常为保留原文句法结构而不惜歪曲译语的习惯表达；④被试往往先尝试用最低级别的翻译单位（如单词）来翻译，尝试失败则考虑用较高一级的翻译单位（cf. Kiraly 1995:42-43）。

对于Sandrock的研究，从设计、分析到结论，我们均没有必要进行挑剔，作为第一部借用心理学方法研究翻译过程的博士论文，其开拓性、创造性意义远远大于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本身。遗憾的是，该论文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反响，在此后的三年里，没有任何关于TAPs翻译过程研究的论著面世。

1986年，Juliane House等编著的论文集《跨语言与跨文化交际：翻译与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语篇与认知》（*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¹³这是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第一部TAPs翻译研究论著，遗憾的是该论文没有公开发表，且用德文写就，在学界没有太大影响。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发表了5篇TAPs翻译研究的文章, Pamela Gerloff、Krings、Lörscher、Olshtain、Færch等学者主要探讨了翻译单位和翻译策略等变量, 被试以语言专业学生为主。其中Gerloff (1986) 是作者于1988年完成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部分成果, 被试是5名美籍法语专业学生, 实验要求在不用词典的情况下进行法译英的TAPs报告。Gerloff 设计了两类范畴来分析TAPs数据: 第一类范畴用于分析译文表达过程, 包括9组(共35个)类别: ①问题识别, ②语言分析, ③存储和提取(retrieval), ④总体搜寻与选择, ⑤推理和论证, ⑥语境分析, ⑦逻辑推理, ⑧超文本知识(extratextual), ⑨语用及任务检测(task monitoring); 第二类范畴是一系列与翻译策略对应的语言学单位: 词素或音素、单词、词组、小句和句子。该设计的目的是: ①方便了解被试在不同语言单位上花费的时间总数和比例; ②可以比较分析不同被试的翻译行为; ③可以体现不同译者对翻译技巧的取舍情况。

Krings (1986b) 是TAPs翻译研究的奠基之作。Krings先对同期的研究作了一番评述。他认为 Sandrock (1982) 的原文过于简单¹⁴, 因此不能在实验报告中发现翻译问题。Krings 选择的实验原文存在较多难点, 旨在发掘更多翻译问题。Krings 认为 Gerloff (1986) 的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 ①从二语运用的角度而不是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考察被试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因此不能区分理解上的问题、理解与表达相结合的问题以及表达的问题; ②没有界定翻译策略, 所以不能区分(人为控制的)策略和(自发的)非策略问题; ③Gerloff 把每个TAPs报告直接放到预设的35个类别中, 这就暗示了在策略和过程之间存在直接对应关系, 而在Krings的研究中, TAPs数据是翻译策略运用的标记, 是推断翻译认知心理过程的依据。

Krings 的被试是8位德国籍英语教育硕士生, 4位德译英, 4位英译德。通过分析TAPs数据, Krings 得出117种翻译策略和两个解释翻译过程的假设模式, 这两个模式采用流程图¹⁵的方式, 分别描述了L1→L2和L2→L1的翻译过程。Krings 指出

¹⁴Krings提出Sandrock (1982) 的研究中被试翻译与阅读的时间比为3:1; 而在他自己的实验中, 平均比例为25:1, 可见前者原文的简单程度。

¹⁵Krings 在流程图中采用了Færch & Kasper (1984) 关于交际策略的术语来记录翻译认知过程的序列。

被试在两种不同方向的翻译过程采用的策略类别大致相同，但运用策略的顺序有别。Kring's 的过程模式显示被试的翻译步骤是线性的，不同策略之间有序地交替进行。

1987年出版的8篇（本）论著有5篇收集于 Claus Færch 等编著的论文集《内省法在第二语言研究中的应用》（*Introspe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这些文章除了继续探索TAPs方法论、翻译策略、翻译单位之外，也开始关注翻译述要¹⁶、自动化过程、参考书运用等变量。Königs（1987）的被试是5位德国人¹⁷，他们在回译¹⁸两篇旅游指南的同时作TAPs报告。Königs 提出两种翻译单位：自发翻译单位和问题翻译单位，其中问题翻译单位能体现：①译者二语能力差别；②译者翻译水平差别；③字、句、语篇层面的翻译困难；④特定的内容困难；⑤行为的困难（cf. Kiraly 1995: 46-48）。Kring's（1987）不赞同 Königs 采用回译的方式进行实验，认为实验前德语译成西班牙语时出现错误会误导正式实验过程，且西班牙文的句法已经被德文同化；并指出，只有原创文本才能用于翻译过程实证研究。

1988、1989年均有8篇（本）论著发表，发表形式以论文集文章为主，占总数一半，其次是发表于各类期刊的文章。分析的变量以翻译策略为主，16篇中有9篇论及；方法论的探讨和批评仍为学者所关注，有6篇论及；其它变量如翻译述要、翻译理解过程、参考书运用、翻译教学等均有文章论及。数据收集方面，House（1988）首次提出协同翻译的TAPs研究，对比讨论了协同翻译TAPs与单独翻译TAPs的差别，指出：“协同翻译比单独翻译得到的TAPs资料更真实，从中体现的翻译策略也更丰富，简而言之，更有趣”（House 1988:95），并提倡以此作为翻译过程的研究方法和教学工具。协同翻译在TAPs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期和突破期均有不少学者响应。Tirkkonen-Condit（1987; 1988; 1989）这三篇文章探讨的问题和实验设计基本相同：通过分析2位非职业译者（翻译专业新生）和1位职业译者（翻译专业高年级学生）的TAPs报告，比较两者在解决翻译问题上的差别。结果表明，职业译者的翻译问题较多，解决问题的效率也较高，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其广博

¹⁶ TAPs翻译研究中，翻译述要是 TAPs 实验前，研究者就翻译任务对被试所作的说明和要求。

¹⁷ 包括两位语言专业本科新生，两位语言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和一位职业译者。

¹⁸ 所谓回译，即原文用德文写成，实验前先译成西班牙语，被试实验时将西班牙语翻译成德语。

的知识 (encyclopedic knowledge)¹⁹。Jääskeläinen 1989年发表的3篇文章修改自硕士论文 (Jääskeläinen 1987)，实验通过2位一年级翻译学生和2位五年级翻译学生从英语译成芬兰语的TAPs报告，分析了翻译过程的外部变量 (耗时和词典运用) 和内部变量 (问题解决和被试对翻译述要的态度)²⁰。

1.3.2.2 发展期 (1990-1999)：发展有声思维法，扩大变量研究范围

西方TAPs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期 (1990-1999) 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数据获取方法仍以TAPs为主，但是实验设计方案更加严谨，并且在单独翻译TAPs的基础上，发展了协同翻译TAPs的方法。第二、扩大了变量范围，从原来考察的单位、策略、参考文献等基本变量，拓展到被试的自我形象 (self-image)、翻译态度 (attitude)、任务常规性等变量。

1.3.2.2.1 发展期的整体研究情况

发展期有72篇 (本) 论著发表，其中包括21篇期刊论文，10部学位论文，3部专著和38篇论文集文章。

Lörscher的《翻译的行为、过程与策略：心理语言学的探讨》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Lörscher 1991a) 是3部专著中影响最大的，也是继 Kring (1986) 之后TAPs翻译研究的重要著作。该研究的52名被试均为未受翻译训练的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母语为德语，有8到11年英语学习经历。实验要求被试在不使用参考资料的环境下，口头翻译一篇文章，并汇报即时的思维活动。该专著在结论中提出：①翻译过程可以描写为“回顾—预期” (retrospective-prospective) 模式；②翻译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内在期望结构的控制；③翻译过程可以从意义导向 (sense-

¹⁹ 参见Jääskeläinen (2002: 132-133) 的介绍。

²⁰ Tirkkonen-Condit (1987; 1988; 1989) 和Jääskeläinen (1989a; 1989b; 1989c) 存在共同的缺点：翻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只能算是半职业译者；2-4位被试的实验数据也不够丰富，因此只能算是一次尝试性的个案研究。

oriented) 和符号导向 (sign-oriented) 两方面进行, 职业译者主要以意义导向进行翻译, 非职业译者则主要以符号导向进行翻译。

Kiraly 从事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目的是改进教学方式。他于1995年出版的专著《翻译的路径: 教学与过程》(*Pathways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Process*), 通过9名初学者和9名职业译者英德互译的TAPs实验, 对翻译单位、策略、自动化过程、译者自我形象等变量进行了分析, 并运用实证研究结果论证翻译认知过程的假设, 最后提出研究成果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这一时期出版的论文集有五种, 限于篇幅, 我们介绍以下三种。

Tirkkonen-Condit 主编的《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的实证探索》(*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Tirkkonen-Condit 1991) 收集了 Toury 等发表的四篇文章。Toury (1991) 以 Sandrock (1982) 的文章为例, 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了TAPs翻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作者指出的口头报告行为对翻译过程的潜在影响, 至今仍无法在实证研究中避免。

Joseph H. Danks等编著的论文集《口/笔译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Danks 1997) 被吴义诚称为国际上第一部以翻译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²¹。书中收录的12篇论文重点探讨了翻译的认知心理过程, 包括: ①翻译过程的研究路向与方法; ②翻译认知过程的描写和解释; ③翻译习得与翻译能力的发展; ④口译的认知心理过程研究。其中三篇文章运用了TAPs方法: Dancette (1997) 对实验过程进行录像并随后对被试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比较分析实验中可观察到的提示, 探索了构成认知图像的概念映射 (conceptual mappings) 问题, 并试图通过使用反省程序证明: 较小规模且可重复的模式不仅能很有力地解释具体实验情况, 而且对译员翻译意识的培训具有教学价值。Kiraly (1997) 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将翻译过程模式化; 论述了教学中如何提高译者的翻译意识及逐步建立自信等问题; 批评了传统的规定性教学法, 提出必须对人类认知

²¹ 我们认为, 第一部以翻译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应该是Séguinot主编的《翻译过程》(*The Translation Process*) (Séguinot 1989c)。

系统如何理解、加工和转换语篇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只有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翻译教学才可能取得成功。

Gyde Hansen的论文集《探究翻译过程：方法与结果》（*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Hansen 1999）收入6篇TAPs翻译研究文章。文集中Jakobsen 和 Schou 首次介绍了 Translog 应用程序（Jakobsen & Schou 1999）；A.Jensen 的文章《翻译中的时间压力》（“Time Pressure in Translation”）将被试分为非职业译者、年轻的职业译者和翻译专家三类，分别在不同的时间限定下完成翻译任务，实验数据包括TAPs数据和Translog数据（Jensen 1999）。

期刊方面值得关注的是 *Meta*1996 年出版的《翻译过程》（*Translation Process(es)*）特刊，收入了 Alves 等学者的 7 篇 TAPs 翻译研究文章，论文分别讨论了 TAPs 研究方法、翻译策略、翻译教学、自我形象、翻译态度、任务常规性等问题。*Target* 上共发表了 4 篇 TAPs 翻译研究论文，其中 Laukkanen（1996）研究了翻译过程中的情感态度因素；Séguinot（1996）论述了方法论、翻译单位及翻译策略等；Tirkkonen-Condit（1997）借鉴其它研究者的实验数据，从语言学角度对 TAPs 语篇进行了分析；Shreve 等（1993）则分三组实验，考察了 33 位被试翻译阅读和一般阅读的差别。另外 Mondahl 等（1992; 1995）在 *Multilingua* 上发表了两篇探讨翻译过程中词汇搜索策略的论文。

1.3.2.2.2 发展期的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研究内容，我们对这一时期的 72 篇（本）论著进行了统计，见下表：

表 1.5：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发展期（1990-1999）的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	宏观研究					微观研究												
	方法论及翻译方式				应用	基本变量				非基本变量								
	方法论	综述	批评	协同翻译	教学	单位	策略	述要	参考文献	理解	自动化	语义改变	自我形象	耗时	态度	任务常规性	文化因素	语境作用
数量（篇）	16	9	5	5	10	6	26	9	6	8	4	3	10	3	9	6	2	1

第一、宏观研究方面，探讨TAPs翻译研究方法论的文献16篇，综述性文章9篇，对TAPs方法提出批评的文章5篇。当然，上述数据存在交叉部分：一方面，有些论著在探讨方法论的同时，也包括了对TAPs翻译研究的综述和批评；另一方面，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在文献中往往也是共存的，研究微观变量的论著，往往先进行宏观的综述和方法论探讨，再提出实验设计、数据统计和结论分析。这段时期，西方学者也对以TAPs为主的实证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不少学者响应House（1988）提倡的协同翻译TAPs研究，设计实验对该翻译方式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5篇。除了协同翻译TAPs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4篇介绍或运用电脑击键记录技术的文章。Englund Dimitrova 的《从认知角度看翻译中意义的改变》²²（“Semantic Change in Translation - A Cognitive Perspective”）（Englund Dimitrova 1993）除了采用TAPs数据之外，还运用 ScriptLog 程序²³，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明晰化表达（explicitation）而对源语在语义上的更改。另外三篇 Elisabeth H. Jensen（1999）、Astrid Jensen（1999）和 Arnt Lykke Jakobesn（1999）是随着 Translog 程序的发明，介绍并应用该程序的研究论文。这些文章的出现，改进了三元数据分析模式的组成部分，是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发展。

宏观研究还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应用上，目前最直接的应用是翻译教学，即通过微观变量的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译者在翻译行为和思维上的差别，提出新的教材、教案和课堂设计。应用于教学方面的文章有10篇，其中 Kiraly（1990; 1995; 1997）通过实证研究对翻译教学提出新颖而独到的看法。

第二、微观研究层面包括基本变量研究和非基本变量研究²⁴。在基本变量问题上，翻译策略仍然是研究热点，共有26篇文章论及；翻译述要²⁵比探索期更受关注，有9篇文章论及。另外，涉及翻译单位和参考文献的文章均为6篇。

²² 该文是Englund Dimitrova（2005）著作的概述。

²³ 关于该程序的具体介绍，详见论文第三章的方法论部分。

²⁴ 事实上，这两者没有绝对的界限，根据探索期的研究情况，我们将翻译单位、翻译策略、翻译述要和参考资料这四种在探索期就已得到充分研究的变量列为基本变量，将其它没有引起太大关注的变量列为非基本变量。

非基本变量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一些在探索期没有出现过的变量(如翻译态度、语义变化、耗时、文化因素、语境作用等)和探索期较少关注的变量(如翻译理解过程、自动化过程、译者自我形象、任务常规性等)。研究者通过探索期的摸索发现影响翻译心理过程的因素²⁶十分繁杂,认为要想全面了解翻译过程,必须加强对非基本变量的研究。

1.3.2.2.3 发展期TAPs研究的被试情况

表1.6: 西方TAPs翻译过程研究发展期的被试情况(被试为10人以上的文献)(单位:人)

研究者	初学者	语言专业学生	翻译学生	职业译者	总数	被试国籍
Lörscher (1992a; 1993; 1996)	—	45	—	22	67	德国
Lörscher (1991a)	—	52	—	—	52	德国
Shreve et al (1993)	—	10	10	13	33	美国
Fraser (1996c)	—	—	—	33	33	英国
Alves (1996)	—	12	6 ²⁷	6	24	葡萄牙/巴西
Fraser (1994)	—	—	—	21	21	英国
Kiraly (1990; 1995; 1997)	9	—	—	9	18	德国
Jääskeläinen (1990b; 1996b)	4	—	4	4	12	芬兰
Matrat (1992)	3	—	6	3	12	美国
Fraser (1993)	—	—	—	12	12	英国
Mondahl (1995; 1996)	—	—	5	5	10	丹麦
Tirkkonen-Condit (1997)	2	—	2	6	10	芬兰

首先,被试人数有明显增加。研究者发现,要使实验数据具备统计意义,被试数量必须达到一定要求。但是,TAPs数据的收集、转录和分析要比社会语言学的其它数据收集法(如问卷调查)复杂得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²⁵ 翻译述要的雏形出现于Jääskeläinen (1987),当时运用了“assignment”即翻译任务或翻译要求之意。Janet Fraser (1993)借用了德国功能学派关于翻译委托(translation commission)的概念,提出“translation brief”,指翻译委托人对译文的具体要求。

²⁶ 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各种因素以不同的方式促进或干扰翻译的进程。

²⁷ 翻译学生在Alves (1996)中被作为半职业译者考虑。

Séguinot指出两个半小时的分析报告为100页纸 (Séguinot 1996: 76)。因此, 如何在研究人员能力范围内选择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被试, 是研究小组或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统计显示, 这一时期有12例TAPs研究的被试人数超过10人, 其中 Lörcher (1992a; 1993; 1996) 的实验人数为67人, 高居榜首, Lörcher 在1992年之前就收集到52名语言专业学生的TAPs数据, 其后增加了22名职业译者的TAPs数据, 扩大了实验规模, 提高了数据的统计学价值。

其次, 被试类型更加多样化。探索期 TAPs 研究的被试主要是非职业译者, 如语言专业学生或翻译学生, 这是考虑到职业译者思维过程的自动化程度较高, 不容易报告出思维信息。然而, 学生被试的数据过于片面, 研究结果不具备普遍性。因此, 多数研究者增加职业译者被试, 通过对比实验来揭示翻译思维过程。统计显示, 除了 Lörcher (1991a) 没有职业译者被试, 其它研究的被试群体中均有一定数量的职业译者。而且职业译者往往作为对比的一方, 另一方则由语言专业学生、翻译学生、翻译初学者、半职业译者等组成。

再次, 被试的国籍更为分散。TAPs 翻译研究发源于德国, 因此探索期的研究主要在德国展开, 采用德国籍被试从事德语和其它语言之间的翻译。TAPs 研究在发展期受到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 在北欧的芬兰、丹麦、瑞典和挪威, 西欧的英国和法国, 美洲的美国、巴西和加拿大, 各国学者在实验中大多采用本国籍被试, 从事母语和外语之间的翻译。研究阵地和选取被试的国籍范围的扩大, 提高了翻译过程 TAPs 数据的普遍性、广泛性和代表性。

1.3.2.3 突破期 (2000-2006): 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实证与思辨结合

西方TAPs翻译过程研究突破期 (2000-2006) 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在方法论上, Translog 和 TAPs 结合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虽然前期研究也采纳了由单独 TAPs或协同 TAPs、问卷采访、译文评估等组成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但是在本质上均未跳出内省法的框架 (译文评估则是以结果数据推导翻译过程), 因此受限于内省法在生态效度 (ecological validity)、数据主观性等方面的不足, 有不少负面反馈。Translog 的出现是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虽然该程序数据不能直接反映被试的思维心理过程, 但是它与 TAPs 在不同方式上

的结合，从外部行为和内部思维两方面体现翻译过程，进而组成的三元数据分析法，成为当前翻译过程实证研究较为热门的模式。第二、这一时期的研究显示了实证与思辨结合的趋势，虽然这样的文献不多，但是这种文章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暗示：实证研究如果能够和思辨分析很好地结合，则论述有理，证明有据，或许能给翻译过程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首先，我们回顾论文的发表情况。这一时期共有39篇（本）论著发表，包括17篇期刊文章，1部博士论文，1部专著，20篇论文集文章。

Englund Dimitrova的《翻译过程中的专业技能和明晰表达》（*Expertise and Explici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Englund Dimitrova 2005）是突破期惟一的著作。正如书名所示，该研究关注两大问题：其一是译者执行任务时专业技能的表现，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即时间的分配特征、任务的初始计划、译文书写过程的片断特征、对译文的修改情况；其二是明晰表达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为此作者首先分析了俄语和瑞典语的文本衔接情况，接着运用结果数据和过程数据论证源语中内隐的衔接如何在译文中得到明晰表达。总结部分，作者归纳了翻译过程专业技能的特征，提出了明晰表达能否作为翻译普遍性原则的问题，并指出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普遍性和对翻译教学的意义。实验设计方面，该研究运用了三类被试²⁸的TAPs数据、ScriptLog数据和译文数据，是目前运用三元数据分析模式研究翻译过程的典范。

这一时期出版的相关论文集主要介绍以下两种。

Tirkkonen-Condit 与Jääskeläinen主编的《探讨与描绘口笔译过程：实证研究的视角》（*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Tirkkonen-Condit & Jääskeläinen 2000）收入相关文章6篇，分别从方法论、协作翻译、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翻译教学、参考资料等方面进行实证探讨。

Alves主编的《三元数据分析法：透视翻译过程研究》（*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Alves 2003）是这一时期

²⁸ 被试包括3位语言专业学生、2位翻译学生和4位职业译者。

的重要论集，该文集以三元数据分析模式为主线，收集了7篇相关文章，从理论、操作和教学应用三个层面探讨翻译过程。Hansen (2003) 属于理论探讨型，指出三元数据分析模式提高了过程数据的严谨性和分析的清晰度。Alves (2003) 和 PACTE (2003) 属于思辨与实证结合型：Alves等运用关联理论，以翻译能力为导向，调查译者解决问题和作决定的特点，数据包括Translog、反省TAPs等；PACTE小组则首先重提翻译能力模式²⁹，接着简单介绍该研究项目及设计，最后对上述模式提出修改方案，其多元数据来自问卷、PROXY记录程序和反省TAPs。Jakobsen (2003) 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该文运用TAPs和Translog数据来观察TAPs对于翻译速度、修改过程、翻译单位切割的影响，结论指出TAPs在较大程度上减慢了翻译速度（约比正常速度减慢25%）、基本上不影响修改过程、增加了翻译单位切割的相对数量。Rothe-Neves (2003) 主要研究工作记忆对正式翻译行为的影响，Barbosa & Neiva (2003) 和Livbjerg & Mees (2003) 则将实证研究结果应用于翻译教学。

期刊文章的发表情况与发展期类似，*Meta* (2005) 出版了《口/笔译的过程与途径》(*Processes and Pathway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特刊，共收集口/笔译过程研究的文章27篇（2篇口译研究）。这些文章包括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其中论述或运用TAPs、Translog、三元数据分析模式的文章有11篇。Krings (2005)、Hansen (2005) 和Lörscher (2005) 主要探讨了方法论问题。Heiden (2005)、Asadi (2005)、Ronowicz等 (2005) 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翻译策略、词汇存储和词典运用等具体变量。Rydning (2005)、Tirkkonen-condit (2005) 和PACTE (2005) 则结合了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Rydning运用认知合成理论重新提倡巴黎学派（释义学派）的翻译模式；Tirkkonen-condit用实证数据支持监控模式；PACTE小组运用多元数据调查翻译能力及其习得。另外，Lee-Jahnke (2005) 提出过程导向的翻译培训手段，属于教学应用层面；Kussmaul (2005) 运用多人对话TAPs分析了可视性图例对成功翻译的帮助，是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中比较新颖的课题。这段时间，*Target*上有3篇TAPs研究论文，其中Bernardini (2001)

²⁹ 之所以说是“重提”，因为该模式是PACTE小组于1998年设计的。

和Jääskeläinen (2002) 是两篇影响较大的综述性文章, Breedveld (2002) 探讨了翻译过程的时间分配问题, 是研究翻译耗时的重要文献。

表 1.7: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突破期 (2000-2006) 的研究内容

	宏观研究							微观研究												
	方法论及翻译方式						应用	基本变量				非基本变量								
研究内容	方法论	综述	批评	方式 (协同翻译)	运用 Translog 程序	三元 数据 分析法	教学	单位	策略	述要	参考文献	理解	自我 形象	耗时	工作 记忆	世界 知识	创造 性	翻译 能力	修改 过程	自动化\语义 改变\态度\ 任务常规性\ 文化因素\ 语境作用
数量 (篇/本)	12	4	1	5	13	19	7	1	12	1	4	3	1	6	1	1	1	2	1	0

突破期研究的内容有以下特点:

第一、宏观研究上存在这样的现象: 虽然这段时期发表的论著只有39篇, 探讨方法论的文章却有12篇, 这一比例远远高出发展期³⁰, 这说明随着研究的发展, 方法论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3篇论著运用了Translog 程序, 占文章总数的1/3。在经历十多年关于方法论的探讨之后, 学者们迫切需要一种实验方法来客观记录、分析翻译过程, Translog 程序应运而生, 它为囿于内省法框架的实验方法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同时我们发现, Translog 并没有取代 TAPs, 而是与 TAPs 一道, 组成了目前较为理想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³¹。经统计, 突破期的39篇文章中有20篇用到三元数据分析法, 占51.3%, 且这20篇中多数研究的数据由 Translog 和 TAPs两类数据组成。

第二、微观上, 基本变量研究还是以翻译策略为主, 但翻译单位、翻译述要、参考文献等研究已不再热门, 研究者转而探讨非基本变量, 工作记忆、世界知识、创造性、修改过程和翻译能力等都成为这一时期的新课题。这也是翻译过程研究的

³⁰ 发展期的 72 篇文章只有 16 篇讨论方法论问题。

³¹ 虽然这一模式并不是新发明, 而且在前期TAPs研究中也受到关注和应用, 如Li (2004) 就抽样统计了 15 篇发表于 2002 年以前的文章, 有 60%的研究运用了由TAPs、问卷采访和文档分析等组成的三元数据分析法。

必然趋势，只有清晰认识影响翻译过程的各种变量，翻译过程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描述。突破期的被试情况与发展期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1.3.3 中国学者对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

1.3.3.1 中国译界TAPs翻译过程研究概述

中国学者开始从事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时间晚于西方学者。第一篇介绍西方TAPs 翻译研究的文章是蒋素华（1998）《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该文介绍了Lörscher 用心理语言学方法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指出通过“有声思维”获得数据的可靠性，以及在解释这些数据时应注意的问题。此后，各类期刊发表了相关论文十来篇，并有多部学位论文和专著面世。

表 1.8: 中国译界 TAPs 翻译过程研究论著统计

	专著	论文集 论文	学位 / 证书论文			期刊论文			共计
			博士 论文	硕士 论文	证书 论文	翻译类 期刊	外语类 期刊	其它 期刊	
篇数 (篇/本)	2	0	1	4	0	4	11	1	23

表 1.9: 中国译界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内容

	宏观研究						微观研究						
	方法论及翻译方式						应用	基本变量				非基本变量	
研究内容	方法 论	综 述	批 评	方式 (协 同翻 译)	介绍、 运用 Translog 程序	三元 数据 分析 法	教 学	单 位	策 略	述 要	参 考 文 献	翻 译 能 力	文 化 因 素
篇数 (篇/本)	6	7	2	1	2	1	1	3	6	1	0	1	1

中国译界对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集中在宏观方面。文献梳理表明，专门论述或论及方法论的文章有 6 篇。蔡寒松（2000）《心理学口语报告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 TAPs 的起源及分类、对研究翻译过程的重要意

义、实施过程的具体步骤和运用该方法的注意事项。李德超（2004）《TAPs 翻译研究的前景与局限》在回顾 TAPs 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它在操作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存在的不足，并就 TAPs 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姜秋霞等（2005）《翻译研究实证方法评析——翻译学方法论之二》对实证方法的应用形态、内在逻辑、发展空间等问题进行基本论述，文章部分论及以 TAPs 为主的实验研究方法。郑冰寒（2006）《洞悉翻译过程的辅助工具——Translog 程序介评》介绍了 Translog 程序的功能、操作步骤以及在写作和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该文根据相关文献，分析了 Translog 程序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两种运用方式；结论部分指出该程序固有的缺陷、有待改进之处，及其在英汉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另外苗菊（2003）和崔霞（2004）也论及 TAPs 研究的方法论。

综述性文章有 7 篇，李德超（2005）《TAPs 翻译过程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篇，介绍并评论了 TAPs 翻译研究在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翻译述要和翻译方式上取得的成就，总结出该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对翻译教学的启示。苗菊（2005; 2006）、文军等（2006）和颜林海（2006）也从文献综述的角度介绍 TAPs 翻译研究。吴义诚（2001）和王金铨（2006）则是对国外文献的评介。

微观变量的分析以翻译策略为主，其次是翻译单位。蔡寒松等（2000a; 2000b）分别运用三名被试的 TAPs 数据对英语因果关系句汉译时的动态思维过程和英语双重否定句汉译过程进行了个案研究，具体考察了思维过程中元认知和认知策略的应用情况。张健（2004）、刘立香（2006）、周亚莉（2006）等的硕士学位论文主要对英汉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进行了研究。文军等（2005）则运用即刻内省法（*immediate retrospection*）探讨了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

苗菊于 2003、2006 年分别出版了《探索翻译过程与译者》和《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发展》两本英文专著，后者是其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后项目成果，该书在研究翻译过程与译者的基础上，分析了译者的能力构成，并构建了发展译者能力的翻译教学模式，应用于翻译人才的培养。

赵冉于 2004 年递交给 Carnegie Mellon 大学现代语言系的博士论文《专家与学生译者说明文英译汉过程的比较研究》综合运用了 TAPs、反省 TAPs、观察笔记

和译文更改记录等方法,探讨了专家译者和学生译者在翻译过程的认知策略上的差别,并进而总结出翻译专业技能所体现的四方面内容。这篇论文的实验设计比较严谨,研究方法上虽然没有论及 Translog 等新技术,但其由即时 TAPs、反省 TAPs、观察笔记等构成的三元数据模式基本上保证了实证数据的充分性,在数据分析与实验结果的论述上也显得很有章法,值得后来的研究借鉴。这篇论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被试的分类不够细致;随着 TAPs 翻译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要对被试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和观察(cf. Shreve 2002)。第二,研究目标过于宏观,探讨了英译汉的整个翻译过程;根据 Jääskeläinen 的观察,TAPs 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从全面探讨翻译过程转向对翻译过程中具体问题的研究(包括验证一些具体假设)(Jääskeläinen 2002:109)。

1.3.3.2 中国学者从事英汉翻译实证研究的意义

144 篇(本) TAPs 翻译过程研究文献从语言对的角度可以有如下总结³²:

表 1.10: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中所考察的语言种类(1982-2006)

语言	英语	德语	法语	芬兰语	丹麦语	西班牙语	瑞典语	葡萄牙语	俄语	日语	挪威语	希伯来语	意大利语	荷兰语	韩语	汉语
数量(篇/本)	74	31	27	22	14	8	5	3	2	2	1	1	1	1	1	1

表 1.11: 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中位于前五位的语言对(1982-2006)

语言对	英语和芬兰语	英语和德语	英语和法语	英语和丹麦语	德语和法语
数量(篇/本)	22	14	13	11	7

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丹麦语、瑞典语以及俄语均属于印欧语系(Crystal 1997:443-451),因此英-德、英-法、英-丹、德-法、德-西、德-葡、瑞-俄等语际翻译,均是在亲属语言之间进行。相比非亲属语言,亲属语言之间的同源词数量更多,形态变化和语音系统等方面更为相似。芬兰语在上表中是例外,它属于乌拉尔语系,因此芬-英和芬-德的 TAPs 翻译过程研究,或

³²有些文章不涉及具体语言对,如综述性文章、方法论探讨等。

许可以把实证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非亲属语言之间的翻译。但是鉴于芬兰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密切关系³³，芬兰语和英语以及芬兰语和德语之间的翻译不能作为非亲属语言翻译的典型代表。

因此我们设想：在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中，是否可以把英汉语作为非亲属语言的代表？汉语产生于东亚腹地，具有形式流散疏放、重“神驭”而不重“形驭”的特色，与印欧语系语言在历史、地缘及语言特征上相去甚远。刘宓庆（1993:140-141）针对英汉两种语言架构的本质差别指出：“汉语与英语殊异，差异起于文字体系的差异性。汉字构形独特，是一种欲集形、音、义于一体的综合型象形符号体系，而以图像表意为其主要功能。汉字不具备类似印欧语那种形态发生学机制（即形态音位发生机制，主要通过音位交替或音位变换来表现和标定语法意义），因而不具备由形态来标定的时态、语态、语气、性、数、格、级等等比较严谨的形态程式体系及语法范畴。汉字以词汇手段表示它认为有必要表示的语法功能和关系，而对它认为没有必要表示的时态、语态、格、数等等语法范畴则‘尽在不言中之中’。可见汉语这种基本上利用词汇的语法形式灵活性、随机性很大。汉语语法不具备严格的形态程式而呈隐性（covert），这样就在本质上与英语及其他印欧语语法有了区别，后者是显性（overt）”。另外，由于任何语言都必须植根于特定的文化母体中，世界上还找不到、也不可能存在不植根于某种文化的自然语言。文化是语言最基本的也是最大的参照系。以语言的本体论观点来看，从文字体系、语音体系、词汇体系、语法体系到表现法体系五个层面无一不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这些体系的本身就是文化现象。语言的民族文化性决定了它的独特性，从而使翻译理论趋于多元化：适合于某些特定的语言的语际转换规律不一定适合于另外一些语言，问题常常出现在更为广泛、深刻的文化层面。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影响语际翻译的难易程度。同时精通汉语、英语和法语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指出，“中、英文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西方语言之间的差

³³根据印欧语系的“黑海—里海起源说”，印欧语在亲缘关系上与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最为接近，而芬兰—乌戈尔语族起源于乌拉尔山的中部地区，该地区与印欧语系的发源地里海北岸草原地区又是相邻的，故印欧语系与乌拉尔语系具有密切的联系。“黑海—里海起源说”的主要提倡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古学研究所的女学者M.Gimbutas。具体参见Mallory（1997: 297-299）。

距，因此，中英互译的难度远远大于西方语言之间的互译”（许渊冲 1999: 4），并用他个人的实践经验补充说明以上看法：“如果一首诗从中文译成英文需要 1 小时，同一首诗从英文译成法文则最多只要半小时。中英互译难于西方文字互译”（许渊冲 2003: 52）。许先生没有进一步论证中英文之间的差距如何大于西方语言之间的差距，我们却在刘宓庆的一段论述中找到一些提示，他依照描写的原则，以语言事实为依据，考察了德、英、汉三语在展开一个语段，表述同一理念时的共同点和差异；并采用尼采的一段原文为语料（德语共 85 字，英语共 96 字，汉语为 196 字），推导出以下事实：

第一、德、英、汉三种语言各有其相同及相异于其他两种语言之处：相同者，一、交际功能一致，都是为了表述某一相同意念的扩展；二、词有词类，句有句式，三语皆然；三、德、英二语与汉语有大致相应的句法项（即主、谓、宾、定、状），德、英相应者尤为明显，甚至分布模式亦大体相应。相异者：一、文字系统殊异，尤以汉语最有特色；二、汉语根本没有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的形态变化（指屈折变化 inflexion）；德英各有其殊异于对方的屈折变化；三、汉语属于话题优势语言，句子可以没有施事主语，但大体有一个话题。德、英句子都必须有主语，形成“主谓优势”语言；四、语段发展（即汉语所谓铺叙）的特点不同。例如，句法层级标志殊异。所谓句法层级指主句（上位）及从句（下位），从句不能独立于主句，主句中的其一部分（或全部）受从句描写、限定、制约（提出某种条件为前提）。德、英由于有层级标志，所以看得出来那部分是定语从句、那部分是状语从句。汉语则全无这类结构性标志，汉语的办法是重提被描写、被限定、被制约的部分。这是从西语译成汉语时字数不得不大大扩充的原因之一。

第二、可见三语均各有其不同于其他二语的异质性。但“相异”也不是咸出一辙。三语中，德语和英语之间关系较密切，属于“亲缘语言”（relative language, O. Jespersen 1913）；汉语与德、英则纯属“萍水相逢”，更需要知己知彼的了解。（刘宓庆 2001:151）

可以设想,运用有声思维法研究翻译过程,以非亲属语言(如英汉翻译)为研究对象与以亲属语言(如英法翻译)为研究对象所获得的结果应该存在差别。这一语言现实,首先决定了中国的翻译理论断不可与其他的翻译理论体系混为一谈;其次,也说明建立在其他语言翻译基础上的翻译过程研究无法简单推及到有汉语参加的翻译过程研究;再者,TAPs 翻译过程研究需要进行多种语言的实验研究,其中包括有汉语参加的翻译活动,缺少了汉外翻译,研究成果的普遍性将会大受影响。目前就英汉两种语言作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文章数目甚少,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与中西方哲学思维差异有着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实证研究,中国哲学重理论思辨。因此,同样对于人类迫切需要了解的翻译心理过程,西方学者在 1980 年代初掌握 TAPs 方法后,20 多年间有 144 篇(本)相关论著问世;而中国学者发表的相关论著只有 20 余篇,其中真正开展实验研究的文章更少。

其次,这与跨学科研究在中西方发展的不同步有关。上个世纪下半叶,由于跨学科研究连续获得了好几次诺贝尔奖,西方学界开始对该新兴领域刮目相看,二十世纪 60、70 年代更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而中国兴起“交叉科学热”的标志是 1985 年召开的全国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口号。因此,同样作为跨学科研究产物的 TAPs 翻译过程研究,西方学者自然比中国学者有更早的起步和更丰硕的成果。

再次,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在操作上存在较大的难度,特别是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环节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能够充分说明客观事实和主观成分之间关系的固定模式(姜秋霞、杨平 2005:25)。因此,想要结合汉外互译的特点来整理出一套融合方法论、研究设计、数据分析的固定研究模式,中国学者尚需一段探索的过程。

以英汉语作为语言对象,采用 TAPs 方法来研究翻译过程,无论是对西方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还是对有汉语介入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使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得到来自非亲属语言的数据论证;另一方面,也能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在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方面与西方接轨,互相补充,互相佐证。

第二章 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理论概述

Choice and decision-making are perhaps so fundamental in translation that almost any theoretical or research-oriented treatment is bound to relate to them in one way or another.

选择与决策行为在翻译过程中是如此地重要，几乎所有理论型或调研型研究都与之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

Sonja Tirkkonen-Condit (1993:8)

第一章文献回顾中，笔者详细爬梳了西方和中国二十多年来运用有声思维法等考察的翻译过程的具体内容，发现现有文献尚未对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作出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描述，而“选择与决策行为在翻译过程中是如此地重要，几乎所有理论型或调研型研究都与之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Tirkkonen-Condit 1993:8）。因此，笔者将本论文的具体研究目标确定在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上。本章主要从理论上分析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首先提出翻译是“作选择”的过程这一命题，并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继而论述了选择行为的博弈性、顺应性、指标性和体验性等特点；最后指出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可以从翻译单位的选择、决策过程的选择、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和翻译策略模式的选择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第一节 翻译是“作选择”的过程

本节试从以下几方面分析论证翻译是“作选择”的过程：首先，翻译是问题解决的过程，这一论断是探讨决策过程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翻译是“作决策”的过程；再次，语用学如何对翻译选择行为进行解释；最后，中外译界学者对这一论断的认识和讨论。

2.1.1 翻译是问题解决的过程

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过程与决策过程有怎样的关系？Wilss 认为：“虽然两者的界限模糊，且常有人将它们彼此等同，但概念是存在差别的。问题解决过程包含决策过程，决策过程是问题解决过程的关键环节，通常是当问题解决过程的操作步骤明确提出决策需求时，决策行为才开始运作”（Wilss 1996:175）。

根据林崇德等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的解释：问题解决是思维的一种形式，由一定的问题情境引起，经过一系列具有目标指向性的认知操作，使问题得以解决的心理过程（林崇德等 2004:1314）。John R. Anderson（1980）指出，问题解决具有以下三个特征：①目标指向性，解决问题的目的就是把问题的初始状态转变为目标状态；②操作系列性，问题解决的活动包含一系列认知操作，只有单一认知操作的过程不能称为问题解决，比如问一个成人“一加一等于几”，他立即就能说出答案，这算不上是问题解决；③操作认知性，问题解决的活动必须有认知操作的参与，单纯的身体动作系列不能称为问题解决。问题解决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受问题的性质以及问题解决者的动机、能力、经验等因素影响。从逻辑分析看，问题解决的过程可分为发现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四个阶段。但实验研究表明，问题解决并非简单地、直线式地进行，而是一个反复的、曲折的过程。

所有的翻译行为都是问题解决行为（Kaiser-Cooke 1994:137）。首先，翻译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目的指向性的问题，即在忠于原文的前提下，得出受目的语系统认可与接受的译文。其次，翻译问题的解决有一系列的操作过程，需要运用不同的策

略，遵循一定的步骤进行。问题起源是译者根据原文理解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译文，结合特定语境对各种选项进行评价、删选并作出决策，最后还需要进行译文修改和润色。第三，翻译问题的解决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需要译者动用记忆、注意、感知、知识表征、推理等认知行为。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译者工作的描述，清晰地看到问题解决的具体步骤。第一步，翻译问题的出现，译者识别问题类型并认为有必要解决该问题。第二步，译者有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方向和目标，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一过程中译者需要综合考虑外部与内部的因素，作出一系列宏观或微观层面的决定¹。第三步，译者会考虑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或者提出解决问题的术语²；或者尝试运用不同的具体方案。第四步，译者决定一个策略，并对结果进行评估，看是否符合预定目标。最后，翻译结果接受出版社编辑、老师或普通读者的评价和反馈。

Lörscher (1991:119) 将正在进行的翻译任务划分为策略型翻译和非策略型翻译，前者从遇到一个翻译问题开始，到提出一种解决方案（或者表示暂时无法解决）时结束，需要译者运用策略进行问题解决；后者从选取一定单位的原文开始，到该原文被译成目的语或出现翻译问题时结束，由于不存在翻译问题，译者不需要考虑策略的使用，整个过程比较顺畅无阻。Mondahl & Jensen (1996) 指出翻译过程本身包含两个主要范畴：自发序列 (spontaneous sequences) 和问题序列 (problem sequences)。前者的特点是翻译过程没有停顿，没有问题的外部迹象，译者运用的是自发的、技巧型的知识和经验型知识中最自动化的部分；后者的特点是翻译过程中有停顿，译者的自动化技巧和经验性知识不足以解决翻译问题，必须求助于受控的知识类型，并吸收已分析知识，译者意识到存在多种选择且必须作出有说服力的抉择。

Lörscher (1991) 和 Mondahl & Jensen (1996) 对于翻译过程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即整个翻译过程包括译者运用翻译策略解决的问题序列和凭借自动化技能解

¹ 比如译者会去了解：原语作者是谁？为什么而写？写给谁看？译语的功能是什么？作者为什么把这些词安置在这里？这些词在具体语境中是什么意思？等等。具体论述参见Nord (1991) 对于以翻译为导向的语篇分析的综合说明。

² 比如译者会问自己：是直译？以译语文化素材来替代？还是加注？

决的自发序列，前者属于策略型翻译，后者属于非策略型翻译。但也有学者不赞同非策略型翻译的说法。Ritva Leppihalme 提出：“我宁愿认为职业译者那种顺畅无阻的翻译是翻译策略的一部分，只是这种策略已经自动化到一定程度，译者不需要停下来有意识地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同时，由于整个行为的自动化，译者不容易说明该过程发生了什么”（Leppihalme 1997:25）。Leppihalme 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们更倾向于 Lörcher 等对翻译过程或翻译策略的划分。首先，策略型与非策略型翻译的划分有利于通过 TAPs 实证研究来考察翻译策略。其次，我们假设“学习在本质上是归纳型的”：初学者解决翻译问题一个重要的方法是试误——随机选择一个选项，通过观察、评估该结果是否符合种种限制和要求，最终作出决定；而职业译者试误的行为相对较少，面对潜在选项，他们具备较为自觉的决策行为。因此，在翻译学习过程中，初学者通过体验个人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掘决策策略，提高决策能力，最后固定为内在的自动化的技巧，来帮助他们快速处理常规的翻译问题。从以试误方式解决问题到自动化解决问题，是译者翻译能力提高的表征，也就是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序列减少，自发序列增加。因此自动化过程不应该属于解决问题的策略之一。

中西方翻译研究中系统描述和讨论问题解决行为的论著相对比较缺乏，在 Snell-Hornby（1988），Jeremy Munday（2001）以及 Mona Baker（1998）等翻译学的综合性论著或百科全书中均没有详细解释或探讨“翻译是问题解决过程”这一命题。一些论著即使涉及翻译的问题解决或类似术语，不同作者的理解也并不统一，对翻译问题（translation problem）与翻译困难（translation difficulties）的差别也未作深入考察³。因此我们认为，以问题解决为切入点来探讨翻译过程，或许能得出新的发现。

³ 在翻译教学中，对翻译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学员认识问题，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翻译问题不同于翻译困难。翻译困难是某个译者或学员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知识或翻译能力上的不足或没有适当的文献辅助资料而遇到的主观上的困难，而翻译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翻译问题可以分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诺德指出，在功能翻译中，翻译问题的处理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参见张美芳 2005:64）。

2.1.2 翻译是“作决策”的过程

决策的概念最初运用于经济学和统计学，如今广泛运用于哲学、心理语言学、数学、控制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林崇德等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对“决策”的定义是：“决策（decision），对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评估比较，最后作出选择的过程。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一般将决策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① 辨识问题；② 收集信息；③ 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④ 评估被择方案；⑤ 选择方案；⑥ 付诸实践”（林崇德等 2004: 654）。决策者做决定之前，往往面临不同的方案和选择，决策者需要对各种选择的利弊、风险做出权衡，以期达到最优的决策结果。

翻译是“作决策”的过程，在翻译的认知过程中，译者需要针对不期而至的翻译问题，提出可能的选项并从中作出选择：在译与不译之间，在直译与意译之间，在归化与异化之间作决策，在多重选项中决定最理想的译文。

捷克著名翻译理论家 Jiri Levy 最早注意到这一点，他在《翻译作为决定过程》（Levy 1967）中指出，翻译⁴过程包括一系列的步骤，每个步骤都会涉及到一次选择，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Levy 认为，就目的而言，翻译是一个交际过程，目的在于把原文的信息传达给另一种语言的读者；就译者在翻译过程各个阶段的实际工作来说，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他把翻译过程比作下棋，一系列的情形犹如棋步，一步棋可能有多种走法，对弈者需要作出抉择。Levy 还将“决策”这一术语界定为：译者面对翻译困难时，从众多问题解决方案中选择一种恰当可行的方案，一旦作出决策，该决策就会影响相继的选择。因此，无论决策行为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它在本质上是分级的而不是简单连续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决策研究集中在开发形式模型，使之有效地应用于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比如通过筛除低效率的策略，开发执行任务的最佳策略；所有的决策策略均包括决策目标、决策者和若干决策原则等。这种形式模型的研究，不利于决策理论在翻译领域的发展，因为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行为首先受到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Levy（1967）提出（翻译的）决策行为会受到译者的审美标

⁴ 包括美国语言学家 Jacobson 所区分的“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Jacobson 1959）。

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Thomas S. Wallsten (1980:X) 认为 (翻译的) 决策行为是复杂的认知任务, 常常依赖于翻译时的具体情形, 译者的行为方式受控于译者本人的记忆容量、记忆力和信息加工能力等。Wilss (1996:180) 也认为译者很难作出一个客观的决定, 不同译者之间的决策行为难以一致, 决策行为是由译者的个体特征 (包括个性、知识、社会文化和教育背景等) 决定的。这说明, 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常可用不同方式来设定, 依据是一系列相关因素: 如足够的相关知识、详细的问题特征、可以运用的选项, 以及译者的自我感觉和职业面貌⁵。

译者本身的认知差别是影响决策行为的内在因素, 而外在语境 (包括宏观语境和微观语境) 也是影响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根据决策过程中的宏观语境, 译者一般会提出定位于全文的策略, 并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贯彻到底。这需要译者完全把握原文内容、交际目的、读者的阅读期待等。对宏观语境的把握, 可以参照Harold D. Lasswell的传播学模型: 谁 (Who?), 说什么 (Says what?), 通过什么渠道 (In what channel?), 对谁 (To whom?), 产生什么效果 (With what effect?)。

图 2.1: Lasswell 的传播学模型



Wilss指出:

专业性越强的文本, 如科技、商务等文体, 译者越容易把握宏观语境。作者、译者和读者在这类文体上很少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译者如果按照功能对等的原则进行翻译, 即便涉及跨文化方面的障碍, 也是容易解决的, 无须

⁵ 如译者对自己是新手还是专家的不同认可, 会影响其翻译时的决策行为。

担心读者会提出截然相反的要求。然而，微观语境上的问题，即便是富有经验的译者也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普通的问题解决—决策策略，如 Miller 等（1960）提出的 TOTE（test-operate-test-exit）模型由于缺乏针对性，无法帮助译者寻找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相对语法规则而言，微观语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受一定范围的局限，翻译问题越特别，普通的问题解决—决策策略越无法启用。（Wilss 1996:176-177）

翻译作为决策过程的研究，目前还不够成熟充分，处于翻译研究的边缘。翻译理论家或实践者很少使用某种决策理论来提高翻译活动的质量。正如 Gerzymisch-Arbogast（1994a:281）指出：目前尚未有系统的策略来帮助译者在犹豫时作出选择，比如一个术语是否应该根据其专有定义翻译，什么情况下该术语会偏离其专有定义的描述等问题。为了帮助译者在复杂多变的翻译问题面前更好更快地作出决策，学界有必要对决策过程进行深入的描写与探讨。

2.1.3 选择行为的语用学解释

运用语言学理论来解释相应的翻译理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50-1980 年代，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就一直处于翻译研究的主导地位，而翻译学科也长久以来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因此，我们有必要借助语言学理论来论证翻译是“作选择”的过程。

Jef Verschueren 的语用观认为，语言的使用，说到底是“一个连续的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处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这种语言选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选择发生在语言结构的任何一个层面，从语音、语调到语法结构的选择；从语码到语篇的选择等；第二，语言使用者作出的选择不只是语言形式，还包括语言策略；第三，语言使用者所作出的选择有不同程度的意识性；第四，选择发生在语言产生和语言理解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都要作出选择；第五，语言使用者没有权利在选择与不选择之间作出抉择，因为语言使用者一旦进入语言使用过程，也就只能选择心目中最合适的和最需要的来进行交际；第六，可供语言使用者

选择的语言手段和策略不是机会均等的，因为所选择的具体手段和策略受到认知、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七，语言使用者在语言手段和策略上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与之相关的其他语言或非语言因素出现变化（Verschueren 1999:55-58）。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使用过程，而且是两种以上语言之间复杂的转换过程。因此，除了惯用的固定表达（如科技术语的翻译）和高度标准化的文本模式（如商务合同的翻译），翻译与其它语言运用形式一样，充满了选择与决策行为。对于翻译选择与决策过程中存在的诸如译者的知识背景、关注点、译者态度、文本的难易程度、语境的模糊程度、各种干扰等制约因素，机器翻译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近半个世纪以来，机器翻译仍然不能模仿神经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是因为机器翻译在原文理解和译文重建过程中缺乏认知能力。Wilss（1996:179-180）提出，翻译中之所以充满了决策与选择，问题解决之所以充满障碍，根本原因是翻译过程中存在“第三种可能（*Tertium Datur*）”：语言的运用不能以二元相对论（对或错）的方式来对待。翻译过程中的源语和译语不是机械的对等关系，很多时候需要译者从一系列的选项中进行选择和决策。翻译过程中的选择行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译本的选择。Verschueren（1999）提出：（语言）选择的具体手段和策略受到认知、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中，这种影响和制约体现在最初的译本选择上。Venuti指出：翻译是在致力于转述一个异域文本，以达到理解与交流之目的，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上。而选择的依据和标准，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密切相关（Venuti 2001:359-360）。

第二、文化立场的选择。当译者协调了各种外部宏观因素的制约，选准当译之本后，马上就会面临文化立场的选择。Verschueren（1999）认为：语言使用者作出的选择不仅包括语言形式的选择，还包括语言策略的选择。文化立场则是决定语言策略选择的背后动因。许钧（2002:66）指出：每一个有使命感的译者，都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而这一立场的确立，无疑直接影响着

译者的翻译心态和翻译方法。近年来兴起的“归化”与“异化”问题，实际上是以译者所选择的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

第三、文本意义的选择。即考虑如何理解原文文本的过程。Verschueren (1999) 认为：选择发生在语言产生和语言理解两个方面。翻译也不例外，因为译者首先面对的源语文本，无论从纯语言学、文学，还是从文化层面上看，都是一个非确定性的意义开放系统。文本的意义不是完全澄明的，也不是凝固不变的“一种意义”，它是开放的，悬浮的，既躲避着译者—读者的把握，但同时有着被“无限地重新解释”的可能性。作者、文本与读者（也就是译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这是文本意义得以理解的先决条件（许钧 2002:67）。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就表现为译者发挥主体性选择的过程。

第四、译文表达的选择。译文表达是在理解文本意义之后的再生产，是语言产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在 Verschueren 看来更是充满了选择。在文本意义的传达环节，译者所面对的选择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文本的形式意义、文本的言外之义以及文本的文化意义、联想意义等的传达，都有“译”与“不译”的选择。面对一个潜在多义的文本，译者更需解决诸如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形式与内容等各个方面的协调问题。

第五、操作层面的选择。Verschueren (1999) 指出：选择发生在语言结构的任何一个层面，从语音、语调到语法结构的选择；从语码到语篇的选择等。在翻译的操作层面，选择更显得具体而细微，如句式的选择，语气的选择，情感意义的选择，词汇色彩的选择，可以说，大到句式，小到词字，乃至一个标点，都有可能需要译者在对各种因素的权衡中，在“译与不译的尴尬处境中，在异同与得失之间”，作出积极的选择（许钧 1998:4）。刘宓庆针对翻译的具体操作指出：“不仅艺术语言需要选择，非艺术语言同样需要选择，其中包括，（a）词语选择（形象vs非形象，色彩vs非色彩，专业vs非专业，明示vs暗示等等）；（b）句式选择（主动vs被动，单句vs复句，顺译vs反转，等等）。翻译在任何一个层次都有大量的选择要做，小如量词‘一柄曲尺’，a cloud atlas（一幅云图），等等，大如句式及文章风格体式。只有精于选择，才能精于翻译艺术”（刘宓庆 1995: 274-370）。方梦之也作出了类似的论述：“翻译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连续不断地选择

的过程，且不说一开始对原作的选择，原作选定后，先可选择决定翻译的类型：全译、摘译、缩译或以译为主的综述。开译后，大至篇章的格调与布局，句间、段间的衔接与连贯，小至注释的应用及其方式（夹注、脚注，还是文末注）等，无一不需要译者的精心选择”（方梦之 1999:99）。

为了表明选择行为体现在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我们特意将其划分成不同层面。但事实上，上述各个层面在翻译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相对而言，译本选择作为翻译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尚可与后面的四个层面划开界限；后四个层面则是难以分割的。首先，译者选定原文开始翻译，马上会面临理解的选择，而该选择与译者的文化立场密切相关，又直接影响表达的选择。其次，文本的理解反过来受到译语表达的影响，Verschueren 认为意义的生成过程即是话语与语境因素的互动过程，不同的语境因素可以左右语言的选择，改变话语的意义；而不同的语言选择也会影响到语境的变化。在翻译过程中，不同语言表达的选择导致语境变化，也会影响到文本意义理解的选择。第三，译文表达不但是译者在原文理解前提下的表达，也是基于译者文化立场下的表达。第四，无论是理解还是表达，都必须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进行选择，可以说，操作层面的选择渗透于理解和表达之中。

2.1.4 中外学者对选择行为的研究

翻译是“作选择”的过程，这是不少中外学者的共识。Newmark 指出：“翻译理论关心的就是选择与决定，而不是源发语篇或者目的语篇的运作原理”（Newmark 1982:19）。Gregory Rabassa 认为翻译是选择的过程，一个永远也完成不了的选择过程；这种选择总是开放的、无止境的，由于译者心目中有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理想的完美，所以他总是不满足于现状，致力于接近完美（Rabassa 1989:7）。Nida 则在《翻译新视角》（“A Fresh Look at Translation”）中这样阐述：“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要作出成千上万次的涉及选择与处理的决定，以适应另一种文化，适应另一种语言，适应不同的编辑和出版商，最后还要适应读者群”（Nida 2000:7）。中国翻译界，张泽乾认为“意义意味着选择，而选择就是通过修辞手段来准确地表达某一概念或观念……译者必须善于选择，以求译语对原语的趋同”（张泽乾 1994:268）。孙致礼论及了文化立场的选择：“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自始至终面临着异化与归化的选择，通过选择，在接近作者和接近读者之间找到一个‘融合点’”（孙致礼 1999:36）。李运兴指出译者的“具体任务是进行一系列的选择，以使译文和原文达到某种程度的对应”（李运兴 2001:32）。萧立明提出比较宏观的看法：“翻译学的建立就是解决综合治理的问题，也就是在种种选择面前解决最优化问题”（萧立明 2001:9）。香港学者金圣华则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度量，过与不足的平衡。译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养、经验，在取舍中作出选择”（金圣华 2002:15）。

除了只言片语的论述之外，更有学者以全文、专著或部分章节的形式深入探讨了“翻译是选择过程”的论断。Levy（1967）借助英语和德语、英语和俄语等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重点论证翻译是不断作选择与决策的过程。Reiss（1981）从文本类型的角度来探讨翻译中的选择与决策。Wilss 的专著《译者行为中的知识与技巧》（*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Wilss 1996）运用理论思辨的方法探讨了翻译过程，作者把翻译过程看作不断作出决定和选择的过程，书中有很多章节就是以该论断为标题，详尽分析了诸如选择、问题解决和决策等问题。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者 Krings、Gerloff、Lörscher、Jääskeläinen 等更是运用 TAPs 数据来探讨翻译过程中的各种选择与问题解决策略。中国译界，许钧（2002）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探讨了选择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吕俊、侯向群（2001）专门论述了选择控制的问题，但缺乏对译者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具体分析。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借用最新的翻译理论或语言学理论来解释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如范祥涛、刘全福（2002），宋志平（2004）等。目前中国译界对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作出深入研究并总结出完整理论模式的恐怕要数胡庚申 2004 年的新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单从标题来看，作者就对翻译之选择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胡庚申以达尔文“适应/选择”说为理论支撑，选取“译者为中心”的基本视角，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基本理念：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该专著以全新的理论视角（蔡新乐 2006）构建翻译理论，赢得较好的反响，被誉为是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刘云虹、许钧 2004）、别开生面的理论建构（李亚舒、黄忠廉 2005）。但是，该著作的重点在于构建理论大厦，宏观分析翻译过程的适应与选择，对如何适应与选

择，特别是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如何抉择和决策、如何解决问题、解决的策略是什么等等这些微观的问题均未作论述。因此李亚舒等在关于该书的书评最后提出补充：“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从宏观译论研究到学科研究，《翻译适应选择论》都可以产生进一步研究的选题。我们期待这两个方面新的思考”（李亚舒、黄忠廉 2005: 96）。

第二节 选择行为的特点

2.2.1 博弈性

博弈论 (game theory) 也称对策论, 是数学的一个分支, 最初产生于1920年代, 1940年代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据博弈论, 竞争和对抗双方都可以选择一定的策略。若甲方所得与乙方所失相当, 结果就是“两方零总和”, 也称“零和对策”; 若甲方所得与乙方所失不相等, 结果就是“两方非零总和”, 也称“非零和对策”。博弈论的主要内容是利用数学方法探索最优的对抗策略, 从而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对弈者在走棋过程中, 每走一步棋都要作出选择, 而选择一经做出, 就预先确定了自己随后棋步的走法, 后面的每一步棋都受到前面决策的影响。开局选择不同, 随后的走法也不同, 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对弈者要作出最佳的选择, 运用“极小极大策略” (minimax strategy), 使损失或风险的极大值达到极小。Levy (1967) 从博弈论中得到启发, 认为翻译过程就是一个博弈与策略选择的过程: 翻译过程中各个层次的选择都为后面的选择设置了不同的前提, 形成了不同的翻译结果, 译者必须根据相关的语境, 作出恰如其分的决定, 力求最佳翻译结果。

2.2.2 适应性

Verschuieren的语用综观论认为: 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 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 (variability)、商讨性 (negotiability)、和适应性 (adaptability)⁶。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

⁶ 关于adaptability的翻译, 不少学者翻译成“顺应”或“顺应性”。钱冠连等指出, Verschuieren在书中多次强调(说话)人与环境的双向适应, 既然是双向适应, 就不是一方服从、顺从、听从另一方的单项关系, 故将adaptability译为“适应”与“适应性”(钱冠连、霍永寿 2003:15)。本文在该词的翻译上采纳钱先生的观点。

作出，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适应性则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特征（Verschuieren 1999:59-61）。这三种特性互相联系，共同组成了语言运用的基本要素。其中变异性为语言的运用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基础，如果没有变异性，所指与能指就只能按照严格对应的模式进行，语言世界就不会出现精彩纷呈的面貌，比如要表达“丈夫”的意思，因为变异性的存在，出现了“老公”、“先生”、“爱人”、“夫君”等，在特定的语体中，还包括“孩他爹”、“另一半”等表达法。其次，商讨性为语言使用提供了选择方式。比如在表达“丈夫”时，语言使用者可以灵活地通过商讨的方式从可能选项（也就是“丈夫”这个词的不同变体，“老公”、“先生”等）中进行选择。第三，适应性反映了语言使用的根本目的，这一目的同时也对选择的方式起到指导作用。同样以表达“丈夫”的意思为例，在正式场合的介绍通常用某某的“先生”或“爱人”，而在乡村农妇的话语里“孩他爹”则更显亲切。众多的被选词汇在商讨过程中，必须适应具体的语境选出适当的词汇进行表达，而语言的适应性使得语言使用者能从可选择的不同语言项目中做出灵活的，符合语言环境的选择，从而尽量帮助交际的需要。语言使用的适应性是包括语境关系适应、语言结构适应、动态适应和适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在内的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

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翻译是一个包括语言选择、问题解决和决策等在内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语言转换过程，该过程所牵涉的相关变量远比单语交际复杂。翻译行为具有多种选择组合的性质，做出选择就是为了顺应多层次、多维度的翻译目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翻译的功能（宋志平 2004:21）。胡庚申说得好：“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这种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具体特征之一是‘适应’，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之二是‘选择’，即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翻译就是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胡庚申 2004: 42）。无论是 Verschuieren 的语言适应论，还是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两者的英文表述均为“adaptation”，哲学渊源均为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因此表达的是相同的概念。而从理论层次而言，语

言适应论是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基础，翻译适应选择论则是语言适应论的具体体现。语言适应论所讨论的语境关系适应、语言结构适应、动态适应和适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等，在探讨翻译选择过程的适应性时均可借鉴。

2.2.3 指标性

翻译过程选择行为的指标性是指不同类型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体现不同的选择行为，因此不同的选择行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衡量译者能力的标准。指标性体现在翻译过程选择行为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翻译单位、翻译工具还是翻译策略，不同类型的译者均有不同选择行为，而在同一类型的译者中，差别不是非常明显。西方 TAPs 翻译过程的研究者较早注意到选择行为的指标性特征，他们设计实验探讨不同类型的被试在翻译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差别，并总结出一些相当有意义的结论。比如在翻译单位的选择上，职业译者往往比非职业译者把握更大的语言单位。在翻译工具的选择上，职业译者的高风险特征和初学者的低风险特征是指标性的一方面；职业译者运用单语词典的频率较高而初学者运用双语词典的频率较高是指标性的另一方面。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职业译者比非职业译者更多地使用总体策略。

当然，不同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的变量（比如语言对、被试类型、翻译方向等）得出的关于选择行为的指标性特征会有所不同，这需要研究者针对具体现象和结果作出具体的描述和合理的解释，从而对特定的翻译活动（包括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等）提供帮助和启示。

2.2.4 体验性

翻译过程选择行为的体验性源自语言本身的体验性。早在1772年，Herder 就从人类的体验和认知角度阐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他说：“有100,000条根据，证明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证明语言是通过人的感官和知觉形成的！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所有的民族、国度和环境里，语言都萌芽于理性之中并随着理性的成长而成熟起来！谁能对世界各民族的这一普遍的心声充耳不闻？！”（Herder 1999:64）。Malinowski 于1935年也明确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所有词汇的所

有意义最终是来自身体经验” (cf. Halliday & Hasan 1985:7)。第二代认知科学 (王寅 2002a) 强调心智的体验性, Lakoff & Johnson (1999) 将体验哲学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三条原则, 第一条就是“心智的体验性”。Lakoff & Johnson 后来又反复强调了这一原则: “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 心智是体验的, 意义是体验的, 思维是体验的, 这是体验哲学的核心”。并提出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 “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形成的, 其最基本形式主要依赖于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等的感知而逐步形成, 归根结底, 认知、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 (Lakoff & Johnson 2002: 245-249)。语言符号也是这样, 遵循着‘现实—认知—语言’的进展程序, 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理有据的 (王寅 2005:37)。

根据 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 及 Lakoff (1987) 体验哲学的理论, 人类的认知、概念、意义、推理、理解和语言等都来源于对客观外界的感知和经验 (这与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 翻译也是基于其上的认知活动, 同样具有体验性。人类的思维、认知和理解, 都基于现实世界。由于我们享有基本相同的现实世界, 因此才有大致相同的思维, 正是这种体验性认知才形成了不同语言之间具有互译性的认知基础。王寅提出, 说翻译具有体验性, 有多重含义。首先, 作者的认知和理解来自体验性活动, 其创作灵感和要素主要来自生活, 也高于生活。其次, 译者和读者的认知和理解也来自体验, 而且也只有对文本作体验性的理解才能获得其创作意图。另外, 王寅还指出, 译文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 理解必定也来自体验和认知。最后总结为一句话: 翻译主要是基于体验的认知活动。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王寅拟构了如下的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 翻译是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 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 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 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 倡导和谐翻译 (王寅 2005:37)。另外, 于建平 (2006) 也根据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 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 并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中译者汉语原文的理解和英语译文的表达两个过程, 文章最后提出译者的翻译认知能力直接影响其翻译水平, 而翻译认知能力与译者的语言体验经

历有着直接的关系。于建平的文章跳出了纯理论思辨的框架，以实证的方法探讨语言体验性对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是比较有新意的，由结论引发的对翻译教学的启示也很有价值，但是该文的实证分析主要以结果为导向，通过不同译者原文和译文的比较来描写翻译的认知能力，不能体现翻译过程中译者行为和思维的运作过程，而恰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能力和翻译的体验性表现得最明显。因为翻译过程能够充分体现译者的决策和选择行为，而决策和选择行为是译者个体实践体验、社会文化和知识储备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节 选择行为的研究层面

许钧在《论翻译之选择》结论部分提出：“翻译的选择问题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无论是‘译什么’，还是‘怎么译’，都涉及到译者的选择。通过对翻译选择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相对于‘怎么译’，‘译什么’更需要我们去进行研究与探讨”（许钧 2002:68）。“译什么”涉及翻译选择的外部因素，属于广义翻译过程的范畴。研究者主要结合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分析译者翻译目的或动机。这方面的研究将翻译纳入文学文化范畴，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尤其是近年兴起的多元系统学派对此作出很大的贡献，成就显著。

“译什么”固然重要，但是“怎么译”同样不能忽视。“怎么译”涵盖文化立场、文本意义、译文表达和操作层面等选择，属于狭义的翻译过程范畴，而该过程正如吕俊与侯向群所认为的是一个心理的过程：“翻译是一种选择的艺术”……“这种选择实际上是一系列连续阶段的信息加工过程，即一个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它不断地进行着推理、判断，不断地筛选淘汰，不断地梳理和整合，最后才得出一个结果。这一过程，就是一种选择的过程”（吕俊、侯向群 2001:310-311）。

TAPs 研究方法对于深入探讨翻译的选择行为非常有效，该方法能使大脑思维过程这个“黑匣子”揭开（至少部分揭开）神秘的面纱，从而展现不同类型的译者在执行翻译任务时都会考虑哪些选项，其思维是新颖的还是常规的，他们能否陈述自身的行为状况，追踪思维的各个细节，又是如何得出最终方案等一系列认知行为。本论文的第五、第六章将具体探讨选择行为的以下四个层面。

2.3.1 翻译单位的选择

翻译单位的选择长期以来都是翻译研究者讨论的热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关于翻译单位的概念，学界一直争论不下，分歧颇多。有人认为翻译单位就是翻译转

换过程中的操作单位，认定句子是基本的翻译单位；有人则把翻译单位当作结构单位，认定要以语段为翻译单位；还有人把翻译单位看成是理解单位，从而认定语篇是理想的翻译单位。这些不同的意见，源于对翻译单位这一术语的不同理解，因此探讨翻译单位的选择，还得先从定义入手。

由于“翻译单位”的概念是语言学派首先提出的，因此过去对翻译单位的界定大多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如把翻译单位定义为“可以与源语文本的单位相比对的目标语文本单位”（Malmkjær 1998:286）。Barkhudarov 明确地按照语言层级把翻译单位切分为音位、词素、词、词组、句子和语篇，他认为：“翻译单位是指在译文中能够找到对应物的原文单位，但它的组成部分在译文中并没有单独的对应物。换言之，翻译单位就是源语在译文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的语言单位”（巴尔胡达罗夫 1985:145）。徐莉娜指出：“这种根据结构形式切分出来的翻译单位不利于翻译操作，而且经常会影响到语篇的连贯性和翻译的质量。尤其在‘形合’对‘意合’、形态语言对非形态语言、显性语法对隐形语法的两种语言体系中进行语符转换时，这种以形式特征来切分翻译单位的做法显然弊大于利”（徐莉娜 2004:15-19）。

TAPs翻译研究学者以过程为导向，对翻译单位进行了实证探讨。他们首先重新界定了翻译单位。Gerloff（1987）认为翻译单位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使用的分析单位，包括词素或音素、单词、词组、小句和句子等5个层级，这种界定表面上沿袭了语言学派的单位切分法，但Gerloff的研究将翻译单位与翻译策略进行对应，显示了翻译单位的动态性，在实际分析上与语言学派对翻译单位的静态分析是不同的。Lörscher 对翻译单位的定义是：“译者聚焦的源语文本部分，目的是把它在目标语中作为一个整体再现出来”（Lörscher 1993:209）。Jääskeläinen 把翻译单位定义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无标记处理’活动因注意力转移至特定的与任务相关的问题而中断的那部分语段”（Jääskeläinen 1990b:173）。其中“无标记处理过程”是指译者在TAPs实验中不停顿地说出大脑思维内容的过程；相反地，“有标记处理活动”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从发现问题到找到该问题答案为止的大脑思维过程。TAPs研究者没有事先预设翻译单位应该是哪一级语言单位，而是强调翻译过程中能够流畅地转换为目标语的源语语段，该语段可大可小，不局限于词、短

语、句子或句群等语言单位，随着译文的难度和译者对原文信息的处理速度进行相应的调整 and 变化。翻译单位的这种可变性在很多TAPs翻译实验中得到了证实（Gerloff 1987；Lörscher 1991；Séguinot 1996）。

对于翻译单位的选择，Lörscher（1991；1993）发现，普通学生翻译时使用的单位都较小，大部分是以词为翻译单位，而有经验的译者的翻译单位均大于词，如短语、句子或整个语段，不过有经验的译者在运用较大的翻译单位时也不会忽视对较小语言单位的处理。Séguinot（1996:75-79）的研究发现，职业译者在以句群为单位翻译时，也注意到了发生在单个句子层面（如单词或短语）的局部问题（local problem），但“句群”的整体意思是译者解决局部问题的参照系。

本研究从以往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结果中总结出翻译单位的选择具有动态性和指标性两种特征，这些特征将在第五章第一节得到进一步描写、论证和补充。

2.3.2 决策过程的选择

Wilss 针对决策过程的多层级问题指出：

关注决策的认知过程，就必须调查所有决策之前的过程，如注意、调查、分析等过程。如果说决策行为出现在翻译过程的固定点，我们就必须探讨：为什么翻译时会出现种种选择现象？哪些因素决定哪些选择？哪种类型的选择（如表达时语义或词汇的转换）会在哪些环境下发生？哪些因素来决定这些选项？为什么要放弃一些决策（如翻译一本书的标题或一段特别棘手的段落）？译者如何决定决策时机和优先考虑的译文？在什么情况下（如时间紧迫或能力不足），决定会部分或全部失效？最后，决策结果是什么？

尽管 Corbin（1980:48）强调，翻译时选择行为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非选择行为。但是，据我所知，上述问题均未能目前的翻译教学和实践引起足够关注。（Wilss 1996:187-188）

Wilss 的看法是独到而敏锐的，他于 1996 提出的这些问题，很多至今还悬而未决。原因一方面限于研究方法，因为决策问题属于翻译过程研究，长期以来缺乏

有效的研究手段；另一方面是重视不够，翻译教学和实践长期以来遵循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对翻译过程、译者思维心理等方面的棘手问题，回避有余，正视不足。本文将从英汉翻译的角度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考察。

Corbin (1980) 认为翻译过程的决策行为包括六个阶段：1、问题识别；2、问题分类（描述）；3、研究、收集背景信息；4、考虑问题如何进展（前选择行为）；5、选择时刻；6、评估翻译结果（后选择行为）。这大概是依据认知心理学的决策分类推演出来的。认知心理学一般也将决策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1）辨识问题；（2）收集信息；（3）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4）评估被择方案；（5）选择方案；（6）付诸实践。参考 Corbin 的阶段划分，本论文第五章第二节关于翻译决策过程的研究将从三个方面进行：①翻译问题特征；②选项与决策过程特征；③选择结果分布特征。

2.3.3 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

翻译工具（translation instrument）包括各种词典、术语表、百科全书、语料库、电子词典或软件、以及网络资源等，是当前翻译活动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然而，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翻译工具的运用一般附属于翻译策略，很少单独探讨。比如 Krings (1986) 划分的五项翻译策略中，第一项理解策略包含译者对意义的推理和对参考书的运用；在 Krings 看来，参考书（翻译工具之一）的运用只能是众多翻译策略中理解策略的一部分。同样在 Séguinot (1996) 关于局部策略的四种子策略中，翻译工具（包括词典、词汇表、百科全书等）也被安置在搜索策略的类别中，属于搜索策略的外部元素。

PACTE (2003) 提出翻译工具运用的重要性，在其关于翻译能力的框架下，翻译工具使用能力和翻译策略能力等处在了平等的地位。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独到而准确的，在讲究翻译效率和质量的今天，是否善于运用身边所有可参考的翻译工具，是译者翻译能力的重要体现。本研究中，我们也主张将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从决策过程的选择中独立出来，单独作详尽的分析。

2.3.4 翻译策略模式的选择

探讨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最终归结到翻译策略模式的选择。翻译策略是 TAPs 翻译研究的基本变量，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研究者就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Krings 认为：“所谓翻译策略，即当自动化过程受阻时，译者所求助的手段。具体包括以下五种：一是理解策略（strategies of comprehension），主要体现为译者对意义的推理和对参考书的运用；二是等值检索策略（strategies of equivalent retrieval），主要是译者为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应词或近义词的回忆；三是等值监控策略（strategies of equivalent monitoring），即译者考量特定的词语在译文中是否适合；四是决策策略（strategies of decision-making），指译者在两种互有长短的解决方案中进行取舍；五是简化策略（strategies of reduction），指译者为了使译文更易为目标语文化接受而对原文内容，尤其是比喻性质的文本的删节”（Krings 1986: 267-274）。

Gerloff 将“文本处理策略”（text-processing strategies）描述为“翻译文本的解码和转译的过程中，所有元语言元认知的评述或具体解决问题的行为”⁷。她划分的翻译策略具体包括问题识别、语言分析、存储和提取、全面搜索与选择、文本推理与论证、文本语境化、任务监控等七种，涵盖了从确认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种种可能步骤（Gerloff 1986: 252）。Gerloff 区分的七种策略与 Krings 的五种翻译策略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等值检索策略对应全面搜索与选择，等值监控策略对应任务监控等，只是 Gerloff 的分类更加细致复杂。

Lörscher 综合了 Færch 等（1983）对于策略的心理语言学定义，把翻译策略定义为“译者在把一个语段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解决所遇问题的一种有意识的过程”（Lörscher 1991: 76）。这一定义首先强调了翻译策略的“问题取向性”，即翻译策略都是为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而触发的；反过来说，当翻译问题

⁷ 需要指出的是，Gerloff 采用了一个非常广义的策略的定义，包括问题指示、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等。

出现时，通常会有相应的翻译策略来解决，否则翻译过程就无法延续下去。⁸其次，该定义突出了译者的“意识”在确定翻译问题时发挥的作用。换言之，只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到的问题才被认为是翻译问题，它们也才是译者的翻译策略需要解决的对象（李德超 2005:30）。可以这样理解，翻译问题和翻译策略是相互依附的；翻译问题的出现是翻译策略得以运用的前提；而翻译策略的运用，是确认翻译问题存在的标志。这种认知取向的翻译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翻译策略研究的颠覆：传统上对翻译策略的界定往往从研究者的视角出发，面对怎样具体的翻译问题，有怎样的翻译策略和策略运用步骤；而Lörscher的定义从译者角度出发，关注不同译者在真实的翻译情境中有意识地解决翻译问题的步骤（Lörscher 1991:119）。

Mondahl & Jensen 提出问题序列的解决策略包括搜索策略和评估策略。其中搜索策略包括获取策略（achievement strategies）和简化策略（reduction strategies）⁹。译者在使用获取策略时尽可能寻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并获取很多潜在的译文选项。简化策略是获取策略的补充，当译者未能发现可接受的等值译文时，采取简化原文形式或内容的办法，极端的做法是完全省略问题单元。简化策略属于不精确的翻译，其运用与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翻译标准有关（Mondahl & Jensen 1996:102）。

评估策略用于对译文不同选项的决策和选择。一方面，该策略直接在自发联想时进行评估，如类似“某某看上去更好”等的 TAPs 报告。另一方面，如果译者运用翻译标准来监控选择，就会减少直觉的评估。评估策略的运用中，译者会在原语和潜在的译文之间指明差别来帮助自己作出选择，这时就会出现可接受性问题。另外，译者还可能运用回译来检测等值的充分性，或者结合考虑读者群来进行评估。最后，译者会根据自己坚持的翻译标准作出选择。

Jääskeläinen（1993）基于Lörscher（1991）的定义将翻译策略分为总体策略（global strategies）和局部策略（local strategies），前者指整体翻译任务中的策略

⁸ 当然，有些译者会暂时搁置某翻译问题，这本身也是一种策略，属于总体策略，而搁置的问题也必然会在上交任务之前运用局部策略予以解决，否则，该译者就缺乏职业责任感。

⁹ 该分类参考了Krings（1986）对翻译策略的分类标准。

（如考虑译文风格、假设读者群等），后者关注具体翻译操作（如寻找合适的词汇等）。Jääskeläinen通过分析4名职业译者TAP数据发现，职业译者比非职业译者更多使用总体策略，而非职业译者多采用局部策略。另外，职业译者一旦制定总体策略，一般会在翻译过程中有系统、有计划地执行；而非职业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运用缺乏计划性，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随意。

Séguinot（1996）将局部策略按功能分为四种：即人际策略（interpersonal strategies）、搜索策略（search strategies）、推理策略（inferencing strategies）和监控策略（monitoring strategies）。人际策略是在具体环境下由多位译者的合作关系产生的，其功能具体包括交际性功能、校正功能等；搜索策略指查找词汇或句子结构的技巧；推理策略指译者对原文特定意义的推断；监控策略指译者对原文和译文的比较等。

与前人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侧重于讨论不同译者解决问题的策略比较，基于定性比较和定量分析，归纳出职业译者翻译策略的特点，并据此构建职业译者的翻译策略模式。具体论述将在第六章展开。

第三章 研究方法

A number of trends can be distinguish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One is a broadening of interest from *translational* studies (focusing on translations themselves) to *translational studies* (focusing on translators and their decisions). Another is a move from prescriptive towards descriptive approaches. However,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rend has been the shift from philosophical conceptual analysis towards empirical research.

过去十年来翻译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显著的趋向：一种是研究兴趣上从注重翻译本身的研究拓展到注重译员及其翻译决策的研究；另一种是从规定性的方法转向描述性的方法；而我认为最重要的趋向，则是从哲学的概念分析转向实证研究。

——Andrew Chesterman (1998:201)

本章通过比较分析目前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几种常用方法，总结出最适合英译汉过程研究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第一节，对比分析内省法框架下的即时有声思维法（即时TAPs）、反省有声思维法（反省TAPs）和协同翻译有声思维法（协同翻译TAPs），并探讨即时TAPs在翻译过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实验设计时的对策；第二节主要讨论电脑击键记录技术及其在英译汉研究中的可行性；第三节提出本研究采用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以即时TAPs、实时观察记录、问卷采访为主体，同时结合译文更改记录，并参考专家译文评估。

第一节 有声思维法与翻译过程研究

3.1.1 有声思维法概述

有声思维数据收集法¹是评估自我监控与反省的主要方法之一，其特点是被试以口头言语的形式陈述出自己的心理活动过程及行为表现，实验者通过音像器材对此进行记录，随后整理为文字信息加以分析。由于该方法属于心理学领域的内省法，下面先对内省法作简单介绍。

内省法(introspection)是 Würzburg 学派于 20 世纪初发展起来并介绍到心理学领域的。心理学研究者在长期研究人的行为与能力的基础上，开始将研究重点从表面行为转向更深层的认知心理过程。但是思维过程无法通过视觉观察，研究者只能借助被试口述的方式收集其思维过程信息。这种方法就是内省法，它融贯于心理学各具体研究方法之中。正如德国哲学家 Ernst Cassirer 所言：“没有内省，没有对各种感觉、情绪、知觉、思维的直接认识，我们甚至不能规定人的心理学范围”（恩斯特·卡西尔 1985:3）。

内省法早期受到行为主义学派的挑战，在行为主义心理学时代，言语行为几乎毫无例外地用输入和输出来研究，而大脑中言语接受和言语生成的过程被称作“黑匣子”，超出了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行为主义者认为，既然人们无法观察到这些过程，就不能对此作任何科学调查，因此拒绝运用内省数据分析有关思维的过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内省法重新受到认可，认知心理学家运用该方法来研究“解决问题的过程”，即为完成认知任务寻找解决办法的思维过程。

内省法可以依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根据研究内容可分为认知层面、情感层面和社会学层面的研究。根据诱导手段的自由程度可分为问卷、日记和有声思维：思

¹ 根据表述需要，有声思维数据收集法的汉语表述可以是有声思维法、有声思维、口语报告法、口头报告法、出声思维、出声思考等；英语表述有 Think Aloud Protocols、Think Aloud、Protocol Analysis、Verbal Protocol、Verbal Report 等。

维在问卷中自由度最小，被试只能根据多项选择的问答表进行选择；口记自由度最大，被试自行决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以多少信息量提供“内省”报告；有声思维的自由度居中。根据言语行为和口述时间的间隔还可分为以下三类：①“同时内省”法（*simultaneous introspection*），即被试在阅读、写作、翻译（不包括口译）的同时进行口述；②“即刻内省”法（*immediate introspection*），即被试在完成任务后马上进行反省报告；③“反省”法（*retrospection*），即被试在完成任务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反省报告。

有声思维法在人类内隐的心理过程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打破了心理学传统研究凭借观察外部行为间接研究内部心理的樊篱，通过被试的有声思维，直面思维过程，捕捉心理轨迹。该方法可以追溯到 Karl Bühler（1907）的研究。Bühler 试图从有声思维中发现思考时大脑的活动，他认为许多思维过程是高度自动化、无意识的，为了使被试有意识地思考，最自然的方法是对他进行提问，然后让他用“是”或“不是”来回答（Bühler 1907:297-365）。

20 世纪 50 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兴起使内部认知的信息加工过程成为心理学家的研究重点。德国心理学家 Duncker 于 1945 年首先提出由内省法发展而来的有声思维法，即要求被试在实验时报告头脑中的思考过程，或在实验后追述思维过程（参见王甦等 1992:14-15）。有声思维法使内部的认知过程经口语报告而外显，研究者通过分析报告，就能探索人类认知加工的内部过程。1950 年代以来，有声思维法已成为探索认知过程的重要方法，但同时也遭到了行为主义学派的猛烈攻击。对此，Newell & Simon（1972）指出有声思维法在研究“人类问题解决”上的应用潜力，他们运用棋手下棋的有声思维实验来证明反省技术可以使思维还原；为了反驳批评者和唯心论者（*spiritualist*），他们要求被试重复推理过程。Steinberg 运用万有引力的例子来反对行为主义者对内省数据的全盘否定，他指出：“不能因为现象性经验（*phenomenal experiences*）无法直接观察就否认其可以用科学理论来解释，现象性经验可通过体验者本人的汇报获得证实。心理过程与万有引力概念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即本身都是观察不到的，能观察到的是作用或结果。不过，心理过程与万有引力这样的物质理论实体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人不可能直接体验

万有引力，却能直接体验思维活动”（Steinberg 1982:93-94）。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有声思维法开始广泛用于人类认知过程的研究。

3.1.2 翻译研究中常用的三种有声思维法分析

一般来说，有声思维法可以分为即时TAPs（concurrent TAPs）和反省TAPs（retrospective TAPs）两种。即时TAPs要求被试一边完成任务一边大声报告思维活动、描述思考过程而无需解释原因，思维与报告同时进行。反省TAPs则要求被试在完成任务之后，回忆其思考过程，报告的内容主要来自长期记忆。另外，在翻译过程研究中还发展出协同翻译TAPs。协同翻译TAPs在本质上属于即时TAPs，也要求被试在执行任务的同时报告思维信息，但其实验方式必须由两名以上的被试协同完成翻译任务。由于有声思维法的常见形式是被试单独完成的即时TAPs，大部分文献中不加定语的“TAPs”或“有声思维法”均指单独被试的即时TAPs。

3.1.2.1 即时TAPs

K. Anders Ericsson 和Herbert A.Simon 深入且系统地探讨了即时TAPs在认知心理研究领域的运用。他们在《有声思维的口头报告分析》（*Protocol Analysis – Verbal Reports as Data*）（Ericsson & Simon 1984）中结合即时TAPs方法，具体提出人类认知与信息加工的模式。该模式认为，信息储存在不同的记忆库中，这些记忆库有不同的记忆方式和存储容量：如短期记忆库（short-term memory）存储方式简单、容量有限，长期记忆库（long-term memory）存储方式困难、容量较大；唯有存储在短期记忆库的信息，即留意信息（heeded information），可以在即时TAPs实验中被主体报告出来。这一区分十分关键，因为知识输入与输出的认知过程，和未留意信息（unheeded information）一样，不能直接获得，分析者只能根据报告进行推断。该模式的进一步假设是：言语编码的信息，能以与留意信息相同的方式被主体报告出来，言语化过程并不影响认知行为，只会拖延行为的时间。

Ericsson & Simon 在论述即时TAPs优点的时候，与反省TAPs进行了一番比较，他们提出：“唯有即时的言语化思维才能详尽反应被试在执行长期任务时的心理状态（长期任务指超过10秒的任务）。一旦完成长期任务，部分信息转移至长期

记忆，留给短期记忆的只有检索的提示（retrieval cue）。因此，事后报告²往往困难且不完整”（Ericsson & Simon 1984: xvi）。此外，被试的事后报告还有可能表达事后的思维活动。Lörscher 发展了以上观点，指出即时TAPs优于反省TAPs的理由：①通常认为，被试只能汇报正在关注的信息，即短期记忆中的信息；由于短期记忆在人脑中存储时间较短，只有通过TAPs同步汇报，才能获取这类心理信息；②由于TAPs实验是一种即时口述行为，对比事后回忆的反省报告，被试不需要忙于记忆，所以汇报出来的信息更加客观、完整（Lörscher 1992a:426-439）。Hannu Kuusela & Pallab Pawl（2000）比较了即时TAPs和反省TAPs揭示人类决策过程的效果，指出即时TAPs不但比反省TAPs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对于决策过程的观察也比反省TAPs准确。因此，即时TAPs在认知科学、人机互动（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等领域更受研究者青睐。

Ericsson & Simon（1984）还指出TAPs实验时应注意的事项，这对具体的实验设计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总结如下：

第一，为了让被试准确汇报思维信息，研究者在实验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避免让被试感觉在进行社会交际活动。因此，实验设计有以下要求：①要为被试提供自然的实验环境；②避免一些敏感信息对被试的引导；③避免被试与测试者（或被试之间）的人际互动。

第二，实践经验会影响短期记忆的执行过程，导致被试在执行任务时报告出的有效思维信息减少。因此，为了从短期记忆中得到大量信息，被试应当在过度学习（overlearning）³之前就报告出心理过程。在具体实验过程中，主试首先应当控制被试在TAPs报告前的阅读时间，其次要对被试在报告过程中的长时间停顿进行提醒。

第三，人类认知与信息加工模式解释了个人的性格与经验对TAP数据收集的影响，即知识结构和思维言语化能力的个体差别会影响所收集的数据。因此，我们在具体研究中不能忽视个体差别的存在，在分析时要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² 该处的“事后报告”主要指反省TAPs，也可以包括反省式的采访（retrospective interview）。

³ 过度学习相当于收集了许多旧信息，一旦产生效应，存储在短期记忆中的信息量就会减少。

简言之，即时TAPs数据是被试执行任务时思维的“留意信息”，分析这些数据有助于把握被试的认知行为和思维过程。即时TAPs在适当的条件下（文字信息的考察、无社会互动、无干扰、无分析思维指导等）不会影响心理过程和认知行为，并能提供当时真实的思维信息。

Ericsson & Simon (1984) 对于TAPs研究方法的分析，以及他们提出的人类认知与信息加工模式，对即时TAPs在认知科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领域的应用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很多语言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论设计实验，在阅读、写作、外语习得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而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也正是借助即时TAPs方法，依据Ericsson & Simon (1984) 的人类认知与信息加工模式，开始逐步发展起来。

3.1.2.2 反省TAPs⁴

作为心理学科传统的数据收集方式，反省 TAPs 在认知心理、语言习得等领域较早得到了运用。反省 TAPs 要求被试在完成一项任务之后，通过回忆汇报出执行任务时的思维信息，其数据主要来自长期记忆库，小部分为短期记忆信息，因此反省 TAPs 与即时 TAPs 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数据来源不同。通常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短期记忆是对当前信息的加工和贮存，是唯一对信息进行有意识加工的记忆阶段，因此短期记忆信息往往更加可靠；长期记忆在获取时不但会介入遗忘、干扰等因素，也会引入被试原有经验对思维内容的推论和补充，因此数据更间接、易失真。基于上述原因，即时 TAPs 在研究者的心目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

当然，反省TAPs优于即时TAPs的地方（比如数据的收集不干扰任务过程，数据比较丰富自然等）也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于是他们对原有的反省TAPs技术进行了发展。Guan Zhiwei 等在《眼睛跟踪法测量受激RTA的可靠性》（“The Validity of the Stimulated Retrospective Think-Aloud Method as Measured by Eye Tracking”）一文中，从最基本的要求出发来研究RTA的有效性，即被试运用RTA能够汇报出其真实的心理过程和行为。该文主要有三个目的：①评估RTA的可靠性

⁴反省TAPs的英文表述还有RTA (Retrospective Think Aloud), post-task testing, retrospective protocol, retrospective report, think after等。

（被试的汇报与其最初的任务行为是否一致）；②测试任务的复杂程度对于RTA可靠性的影响；③RTA除了记录基本的任务行为之外，还能提供哪些信息。具体实验设计上，作者运用了眼睛跟踪数据来验证反省报告的可靠性⁵，并设计了简单任务和复杂任务来考察任务复杂性对于RTA可靠性的影响。在反省报告时，被试可以一边观看初始行为的录像带，一边回忆并提供反省报告。研究结果证实了受激RTA所汇报的任务行为和顺序均与最初任务一致；同时，受激RTA的可靠性不受任务复杂程度的影响，这表明RTA适用于其它领域的研究。研究结果还表明被试报告中使用的逻辑推理和策略解释为任务行为提供有效信息，这些推论和解释指明了在信息加工和分类过程中被试所使用的具体策略（Guan Zhiwei 等 2006）。

Guan Zhiwei 等通过实验论证RTA数据的有效性的同时也指出，Ericsson & Simon（1984）所担心的逻辑推理和策略解释不但不会干扰数据的可靠性，反而能提供即时TAPs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该实验运用了受激RTA，这是反省TAPs在新技术辅助下的发展。影响反省TAPs最大的因素是“遗忘”，Ericsson & Simon（1984）也指出反省TAPs会因此忽略很多短期记忆的细节。但是，在录像视频作为诱因的激发下，或者在Translog等软件重播功能的帮助下，反省TAPs能够回忆起大量属于短期记忆的信息，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可靠数据。

John S.Gero 等（2001）对比了即时TAPs和反省TAPs应用于工业设计实验的差别，实验中反省TAPs同样得到录像视频的辅助。该实验得出以下结论：①反省TAPs的口述片断大于即时TAPs，原因一方面是绘图和修改影响了即时反省报告⁶，另一方面是即时TAPs为反省TAPs作了排练和演习，使得反省报告更加连贯，完整；②反省TAPs和即时TAPs汇报的内容基本相同，表现在信息提取、功能一行为

⁵眼睛跟踪数据作为标准数据是基于广为接受的“心—眼假设”，即认为一个人眼睛观察的地方，往往是他关注、考虑的地方。

⁶Jakobsen（2003）指出即时TAPs增加了翻译单位切割的相对数量，这体现了即时TAPs对于行为过程的影响，和行为过程对于即时TAPs的影响实际上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这两种实验结论是互相佐证、互相支持的。

一结构、宏观策略和分析—综合—评估模式等具体层面。因此在过程导向的工业设计研究中，即时TAPs和反省TAPs具有同等的实验效度。

上述研究表明，反省TAPs在视频等诱因的激发下所提供的过程信息不但具备可靠性，其内容的丰富程度也不亚于即时TAPs，甚至还能通过逻辑推理和策略解释，提供即时TAPs所不能提供的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而另一方面，反省TAPs对实验过程的干扰程度远低于即时TAPs，实验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因此，在结合电脑击键记录技术进行三元数据分析的研究模式中，有不少学者更加关注反省TAPs。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上述两个实验的反省任务均不是翻译活动，且任务的复杂程度均不如翻译。在被英国文艺评论家 Ivor A. Richards 认为“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最为复杂的活动之一”（Richards 1953）的翻译面前，我们很难想像被试能在实验之后，通过反省TAPs或受激的反省TAPs，汇报出自己反复权衡、上下取舍的整个决策过程。因此，关于反省TAPs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运用，我们需要更多来自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成果来佐证。

3.1.2.3 协同翻译TAPs

前期的TAPs实验基本上采用单独翻译的方式，由于被试在单独翻译TAPs时容易有不自然的表现，不少学者（如House, Matrat）主张采用协同翻译（joint translation）来代替，并通过实验论证：“协同翻译比单独翻译得到的TAPs资料更真实，从中体现的翻译策略也更丰富，简而言之，更有趣”（House 1988:95）。被试在两种TAPs实验中口头报告的方式很不一样：单独翻译时，口头报告是外加的任务，且属于自言自语的形式，被试往往会尴尬或不自然；协同翻译时，几位被试共同商讨解决方案，每个人的即时思维能够很自然地得到表述。

Matrat（1992）认为TAPs翻译实验中协同方式优于单独方式：首先，被试不需要在翻译时忙于汇报思维活动；其次，协同翻译时被试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因此翻译过程的自发反应行为能够在探讨、论辩时自然地进行收集。Matrat 还针对具体实验指出，单独翻译TAPs能够用于分析词法层面的问题，但是由于被试汇报时的省略和停顿，句法层面的问题则难以得到体现；而协同翻译时，翻译和报告不需

要同步进行，语言认知负担也会因为组内成员的分担而减轻，因此被试可以在共同解决问题的时候汇报出句法上的问题。此外，协同翻译可以比单独翻译发现更多的翻译问题：单独翻译只能体现单个译者面对的问题；协同翻译时，不同译者对具体问题或者文本片断的不同意见往往通过讨论来解决，从而体现更多的翻译问题，并能了解译者对此的不同解决方案。Matrat 还指出被试在协同翻译时对问题的处理更为深入，他们不但要解决翻译前的理解问题，在得到有助于原文理解的初步译文之后，还进一步协商直到获得理想的译文。因此，协同翻译TAPs不但能够获得词汇策略、句法策略、非语言策略和元认知策略，还能获得职业译者已经自动化了的工作策略。当然，Matrat 也指出了协同翻译的不足之处：单独翻译的TAPs数据往往比协同翻译更有逻辑性。例如协同翻译时，两位被试因为翻译问题发生争执，言语容易交织在一起，导致研究者无法辨识和理解争论的内容；翻译小组的激烈争论，还会导致实验的中断。有时候，职业译者根据直觉得出的译文，包含了对文本复杂而跨越式的阐释，让搭档无法理解，导致交流的中断。

Kussmaul 也是协同翻译 TAPs 的支持者，他认为单独翻译方式获得的 TAPs 数据并不真实，大部分译者在翻译时均不会说出具体思维过程，而被试交谈时提供的 TAPs 数据则比较自然，能够提供更为详实的翻译过程数据（Kussmaul 1995）。但是，Kussmaul 也注意到小组成员的动态交流不利于数据收集的一面，比如某位被试在小组中处于主导地位，原因不是其翻译水平最高，而是因为他的个性特征。因此在协同翻译的小组设计时，应当考虑将专业技能、社会地位以及性格特征都比较接近的被试进行搭配。

针对 House（1988）和 Matrat（1992）指出的协同翻译 TAPs 优于单独翻译 TAPs 的观点，Jääskeläinen（2000）从实验设计方面进行了反驳：House 的单独 TAPs 实验缺乏热身练习，这会严重扭曲实验结果；而 Matrat 实验的时间限制、原文的难度和参考书限制等，也会大大增加认知负担，导致报告数据贫乏、含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TAPs的协同方式虽然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单独翻译TAPs的不足，但其实是引入不常见的工作方式代替不自然的工作状态。采取协同翻译的目的是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更真实、更丰富的TAPs数据，但是该工作方式本身并不普遍，因为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译者都是单独工作的。除非象 Seguinot

(1996) 那样找到一对一直从事协同翻译的译者在相同的地点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常规翻译任务, 然而, 基于这种被试得出的实验结论, 对于绝大多数单独翻译的译者来说是否适用, 仍然是个未知数。而且, 协同翻译的被试往往存在性格和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异, 造成合作上的分歧和表达上的失衡, 比如表现欲或表达能力较强的被试容易在口头报告时处于主导地位, 使其它被试难以自由表述自己的想法。

综合上述不同类型的有声思维法, 包括即时TAPs、反省TAPs、协同翻译TAPs等, 每种方法都是利弊并存, 毁誉参半, 它们一起组成了TAPs研究方法的总体。在实验设计中, 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实验目的、要求和条件, 合理选择研究方法, 并结合其它实验手段, 共同完成研究任务。

3.1.3 TAPs 翻译研究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即时 TAPs 是目前大部分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数据获取方法, 在我们的研究中, TAPs 数据将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然而该方法在方法论、实验设计、数据处理与分析等层面均存在一些问题 (cf. Færch & Kasper 1986:215-126; Lörscher 1991a:51; Toury 1991:60; Dancette 1994:120; 李德超 2004:385-391)。这些问题对实验结果会有怎样的影响? 在实验过程中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 以减少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3.1.3.1 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即时TAPs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运用始终伴随着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

第一、即时TAPs 能否真正反映翻译过程或思维过程?

即时TAPs的前提假设是人类的高级认知过程能够被意识, 且能通过口语报告被反映、观察、记录和分析。然而处于低水平、尚无意识的信息加工过程, 则无法在口语报告中得到清晰地反映。另外, 对于进入意识领域的全部思想, 被试能否准确理解研究者的指示进行口语报告, 被试是否具备应有的语言表达能力, 使自己的内部认知活动借助语言外显化, 也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对此，Jääskeläinen引用了Ericsson & Simon (1984)对思维过程的定义进行了回答，即“把人类思维过程视为一种信息处理过程，而信息处理部分主要发生在大脑的工作记忆中，因为储存于工作记忆中的想法能够通过言语表达，所以即时TAPs能够反映思维过程”(Jääskeläinen 1998:266-267)。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职业译者的翻译过程高度自动化，因此口头报告往往比翻译或语言专业的学生来得少”(Börsch 1986:207; Toury 1992:69)，即使没有完全自动化，被试的思维过程往往速度太快而来不及汇报。有被试在TAPs练习时指出：“我所想到的事情以十分之一秒的速度闪过，以至于没法把握想到的是什么，该想法又是如何产生的”(Kiraly 1995: 94)。事实上，Krings早在1987年就已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被试口述时在意愿上的差别或许比Ericsson & Simon所假设的更大”(Krings 1987:167)。

第二、即时TAPs会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思维过程？

被试如何分配认知操作和口语报告之间的信息加工能量？这一问题尚无一致结论。除了Ericsson & Simon (1984)，Hayes & Flower (1980)和Bereiter & Scardamalia (1987)也都认为即时TAPs不会影响思维过程，因为口语报告具有反应性，既可能改变初始思维过程从而影响思维结果，也可能只是简单地延长反应时。而且，即时TAPs可能提高了被试对自己加工过程的监控意识、调动了元认知，从而提高解题质量。因此即时TAPs不但不会妨碍，反而有益于问题的解决。不过，在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之前还需有更多的实验结果验证。另外，前文提到翻译问题的解决是有步骤的，这对于运用有声思维持续获得思维过程的信息是一个理想的前提。

然而，Jakobsen (2003)的实验却反映了即时TAPs对翻译过程的影响，该实验结合即时TAPs和Translog，结果表明即时TAPs在较大程度上减慢了翻译速度（约比正常速度减慢25%）、基本上不影响修改过程、增加了翻译单位切割的相对数量。根据这一发现，Jakobsen提出：“目前的实验研究成果证实即时TAPs对翻译任务产生的影响要比Ericsson & Simon (1984)所预测的更大”(Jakobsen 2003:93)。

第三、即时TAPs翻译实验中，两种不同的翻译模式是否会互相干扰？

所谓两种不同的翻译模式，指在翻译和口语报告的同时，涉及了口译和笔译两种翻译模式。即时TAPs实验过程使被试在得出译文之前，不光经历翻译思维过程，还伴随着口头报告过程，因此整个过程涉及的翻译策略，跟纯口译或笔译都不一样，运用的变量也不尽相同。Toury 列举了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分析了两篇从英语翻译成德语的译文，指出即时TAPs使有经验的笔译者由于缺乏口头翻译的经验，译文水准与初学者相差无几。并进而怀疑：很多即时TAPs 翻译实验揭示的差异性极有可能是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模式在实验者身上互相影响所致（Toury 2001: 233-240）。

针对方法论层面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实证研究中有这样的考虑：①实验前与实验后的被试背景核查⁷有助于排除在语言表达上不适合TAPs 实验的被试；②实验前的培训有助于被试准确理解研究者的指示进行口语报告；③职业译者虽然在翻译技巧上有高度自动化的趋势，但其面对同样的翻译任务时所意识到的翻译问题要多于非职业译者，对译文质量的要求也更高，因此，职业译者的TAPs数据信息量不一定比初学者少；④实验时设计职业译者和非职业译者的对比，可以体现职业译者在哪些方面已经自动化，在哪些方面有更多的考虑和关注；⑤TAPs会在较大程度上减慢翻译速度，因此实验设计时不要对翻译时间作硬性规定，研究者可以提供被试参考时间，但被试可以适当提前或延后提交译文；⑥Jakobsen 提出即时TAPs增加了翻译单位切割的相对数量，该翻译单位是依据被试停顿时间来切分，我们在考察翻译单位时将依据被试注意力单位的转移来切分，因此翻译单位大小不会因切割数量的多少而改变；⑦Toury 指出TAPs翻译实验中的口译和笔译两种翻译模式会互相干扰，这一问题学界至今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Jääskeläinen 2002:107），但我们认为，不应该把TAPs翻译过程的口头报告与口译等同，这两者基于不同的思维模式，在报告内容和语言形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别：口头报告的内容主要是思维过程信息，反映的是间断、可以缺乏逻辑的思维片断，其次是伴随思维信息汇报出的翻译结果；而口译所报告出的内容都属于译文，语言表达上通常简

⁷这也是Li（2004）提出的第八条可信度保障条款。

洁、连贯、符合逻辑。因此，TAPs翻译实验只存在口头报告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不存在口译对笔译的干扰，而口头报告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实验培训来减少。

3.1.3.2 实验设计层面的问题

实验设计层面的问题多数是以前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或者实验条件不允许等原因造成的，比起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较为简单，且多数可以妥善解决。研究者在设计实验时应注意下列问题：

首先，减少被试效应对实验的影响。从被试效应看，即时TAPs数据与被试语言表达能力有很大关系，被试是否善于言表以及是否适应即时TAPs行为都会对实验产生影响。实验者往往难以控制被试效应：翻译初学者很容易封闭思维，不能充分表达思维活动；职业译者则容易减少口述，省略思维活动中的细节，烦于详细表述。有的被试先译后述，翻译与报告并未同步，使记录成为追述。

其次，减少外部因素对实验的影响。根据Ericsson & Simon (1984)的看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口头报告时的人际互动，因为交流是有条理的，对当下任务造成的影响往往无法控制。主试在实验现场也会对被试造成一些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比如被试可能会有意识地隐瞒失误、猜测主试的意图而进行讨好式的报告。另外，实验环境、数据收集方式、辅助工具是否受限等，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

针对被试效应和外部因素影响，我们在实验设计时有以下考虑：①虽然我们无法要求所有同类型的被试在语言表述能力上完全一致，但在被试背景核查时，我们会排除一些有表达障碍的被试和容易产生语码冲突的被试；②上文提到的实验培训，也会帮助被试适应TAPs的实验环境，避免“先译后述”等不符合TAPs实验要求的行为；③实验过程中主试退居被试身后，避开被试视线，实验过程尽量不干扰被试，如有条件，主试可在实验室隔壁房间监听，并用电子设备来提醒被试的长时间停顿，主试提供的指导语和提示语保持中立性；④为避免在对比实验中引进额外变量，我们为所有被试提供了相对一致的实验室环境、辅助工具等，数据收集方式和步骤也相对统一。

3.1.3.3 数据处理与分析的问题

即时TAPs数据的转录、编码和分析过程是否具备充分的信度？这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知识背景、理论基础和研究预期的不同，使研究者在转录语音数据、划分语句片段、标志、分析指标等的具体处理上都会有差异。语音数据的转录目前尚待建立统一的编码体系。在数据分析方面，绝大部分TAPs翻译研究对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也就是Bernardini指出的“以轶话的方式（anecdotal fashion）陈述发现”（Bernardini 2001:241-263），这种缺乏整理的分析方法难免使人怀疑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针对数据处理与分析等问题，我们有以下几点考虑：①在数据转录时，首先根据研究内容制定相对细致的誊写规范，进而严格按照誊写规范转录录音数据，最后邀请一位研究协助人员⁸对转写数据进行核查；②在数据编码时，首先制定编码规范，比如翻译单位的切分依据、翻译问题的切分依据等，进而严格按照编码规范进行数据编码，并再次邀请该研究协助人员对数据编码进行核查。具体誊写规范、编码规范等见第四、第五章。

3.1.4 TAPs 翻译研究的可信度保障条款

TAPs翻译过程研究在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引起很多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进方案。同时，与实验设计息息相关的是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分析，这种分析不但能够指出在实验设计与分析上的利弊得失，而且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指导方案，供研究者参考。

李德凤的文章《TAPs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可靠性》（Li 2004）首先肯定了TAPs研究对于了解译者心理活动的意义和作用；进而指出应当根据可靠性保障条款，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他根据Guba（1981:78）提出的实验研究的四项可信度标准，即真值性（truth value）、应用性（applicability）、持久性（consistency）

⁸ 本研究是笔者的博士研究项目，绝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笔者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但在数据转录与编码时，笔者邀请了一位在该领域经验比较丰富的研究者对数据转录和编码的结果进行核查，力求客观处理与分析本研究的TAPs等数据。

和中立性（*neutrality*），分别从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报告和应用四个方面提出TAPs研究的12条可信度保障条款：

第一、数据收集：

- 1、自愿参加（*voluntary participation*）
- 2、匿名保证（*guarantee of anonymity*）
- 3、有目的地采样（*purposeful sampling*）
- 4、三元数据分析法（*triangulation*）
- 5、长期跟踪研究（*prolonged engagement*）
- 6、自然（或接近自然）的实验环境（（*near-*） *natural situation*）
- 7、被试培训（*training for subjects*）
- 8、背景核查（*background checks*）

第二、数据分析：

9、同行沟通、逐步问答与解码可靠性（*peer debriefing, stepwise replication and intercoder reliability*）

10、专门人员检查（*member checks*）⁹

第三、数据报告：

11、详尽描述（*thick description*）

第四、应用

12、控制结论的普及化（*refrain from generalizing*）

李德凤从国际译学期刊（*Target, Meta, Babel*等）和著作中取样15篇（本）TAPs 翻译研究的论著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控制结论的普及化（73.3%）、三元数据分析法（60%）和详尽描述（53.3%）这三项条款出现在较多论著中；匿名保证、背景核查、专业人员检查这三项条款在样本中均未提及；长期跟踪研究（6.7%）、同行沟通、逐步问答和解码可靠性（13.3%）、自发参与（20%）和被试培训（26.7%）等条款只体现在少数样本中。结论表明，不少TAPs翻译过程研究

⁹ 该重要步骤是检查研究者对于“建构”“假设”等的理解是否正确。通常形式是由研究者递交部分研究成果（如采访到的短小报告）进行检查，这一步往往在收集和分析数据时执行。

缺乏必要的保障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结果的说服力。我们在实验设计、数据分析和结果报告中会逐条参考上述款项，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第二节 电脑击键记录技术及其在英译汉研究中的可行性

3.2.1 电脑击键记录技术概述

电脑作为书写的工具，不但在写作实践与方式上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所有书写研究（包括译文书写）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角度。在写作的认知研究领域，电脑击键记录软件更是广受欢迎。Spelman Miller & Sullivan 在《电脑击键记录技术与写作》（*Computer Key-Stroke Logging and Writing*）的前言中这样论述：“作为一项可观察的工具，击键记录软件为捕捉写作行为的细节提供了机会，其用途不仅用于写作的语言学与认知研究，还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语言习得与语言教学”（Spelman Miller & Sullivan 2006:1）。

目前已经面世的各种电脑击键记录软件，其基本理念是相似的，只要被试在电脑上处理文本，研究者就能通过击键记录软件准确记录并重现被试的书写过程。具体包括以下功能：

第一、能记录所有按键和鼠标的活动。研究者可以获得整个书写过程的基本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储存起来供后期处理分析。数据的连续存储不会干扰电脑的正常使用，研究环境具备很高的生态效度。

第二、所记录的数据可用于后期的分析，有的软件本身具备分析功能，有的软件需要将数据传导到其它程序（如SPSS、SAS等）进行分析。

第三、研究者可以根据兴趣，分析书写过程的不同变量，也可以结合不同方法获得的数据，即所谓三元数据分析法（见第三节），具体考察书写过程的某一变量。同时，电脑分析数据的效率比人工处理高得多。

3.2.2 几种常用击键记录技术分析

电脑击键记录技术不光用于写作研究，在阅读、语言习得、人机互动等研究领域也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更为翻译过程研究将带来技术上的革命。下文简单介绍几种常用击键记录软件的功能和应用。

3.2.2.1 JEdit、S-notation & Trace-it 软件

JEdit 是 Jakob Cederlund 开发的具备记录功能的文本处理软件，运行于苹果 Macintosh 系列电脑。该软件具备常用的文本编辑功能，如剪切、粘贴、撤销、重做、文本格式操作等；提供书写过程的基本统计数据，如停顿、命令、输入法等。JEdit 将书写过程记录在以图标显示的文件中，该文件可以输出到 MID¹⁰ 编辑器，通过 S-notation 进行分析。

S-notation 目前主要用于描述写作过程的修改行为，以反映专家和新手在写作技巧和能力上的差别。除了作为研究程序，S-notation 在其他方面的用途也颇有开发潜力：教师可以运用该软件来观察学生的不同写作策略；作者可以用它来记录写作历程，对比文章修改前后的面貌；此外，S-notation 还能用于比较不同环境下的写作行为。

Kerstin Severinson Eklundh 等开发的 Trace-it 软件能在电脑屏幕上呈现所有修改行为，回放写作全过程。该软件可以在不同的电脑或文本处理器上研究文本修改策略，并支持不同类型数据的交互分析。Trace-it 的页面包括两个窗口，一个显示文本的 S-notation 形式，另一个显示普通文本，使用者可以在每个修改的地方重播、快进或后退。Trace-it 也能获得写作过程的统计数据，包括简要统计数据和详尽描述数据；在教学上可以提高学生对修改策略的关注；在写作实践上可用来存储文本在不同时段的修改过程和步骤。

3.2.2.2 ScriptLog 软件

瑞典学者 Englund Dimitrova (1993; 2005) 在 TAPs 翻译研究中运用了 Scriptlog 2.1 软件。该软件是 Sven Strömquist 和 Sven Moen 于 1993 发明的，它和 JEdit 一样，运行于苹果 Macintosh 系列电脑，并且可以记录键盘和鼠标的输入活动。同时，所有信息都有时间标注，存储在一个录制文档中。该录制文档可转成其

¹⁰ MID 是 Movement, Insertion 和 Deletion 的首字母缩写，是一种自主形式的编辑器，它能概括每个部件在写作过程中移动、插入和删除的行为，并附注以特定的时间标记。

他文档，如编辑后文本和线性表示文本，前者提供文本成品，后者用字符记录整个文本输入过程。

ScriptLog 最突出的功能是协同击键记录数据和眼球跟踪数据，探索被试写作过程的注意力分配情况。比如在儿童看图写作实验中，作为诱导工具的图片会分散被试的注意力，如果能收集并分析被试击键活动和眼球活动的的数据，就能较完整地描述被试看图写作的认知过程。

击键数据和眼球跟踪数据相结合的研究理念比较新颖，数据精确度较高，但在普通写作研究中意义不大。然而，该设计却非常适合翻译过程的研究，因为翻译比普通写作任务增加了阅读原文的过程，目光在原文上的定位很能说明被试当时注意力的集中点，结合击键记录数据，可以推断被试的决策与选择是受原文语境的提示，译文语境的提示，还是词典等参考资料的提示。目前这项技术尚在发展中，而该研究理念也为Translog 软件所借鉴，运用于翻译过程的研究。

3.2.2.3 Inputlog 软件¹¹

Inputlog 软件是比利时Antwerp大学Mariëlle Leijten 和 Luuk Van Waes 于2005年2月推出的，主要用于研究写作过程。该软件最显著的特点是能够独立于文字处理器，记录按键和鼠标的活动，用于分析Word文档的书写过程，并且兼容Windows系统的其它程序。也就是说，该软件能记录和观察的不光是书写过程，还包括访问网站、运用其它程序等。另外，Inputlog还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书写过程，其输出数据存储在一个叫IDF（Inputlog Data Files）的源文件中，通过内部转换，可为研究者提供形式数据、停顿数据和文本数据等；也可以作为输入端为重播模式提供数据，显示文本重播过程。重播模式能根据用户要求，以不同的速度重现初始书写过程¹²。重播模式可作为中介工具，分析文本的修改过程；也可作为诱导工具，收集反省TAPs或反省式采访数据。Inputlog 软件目前的主要功能包括：①记

¹¹ 笔者感谢Mariëlle Leijten & Luuk Van Waes无偿提供Inputlog 2.0供本研究使用。

¹² 目前该技术最多以原速度120%的速度播放。

录Word文档的书写过程；②生成数据文件，包括统计数据、文本数据、停顿数据和模式分析数据等；③以不同速度重播录制的书写过程。

笔者尝试将 Inputlog 用于英译汉过程研究，发现以下问题：

第一、Inputlog软件的回放功能运用了电脑屏幕的XY坐标定位法，程序只能识别光标移动和鼠标点击动作的几何位置。因此，Inputlog软件能使书写时段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重现，但其前提条件是电脑的设置（如工具栏、语言设置、词典软件等）在书写过程与文本重播过程中必须完全一致。事实上，实验时电脑屏幕图标位置变动的可能性很大，比如翻译过程中，被试进行了网页查询，Inputlog软件回放时，由于网页已更新，鼠标点击的查询条目并非实验时点击的条目。电脑屏幕的XY坐标定位法对实验更为致命的影响是：该软件的启动和关闭键位于Windows界面的提醒区域（notification area），而该区域项目变动频繁，比如打开金山词霸软件，提醒区域就会显示词霸的图标；Windows需要升级某软件时，也会在该区域出现提醒的图标。而一旦插入别的图标，Inputlog的开始或关闭键就要顺势移位，从而导致软件回放时经常无法自动找到开关键，所录制的文件也因此根本无法重播，实验数据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无法还原。

第二、利用 Inputlog 软件的回放功能作反省 TAPs 报告，虽然软件能以原始速度的一定倍率进行回放，但不可以随时暂停回放过程，因此，被试进行受激的反省 TAPs 时，汇报速度要跟着屏幕回放的速度走，而不能根据自身思维进行自由地反省。在我们的测试中，被试因为屏幕上字幕回放的速度太快，反省报告跟不上，曾提出不用看屏幕回放，直接面对译文作反省报告；虽然被试最后还是完成了基于 Inputlog 软件的受激反省报告，但反省 TAPs 数据远不如即时 TAPs 数据丰富。这一结果表明，Inputlog 软件的回放功能并不能帮助被试更好的进行反省式报告。

第三、方法论中已提到，Inputlog 软件用于英译汉的局限是对输入的汉字数据不能统计分析，因此其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也无法在英译汉研究中发挥作用。

可见，结合 Inputlog 软件作受激的反省 TAPs，在目前英译汉实验中仍然是一项不够成熟的技术。

3.2.2.4 Translog软件¹³

Translog 软件是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 Arnt Lykke Jakobsen 和 Lasse Schou 于 1998 年发明的，用于辅助 TAPs 方法研究翻译过程，因此命名为 Translog（translation log 的缩写）。与翻译过程的其它研究方法相比，Translog 具备电脑击键记录技术的优点，即过程信息不受环境因素影响，数据具有较高的客观可靠性。Jakobsen 指出：“迄今为止，大多数自愿参加 Translog 翻译实验的被试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完全忘记自己在进行实验，在 Translog 软件上输入译文跟正常的翻译行为并无二致。他们还表明不会注意到输入的文本正在被记录这一事实。由此可见，Translog 具有自然有效性”（Jakobsen 1999b:15）。

Translog 软件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运行，可以在不干扰文本输入的前提下，准确记录所有按键的活动，包括修改、删除、增加、剪切、复制、光标移动、电子词典查询等，并能显示按键活动的时间。只要简单地点击程序中的播放键，就能重播任一时段的文字输入过程；同时还提供线性表示（linear representation），通过一系列符号来描写文字输入过程。研究者可以根据 Translog 程序记录的信息，而不是凭借作品或译文，来推测文本书写过程。另外，研究者可以运用该程序详细地实时记录数据，分析认知过程与时间的关系；其重播功能，可以作为反省报告的诱导工具，利于收集较为丰富的过程反省信息；不同的文本显示方式，能帮助研究者了解实验中任一时间被试的思维关注点；以及被试在某一语段写作或翻译中的耗时。

Translog 软件虽然为写作和翻译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翔实可靠的实验数据，但其自身缺陷和有待发展的地方我们也必须看到。该程序记录的文本输入过程，实际上只是写作或翻译全过程的一部分，其他如写作的审题、构思、腹稿，或翻译的原文阅读、理解、决策过程等，都是该程序目前无能为力的。因此，Translog 软件在写作和翻译过程研究中主要用作辅助工具，利用其屏幕重播、线性表示或统计等功能，配合其他研究方法探索人脑思维的运作状况。

¹³笔者感谢 A.L. Jakobsen 教授无偿提供 Translog 2006 安装文件。关于该软件的介绍，参见拙作〈洞悉翻译过程的辅助工具—Translog 程序介评〉，见《中国科技翻译》，2006 年第 4 期，页 22-26。

Translog 软件自问世以来, 在应用中不断修订与发展。Jakobsen 等最新推出的 Translog 2006 白金版 (platinum version) 程序还提供了跟踪眼球阅读活动的 Eye-to-IT 程序和声音记录单元 (audio component)。前者利用红外线眼睛跟踪设备和脑电图扫描器数据 (EEG Data), 记录任一时间人眼在电脑显示屏上的聚焦位置, 具有很强的生理现实性。后者可用于记录被试在翻译过程中的有声行为, 比如被试在理解原文或修改译文时不自觉说出的话语。如果将以上三种功能同时使用, 那么键盘输入的过程、不自觉发出的有声信息和眼球在电脑屏幕上的定位, 不需要被试的内省报告, 都可以准确记录。

笔者尝试将该程序用于英汉翻译过程的研究, 遗憾地发现, 它虽然可以成功地应用于汉译英过程实验, 但由于该程序主要面向印欧语之间的翻译, 并未考虑到汉字书写和输入的特殊性, 因此无论是过程重播还是线性表示, 都不能显示任何汉字, 不适用英译汉过程的研究。曾有学者提出在英译汉时译文用汉语拼音代替汉字进行输入, 但这种译文充其量只是半成品, 况且汉字本身的声调和同音多义性, 也使得拼音无法完全取代汉字的表达功能。科技日新月异, 假以时日, 我们相信 Translog 软件无论是数据的丰富程度, 还是在语言的适用方面, 都能更加成熟, 成为探索翻译认知过程的得力助手。

3.2.3 击键记录技术在英译汉研究中的可行性分析

前文介绍了四种电脑击键记录软件, 并着重分析了 Inputlog 和 Translog 等软件。下文将分析这四种软件在英译汉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可行性。

第一、击键记录软件在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

大部分电脑击键记录软件是为研究写作过程而开发的, 但并不妨碍其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适用性。不可否认, 写作过程和翻译过程在思维活动上存在较大差别, 翻译可以说是受原文束缚的书写, 但是软件记录与分析的不是直接、具体的思维过程, 而是通过键盘和鼠标输入在电脑上进行操作的文本处理过程。这些涉及电脑键盘输入的行为, 写作与翻译过程是大致相同的, 均有停顿、增删、修改等现象。

第二、击键记录软件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

击键记录软件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涉及到该软件在具体研究中的适用性。实证研究非常注重实验环境的生态效度，目前大部分译者的翻译活动在 Word 文档中进行（包括本研究的所有被试），因此软件能否与 Windows 系统及 Word 程序兼容，成为研究者首要考虑的问题。上述四种技术中可以做到兼容的是 Inputlog 软件和 Translog 软件。然而，Translog 软件虽然在 Windows 系统下操作，但文本编辑界面与 Word 界面有较大差别，略带实验痕迹；且 Translog 不能记录被试通过互联网和或电脑软件进行决策的行为。Inputlog 能较好做到上述几点，该软件不但能够让被试在正常的 Word 文档中进行文字输入和编辑，其重播功能还可以重现文字处理过程、电子词典与互联网查询等活动。遗憾的是，该软件在实际运用中因为“XY 坐标定位法”而存在明显的缺陷。

第三、击键记录软件与语码显示的兼容性

击键记录软件与语码显示的兼容性是翻译过程实验研究相当关键的因素，如果输入的语码在实验程序中显示乱码、不能显示或者不能准确显示，该程序就无法使用。我们最先关注的 Translog 软件不能显示任何汉字，无法显示汉语的输入形式、输入结果的统计数据 and 输入过程的重播，因而不能用于英译汉的翻译过程研究。Inputlog 软件能基本解决语码显示问题，但其线性序列也只能显示汉字拼音的线性序列¹⁴，因此其数据分析功能也无法运用在英译汉研究中。

分析表明，上述四种软件均未能完全适用（包括记录与重播功能、数据分析功能等）英译汉研究。但是，电脑击键记录技术为翻译过程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和研究途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中国学者对该领域研究的关注，适用于英译汉的击键记录软件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应运而生。

¹⁴线性序列记录的只能是击键的字母，而汉字的输入法却有全拼、双拼、五笔等，因此如果要借鉴 Inputlog 记录的线性序列，研究者必须对考察的问题进行变通。

第三节 本研究采用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多种方法的结合可以为研究提供不同层面的数据。对于翻译过程研究而言，首当其冲的结合方式就是目前较为热门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本章第一、第二节已经对不同形式的TAPs方法和不同种类的电脑击键记录技术在英译汉过程研究中的可行性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慎重的取舍。在此基础上，本节将重点论述本研究采用的其它数据收集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和即时TAPs共同组成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3.3.1 三元数据分析模式概述

关于翻译过程研究的所谓“三元数据分析模式”，Fabio Alves 在其编著的论文集序言中这样解释：

本书的题目《三元数据分析法：透视翻译过程研究》应该这样理解：书中所有文章运用的方法都好比是航海时运用的三角测量定位法。假设轮船航行时通过航海图未作标记的海域，这时，就应当依据几个已标记的地点来确定此处的方位。推及到社会科学方面，本书作者均使用多种数据收集的方法，分析自己关注的问题，使翻译过程的本质问题明朗化。（Alves 2003: 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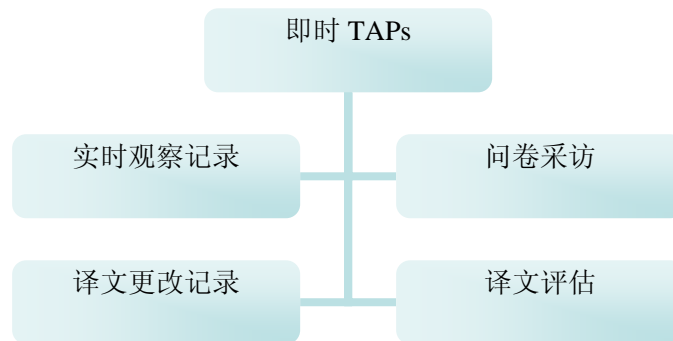
“三元数据分析法”源自航海技术中运用几个定点定位某一未知点的“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所不同的是，翻译过程的研究不是依靠仪器或量具来测量，而是运用多种数据来分析。因此在移植“三角测量法”概念时，我们主张在汉语中用“三元数据分析法”来表述，并把运用该方法的翻译过程研究模式定义为“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运用多种数据交互验证，可减少单方面数据的不足和偏误。同时，三元数据分析模式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不限定由具体哪些研究方法组成，只要运用多元数据收集法进行研究分析，就属于三元数据分析模式。例如Li（2004）提出，60%的TAPs翻译研究运用了三元数据分析模式，这里的模式主要是由TAPs与后期采访、问卷调查、译语文本分析等组成。

3.3.2 本研究采用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本研究采用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以即时 TAPs、实时观察记录、问卷采访为主体，同时结合译文更改记录，并参考专家译文评估（见图 3.1）。

图 3.1： 本研究采用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3.3.2.1 即时 TAPs

即时 TAPs 用于收集被试翻译过程的思维信息。参见本章第一节。

3.3.2.2 实时观察记录

本研究中的实验人员（主试）都负责指导监控与观察记录两项任务。因此，每一位被试的每一篇文本翻译实验过程都有较详细的他人观察记录。记录内容主要有：被试开始、中断、继续、结束每一处问题解决过程（包括思考问题、查询词典、电脑输入）的时间（精确到秒），翻译过程中被试的肢体动作、神情表现等。收集实时观察记录数据的目的是补充即时 TAPs 录音设备难以记录的内容，使最终收集到的实验数据完整全面。正式分析当中，通过实时观察记录获取的这部分数据

被用作对被试举措性质和思维逻辑的辅助判断依据，目的是保证本文针对被试主动汇报内容所作的判断更为客观真实。实时观察记录数据实例见附录四。

3.3.2.3 问卷采访

即时 TAPs 实验结束后立即进行问卷采访。具体分问卷调查和采访调查两部分，前者采用被试独自填写问卷的形式，后者采用研究人员与被试之间访谈交流的形式。采访的作用之一，是促使被试对自己实验进程中一些具体翻译问题的思考与操作进行有针对性的反省性质的回顾报告，该回顾报告数据可以很好地补充即时 TAPs 难以完整体现的信息。详见第四章“4.2.4 问卷与采访”。

3.3.2.4 其它辅助方法

译文更改记录：考虑到当前电脑击键记录技术无法应用到汉语相关的翻译过程研究领域中来，本研究在保证被试自愿且自发地统一译文记写方式（即均采用电脑文字输入）的前提下，于被试译文初稿完成后开启运用Word程序Track Changes功能，保存下被试对译文作更改的内容¹⁵。译文更改记录数据实例见附录七。

译文评估：译文评估共七项内容：总体评价、词句理解、遣词造句、衔接手段、逻辑连贯、语体风格、功能目的；评估结果通过各项评分体现，以保证译文评估的客观与公平。两位译文评分者（代号为 Rater1、Rater2）均为高校翻译专业教授，有 20 年以上的翻译教学与实践经验，参加过多次中国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英译汉题目的阅卷工作。本研究要求他们根据 10 分制量表对 18 位被试的 36 篇译文进行匿名评分，被试译文的各项成绩取两位专家评分的平均值。详见第四章“4.2.5 译文评估”。

本研究采用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主要立足于以上方法获得的数据，来探讨英译汉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我们在第二章理论部分指出，英译汉过程的选择行为将从四个层面进行研究，分别是翻译单位的选择、决策过程的选择、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翻译策略模式的选择。关于翻译单位和翻译工具的研究，西方学者已经在亲

¹⁵ 由于译文更改记录只能保存译文文本变动的最终结果，不能保存被试每一处更改的详细过程（比如更改操作的反复等），译文更改记录得到的数据只作为本文实验数据的辅助参考资料。

属语言对之间展开，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 TAPs 数据。关于决策过程的选择，国内外学者过去的研究成果较少，我们将重点探讨翻译问题特征、选项与决策过程特征、选择结果分布特征等内容，依据 TAPs 数据库，进行穷尽性的定量统计和分析。关于翻译策略模式的选择，我们拟在定性与定量分析 TAPs 数据的基础上，结合问卷采访数据、译文评估数据的定性或定量统计结果，构建出职业译者英译汉过程的策略模式。

第四章 实验前测、设计与数据

第三章从理论层面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各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了适合本项研究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展开一系列实验前测，实验前测的目的是为正式实验设计作好铺垫。第一节是对实验前测的详细描写。第二节从七个方面描述本研究的实验设计，并简要呈现通过实验收集到的部分数据。

第一节 实验前测

表 4.1: 实验前测被试的背景信息 (被试编号: P1-P6)

被试类型	编号	性别	年龄段	教育背景	翻译经验
初学者	P1	女	20-24	会计专业三年级本科生，正在辅修 1 门翻译理论课程。	1 年以下业余翻译经验，3 万字以下累计翻译字数。
	P2	男	20-24	计算机专业三年级本科生，正在辅修 1 门翻译理论课程。	1 年以下业余翻译经验，3 万字以下累计翻译字数。
半职业译者	P3	女	25-29	英语语言学专业硕士，主修过 4-5 门翻译课程。	3-4 年业余翻译经验，10-20 万字累计翻译字数。
	P4	女	25-29	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硕士生，主修过 4-5 门翻译课程。	3-4 年业余翻译经验，10-20 万字累计翻译字数。
职业译者	P5	男	30-34	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博士生，主修过 6 门以上翻译相关课程；高校翻译专业讲师，主讲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等课程。	5 年以上职业翻译经验，50 万字以上累计翻译字数。
	P6	男	55-59	高校翻译专业资深教授，主讲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等课程。	30 年以上翻译实践与教学经验，100 万字以上累计翻译字数。

正式实验之前，笔者进行了一系列前测。前测的 6 位被试 (P1-P6，具体信息见表 4.1) 根据教育背景和翻译经验，分为初学者、半职业译者和职业译者三类¹。前测被试均不参加正式实验，其数据仅用于前测分析。前测包括以下三组实验：

¹ 前测被试的选择和分类标准与正式实验完全一致，这部分内容详见 4.2.1 实验被试。

前测实验一：考察被试未经培训进行实验的情况。主试先向被试介绍什么是有声思维法、怎样做有声思维、有声思维应当注意的事项；待被试对有声思维法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让其进行一段英译汉的翻译，同时作有声思维报告。实验文本节选自哈佛大学校长致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欢迎辞（前测文本详见附录二，下同），前后共三个句子，85个英语单词。

有声思维培训：被试完成前测实验一，休息10分钟，然后接受有声思维培训。培训习题为两道GRE逻辑题和一篇看图作文，被试需要在解题和作文时进行有声思维。主试在适当的时候纠正被试不符合实验要求的行为，如回顾性报告、无声思考时间过长等。完成习题任务，主试让被试在有录音的环境下逐句翻译一篇短文，当被试自我感觉适应实验方式，并能熟练自然地进行有声报告时，进行前测实验二。

前测实验二：原文节选自Isaac Asimov的科普短文《电脑与人脑的差别》（*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Brain and a Computer*），前后共七个句子，123个英语单词，被试按照培训要求进行翻译并作有声思维报告。

前测实验三：原文是《文汇报》1979年发表的一篇短文，前后共三个句子，75个汉字，被试将这篇汉语短文翻译成英语，并按照培训要求进行有声思维报告。

前测实验反馈：六位前测被试在完成前三项实验任务后，填写问卷并回答主试提出的几个与实验相关的问题。

前测实验的结果和意义将从四个方面来分析：①关于实验培训的作用；②翻译方向问题；③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整；④前测翻译过程的定性分析。

4.1.1 关于实验培训的作用

Spelke等人通过实验表明，练习在人的注意力分配中有重要的作用。该实验要求两位被试在听写单词的同时阅读并理解一些短故事。结果发现，当两位被试在同时完成两项任务时，其阅读速度和书写速度都大受影响。但是，在给被试30个小时的练习之后，他们的阅读理解就不受同时进行的听写任务的影响。该研究表明，练习能够有效改进同时完成两项任务的能力（梁宁建 2003:101）。在TAPs翻

译实验中，被试也需要同时进行两项任务，即翻译任务和口语报告任务，通过练习可以减少口语报告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前测实验一和前测实验二的对比体现了培训在 TAPs 实验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从数据的信息量来看，六位被试前测实验一 TAPs 数据非常贫乏，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思维的结果，也就是片断式的译文，且不断出现长时间的停顿。虽然主试在 TAPs 注意事项里说明停顿不宜超过 10 秒，但在具体实验中该现象还是频频出现。相比之下，六位被试前测实验二的 TAPs 数据比较丰富，除了汇报出翻译结果和调整译文的过程信息之外，还有不少关于词汇选择、字词搭配、结构调整等思考过程，以及选择过程中的个人感觉和一些属于翻译理论或原则的思维数据。以下两个例子是半职业译者 P4 在培训前后的两段 TAPs 报告：

例 4.1 (P4/semi-professional/T1) (培训前)

(原文)：This is surely a moment of promise, of risk, and of opportunity in China.

(TAPs)：在中国，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充满，promise... .. (12s)，希望吧，充满希望、风险？还是挑战... .. (8s)，嗯，风险，和，和... .. (5s) 机遇的... .. (15s) 时刻吧。

例 4.2 (P4/semi-professional/T2) (培训后)

(原文)：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brain and a computer can be expressed in a single word: complexity.

(TAPs)：人脑和电脑的差异，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复杂程度。是“复杂程度”呢，还是“复杂度”？“复杂程度”好一点，更符合 general audience 的一些... ..可以用，can be expressed in，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表达”不好，用“形容”。把 in a single word 放到“形容”的前面去，更符合中文的习惯。... ..一个词来形容，来，用... ..can be expressed in a single word，可以用“来”的句式结构。

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半职业译者 P4 在培训前后进行 TAPs 报告的不

同表现。原文都各只有一个句子，结构均不复杂。结果显示例 4.1 中被试汇报出的 TAPs 数据信息量很少，但这并不是因为被试在翻译过程中思维的自动化程度很高（因为数据显示其有多次长时间的停顿考虑，但思考的信息均未汇报出来）。被试在实验前测之后表示，实际上例 4.1 在词汇选择、搭配等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但因为当时对怎样作有声翻译不熟悉，很多想法没有及时汇报出来。例 4.2 则不同，被试通过培训，对有声翻译形式相对比较熟悉，在翻译的同时能较自然且及时地汇报出所思所想，因此，即便翻译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子，也能提供丰富的思维信息。

第二，从被试的实验反馈来看，六位被试有四位反映前测实验一说出的关于翻译思维过程的信息在 60%以下，两位反映在前测实验一说出的关于翻译思维过程的信息为 60%-70%。而在前测实验二的反馈报告中，有五位被试指出自己说出了 90%以上关于翻译思维过程的信息。前测实验一的反馈表中，P2 针对 TAPs 对翻译过程是否存在影响时指出：“把原来默写的过程化为有声语言的表达，比较不习惯，开始的时候比较紧张”；P4 指出，“……把翻译的过程口头表达出来有点影响思路，不如默想时清晰”；P5 指出，“第一篇翻译过程有点不自然，我对该翻译方式不适应，感觉口头报告比较别扭”。但在前测实验二的反馈报告中，P2 和 P4 均认为已经适应了实验方式，有声思维对实验过程或结果基本没有影响。P5 指出有声思维对翻译过程“稍微有点影响，速度上放慢了一点，因为思维也是一分为二的，一部分在考虑下面怎么翻，一部分在表述，表述也是思维过程，分了一部分心，但是占的比例很小，因为是自然地用母语说话，不需要很多脑筋，不象翻译过程，转码需要时间”。此外，实验反馈显示，大部分被试认为实验二的信度为 90%以上。下例是职业译者 P6 接受采访时论及的前测实验二数据的可信度。

例 4.3

（主试）：您觉得第二篇文本的翻译和您平常从事的翻译有区别吗？

（P6/professional）：因为比较放松，就没多大区别，实际上我平常也是这样做的。如果说是，比方说电视台啊、电台啊，或者媒体来的话，说不定就少真实了。那可能，嗯，为了面子吧，有时候（笑声）……就不那么真

实。因为你吧，你要做科研，所以我想尽可能真实一点。很自然的，也不隐瞒的。实际上如果说你电台来叫我做，或者是，或者哪个出版社叫我做的话，那我可能翻得比这篇要快得多，就是，因为要翻译出来还是便当的，对吧，很快可能就打出一篇出来了，不象，不象我现在在你面前（思维）是全部暴露的，整个思考啊，不放心啊，就全部出来了。比较真实的，特别真实，我跟你讲，你这个（实验）做得一点都没有那个好像要考虑其他因素，就是我怎么想的怎么做，就这样解决问题，非常真实。所以你这个得到的数据呢，你分析完全可以，可以讲是可靠的，没有虚假的东西。……你的实验，信度可以达到 98%。

通过前测实验一和二的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在实验设计时安排 TAPs 实验培训是非常必要的。经过培训的被试不但能提供更为丰富的 TAPs 数据，而且不会因为实验方式问题产生不自然的感觉，有声思维对翻译过程的影响较少；再者，相比未经培训的被试，有培训经验的被试所提供的实验数据可信度较高。

4.1.2 翻译方向问题

关于翻译方向（direction of translation），Michea 对双语被试翻译过程有这样的论述：“翻译不是从某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变，译者操纵的是两种不同的‘键盘’，键盘中聚集了一系列的模型和样式可供译者支配；而译者在编写译文时，必须时而求助于一方，时而求助于另一方”（cf. Kiraly 1995:17）。这段论述认为：翻译不是从 A→B 或从 B→A 的程序性过程，而是在 A 和 B 两种集合的共同支配、作用和帮助下产生 C 的过程，因此翻译方向对双语译者的翻译过程没有任何影响。该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法国释意学派就认为在译入与译出之间不存在预先的差别，Gleason（1980）也认为译入与译出这两种活动皆围绕语言的理解和表达，因此其所涉及的认知过程是一致的。从实用的角度，Wilss 指出德国的翻译市场希望译者能够将母语译到外语。“德国三所大学中的口笔译学院为了给市场提供最优秀的毕业生，都为学生提供双向翻译课程，考试采用双向翻译的形式”（Wilss 1982:183）。

然而，国际上主流的看法是：译者应当尽最大可能从事外语到母语的翻译，或将一门不太惯用的语言译成自己惯用的语言，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流利性和最大程度的有效性。相反方向的翻译被称为“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或“服务翻译”（service translation），只可用作教学练习，以检查学生的语言运用情况（cf. Baker 1998:64）。事实上，英国汉学家Angus C. Graham早在1965年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一般来说，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²（Graham 1965:37）。结合本研究的具体情况，我们发现，不同的翻译方向对实验影响很大。

首先，我们考察的被试不属于双母语者³，他们是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汉语母语者，因此被试的英语水平明显不如汉语，这客观上使得被试在正向翻译和逆向翻译时，过程和结果均会出现较大差别。

其次，根据 TAPs 实验的要求，被试的译入语应该和 TAPs 报告的语言相一致。Toury 指出：“被试习惯以母语对思维过程作 TAPs 报告，而在母语译成外语的时候，作为译入语的外语和用于 TAPs 报告的母语容易产生语码冲突，影响翻译过程的自然性”（Toury 1995:235）。

通过前测实验二和前测实验三的比较，我们发现六位被试存在共同的现象：英译汉 TAPs 过程比较自然流畅，所提供的翻译过程信息比较丰富，译文质量也比较高；汉译英过程的 TAPs 经常出现中断和停顿，提供的翻译过程信息较少，译文质量较差。下例是职业译者 P6 在实验后接受采访的报告：

例 4.4⁴

（主试）：在您做了英译汉和汉译英之后，您觉得翻译方向对于翻译过程有无影响？

²Graham的原文是“...there are few exceptions to the rule that translation is done into, not out of, one's own language”

³该处的“双母语者”指两种语言都达到说本族语那样流利的人。

⁴例 4.3 和例 4.4 均引证了P6 的回答，是考虑到P6 作为资深译者和翻译课程教授，其回答比较有说服力。

(P6/professional): 绝对有影响。因为像一些有经验的翻译家就认为, 嗯, 翻译应该向母语这个方向翻译是正确的, 就是从外语翻译成母语, 这个翻译出来肯定比较好; 而从母语翻译成外语呢, 肯定是像我刚才那样, 那就是要非常……一个是, 如果母语翻译成外语, 一个你必须在外国多呆, 象林语堂那样, 你在国外的环境呆个几十年, 那你实际上已经取得 native speaker 的语感了, 那也是可以的。那象我们这种, 都是通过, 看书而获得的一些语言的 proficiency 啊, 这种水平啊, 实际上语感还是不够的, 所以翻这个汉译英的把握还是没有像英译汉的把握那么大。这是我的感觉。

(主试): 对比您刚才英译汉和汉译英的有声思维报告, 发现英译汉的报告内容更加丰富, 这是为什么?

(P6/professional): 这个原因呢, 因为就是我表述的思维实际上是在考虑用……实际上翻译最主要的是后边这个表达, 理解实际上还是退一步, 当然很重要, 但花的时间没有象表达那么花的时间来得多, 所以在表述思维的时候实际上是表达, 这个翻译的第二个过程, 即是编码, 重新编码这个过程, 说的比较多。而重新编码呢, 是, 用母语重新编码呢, 是有话可说, 这是我的母语, 我怎么想的, 实际上也是用汉语在思维, 所以讲得就比较多, 而倒过来, 编码, 我因为从外语的编码呢, 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 所以在解说思维的时候呢, 也, 话也不多, 好像也, 也不多了。……自然的话就少了, 说不出多少了。

通过前测实验, 我们发现本研究所考察的被试在进行英译汉的有声思维实验时, 的确存在如 Toury 所说的语码冲突现象, 这对实验数据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决定在实验设计中, 专门考察英译汉的情况, 这样一方面不引入翻译方向这个变量, 另一方面也避免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自然现象和语码冲突问题。

4.1.3 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整

实验前测为本研究设计问卷和采访提供了反馈信息和修改意见。我们在前测时让六位被试填写草拟的调查问卷,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 我们发现最初草拟的问卷

存在较多问题。比如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您认为该环境对翻译过程有影响吗？选项“有”或“无”，并要求“如果有影响，请简单说明”。有些被试就这道题提出这样的疑问：“该环境对翻译过程的影响是存在的，因为它毕竟和平常翻译的形式不同；但通过实验培训，有声思维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已经很小了，所以我该填‘有’还是‘无’呢？”。还有些被试带着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对该题进行回答，比如被试 P1 选择了“无影响”，但在其 TAPs 文本中有这样的数据：“我发现，一边说一边做有点影响翻译，我随时随地要提醒自己我要说，我要说……”。可见 P1 选择“无影响”并非真实想法，而是认为选择“无影响”会比较符合主试需要的答案；或者认为选择“无影响”，就不需要说明原因了。因此我们在正式问卷中对该题作了改动，选项改为毫不（影响）、有点（影响）、不太（影响）、比较（影响）和非常（影响）。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其它问卷和采访题中，我们通过分析前测的调查结果，对所有设计不够合理的题目进行了调整。

4.1.4 前测翻译过程的定性描写

这部分选取了两段前测 TAPs 的例子进行定性比较和描写。定性描写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考察第二章提出的选择行为的四个层面是否在 TAPs 数据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其次，通过 TAPs 数据的对比分析来了解不同类型的被试决策行为的差别。

例 4.5 (P2/novice/T2)

(原文): The large mammalian brain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hing, for its size, known to us.

(TAPs): The large m... [不会读] brain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hing, for its size, known to us. 大, 大型……哺乳动物……大脑。大型哺乳动物的大脑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hing, 最复杂, for its size. [写] 呃, for its size, 呃, 大型哺乳动物, for its size, [查 size] 大小、尺寸、体积……大型哺乳动物的大脑……体积? 容量! ……的大脑, 由于容量,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hing, known to us, 呃, known to us, 如……正如我们所知, 正如我们所知, 嗯,

看看最前面，大型哺乳动物的大脑，由于容量.....较大？嗯。正如我们所知，由于容量.....正如我们所知，由于容量较大，大型哺乳动物的大脑是最为复杂的。[写]最复杂的？最为复杂的。

(译文): 正如我们所知，由于容量较大，大型哺乳动物的大脑是最为复杂的。

例 4.6 (P3/semi-professional/T2)

(原文): The large mammalian brain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hing, for its size, known to us.

(TAPs): The large mammalian brain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hing, for its size, known to us. 句式结构是，最开始的逗号分开的前面的这一段是说最复杂的东西，这个当然是最复杂的东西，for its size, known to us, 最复杂的东西，known to us, ok, 这也很好理解，是对我们来说最复杂的东西；for its size, 其实是说在大多数.....in terms of size. Ok,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型灵，呃，哺乳动物的，脑，对我们来说，known to us 放到前面去，更符合中文的习惯，对我们来说是最复杂的东西，哦，还要把“从尺寸上来说”这句话也要放到前面去，那就是说，哺乳类动物，大型哺乳类动物的，呃，脑，脑，嗯，对，大脑，要使用比较严谨的词，脑，是，从，尺寸，尺寸这个词可能用得不好，是从，脑容量这个词可能比较严谨一些，脑容量，是从，ok, size 这个词，可能不一定是脑和脑比，它可能是脑和非脑比，那么就不应该用“脑容量”这个词，应该是说 the most ... for its scale ... 那应该换成“复杂程度”还是应该换成..... 呃，这个暂时放下，或者暂时用“脑容量”代替。

[写] 大型哺乳动物的脑是我们所知的，known to us 应该翻译成“是我们所知的”，不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所知的，从脑容量来说，最复杂的东西。“从脑容量来说”需要再进一步考虑。

(译文): 大型哺乳动物的大脑，从脑容量上来说，是我们所知的最复杂的东西。

首先，从翻译单位的选择来看，P2 将该句主要分成四个部分来翻译，即 “The

large mammalian brain”, “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hing”, “for its size”, “known to us”; P3 则从句式结构角度将 “The large mammalian brain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hing” 作为一个单位处理。两位被试都在个别词汇翻译上遇到问题, 如 “size” 的翻译, 但解决的手段有所不同。

其次, 从决策过程的选择来看, P3 在翻译时比 P2 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在解决问题时提出的选项也较多, 比如 “size” 用 “尺寸” 还是 “容量”, “known to us” 应该翻译成 “是我们所知的”, 不是 “对我们来说”, 等等; 此外, P3 还在 TAPs 报告中考虑到译文期望结构, 比如 “known to us 放到前面去, 更符合中文的习惯”, “脑容量这个词可能比较严谨一些” 等; 并据此进行了句子结构的调整。P2 同样进行了句式调整, 但未说出调整的原因和依据, 调整的效果也不如 P3。

再次, 从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来看, P2 在遇到 “size” 的翻译问题时, 马上借助词典来解决; P3 虽然对 “size” 作为 “尺寸” 的意思不以为然, 对自己提出的 “脑容量” 也不十分满意, 但始终没有运用翻译工具, 而是反复结合上下文语境来选择合适的翻译。

最后, 从整体翻译策略的选择来看, P2 从小处入手, 一部分一部分解决翻译问题, 然后综合成整句话的翻译; 而 P3 则先考虑结构, 在整体把握整句话结构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解决个别问题。

当然, P2 和 P3 在翻译时决策行为的效果, 还可以参考翻译结果的质量。从例 4.5 和例 4.6 译文意思的准确性、表达的適切性来看, P3 的译文要比 P2 的译文更胜一筹。

通过上文的对比分析, 我们认为对于英译汉选择行为的考察, 可以从以上四个层面进行。在考察时既可以采用定量统计的方法来比较不同译者不同变量的差别, 也可以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比不同译者的表现, 最后还可以结合译文质量评估来辅助说明决策行为的效果。对于这些内容的具体分析和论述, 我们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展开。

第二节 实验设计

所谓实验设计，是科学实验前的具体计划，用来控制实验条件，安排实验程序，减少额外的或未控制的变量，从而增加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好的实验设计能帮助研究者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获得最多最有效的实验数据，达到最佳实验效果；如果实验设计不当，条件控制不严，方法和程序安排不合理，即使实验的规模较大，次数较多，所得数据仍可能无法合理地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本实验设计参考了实验心理学的基本规则和TAPs翻译过程研究的具体要求，并结合考虑了实验前测结果和本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

4.2.1 实验被试

西方学者早期的TAPs研究往往采用单一类型的被试，如外语学习者（Krings 1986a; Lörcher 1991a）、翻译学生（Hönig 1988b; Tirkkonen-Condit 1989）或职业译者（Séguinot 1989; Fraser 1993, 1994; Laukkanen 1993）。随着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开始注重对职业译者和初学者的对比研究（Jääskeläinen 1987, 1989a, 1990b; Kiraly 1990, 1995; Jonasson 1998; etc.）。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倾向对被试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Shreve（2002:160）提出：“先前关于翻译能力的研究着眼于比较初学者和职业译者，事实上考察较高级别的翻译行为，仅仅比较初学者和经验丰富的译者是不够的。这类比较研究还必须根据译者翻译的年份和经验的种类进行分类，同时可以发现，对于译者的分类远不仅仅是初学者和专家，或者学生和职业译者”。Alves（1996）的被试包括职业译者（professional translators），技巧成熟的学生（mature students）和初学者（novice）；Jensen（1999, 2000）的被试为非职业译者（nonprofessional translators），资历较浅的职业译者（young professionals）和专家译者（expert translators）；Kovčáči（2000）则分别选取了两位初学者（beginners）；两位略有经验者（two with some experience）和两位专家（experts）；另外，Martikainen（1999）、Shreve et al（1993）、Ronowicz et al

(2005) 等的研究也均采用了三类研究被试, Englund Dimitrova (2005) 甚至将被试分为四类, 资深职业译者 (senior professionals), 初级职业译者 (junior professionals), 翻译学生 (translation students) 和语言学生 (language students)。基于上述的分析, 本论文将比较研究职业译者、半职业译者和翻译初学者三类被试。

关于三类被试的选择和分类标准, 笔者参考了 Kiraly (1995), Englund Dimitrova (2005), Shreve (2002), Zhao (2004) 等研究文献。

1、被试的第一语言 (L1) 必须是汉语⁵。上文提到, 一般翻译工作都是由外语译入母语, 因此对于英译汉的翻译过程研究, 汉语作为第一语言是选择被试的先决条件。同时, 这一标准可以排除母语差别对实验结果的干扰。本实验虽然在新加坡进行, 但所有被试均来自中国, 并无新加坡籍学生或学者参与, 同时这些被试来新加坡的时间均为3年左右。

2、被试均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被试第二语言水平的差别, 应该说在任何 TAPs 翻译过程的研究中都普遍存在, 包括 Kiraly (1995) 和 Englund Dimitrova (2005) 等研究。关键问题在于, 不同类别被试之间第二语言的差别是否大到足以影响其翻译策略的实施? 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在挑选被试时对其英语水平有严格的标准: 本研究的分类中, 即便是初学者 (主要由大学本科生组成), 也都通过英语托福考试且成绩均为600分以上 (托福600分是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录取中国留学生的底线), 并在两所大学接受了3年左右的全英文教育; 半职业译者主要是翻译专业或语言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职业译者主要由翻译专业博士 (生)、有多年翻译工作经验的职业译者或多年翻译教学经验的高校教师组成。英译汉实验

⁵ L1 (第一语言) 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出生以后所接触的和所学的第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通常是从父母那里学会的, 故而又称“母语” (mother tongue)。通常认为, 一个人的“母语”或“第一语言”有别于任何可能学到的其它的语言。L2 (第二语言) 的概念通常和外语纠缠在一起, 因为习惯上两者都可以指任何不属于某一地区固有语言的语言。但是许多语言学家区分“外语”和“第二语言”的用法, 承认学习目的、教学方法及达到的水平诸方面的较大的区别 (cf. Crystal 1995: 568-569)。本研究不特地区分L2和外语, 提及的L2是指被试除了L1之外, 理解、表达和运用熟练程度最高的语言。

中，英语作为原语对译者的挑战主要在理解方面，以上指标可以确保被试不会在原文理解上出现过多问题从而干扰翻译策略的实施。

3、初学者须对翻译活动有一定的兴趣，有学习翻译的意向和行动，但不超过2年的业余翻译经验和3万字的累计翻译字数，且从未有翻译作品正式发表。初学者在本研究中主要来自笔者执教的翻译辅修项目的中国学生，这些学生来自不同专业，均对翻译有浓厚的学习兴趣，且均符合翻译辅修项目的选课资格。其中有一位被试虽未正式修过翻译课程，但有1-2年的业余翻译经验，阅读或研究过一些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献，笔者也将其列为翻译初学者。

4、关于职业译者，Englund Dimitrova (2005:76) 的标准是“该译者必须有一半的收入来自翻译，并具备3年以上翻译经验”。本研究选择的职业译者必须有3年以上的职业翻译经验，累计翻译字数在50万字以上。此外，所有职业译者还必须要有翻译作品正式发表。

5、半职业译者必须有3年以上的业余翻译经验，但不具备3年的职业翻译经验。该类被试的翻译累计工作量介于初学者和职业译者之间，且从未有翻译作品正式发表。

确定被试之前，笔者先对潜在被试群体进行背景分类，告知他们实验要求，最后从所有自愿参加的人群中按照上述标准有目的地选择了20位被试，其中未有语言表达缺陷者（如口吃者）⁶。被试均以匿名方式参加实验，其真实姓名将在实验分析时以编码代替。被试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中止实验，完成全部实验要求的被试将获得一定的物质酬劳。正式实验采用被试内（within-subject）与被试间（between-subject）设计相结合的形式进行，20名被试均翻译两篇不同文体的文章，实验样本40份，其中有效样本36份⁷。尽管笔者在前期的被试选择上经过了严格的评测和推荐，所有被试均在表达方面胜任有声思维实验，并且通过几次实验前

⁶Gyde Hansen (2005:513) 认为，这类被试在TAPs实验中，会把较多精力放在TAPs报告上，影响翻译任务的进行和翻译过程的自然性。

⁷这一样本数量符合刘润清所提出的建议和要求：“30 是样本的最小极限，因为少于 30，必须进行技术处理才能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少于 30，收集的数据不能形成正态分布”（刘润清 1999:146）。

的培训，20位被试均对该实验过程相当熟悉且能够非常自然地在翻译的同时进行有声思维报告，但是根据被试实验后填写的调查问卷和主试在实验过程的观察记录，笔者还是去掉两位不太理想的被试数据，原因是：其中一位被试认为在这次实验中，有声报告严重影响了翻译过程，并且她认为自己只说出了60%以下关于思维过程的信息；另一位被试认为自己只说出了60%-70%关于思维过程的信息，并且认为这次实验的可信度只有60%-70%。结合主试的观察记录，这两位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出现较多长时间停顿，主试分别给予了12次和9次提醒。由此可见，这两位被试在正式实验时，没有正常自然地进行翻译活动，其数据不能用于实验分析。

最后用于研究分析的有效被试共18位，分属三组类别，每组6人。被试背景信息见表4.2:

表 4.2: 被试背景信息 (被试编号: S₁—S₁₈)

被试类型	编号	性别	年龄段	教育背景	翻译经验
初学者	S ₁	女	20-24	财会专业三年级本科生，正在辅修1门翻译理论课程。	1年以下业余翻译经验，3万字以下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商务作品。
	S ₂	男	20-24	计算机专业三年级本科生，正在辅修1门翻译理论课程。	1年以下业余翻译经验，3万字以下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科技作品。
	S ₃	女	20-24	财会专业三年级本科生，正在辅修1门翻译理论课程。	1年以下业余翻译经验，3万字以下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商务作品。
	S ₄	女	20-24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硕士生，辅修过1门翻译实践课程。	1-2年业余翻译经验，3万字以下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文学作品。
	S ₅	女	20-24	中国文学专业硕士生，未修过任何翻译课程。	1-2年业余翻译经验，3万字以下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文学作品。
	S ₆	女	20-24	计算机专业三年级本科生，正在辅修1门翻译理论课程。	1年以下业余翻译经验，3万字以下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科技作品。
半职业译者	S ₇	女	25-29	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硕士生，主修过4-5门翻译课程。	3-4年业余翻译经验，10-20万字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文学作品。
	S ₈	女	25-29	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硕士生，主修过4-5门翻译课程。	3-4年业余翻译经验，10-20万字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文学作品。

	S ₉	女	25-29	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硕士生，主修过 4-5 门翻译课程。	3-4 年业余翻译经验，10-20 万字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文学作品。
	S ₁₀	男	25-29	英语语言学专业硕士，主修过 4-5 门翻译课程；高校英语专业讲师，主讲英语阅读、写作等课程。	5 年以上业余翻译经验，20-30 万字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应用文。
	S ₁₁	男	25-29	英语语言学专业硕士，主修过 4-5 门翻译课程；高校英语专业讲师，主讲英语精读、阅读等课程。	5 年以上业余翻译经验，20-30 万字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商务文章和文学作品。
	S ₁₂	女	25-29	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硕士，主修过 4-5 门翻译课程。	3-4 年业余翻译经验，10-20 万字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政治评论文章和文学作品。
职业译者	S ₁₃	男	30-34	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硕士，博士生，主修过 6 门以上翻译相关课程；主讲过翻译实践课程。	3-4 年职业翻译经验，50 万字以上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政治评论文章和文学作品。
	S ₁₄	女	25-29	英美文学专业硕士，博士生，主修过 4-5 门翻译相关课程；高校英语专业讲师，主讲笔译、英国文学等课程。	3-4 年职业翻译经验，50 万字以上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商务文章和文学作品。
	S ₁₅	女	25-29	比较文学专业硕士，主修过 4-5 门翻译相关课程；专职翻译员。	5 年以上职业翻译经验，50 万字以上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应用文和文学作品。
	S ₁₆	男	35-39	英语语言学专业博士，主修过 6 门以上翻译相关课程，高校翻译专业副教授。	5 年以上职业翻译经验，50 万字以上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文学作品。
	S ₁₇	男	30-34	口笔译专业硕士，主修过 6 门以上翻译相关课程；高校英语专业讲师，主讲口译、笔译等课程。	5 年以上职业翻译经验，50 万字以上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应用文或文学作品。
	S ₁₈	男	40-44	英语语言学专业博士，主修过 6 门以上翻译相关课程；高校翻译专业教授，主讲口译、笔译和翻译理论等课程。	5 年以上职业翻译经验，50 万字以上累计翻译字数，翻译内容主要为应用文或文学作品。

另外，结合本研究的译文评估结果（详见 4.2.5 译文评估）还可以发现，三类被试两篇文本的评估成绩大体上表现为职业译者高于半职业译者，半职业译者高于初学者。这从第三者评估的角度辅助说明上述被试分类的可靠性。

4.2.2 实验原文

本研究选取实验原文时主要考虑两个因素：文本的有效性；被试之间的公平性。

文本有效性，体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首先，研究性质决定，本文

要做的是将译者的翻译过程尽最大可能在临时实验中体现出来，因此，在对文体代表度和被试实验疲劳度的权衡之下，本研究确定实验原文数量为两篇，一篇科普文，一篇政治演说辞。其次，主张选择难度适中的文本作为实验原文。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不太简单、也不太复杂的刺激信息或相关事物最具兴趣，也最能引起注意并保持注意（梁宁建 2003:107）。过于简单的原文容易产生“天花板效应”⁸（ceiling effect），不能体现被试解决问题的能力差别；难度过高的原文会产生“地板效应”（floor effect），被试容易出现消极心态或敷衍行为，甚至会因为难点过多而选择中途放弃，影响实验进程和实验数据的客观有效性。本研究参考的是中国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大纲，该大纲对译者的要求是：“能运用英译汉的理论和技巧，翻译英、美报刊杂志上有关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论述文章以及文学原著的节录；翻译速度为每小时 250-300 词”（朱嫣华 1994）。

被试公平性，是实验考察不同类型译者之间翻译过程异同点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从文体上考量。

文本一是科普文章，是面向大众的读物。其显著的普及性足以确保被试之间的公平性。

文本二是政治演说辞。同经济、科技等文体相比较，政治演说辞是相对‘大众化’一些的文体，它作为一种本身就以公众为主要听取对象的言论形式，在传媒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一定全球化概念的知识分子，都理应‘耳熟能详’，更何况本实验选取的是政要人物会面时公开发表的一篇简短演说

⁸ 实验心理学认为：在影响指标有效性的各种因素里，“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和“地板效应”（floor effect）是尤其典型的情况。这两种效应是指反应指标的量程不够大，而造成反应停留在指标量表的最顶端和最底端，从而使指标的有效性遭受损失。我们在选择文本时参考该理论，即实验中如果被试翻译成绩太好，那就应该增加文本的难度以降低作业水平。同样的，如果被试的翻译做得太糟糕，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有若干棘手的问题（比如Shakespeare文选的汉译，或《诗经》英译），那么就考虑选用难度较小的原文作为实验文本。在实验前测时，我们就已经考虑到文本难度的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所以选择文本的指导思想是使被试的反应情况分布在指标量程的中等范围内。

辞，因此它的句法和词汇依然具有普及性，凡参与本实验的被试都不会对此类文体感到陌生。除此以外，该文本又恰是取自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时所作的演说，对本文的被试人员（汉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来说，要了解这篇演说辞中发言人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两国关系、两国文化背景等等，实为常事，阅读理解和语句表达不会构成过多障碍，所以仍可保证被试间的公平性。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又结合了前测实验 6 名被试的表现与反馈，结果显然验证前文对文本有效性和被试之间公平性两方面所作的假设。前测实验结果表明，文本一演说辞和文本二科普文能较为理想地体现译者翻译思维过程的差别，文本难度适宜，实验收获数据的有效性高。

综合上述因素，笔者最后确定的两篇实验原文基本信息如下：

表 4.3：两篇实验原文基本信息（单位：个）

	单词数	句子总数			文体
		简单句	并列句	复合句	
实验一原文	178	4	1	6	科普小品文
实验二原文	222	7	0	6	政治演说辞

实验一原文⁹节选自英语科普小品文，节选部分共 11 个句子，178 个英文单词。作者 Isaac Asimov 是美国生物化学家、作家，著有科普读物及科幻小说，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读者。翻译科普文章对于不同专业背景或翻译兴趣的译者来说要求比较一致，他们不会在术语或语体表达上遇到太多困难，容易设想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不过实验一原文在理解和表达上也并非毫无困难可言，原文作者不但为非英语母语的读者设置了一些词汇层面的理解困难，其运用的个别复杂句式也使读者在结构分析上需要费一些脑筋。

实验二原文是英语演说辞，节选自 2003 年美国总统布什欢迎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白宫的讲话，节选部分共 13 个句子，222 个英文单词。演说辞集口语与书面语于一身，结合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演讲者的观点和情感等文体固有特征，并动用一些语言修辞手段，包括外交辞令等，使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较多因素，因此较

⁹ 实验一原文和前测实验二原文选自同一篇文章，只是被试需要翻译的段落有所不同。

能体现不同译者处理翻译问题的能力。

具体实验文本参见附录三。

4.2.3 实验过程

实验过程具体包括两部分内容，即实验培训和正式实验。

4.2.3.1 实验培训

实验前一至两天，主试对被试进行一对一培训。培训目的方面使被试了解实验要求和注意事项（如被试应说出翻译过程所有的即时思维信息，不作回顾性报告，不具体解释所采取的策略或步骤），并进行实验训练；另一方面通过培训让被试有机会熟悉实验室环境和实验所用的电脑。本研究所有实验均在主试指定的实验室和指定的电脑上¹⁰进行操作，实验室备有参考书、单双语词典、互联网和录音设备等，实验环境对所有被试而言相对一致。

培训任务从易到难分三项内容。首先，主试提供两道GRE逻辑题¹¹，让被试在解答分析时作TAPs报告，主试针对报告中的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帮助被试逐步适应有声思维实验。接着，主试打开录音设备，让被试完成一篇汉语看图作文，并进行有声思维报告。作文完毕，主试根据回放的录音指出实验过程中有待改进的问题。最后，主试再次打开录音设备，让被试逐个完成3-5个句子的有声翻译，每翻完一句，主试回放录音，根据被试在句子翻译过程的表现，提出改进意见，并在被试基本达到实验要求之后，结束实验培训。整个培训时间约为60分钟。

4.2.3.2 正式实验

Jääskeläinen (2000:74) 建议：正式实验前 10-20 分钟的热身试验，有助于克

¹⁰ 培训时根据被试要求，我们会在实验所用的电脑上提供被试需要的技术支持。比如添加被试习惯的中文输入法，储存被试常用的网页和术语库，安装被试习惯查询的电子词典软件等。

¹¹ 解答逻辑题的过程中涉及很多推理的思维，这些思维比较容易通过有声思维法汇报出来，帮助被试较快熟悉有声思维实验。

服被试在TAPs初始报告时的不自然表现。事实上，我们在前测时也注意到热身试验的必要性，因为有些被试指出，“刚开始（实验）的一两分钟不太适应，后来就不觉得在做测试了”，“开始的时候比较紧张”。因此，正式实验前，被试进行 5-10 分钟¹²的TAPs热身练习，以调整实验状态。

实验步骤一、主试播放正式实验要求的指示语。指示语事先经过前测测试并以 MP3 格式录音存储，录音朗读人员语调平缓清楚、语速较慢、语气较为中立。

实验步骤二、主试提供被试正式实验文本，并示意开始翻译。主试打开录音设备，退居被试后方，记录被试实验过程中查阅翻译工具、报告停顿过长等。被试开始依次翻译两篇文本。当被试在TAPs报告前的阅读时间过长（一般指超过 1 分钟），或报告中停顿的时间过长时（一般指停顿超过 10 秒），主试对被试加以适当的提醒¹³。考虑到TAPs 会减慢翻译速度（Jakobsen 2003），因此正式实验过程只给参考时间，不作硬性规定和限制。

实验步骤三、被试完成实验任务，主试暂停录音设备，让被试稍作休息。随后，被试根据问卷提示如实填写调查问卷，并回答几道采访题。回答完毕，实验正式结束。

4.2.4 问卷与采访

即时 TAPs 实验结束后立即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详见附录五）和采访调查（采访提要详见附录六），它们连同实验观察记录一起构成整个研究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的主体。问卷和采访有以下几方面目的：①了解被试的背景信息；②了解被试平常的翻译习惯；③了解被试对具体翻译任务的主观意见，比如被试“主观上以什么为翻译单位”。④了解被试对实验方式和实验环境的反应；⑤以问答交流的形式

¹²该处有两方面考虑：一是经过前期的培训环节，多数被试热身 5-10 分钟就可以进入较为自然的实验状态；二是正式实验约为 60 分钟，热身时间越久，被试完成后期正式任务时越容易疲劳作业。

¹³根据第三章第一节的分析，主试对被试TAPs报告前阅读时间的提醒是防止其在阅读过程中进行了过度学习。对于停顿时间的提醒是防止被试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地陷入沉思状态，忘记本实验的基本要求；但提醒并不等于强硬要求，因此我们在数据中看到，尽管主试严格按照 10 秒的要求执行提醒职责，但有些被试的停顿时间偶尔还是会超过 10 秒，甚至 20 秒。

式促使被试对自己实验进程中一些具体翻译问题的思考与操作进行有针对性的反省性质的回顾报告。

三类译者在问卷中对本实验的部分反馈信息¹⁴如下:

表 4.4: 被试对自己翻译能力的自信程度—问卷第 10 题回答情况

被试类别 \ 答题选项 百分比	很有自信	比较自信	一般自信	比较 不自信	很不自信	总计
	初学者	16.67%	66.67%	0	16.67%	0
半职业译者	33.33%	66.67%	0	0	0	100%
职业译者	66.67%	16.67%	16.67%	0	0	100%

表 4.5: 有声报告是否影响翻译过程—问卷第 11 题回答情况

被试类别 \ 答题选项 百分比	毫不	有点	不太	比较	非常	总计
	初学者	66.67%	33.33%	0	0	0
半职业译者	50%	50%	0	0	0	100%
职业译者	66.67%	33.33%	0	0	0	100%

表 4.6: 汇报出多少关于思维过程的信息—问卷第 12 题回答情况

被试类别 \ 答题选项 百分比	90%以上	90%-80%	80%-70%	70%-60%	60%以下	总计
	初学者	16.67%	66.67%	16.67%	0	0
半职业译者	50%	33.33%	16.67%	0	0	100%
职业译者	66.67%	16.67%	16.67%	0	0	100%

表 4.7: 实验数据的可信度—问卷第 13 题回答情况

被试类别 \ 答题选项 百分比	90%以上	90%-80%	80%-70%	70%-60%	60%以下	总计
	初学者	83.33%	16.67%	0	0	0
半职业译者	100%	0	0	0	0	100%
职业译者	83.33%	16.67%	0	0	0	100%

¹⁴ 笔者在这部分只列出被试对实验方式和实验环境的反馈信息, 其它信息会呈现在具体行文中。另外, 表格中不包括被淘汰的两位被试的数据。

4.2.5 译文评估

译文质量评估表共七项内容：总体评价、词句理解、遣词造句、衔接手段、逻辑连贯、语体风格、功能目的。总体评价是评估者看完译文之后的整体印象，并非六个分项目的平均分。词句理解和遣词造句主要针对译者在意义层面的理解和表达。衔接手段和逻辑连贯主要针对译者在结构层面的语篇组织和调整。语体风格和功能目的主要针对译者在译文语体功能等方面的把握。

评分者可以结合以下问题来考量每项评估内容：（1）译文出现了多少本质性的错误和非本质性错误。所谓本质性错误，即理解错误、表达不当、用词不妥等；非本质性错误是指词、句的意义基本正确，但不够精确或不符合语用环境。（2）如果出现错误，这个错误与准确理解或表达之间存在多大差距。（3）评分者对译文的总体评价参照TEM8英译汉的五级标准制：

表 4.8: TEM8 英译汉评分标准（2000）（参见李淑琴 2001:43）

GRADE	SCORE	DESCRIPTION	译文描述（笔者译）
5	10-9	<u>EXCELLENT TRANSLATION</u> The translation faithfully reflects all the original passage with only 1 or 2 minor lexical errors. It adequately reflects the style and tone of the original passage. The translation is elegant (appropriate choice of words, a variety in sentence patterns).	<u>优秀译文</u> 译文忠实传达了所有原文信息，只有 1-2 处词汇错误。语气及文体风格与原文一致，译文比较符合“雅”的标准（即选词恰当妥帖，句式灵活多变）。
4	8-7	<u>GOOD TRANSLATION WITH FEW INACCURACIES</u> The translation reflects almost all the original passage with relatively few significant errors in comprehending individual words, phrases, sentences or ideas. The translation is readable (generally clear, smooth and cohesive).	<u>良好译文，存在少数不准确的表述</u> 除了个别单词、短语、句子或概念出现错误，译文基本传达了原文信息。译文有一定可读性（表述明白清晰，行文自然流畅）。
3	6-5	<u>PASSABLE TRANSLATION WITH SOME INACCURACIES</u> The translation adequately reflects most of the original passage with occasional errors in comprehending individual words, phrases, sentences or ideas. The translation is, for the most part, readable.	<u>及格译文，存在一些不准确的表述</u> 译文传达了大部分原文信息，偶尔出现单词、短语、句子或概念的理解错误。译文的大部分内容具有可读性。

2	4-3	<u>INADEQUATE TRANSLATION WITH FREQUENT INACCURACIES</u> The translation only reflects about half of the original passage with frequent errors in comprehending individual words, phrases, sentences or ideas. The translation is, in some parts, unreadable.	不及格译文，存在较多不准确的表述 译文只传达了一半的原文信息，经常出现单词、短语、句子或概念的理解错误。译文的一些内容不具备可读性。
1	2-1	<u>POOR TRANSLATION</u> The translation reflects less than half of the original passage. Almost all sentences contain errors in comprehending individual words, phrases, sentences or ideas. The translation is, for the most part, unreadable.	劣等译文 译文传达了不到一半的原文信息，几乎所有句子都存在单词、短语、句子或概念的理解错误。译文的大部分内容不具备可读性。

设计总体评价以外的六个评分项目，是为第六章具体问题的探讨提供有针对性的翻译结果数据。同时，本研究设计的评估项目表也可用于翻译教学，帮助学生了解自身具体缺陷，在翻译训练时有的放矢，更快地提高翻译技能和水平。三类被试翻译两篇文章的评估成绩见表4.9和表4.10，这些数据将在第六章辅助说明不同被试决策行为的效果。

表 4.9: 译文一各项评估成绩总平均（满分：10分；单位：分）

被试类别	总体评价	词句理解	遣词造句	衔接手段	逻辑连贯	语体风格	功能目的
初学者	5.83	5.58	6.00	6.08	6.00	6.00	6.42
半职业译者	6.79	6.58	6.67	6.58	6.83	6.50	6.83
职业译者	7.92	7.83	7.42	7.83	7.92	8.00	7.83

表 4.10: 译文二各项评估成绩总平均（满分：10分；单位：分）

被试类别	总体评价	词句理解	遣词造句	衔接手段	逻辑连贯	语体风格	功能目的
初学者	5.63	5.33	5.25	5.75	5.67	6.00	6.00
半职业译者	7.13	6.92	7.00	7.08	7.08	7.17	7.17
职业译者	8.04	7.83	7.92	8.17	8.00	8.17	8.33

4.2.6、TAPs数据誊写:

笔者曾就TAPs数据的誊写规范（convention）问题征求Jääskeläinen的意见，她指出目前没有统一的规范，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自行设计规范和标

记。比如Krings只记录了笑声、停顿等内容；Jääskeläinen运用了话语分析的规范，记录了被试停顿的时间、强调的音节和副语言数据等。

表 4.11: Englund Dimotrova (2005:80) 的 TAPs 数据誊写规范

/	口头报告中 2 秒以下的停顿
(5s)	口头报告中停顿的时间
[...]	省略部分口头报告
()	括号中可以加入三类信息： (a) 副语言信号；(b) 词典查阅；(c) 录音中听不见的部分
?	誊写过程中不确定的内容
斜体	低声的表述
字母大写 (CAPITALS)	表述中带有强调意味的语气
下划线	表明被试同时在电脑上书写 (根据电脑击键的声音判断)

本研究在誊写规范的整体设计上参考了Englund Dimotrova (2005) 的誊写规范 (见表4.11) 并在其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改动, 比如适合标记字母文字的字母大写 (CAPITALS) 就不适合用在以汉语为表述语言的TAPs中。另外, 我们记录的内容也相对更加丰富, 以便从语料中发现更多的有用信息。本实验誊写规范见表4.12。

表 4.12: 本研究的 TAPs 数据誊写规范

TAPs 现象	转写处理	范例
短间歇	/	我这地方 / 尽管? / 以至于
长间歇所有的这个.....
间歇的持续时间	[...s]	[6s]
字词读重音	粗体	来构思一个.....构思一个 玄妙 的科学理论
强调	!	噢, 常驻 , 对!
语气上升、下降	↑ ↓	能够进行数学运算吧? ↑ 呃, 算了, 还是解决数学问题吧。↓
喃喃低语	()	(看看什么意思, 确定一下)
拖长音	——	表示我们两国之间的——
拖短音	—	你们的来访—代—表—了—我—们—两—国—之—间
词语发音未完全	~	It is frequen~
英文错读或发音困难	斜体	这个 mech~ <i>mechanically</i>
译文输入开始	△	△一个了不起的科学理论.....▲
译文输入停止	▲	
查词典开始	◇	◇profound.....◆
查词典停止	◆	
数据转写者附加说明	【】	【单语词典】 【金山词霸】

		【阅读原文】	【回看前一段】	【未说出】
		【笑】	【咳嗽】	

TAPs语料库誊写后的一些基本数据见表4.13。为方便统计，我们将被试每篇文本翻译的具体耗时统一换算成以分钟为单位。译文字数和TAPs文本字数根据WORD文档的字数统计功能，取其中字数或单词数（words）这一项数据。

表 4.13: 翻译耗时、译文字数和 TAPs 文本字数（按被试个人统计）

被试		译文一			译文二		
类别	编号	耗时（分钟）	译文字数（字）	TAPs 文本字数（字）	耗时（分钟）	译文字数（字）	TAPs 文本字数（字）
初学者	S1	30.52	318	3303	44.23	410	4977
	S2	30.45	355	2579	36.08	421	2170
	S3	40.22	348	3876	42.3	394	3524
	S4	32.42	369	3089	39.27	426	4822
	S5	22.77	358	2785	21.7	425	2338
	S6	50.73	382	6250	61.43	423	8041
半职业译者	S7	39.43	372	6196	42.32	407	5573
	S8	32.35	352	2876	49.17	430	4331
	S9	26.4	340	3905	28.65	426	4251
	S10	33.52	401	4782	34.08	473	4411
	S11	35.53	404	2690	36.68	407	2902
	S12	37.92	284	4111	27.58	368	2815
职业译者	S13	37.92	397	4913	30.63	397	3403
	S14	41.65	326	4987	33.9	395	4047
	S15	36.78	376	5600	46.38	512	6248
	S16	30.85	327	3316	31.52	374	3505
	S17	20.08	377	2732	22.88	391	3096
	S18	37.62	373	5291	33.58	430	5806

表 4.14: 翻译耗时、译文字数和 TAPs 文本字数（按被试类别统计）

被试类别	译文一			译文二		
	耗时（分钟）	译文字数（字）	TAPs 文本字数（字）	耗时（分钟）	译文字数（字）	TAPs 文本字数（字）
初学者	207.11	2130	21882	245.01	2499	25872
半职业译者	205.15	2153	24560	218.48	2511	24283
职业译者	204.9	2176	26839	198.89	2499	26105

表 4.13 显示，不同被试翻译过程中的耗时、译文字数和 TAPs 文本字数均存在较大差别。以文本一为例：翻译耗时最少的只用了 20.08 分钟（S17）；翻译耗时最多的用了 50.73 分钟（S6），二者相差 30.65 分钟；译文字数最多的有 404 字

(S11), 字数最少的仅 284 字 (S12), 二者相差 120 字; TAPs 转写文本字数最多的有 6250 字 (S6); 最少的仅 2579 字 (S2), 二者相差 3671 字。

表 4.14 显示, 三类被试职业译者翻译两篇译文的总耗时最少, 半职业译者次之, 初学者最多; 相应的 TAPs 转写文本总字数以职业译者为最多。这说明职业译者在最少的时间内汇报出最多的 TAPs 信息, 也证明了我们在第三章方法论探讨时提出的看法, 即职业译者翻译技巧的自动化不会减少其 TAPs 数据的信息量。

4.2.7 关于可信度保障条款的说明

Gyde Hansen 提出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理想条件, 具体包括: ①译者不会因为个人问题或负面经历, 在口头报告中存在困难; ②译者均非兼通双语者 (bilingual)¹⁵; ③译入语是译者的母语; ④译者不会因为环境或翻译任务产生认知上的压力和困难; ⑤译者经过了有声思维练习; ⑥译者在有意识地 (至少有部分意识地) 进行翻译活动; 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可以汇报的内容 (Hansen 2005: 514)。我们认为, 本研究在实验设计时, 基本考虑到了上述条件和要求。

参照 Li (2004) 的 12 条可信度保障条款, 本研究在数据收集、分析、报告和应用等方面也已做到其中的 11 项。比如: 第一项、自愿参加; 第二项、匿名保证; 第三项、有目的地采样; 第四项、三角测量法; 第六项、自然 (或接近自然) 的实验环境; 第七项、被试培训; 第八项、背景核查; 第十项、专门人员检查等, 都在本章的实验设计中有所体现。还有三项条款说明如下:

1、本研究中唯一没有遵循的条款是第五项, 长期跟踪研究。该条款要求研究者对一些优秀译员展开个案跟踪调查研究, 也可以对一组被试翻译能力的发展进行验证式研究, 以便通过数据了解英汉翻译过程的复杂性, 揭示出翻译的一些客观规律, 克服一时的研究误差。这项条款是对长期研究项目的很好提示, 鉴于本研究是笔者的学位论文, 属阶段性研究项目, 长期跟踪调查暂无法在本文展开。我们也考

¹⁵ 我们倾向于认为 Hansen 所谓的 “bilingual” 是按照 Crystal (1995) 较为苛刻的标准来界定的, 即两种语言都达到说本族语那样流利的人, 相当于前文提到的 “双母语者”。否则的话, 如果按照 Crystal (1995) 较为宽泛的标准界定 “bilingual”, 即所有会讲两种语言的人, 那么所有的译者起码都是 “操双语者”。

虑到与被试保持联系，以方便收集其后续数据，用于今后的研究。

2、条款第十一项为详尽描述：Li（2004）表明，以往TAPs翻译过程研究中比较注重详尽描述¹⁶。由于TAPs实验在不同的环境下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西方学者的实验往往涉及不同的对象、语言对和变量，为了提供实验的具体情境，在实验设计和分析时都非常注重详尽描述。本研究也会遵循这项条款，力图在有限的实验条件和资源下详细、准确地描述实验背景与步骤，记录实验结果。比如本研究的誊写规范在目前TAPs翻译研究中项目最多，内容最详实丰富；本研究的誊写原则是不对录音数据作任何人为更改或增删，力图呈现语音数据原貌。

3、条款第十二项为控制结论的普及化。该条款是指研究者不宜草率地将研究结果普及化，除非该研究执行了非常严格的实验设计，具备非常大的实验规模。基于这项条款，笔者不会草率地将实验结果普及化，在结论部分，根据实验和数据分析的具体情况给本项研究的结果一个恰当的定位。

¹⁶Li（2004）抽样研究表明，53.3%的研究均符合“详尽描述”的标准。

第五章 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实验分析

第二章第三节在论述选择行为的研究层面时，简要论述了翻译过程中最主要的四类选择行为。本章主要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分析实验数据，探讨翻译单位的选择、决策过程的选择和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三方面内容。这三部分研究虽可独立成文，但内容同属于翻译过程中选择行为的范畴，着眼于选择行为中较为重要的研究变量。通过本章三部分内容的数据统计、分析与论述，我们可以大体把握不同类别的译者在翻译时的不同选择行为。至于翻译策略模式的选择，我们将在第六章单独探讨。

第一节 翻译单位的选择¹

5.1.1 TAPs翻译单位研究的回顾

二十多年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中，涉及翻译单位的 TAPs 实验研究论著共 13 篇（本）：

¹ 本节的初步研究成果已发表，参见：郑冰寒，谭慧敏〈英译汉过程中翻译单位的实证研究〉，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2期，页145-154。

表 5.1: 关于翻译单位的 TAPs 实验研究的相关信息

序号	作者	年份	论著语言	出处	研究的语言对	研究内容		被试性质/人数	被试国籍	备注
						宏观	微观			
1	P.Gerloff	1986	英语	论文集	英/法	方法论	单位/策略	语言专业学生/5, 双语者/1	美国	译文评估
2	P.Gerloff	1987	英语	论文集	英/法	方法论	单位/策略	语言专业学生/5, 双语者/1	美国	译文评估
3	P.Gerloff	1988	英语	博士论文	英/法	方法论	单位/策略	职业译者/4, 初学者/4, 双语者/4	美国	译文评估
4	D.Kiraly	1990	英语	博士论文	英/德	方法论/综述	单位/策略/自动化/教学/自我形象	职业译者/9, 初学者/9	德国	译文评估
5	W.Lörscher	1991a	英语	专著	英/德	方法论	单位/策略	语言专业学生/52	德国	视译
6	W. Lörscher	1993	英语	论文集	英/德	—	单位/策略	语言专业学生/45, 职业译者/22	德国	双语互译
7	R. Jääskeläinen	1993	英语	论文集	英/芬兰语	方法论	单位/策略	职业译者/4, 非职业译者/8	芬兰	—
8	D.Kiraly	1995	英语	专著	英/德	方法论/综述	单位/策略/自动化/教学/自我形象	职业译者/9, 初学者/9	德国	译文评估
9	C. Séguinot	1996	英语	期刊	英/法	批评/方法论	单位/策略	职业译者/2	加拿大	协作翻译
10	A.L.Jakobsen	2003	英语	论文集	英/丹麦语	方法论	翻译速度/修改次数/原文单位的切分	职业译者/5, 半职业译者/4	丹麦	双语互译/TAPs/translog
11	张健	2004	英语	硕士论文	英/汉	方法论	单位/策略	语言专业学生/4, 职业译者/1	中国	—
12	李德超	2005	汉语	期刊	—	综述	单位/策略/述要/方式	—	—	—
13	B. Englund Dimotrova	2005	英语	专著	俄/瑞典语	批评/方法论/综述	单位/策略/述要/方式/耗时	职业译者/4, 翻译学生/2, 语言专业学生/3	瑞典	TAPs/Script Log

根据上表，我们按年代顺序归纳关于翻译单位的 TAPs 实验研究。

1980 年代是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探索期。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研究翻译单位的论著共 3 篇（本），作者均为 Gerloff。这三篇论著基于同一项研究（即作者在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项目），Gerloff（1986; 1987）是 Gerloff（1988）的前测研究，文章重点探讨了翻译的分析单位和翻译问题的解决。Gerloff 是 TAPs 翻译过程研究领域最早关注翻译单位的学者之一，她对于翻译单位的界定、分析和论述，为后期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1990 年代是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期，上表显示该时期探讨翻译单位的论著主要有 6 篇（本），包括 1 部博论，2 部专著²，2 篇论文集文章和 1 篇期刊文章。这一时期 TAPs 实验的被试数目明显增加，除了 Séguinot（1996）只选取两位被试尝试协作翻译之外，其他研究的被试人数均超过 10 人。这一时期的研究在翻译方式上也更加多样化，出现了视译 TAPs 和协同翻译 TAPs 等方式。这一时期对翻译单位的论述更加深入，Jääskeläinen、Lörscher 等不但对翻译单位提出了新的界定，他们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少新的成果和发现。

2000 年迄今，译界学者对于翻译过程的实验研究日渐关注，有不少中国学者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论及翻译单位的 4 篇（本）论著中，Jakobsen（2003）和 Englund Dimotrova（2005）在国际上影响较大。Jakobsen（2003）结合 TAPs 和 Translog 软件，论述 TAPs 方法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的结论是被试在执行有声翻译任务时，会增加原文单位的相对切分数量。李德超（2005）从综述的角度回顾了 TAPs 翻译单位的研究状况；张健（2004）的硕士论文也重点探讨了翻译单位在英汉翻译过程中的情况。

就具体内容而言，这十余篇（本）论著从过程取向和认知角度对翻译单位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论断。

首先，研究者对翻译单位提出新的定义：①翻译单位即译者的分析单位，包括从语素或音节到语篇共七个层次（Gerloff 1987:140-141）；②翻译单位是译者聚焦

² Kiraly（1995）这部专著修改自 Kiraly 在 1990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的原语文本部分，目的是在目标语中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再现出来（Lörscher 1993:209）；③翻译单位是译者在翻译中的注意力单位，即译者在翻译中的“无标记处理”活动因注意力转移至特定的与任务相关的问题而中断的那部分语段（Jääskeläinen 1993:102）。本文以 Jääskeläinen 的定义作为分析的基础，因为该定义重视翻译的自然过程，可以较为明确地在 TAPs 数据中指导单位切分。

其次，在具体分析译者操控的翻译单位时，Lörscher（1991a; 1993）发现，普通学生翻译时使用的翻译单位往往较小，大部分以词为单位；而职业译者的翻译单位均大于词，包括短语、句子和段落。但运用较大的翻译单位并不意味着该译者在翻译中不对较小语言单位进行处理；Séguinot 提出：“职业译者在以句群为翻译单位时，也注意到单句内部的局部问题；但句群的整体意思是他们解决局部问题的参照点”（Séguinot 1996:75-95）。

笔者基于上文分析总结出翻译单位的两种特征：动态性——翻译过程中，译者把握的翻译单位是动态的而非单一固定的语言实体；指标性——翻译单位往往是翻译熟练程度的指标，职业译者通常比翻译初学者把握更大的翻译单位。非亲属语言翻译的实验数据是否支持以上结论？是否对上述特征有新的描述和补充？这是本节主要讨论的问题。

5.1.2 翻译单位的实验分析

近二十多年里，汉语学界研究翻译单位的文章有 50 余篇。司显柱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归纳和分析，指出当前翻译单位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提出了翻译单位的“多元互补说”：“从词素到语篇，都有其合理性，都是构成翻译单位多元互补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元；在翻译实践中不能束缚在固定的语言单位上机械对译”（司显柱 2001:90）。多元互补系统说以融合的方式化解了翻译单位研究中各家立论互相排斥的现象，也说明了翻译单位的“动态性”特征。我们将运用实验数据详细描写英译汉过程中翻译单位的变化特征。

实验一和实验二的 TAPs 报告中，有以下关于翻译单位的现象：

一、对于同一篇文本，同一译者会运用不同的翻译单位，从词到句子以上的各层面均有分布；这种现象可以解释英译汉过程中翻译单位是动态的语言实体，符合翻译单位的动态性特征。

二、对于同一篇文本，不同类型的译者运用的各级翻译单位百分比之间存在较大差别，但也有一定的规律：职业译者把握句以上单位的比率大于翻译初学者，而初学者把握句以下单位的比率较职业译者大；对应翻译单位的指标性，表明我们可以通过被试所运用的不同翻译单位之间的百分比来大体把握被试的翻译能力。

三、同一译者，在翻译某一特定的句子或语段时，起初关注并准备进行翻译的语言单位与随后实际处理的语言单位经常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以往文献中均未得到足够关注。同一语言实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先后汇报出不同的翻译单位？例如译者先通读整个句子，表明其主观上试图把握整个句子，以句子为翻译单位；处理细节问题时，译者抛开句子单位，把着眼点落在小句、词组或词上。此外，后期采访中 88.9%的被试对于自己使用的翻译单位有肯定且唯一的答案（见表 5.6），这与实验情况不完全相符。通过对被试TAPs文本的考察，我们发现，被试在翻译过程中，无论经验背景为何，遇到困难时都倾向于从意义走向结构，即从语义层面走向语言结构的表层操作³。被试一开始试图从意义上把握较大的翻译单位（如句子或语段），以免“见树不见林”，但随着具体翻译问题（如疑难词汇或词组、分句之间的复杂逻辑关系等）的出现，最初的主观愿望无法实施，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较小的语言单位上，逐步解决翻译问题。

因此，我们将翻译单位分为以下两类：

主观翻译单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观把握的语言单位，TAPs 报告中表现为被试具体阅读的语言单位。

客观翻译单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实际操作的语言单位，表现为被试集中注意力，具体解决问题的语言单位。

³在表层语言结构的具体操作上，不同译者的手段和策略有所区别，估计是为其秉承的翻译原则所影响。

这一区分可以帮助我们更真实地考察译者翻译过程的思维活动，也有利于更有效地解释译者在选择翻译单位时的主、客观矛盾。

翻译单位的切分标准遵循Jääskeläinen (1993) 的定义，重点关注被试的注意力单位，并参考Gerloff (1986) 的研究，将翻译单位划分为词以下、词、短语、小句、句子、句以上共6个层次。如果被试在某一时段注意力集中于句子的翻译，翻译单位即为句子；如果被试以查阅字典来解决某个词的翻译，单位即为词；如果被试在整体把握句子的时候，夹杂解决单词翻译的步骤，则句子和词的单位各计为一次。最后，统计出该被试在翻译该文本的过程中，分布在不同语言单位上的主、客观翻译单位的数量。我们根据被试的TAPs录音，在翻译单位分析表上记录该被试的主客观翻译单位使用次数；然后核对被试的TAPs文本。样本如下⁴：

表5.2: TAPs文本各翻译单位次数统计样本

(TAPs) : <u>It is frequently said that computers solve problems only because they</u>
(Ss)
<u>are “programmed” to do so.</u> △ <u>人们常说 / 好了, 我需要把 ‘电脑’ 改成</u>
(Op) (Ow)
<u>‘计算机’[4s] / 计算机 - 能 - 解决 - 问题 - 是因为 - 它们 - 被 -</u>
(Oc)
<u>编定了程序 / 编定程序。</u> ▲ (<u>They can only do what men have them do.</u>)
(Ss)
△ <u>它们只能做, 只能完成, 人们要它们完成的任务。</u> ▲ / <u>One must remember</u>
(Os)
<u>that human beings (also can only do what they are “programmed” to do.)</u>
(Ss)
<u>但是, △必须指出 / 人类也只能完成被编程的任务, 被编程的任务。</u> ▲ /

⁴ 括号中的字母为主客观翻译单位的字母代号，其中大写字母 S=Subjective，即主观翻译单位；O=objective，即客观翻译单位；小写字母 w、p 等分别代表词、词组等语言单位，具体参见表 5.3。

(Os)		
<u>这两个有点区别吧 (?) / programme, 两个 programme ↑ / 好的, 那我把前面</u>		
(Ow)		
<u>那个改一下 / △被编程, 被编程的▲ / Our genes “program” us the instant</u>		
<u>the fertilized ovum is formed, and our potentialities are limited by that “program”.</u>		
(Ss)		
<u>我们的基因..... [10s] △为, 使我们在婴儿▲ / 不是婴儿..... [3s] /</u>		
(Op)	(Ow)	
<u>在受精的 - / 受精卵形成↓ / △形成的瞬间, 被编程▲ / and our potentialities</u>		
(Op)	(Oc)	(Sc)
<u>are limited / 所有, 嗯, 我们一切△所谓潜力 / 都 / 受制于这些 - / 程序。▲</u>		
(Oc)		

该段主客观翻译单位数量统计见表 5.3:

表 5.3: TAPs 文本各翻译单位数量统计表 (单位: 次)

单位	主观翻译单位 (S)						客观翻译单位 (O)					
	词以下 (m)	词 (w)	词组 (p)	小句 (c)	句子 (s)	句以上 (d)	词以下 (m)	词 (w)	词组 (p)	小句 (c)	句子 (s)	句以上 (d)
数量	0	0	0	1	4	0	0	3	3	3	2	0

5.1.2.1. 实验数据统计

18 位被试翻译 2 篇文本时运用的主、客观翻译单位的次数百分比见表 5.4。同时, 为了体现不同类型的被试所运用的翻译单位的比例差别, 在表 5.4 的基础上, 我们计算出三类译者的主、客观翻译单位的百分比均值和总平均值, 见表 5.5。

表 5.4: 翻译单位选择次数百分比⁵ (单位: %) (E₁、E₂为实验一、二, S₁-S₁₈为被试编号)

单位 数量 被试	主观翻译单位						客观翻译单位					
	词以下	词	词组	小句	句子	句以上	词以下	词	词组	小句	句子	句以上
E ₁ S ₁	0	0	0	30.77	69.23	0	0	11.54	26.92	42.31	19.23	0
E ₂ S ₁	0	0	0	30.77	69.23	0	0	23.68	50	18.42	7.89	0
E ₁ S ₂	0	0	0	18.18	81.82	0	0	25	25	38.89	11.11	0
E ₂ S ₂	0	0	0	18.18	81.82	0	0	25.58	55.81	13.95	4.65	0
E ₁ S ₃	0	0	0	18.18	72.73	9.09	0	25.81	19.35	38.71	16.13	0
E ₂ S ₃	0	0	0	18.18	72.73	9.09	0	26.32	36.84	26.32	10.53	0
E ₁ S ₄	0	0	18.75	43.75	37.5	0	0	25	47.22	19.44	8.33	0
E ₂ S ₄	0	0	17.65	41.18	41.18	0	0	26.47	58.82	8.82	5.88	0
E ₁ S ₅	0	0	0	30.77	69.23	0	0	40.54	18.92	24.32	16.22	0
E ₂ S ₅	0	0	0	16.67	83.33	0	0	38.1	26.19	26.19	9.52	0
E ₁ S ₆	0	0	0	0	100	0	0	45.45	27.27	21.82	5.45	0
E ₂ S ₆	0	0	0	16.67	83.33	0	0	45	27.5	20	7.5	0
E ₁ S ₇	0	0	0	30.77	69.23	0	0	28.95	31.58	34.21	5.26	0
E ₂ S ₇	0	0	0	16.67	83.33	0	0	10	25	35	30	0
E ₁ S ₈	0	0	0	30.77	69.23	0	0	25	47.73	22.73	4.55	0
E ₂ S ₈	0	0	0	23.08	76.92	0	0	37.21	53.49	4.65	4.65	0
E ₁ S ₉	0	0	0	30.77	69.23	0	0	10	36.67	46.67	6.67	0
E ₂ S ₉	0	0	0	30.77	69.23	0	0	20	16	40	24	0
E ₁ S ₁₀	0	0	0	0	77.78	22.22	0	13.33	33.33	43.33	10	0
E ₂ S ₁₀	0	0	0	16.67	83.33	0	0	7.41	29.63	40.74	22.22	0
E ₁ S ₁₁	0	0	0	42.86	57.14	0	0	29.41	23.53	32.35	14.71	0
E ₂ S ₁₁	0	0	0	38.46	61.54	0	0	27.03	37.84	29.73	5.41	0
E ₁ S ₁₂	0	0	0	0	100	0	0	38.18	30.91	21.82	9.09	0
E ₂ S ₁₂	0	0	0	0	75	25	0	16.67	38.89	27.78	16.67	0
E ₁ S ₁₃	0	0	0	30.77	69.23	0	0	28.95	21.05	36.84	13.16	0
E ₂ S ₁₃	0	0	0	30.77	69.23	0	0	25.93	18.52	37.04	18.52	0
E ₁ S ₁₄	0	0	0	0	100	0	0	33.33	35.42	22.92	8.33	0
E ₂ S ₁₄	0	0	0	16.67	83.33	0	0	25	41.67	19.44	13.89	0
E ₁ S ₁₅	0	0	0	0	0	100	0	10.53	26.32	26.32	31.58	5.26
E ₂ S ₁₅	0	0	0	0	66.67	33.33	0	7.69	7.69	15.38	61.54	7.69
E ₁ S ₁₆	0	0	0	0	90	10	0	31.82	4.55	22.73	40.91	0
E ₂ S ₁₆	0	0	0	0	100	0	0	12.5	25	29.17	33.33	0
E ₁ S ₁₇	0	0	0	16.67	83.33	0	0	6.25	12.5	31.25	50	0
E ₂ S ₁₇	0	0	0	16.67	83.33	0	0	0	11.11	50	38.89	0
E ₁ S ₁₈	0	0	0	0	90	10	0	14.81	25.93	33.33	25.93	0
E ₂ S ₁₈	0	0	0	0	90	10	0	8	24	40	28	0

⁵百分比数值=具体的翻译单位的选用次数 / 全文翻译单位总次数×100%

表 5.5: 三类译者选用的各级主、客观翻译单位百分比均值⁶ (单位: %)

单位 数量 被试	主观翻译单位						客观翻译单位					
	词以下	词	词组	小句	句子	句以上	词以下	词	词组	小句	句子	句以上
初学者	0	0	3.03	23.61	71.84	1.52	0	29.87	34.99	24.93	10.2	0
半职业译者	0	0	0	21.73	74.33	3.94	0	21.93	33.72	31.58	12.77	0
职业译者	0	0	0	9.29	77.09	13.61	0	17.07	21.15	30.37	30.34	1.08
总平均	0	0	1.01	18.21	74.42	6.35	0	22.96	29.95	28.96	17.77	0.36

在表 5.5 的基础上, 我们以柱状图来体现三类译者主、客观翻译单位的差别 (见图 5.1、图 5.2):

图 5.1: 三类译者选用的各级主观翻译单位百分比均值柱状图 (单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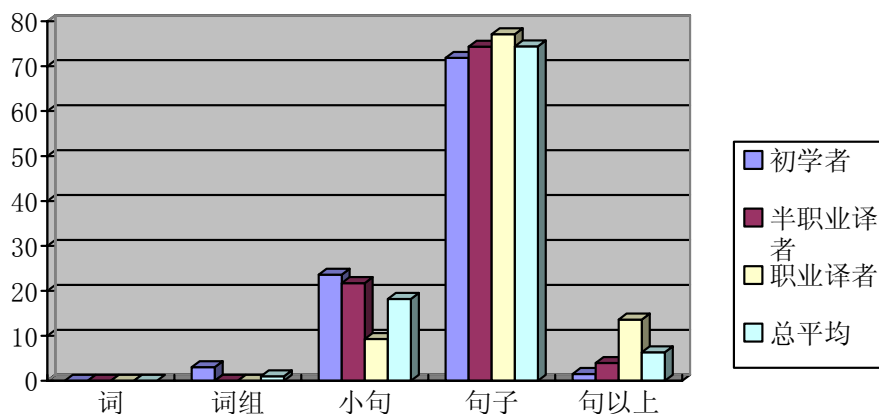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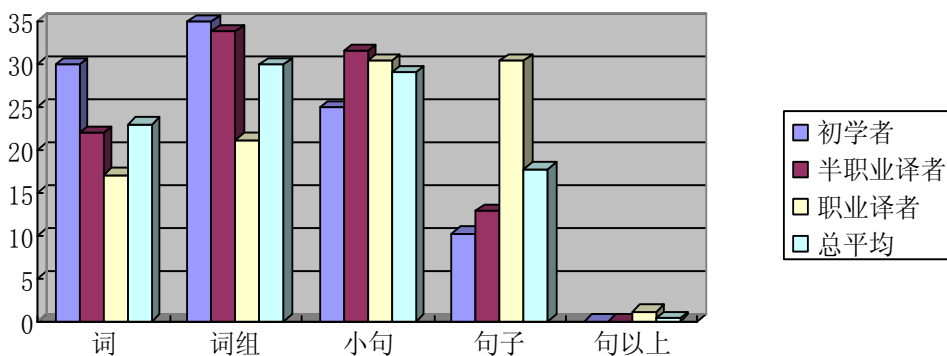


图 5.2: 三类译者选用的各级客观翻译单位百分比均值柱状图 (单位: %)



⁶ 百分比均值 = 同类译者两个实验百分比总和 / 12 × 100%

5.1.2.2. 实验数据讨论

根据表 5.5、图 5.1 和图 5.2，我们发现译者在翻译时选用主、客观翻译单位的情况具有以下特点：

1) 译者很少采用词以下的语言单位作为主观或客观翻译单位（主观翻译单位中，很少使用词组以下的语言单位作为翻译单位）但这并不表示词或词以下单位不能作为翻译单位，只是这些单位的选择与运用的机率很小。

2) 从翻译单位选择次数的百分比总平均值看，主观翻译单位以句子为主，占 74%以上，其次是小句以及句以上单位。客观翻译单位在不同层级间分布得较为平均，相对而言以小句和词组为最，接近 30%，词的百分比超过 20%，句子则接近 20%。说明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翻译单位在各层级间较为分散，这与具体翻译问题有关。

3) 职业译者的主观翻译单位以句子为主，占 77%以上，句以上单位其次，占 13%以上。半职业译者和初学者的主观翻译单位在不同层级间的分布情况较为接近，都以句子为最，占 70%左右，小句次之，约 20%。这表明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单位的关注范围和预测值相对较大，以句子和句子以上单位为主；而半职业译者和翻译初学者的翻译单位关注范围和预测值相对较小，以句子和小句为主。

职业译者的客观翻译单位以句子和小句居多，均超过 30%，其中以句子为翻译单位的情况远远多过其他两类译者，且句以上的翻译单位也有一定数量。半职业译者和初学者的客观翻译单位的层级分布被词组、小句和词三分天下，句子相对较少，句以上基本没有。也就是说，职业译者实际翻译时往往在句子和小句层面转换，甚至会考量句以上的语言单位，而半职业译者和翻译初学者则需要通过句子以下的语言单位的分析和转换才能得出译文，尤其是初学者，翻译单位大多是小句以下。

4) 无论是职业译者、半职业译者还是翻译初学者，其主观翻译单位和客观翻译单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客观翻译单位，从词到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都有一定比例的分布。究其规律与原因，大体如下：

第一、译者有相对稳定的原则性翻译单位来指导其翻译活动，这种原则是自然的而不是刻意的，并且这一潜在的心理原则通常会贯彻始终，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单位选取行为形成一定的控制作用。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只有少数被试指出自己有多种翻译单位，88.9%的被试都认为自己只有一个原则性的翻译单位，且主要是句子。问卷结果见表 5.6:

表 5.6: 调查问卷中被试关于翻译单位的回答

	S ₁	S ₂	S ₃	S ₄	S ₅	S ₆	S ₇	S ₈	S ₉	S ₁₀	S ₁₁	S ₁₂	S ₁₃	S ₁₄	S ₁₅	S ₁₆	S ₁₇	S ₁₈
实验中以什么为单位进行翻译?	句子	句子	句子	句子	句子	句子	小句或句子	句子	小句	句子	句子	句子	句子	句子	句子	句子	句子或段落	句子

第二、TAPs 数据表明，译者的主观翻译单位大多集中在某两个相邻级别的语言单位上（如小句和句子）。虽然译者的原则性单位对其翻译心理有监控作用，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常常根据具体文本的长度和难点灵活选择关注点，所以存在不止一个级别的主观翻译单位。不过，尽管如此，主观翻译单位的波动范围不大，通常只在相邻的两个单位级别内调整。

第三、客观翻译单位相对分散，绝大部分译者的客观翻译单位分布于四种以上的语言单位（如词、词组、小句、句子）。这是因为译者在处理具体翻译问题时，需要不断调整翻译单位以适应具体的翻译问题⁷。不过，受主观翻译单位影响，客观翻译单位的分布呈现出以主观翻译单位为基准上下波动的特点。大多数情况下，客观翻译单位层级等同于或低于相应的主观翻译单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短期记忆长度制约了较大层级翻译单位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文本理解上不时出现的障碍干扰了译者思维的连贯性，导致较大层级翻译单位的选用不能一以贯之。

⁷调整的幅度大与小也往往可以对应译者翻译能力的低与高。

5.1.3 英译汉翻译单位实证分析的思考

实验数据表明，翻译单位大小与译者翻译能力高低直接相关，这也就体现了翻译单位的“指标性”特征。具体来看，职业译者的客观翻译单位较大，表明他们更有能力迅速解决较简单的翻译问题，驾驭较大的语言单位，这一点和以往研究成果基本相符；此外，职业译者的主观翻译单位也较大，说明他们通常关注较大的语言单位，对原文有相对宏观的把握。相比之下，初学者不仅实际操作的翻译单位较小，而且本身关注的语言单位长度就很有限，这愈加制约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的宏观操控。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脑短期记忆的容量大约为 7 ± 2 个组块（chunk），专家和新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知识组织方式：专家的专门知识和信息之间已经在头脑中建立起了密切联系，构成了一个高度抽象与概括的网络与程序，且能够对新的知识与信息进行辨识、推理与评介（梁宁建 2003:296），所以他们头脑中的每一个组块都要比新手大得多，短期记忆的容量自然更大，借助于知识之间的联系，解决问题的效率也更高。因此，职业译者往往可以从容面对较大的翻译单位，不必担心短期记忆的负荷，多数翻译问题通过自动化过程得以解决，单位内部的关系也能迅速得到梳理；相反，初学者一方面无法依靠知识网络增加短期记忆容量，一方面又要借助“手段一目的分析”⁸（Means-end Analysis）处理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自然难以把握较大的翻译单位。

根据 Lakoff & Johnson (1999) 的体验哲学理论，人类的认知、概念、意义、推理、理解和语言等都是来源与对客观外界的感知和经验。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翻译过程同样具有体验性。这种基于体验哲学的翻译认知观，可以解释翻译单位的指标性特征。职业译者由于长期体验翻译活动，翻译能力和素质均得到锻炼和提高，这些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克服翻译过程中理解、转换和表达上的障碍，因此在细小环节上考量的次数就会减少。以单词查阅为例，职业译者在实验中查阅单词的次数远远少于翻译初学者，这除了体现两者语言能力的差别，还体现两者翻译策略的不同。Fraser 提出：“相比初学者，职业译者在词典运用上体现的是高风险特征

⁸“手段一目的分析”是指找出问题空间中问题的初始状态和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着的差距，确定缩小差距的子目标，通过实现一系列子目标，最终达到目标状态，使问题得到解决（梁宁建 2003:287）。

(high-risk-taking personality)，在拿不准原文词汇意思时，倾向于根据语境来猜测其意义，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得更为自信，译文也往往更有创造性”（Fraser 2000:113）。这种现象在本实验研究中也很明显，翻译初学者由于缺乏对翻译活动方方面面的认知和体验，遇到不熟悉的词汇时，没有自信通过语境来猜测，而是寄希望于词典，导致词典运用率偏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时把握的语言单位的大小。

翻译单位还具有“动态性”特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取的翻译单位的层级大小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围绕某一、两个层级上下波动。造成单位选取范围不衡定的因素主要有译者短期记忆长度、翻译熟练程度、文本理解难度等。例如职业译者通常把握句子或句以上的主观翻译单位，偶尔遇到复杂结构时也会把注意力暂时集中到词组或词语的斟酌上，根据语境选择最佳表达；翻译初学者通常以句子或小句为主观翻译单位，遇到难点时或采取逐词对译，或求助于篇幅有限的上下文。从翻译认知的角度来总结，不同译者的翻译单位层级的动态差别体现出各自认知策略的不同。职业译者的认知模式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在整体把握语篇意义的前提下，关注具体细节（如炼字等）的处理；而初学者的认知模式往往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首先关注的是字词句的翻译，遇到问题时才会求助于上下文，由于缺乏对全局的把握，这种断章取义建立起来的认知联系往往会顾此失彼，理解上的偏差和语篇连贯上的问题也是频频出现⁹。

翻译的认知模式理论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语篇。“‘以语篇为基本层面’，主要是就‘整体性’而言的，语句中的各类意义受约与语篇的整体意义，而且对源语篇的理解和翻译离不开语篇的功能和认知分析，必须深入思考语篇中语句、段章节所反映出的各类意义”（王寅 2005:18）。这与本文结论并不矛盾，其“基本单位”与本文的翻译单位有着不同的定义，“基本单位”是规定性的，可以理解为译者的参照单位，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不时参照语篇的整体意义，对具体语段、句子以至词汇进行决策；而本文的“翻译单位”是描述性的，即译者翻译过程的注意力单位。事

⁹这在译文评估中有充分的体现，初学者“词句理解”项目译文一总平均分为10分制的5.58分，译文二为5.33分；“逻辑连贯”项目译文一总平均分为6.00分，译文二为5.67分。这在译文评估的等级划分上只能算是及格译文。

实上，能否以语篇为参照单位，是影响职业译者和翻译初学者在翻译过程中有不同表现的因素之一。TAPs数据分析表明，职业译者翻译的第一步往往是阅读并理解全文，这是把握语篇含义的第一步，开始翻译时还会重新通读整个段落，如果段落难度不大且句子不多，往往整段译文就非常流畅地翻译出来了，如果有较为复杂的句子，通过分句间逻辑关系的梳理和疑难词汇的解决，也能较为顺利地得出译文，且往往不容易受原文句式或表达方式的约束，译文较为地道通达；而初学者较少以语篇为参照单位，往往在拿到原文之后，立即着手翻译第一句，整个翻译过程以寻找词汇、词组、句子意义对等为主，还包括从词典中寻找答案。因此TAPs数据显示，在主观翻译单位层面，职业译者运用的语言单位大于初学者。

第二节 决策过程的选择

翻译过程中，不同类型的译者会遇到不同数量、不同层级的翻译问题，这些问题及其特征是我们调查“决策过程之选择”的第一步。而调查翻译问题特征，首先需要根据被试对问题的识别情况，在 TAPs 文本中切分出所有的翻译问题。

Lörscher (1992b: 153) 认为，翻译过程包括自动化部分和非自动化部分，前者是译者在翻译转换时不需要有意识思考的过程，但无论是在原文理解、译文表述，还是在双语转换的时候，非自动化过程常常会因为翻译问题的出现而中断。Mondahl & Jensen (1996:102) 在描述自发序列和问题序列时指出：自发序列的特点是没有停顿，没有问题的外部迹象，译者运用的是自发的、技巧型的知识和经验型知识中最自动化的部分，在 TAPs 数据中，自发序列的特点是报告的语段没有太多停顿，报告的内容缺少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序列的特点是翻译过程中有停顿，译者已自动化的经验型知识不足以解决翻译问题，必须求助于受意识控制的知识，并吸收已分析的知识；与自发序列相比，问题序列更能引起译者思维的关注，译者意识到存在多种选项且必须作出有说服力的抉择。Scott-Tennent 等学者认为，翻译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他们对翻译策略进行了以下界定：“翻译策略是从大脑意识到的那些潜在程序中选择的一些措施，用来解决一个被意识发觉的翻译问题，产生一个有意识的应用方案。……翻译策略不包括以下两类行为：①未考量多种潜在方案的策略行为；②未提供任何有意识的理由的策略行为（如直觉）”（Scott-Tennent et al 1998:108）。

Scott-Tennent 等（1998）对于翻译策略的界定与本研究对翻译问题的切分标准是一致的。结合上述定义和分析，我们认为，TAPs 转录文本中，翻译问题的语段或者伴随着多项选择算子即潜在的译文选项；或者有被试对问题的分析报告。比如下面两例 TAPs 报告：

例 5.1 (S3/novice/V1)

(TAPs): That depends on what you mean by “think”. 那取决 / 那决定于
/ △那 - 取 - 决 - 于 - / 那在于! ▲ / 那在于—— [3s] / (what you mean
 by think) 那在于…… [4s] 你觉得 / △思考是什么意思。▲

例 5.2 (S7/semi-professional/V2)

(TAPs): Your visit reflects the increasing ties of cooperation and commerc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就是你们的来访标志着 / increasing ties, 就是说标
 志着我们 / our t~ / 应该把这个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翻到前面, 就是说你
 们的来访 - 代 - 表 - 了 - 我 - 们 - 两 - 国 - 之 - 间 / increasing ties / 那就是
 说, 正在升高的这个 / 这样一种 / 正在不断增强的这种合作…… [3s]
 以及经济 / and commerce / cooperation / 嗯, 就是说△你们的来访, 你们的来
 访表示我们两国之间的——▲ [6s]合作和经济纽带, 合作, ties 可以翻
 译成合作与经济纽带, △合作与经济纽带正在逐渐加强。

例 5.1 中 S3 关于“depends on”的思考内容是一个翻译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被
 试不但提出了该词组的多种备选译文(文中划线部分, 下同), 而且从这些选项中
 选择“那在于”作为决策结果, 完成了一次词组层面的问题解决过程。

例 5.2 关于句子“Your visit reflects the increasing ties of cooperation and
 commerc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的翻译问题相对比较复杂, 涉及到两个不同层
 面的翻译问题: 首先被试对于“reflects”是翻译成“标志着”、“代表了”、还是“表示”
 的抉择, 是一个词汇选择层面的翻译问题; 其次, 被试对于“increasing”是翻译成
 “升高”、“不断增强”还是“逐渐加强”, 也是一个词汇选择层面的翻译问题; 再次,
 被试对于“the increasing ties of cooperation and commerce”是顺译作“正在不断增强的
 这种合作”, 还是调整为“合作与经济纽带正在逐渐加强”, 是句式结构层面的翻译
 问题。因此, 例 5.2 中, 被试总共完成了三次问题解决。

另一种情况是被试在 TAPs 报告中没有提出多种选项, 但提出了有意识的考虑
 并有较长时间停顿, 我们也视为一个翻译问题, 比如下例:

例 5.3 (S4/novice/V1)

(TAPs): The elimination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s / (is) essential to the / to this outcome. / [3s] North, 应该是北 / 北朝鲜的 - / 嗯 [3s] / 核计划 / [2s] / elimination, 减少 / 就是, 嗯, 就是 / essential, essential / ◇ [[金山词霸]] 必要的, 必要的 ◆ / 对这个结果是必要的 ↑ [3s] / 嗯 [4s] / 觉得这句话正常的语序会很奇怪, 就是, 嗯—— [6s] / (outcome / outcome 查下字典) ◇ [[金山词霸]] 结果, 这个结果 ◆ / 必要的 [6s] / (朝鲜) 嗯 - 南朝鲜 / 北朝鲜, 核 ~ / programs, ◇ [[金山词霸]] [16s] ◆ 嗯, 连起来 / △ 北朝鲜 / 北朝鲜核 - 武 - 核计划 / 核计划的减少 ▲ / [3s] / 对这个结果 - (非常必要 ↑) [6s] △ 对 ~ / 嗯 / [10s] ▲

例 5.3 体现的就是所谓缺乏多种选项的翻译问题。我们可以从被试 S4 汇报出“觉得这句话正常的语序会很奇怪”并停顿下来思考 6 秒的事实看出, 被试认为不能用正常语序来翻译“The elimination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s is essential to this outcome.”这句话。但除了“北朝鲜核计划的减少对这个结果非常必要的”这一种译文之外, 被试没有汇报出其它译文选项。

上述关于翻译问题的切分标准也符合 Lörcher 的观点, 即策略型翻译, 应该从遇到一个翻译问题开始, 到提出一种解决方案(或者表示暂时无法解决)时结束, 需要译者运用策略进行问题解决(Lörcher 1991:119)。

采用上文对于翻译问题的定义, 我们切分出本研究的 TAPs 数据库中所有的翻译问题, 以及这些问题的原文、译文选项、选择结果、选择理由等。本节将从翻译问题特征、选项数量与决策过程特征、选择结果的选项分布特征三方面来论述决策过程的选择。

5.2.1 翻译问题特征

翻译问题特征包括问题的数量特征和问题的层级特征，前者体现了译者翻译过程中问题的多少，后者则体现了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层级大小。

5.2.1.1 翻译问题的数量

Krings (1986) 最早提供证据表明职业译者和业余译者在自动化过程方面存在差别。由于翻译中的自动化行为通常被认为是经验值和熟练度增加的结果 (Ericsson & Simon 1984)，所以 Krings 最初假设，自动化过程会随着翻译能力的提高而增加。但是通过比较一位职业译者和八位英语专业学生的 TAPs 报告，Krings 发现结果正好相反，也就是说，职业译者比业余译者提出了更多翻译问题。

Jääskeläinen 等 (Jääskeläinen & Tirkkonen-Conditt 1991; Jääskeläinen 1996a) 为证明职业译者比业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更多的自动化行为，分析了大量职业译者和业余译者对翻译问题的 TAPs 报告。她们首先否定了职业译者的 TAPs 报告少于业余译者这一假设，并提出“常规任务” (routine tasks) 和“非常规任务” (non-routine tasks) 两种情境：在常规任务下，职业译者一般比业余译者汇报的数据少；但在非常规任务下，职业译者汇报的数据往往较多。她们的假设是：“当一些过程自动化后，其它过程则受到更多意识的控制，译者因此对于翻译问题更为敏感了” (Jääskeläinen & Tirkkonen-Conditt 1991:105)。Jääskeläinen 等的结论表明，翻译问题数量特征可分两方面：常规任务下，职业译者的翻译问题少于业余译者；非常规任务下，职业译者的翻译问题多于业余译者。

我们对本研究三类译者的翻译问题进行了统计，结果见以下表格：

表 5.7：三组被试两种文本的翻译问题数量

被试	文本一问题数量 (单位：个)	文本二问题数量 (单位：个)	属于被试 常规任务的文本
总数	112	96	—
初 学 者	S1	19	文本一
	S2	12	文本二
	S3	20	文本二
	S4	19	文本一
	S5	16	文本二
	S6	26	文本一

半职业译者	总数	94	81	—
	S7	27	20	文本二
	S8	13	10	文本二
	S9	6	9	文本一
	S10	20	12	文本二
	S11	13	14	文本一
	S12	15	16	文本一
职业译者	总数	94	64	—
	S13	28	11	文本二
	S14	22	16	文本二
	S15	12	14	文本二
	S16	6	6	文本一
	S17	5	5	文本一
	S18	21	12	文本二

表 5.8: 三类被试两种文本的翻译问题数量百分比 (单位: %)

被试类别	文本一问题数量百分比	文本二问题数量百分比	百分比平均值
初学者	37.33	39.83	38.45
半职业译者	31.33	33.61	32.35
职业译者	31.33	26.56	29.21

表 5.9: 常规任务文本的翻译问题数量 (单位: 个)

被试	文本一问题数量	文本二问题数量
平均数量	22.5	15
初学者	S1	19
	S2	16
	S3	17
	S4	19
	S5	12
	S6	26
平均数量	11.33	14
半职业译者	S7	20
	S8	10
	S9	6
	S10	12
	S11	13
	S12	15
平均数量	5.5	13.25
职业译者	S13	11
	S14	16
	S15	14
	S16	6
	S17	5
	S18	12

表 5.10: 非常规任务文本的翻译问题数量 (单位: 个)

被试	文本一问题数量	文本二问题数量
平均数量	16	17
初学者	S1	21
	S2	12
	S3	20
	S4	12
	S5	16
	S6	18
平均数量	20	13
半职业译者	S7	27
	S8	13
	S9	9
	S10	20
	S11	14
	S12	16
平均数量	20.75	5.5
职业译者	S13	28
	S14	22
	S15	12
	S16	6
	S17	5
	S18	21

第一、翻译问题数量的总趋势

初学者两篇文本的翻译问题数量均多于半职业译者和职业译者, 约占三类译者两篇文本问题总数的 2/5; 半职业译者其次, 职业译者最少。这体现了问题数量与译者水平之间关系的总体趋势, 即 Krings、Jääskeläinen 等最初的假设: 随着译者翻译水平的提高, 翻译过程的自动化行为会增加, 翻译问题会相应减少。

第二、翻译问题数量的复杂性

可以看出, 翻译能力和问题数量之间没有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比如文本一, 翻译问题数量最少和最多的被试均出现在职业组。认识到翻译问题数量的复杂性, 也就表明, 不能一味认为, 翻译水平高的译者, 翻译问题数量就必定较少, 反之则必定较多。这种复杂性一方面跟被试的个性特征、对翻译问题的敏感度等因素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任务的常规性有关。

第三、翻译问题数量与任务常规性

Jääskeläinen & Tirkkonen-Condit (1991) 提出“常规任务”和“非常规任务”两种翻译情境，这与问卷调查所体现的译者对文本的熟悉程度是相对应的¹⁰。对照常规任务文本和翻译问题数量，我们发现：①18位被试中有14位译者的常规任务文本和问题较少的文本之间是对应的（对应率77.8%），这表明，无论哪种类型的译者，执行常规翻译任务时遇到的翻译问题往往较少。②初学者翻译问题数量与任务常规性的对应率为50%，半职业译者为100%，职业译者为83.3%，这表明，任务常规与否对初学者翻译问题数量多少的影响不显著，对半职业译者和职业译者的影响较为显著。比如对于职业组被试S13来说，文本二属于常规任务，翻译问题数量还不足文本一问题数量的一半。③同样在常规任务下，翻译问题在平均数量上呈现“职业译者<半职业译者<初学者”的趋向，这与Jääskeläinen & Tirkkonen-Condit (1991)的假设是一致的，即常规任务情境下，被试的翻译水平越高，翻译问题越少。我们的实验数据显示，文本一作为非常规任务时的翻译问题在平均数量上为：职业译者>半职业译者>初学者；文本二作为非常规任务时：职业译者<半职业译者<初学者。这表明，非常规任务下，职业译者未必会比初学者遇到更多的翻译问题，这一结果与Jääskeläinen & Tirkkonen-Condit (1991)的假设不一致。我们认为，非常规任务情境下，职业译者一方面的确比初学者更有可能关注到更多翻译问题，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动化行为帮助解决了不少相对简单的翻译问题。所以在非常规任务情境下，翻译问题数量的多少与翻译水平的高低之间没有明显对应关系。

5.2.1.2 翻译问题的层级

上文主要讨论了翻译问题的数量特征。然而我们认为，更能显示翻译问题特征的不是数量多少，而是它所属的语言层级大小。

5.2.1.2.1 翻译问题层级的划分

翻译问题的层级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翻译策略的层级大小。Lörscher对翻译策略有这样的定义：翻译策略是译者在把一个语段从一种语言译至另一种语言

¹⁰ 我们认为，被试指出的更熟悉的文本对应常规翻译任务情境，另一种较不熟悉的文本对应非常规翻译任务情境。

时，解决所遇问题的一种有意识的过程（Lörscher 1991a:76）。这表明，翻译策略是译者在解决翻译问题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换句话说，翻译策略与客观翻译问题之间基本上存在这样的对应关系：译者在处理哪一层级的客观翻译问题，就需要运用哪一层级的翻译策略；反过来说，译者运用了哪一层级的翻译策略，就意味着他（她）在处理哪一层级的客观翻译问题。

TAPs 翻译研究者对翻译问题或翻译策略的层级已经做了不少研究。比如 Jääskeläinen（1993）把翻译策略分为总体策略（global strategies）和局部策略（local strategies），总体策略指整体翻译任务中的策略（如考虑译文风格、读者群等），局部策略关注具体翻译操作（如进行词汇选择、字词搭配等）；与之对应的翻译问题也包括总体问题（global problem）和局部问题（local problem），前者指文体风格、读者群等宏观问题，后者指词汇、句子等层面的微观问题。我们认为：以“总体”和“局部”两方面来划分翻译问题层级过于笼统，因为 TAPs 数据所体现的更多是词、短语、小句和句子等层面的所谓“局部”问题。

Séguinot（1991）也探讨了翻译问题的层级：“在把法语译成英语的任务中，英语母语者表现出更娴熟的翻译行为和修改技巧，多在语篇层面操作；法语母语者则更依赖于语法规则或翻译原则，多在词汇层面操作”。该结论也存在层级分类上的不足：首先，语篇作为语言单位是比较模糊的概念，小至词汇、标点，大至段落、篇章，都可以成为语篇；其次，如果语篇专指句以上的语言单位，那么 Séguinot 对词以上、句以下的各级语言单位均未做描述。

还有研究者认为，非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注重词汇选择、语法重构等细微的翻译问题，而忽视译文的连贯、风格等属于语篇层级的翻译问题。比如 Gerloff 的研究发现：与职业译员相比，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常‘卡在’较小的语言单位和较低的处理层次上”（Gerloff 1988:133）。Fraser（1993）的研究结果同样证明，职业译员翻译时并不纠缠于某个微观层面上的难点，他们更关注一些宏观问题，如译文的读者类型、源语与译语在功能或文体上是否对等。

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不同类型的译者所关注的翻译问题，但研究中的不足也显而易见：①对翻译问题的层级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②关于翻译问题层级性的结论缺乏系统的比较和总结；③被试人数普遍较少¹¹。

我们根据 Leech (2006) 《英语语法术语表》 (*A Glossary of English Grammar*) 对英语语法单位的分类，将本实验研究所采用的英语文本的翻译问题相应地分为词 (word)、短语 (phrase)、小句 (clause) 和句 (sentence) 以上 (包括句子) 四个层级。Leech (2006) 对词、短语、小句和句子的界定如下：

词：基本语法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对应词典的主要单位。在书面语中，词由空格分割作为标记，是最小的语言单位。

短语：由一个或多个词组成的语法单位，也是简单句的组成成分之一。

小句：主要语法单位，在形式上一个小句可以包括下列成分：主语、动词短语、宾语、补语和状语。

句子：最大的语言单位，语法描写的主要任务。在书面语中，句子起始于大写字母，结束于句号、问号或叹号。在口语中，句子的界定存在争议。没有严格的关于句子的定义，但通常认为，规范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处于语法单位的最高层级。其中句子由一个或多个小句组成；小句由一个或多个短语组成；短语由一个或多个词组成；词由一个或多个语素组成。

(Leech 2006: 17, 86, 104, 126)

吕叔湘 (1979: 28) 提出了区分“静态单位” (或称“备用单位”) 跟“动态单位” (或称“使用单位”) 的主张，把语素、词、短语等归作静态单位，小句和句子则是动态单位。本文在分析翻译问题层级上借鉴这一分类标准和名称，将词汇与短语层面的翻译问题归为“备用单位层级”，小句与句以上层面的翻译问题归为“使用单位层级”。解决短语以下层级的翻译问题，极少涉及句法，而解决小句以

¹¹ Fraser (1993) 的研究被试为 12 人，是上述研究中样本最大的，但该研究的 12 名被试均为职业译者，无法通过对比来发现不同类型译者翻译问题的层级差别。

上层级的翻译问题则通常需要考虑句法结构调整，这大体可以作为两大层级的划分依据。

5.2.1.2.2 统计结果与讨论

翻译问题的层级统计百分比如下：

表 5.11：各翻译问题层级占问题总数的百分比¹²（单位：%）

被试	文本一				文本二			
	词	短语	小句	句以上	词	短语	小句	句以上
初学者	49.69	28.96	17.28	4.08	45.68	38.85	6.93	8.54
半职业译者	39.44	30.21	27.12	3.23	18.07	60.90	8.21	12.81
职业译者	22.63	31.97	36.77	8.62	29.85	31.05	20.48	18.62
平均值	37.25	30.38	27.06	5.31	31.20	43.60	11.87	13.32

表 5.12：文本一和文本二各问题层级百分比总均值（单位：%）

被试	词	短语	小句	句以上
初学者	47.68	33.91	12.10	6.31
半职业译者	28.76	45.56	17.67	8.02
职业译者	26.24	31.51	28.62	13.62
总平均值	34.23	36.99	19.47	9.32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分两方面讨论翻译问题的层级，一是问题层级的总体分布情况，二是不同译者之间的问题层级分布情况比较。

第一、问题层级的总体分布

表 5.12 显示，总的来说，各翻译问题层级中比重最大的是短语级问题，占 36.99%；其次是词；第三为小句；最少的是句以上，仅占 9.32%。

因此，按照上文的划分，“备用单位层级”（词和短语）问题占 71.22%（文本一 67.63%，文本二 74.80%），“使用单位层级”（小句和句以上）问题占 28.78%（文本一 32.37%，文本二 25.20%），可见，翻译问题主要集中在“备用单位层级”的词和短语上。Klings（1987:169）认为 90%的翻译问题存在于词（word）的

¹² 问题层级百分比的计算步骤如下：设 A1 为 S1 的词汇百分比，An 为 Sn 的词汇百分比，n 为 1-18 之间的自然数；则 $A1 = S1 \text{ 词层面问题数量} / S1 \text{ 问题总数} \times 100\%$ ；初学者（S1-S6）词层面问题数量百分比 = $(A1 + A2 + \dots + A6) / 6$

层面，这个比例显然高出本研究结果¹³，原因可以从被试和语言对两方面来解释：①Kring's的被试是8位英语教育职业硕士生，这种类型的被试在本研究中基本上被归为初学者或半职业译者，他们的翻译问题层级较多分布在词或短语层面（下文有进一步的讨论）。②Kring's实验的翻译任务是英德互译，属于亲属语言翻译，对比英译汉的非亲属语言翻译，显然后者难度更大，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更重要的是，需要考虑的宏观层面的问题更多。虽然“句式转换”、“结构调整”等问题在亲属语言翻译时也需要考虑，但出现的频率远不如非亲属语言翻译高。比如在句法表现方式上，汉语重意合（parataxis），英语重形合（hypotaxis），汉语的一个句子可由好几个短语组成，它们之间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无需形式上的拈连；对比之下，英语句子往往要求用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将句子成分连成一个意义与形式珠联璧合的整体（陈宏薇 1997:36-37）。因此英译汉时，为避免欧化或翻译腔，译者时时需要对一些复杂句子进行拆分或重组，而这种拆分或重组就涉及小句或句子层面的翻译问题。

第二、三类译者之间的问题层级分布情况比较

首先，综合文本一和文本二，“备用单位层级”的问题数量总体呈现“初学者 > 半职业译者 > 职业译者”的趋向，其中，词汇层面的翻译问题数量为初学者 > 半职业译者 > 职业译者，短语层面为半职业译者 > 初学者 > 职业译者；“使用单位层级”的问题数量总体呈现“初学者 < 半职业译者 < 职业译者”的趋向，其中，小句和句以上层面的翻译问题数量均表现为初学者 < 半职业译者 < 职业译者。上述结果体现了这样的趋势：随着翻译水平的提高，被试提出的翻译问题更加宏观，这与 Jääskeläinen (1993)、Lörscher (1993) 等的研究成果大体是一致的。该趋势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这样解释：随着翻译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自动化过程帮助译者解决了更多的词汇选择、字词搭配、固定短语翻译等相对微观的问题；另一方面，译者对相对宏观问题的敏感度也加强了，比如英译汉时，通过结构调整而拆长句为短句，避免译文欧化，通过语序转换而变被动句为主动句，契合汉语“主题—话题”形式的叙述方式。

¹³即使 Kring's 划分的“词”包括本文划分的“词”和“短语”，本研究中它们的比重也只有 71.22%。

其次，具体观察两种文本，文本一的翻译问题在词、小句和句以上层级的分布与总体趋势一致：词层级的问题数量随翻译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小句和句以上层级的问题数量随翻译水平的提高而递增；短语层面的翻译问题，尽管在数据上与总体趋势相反，但实际百分比相差很小，并不影响总体结论。文本二的翻译问题在小句和句以上层级的分布也与总体趋势一致；但在词和短语层面的分布与总趋势不一致，原因是半职业译者在短语层面的翻译问题数量百分比很高。我们追溯原始数据发现，6位半职业译者中有4位特别关注短语的翻译，很多词汇选择上的问题，他们都从词语搭配或固定短语的角度考虑，大大增加了短语层面的问题数量。

5.2.2 选项数量与决策过程特征

这部分集中探讨两个方面：①选项数量特征。所谓选项数量，即被试在解决每一个问题时具体提出多少备选译文方案。选项数量可以体现被试为解决问题所收集的信息量大小。②决策过程特征。影响决策过程的因素很多，其中语境因素对解决翻译问题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本节重点讨论决策过程中的语境因素。

5.2.2.1 选项数量特征

为方便分析，我们根据被试在解决某一翻译问题时提出的选项的个数，将选项数量类型划分为“二选型”、“三选型”和“四选以上型”（包括四选）。各类型的出现次数及频率（以百分比表示）见下列表格：

表 5.13：文本一、二选项数量类型的出现次数（单位：次）

类别	被试	文本一			文本二		
		二选型	三选型	四选以上型	二选型	三选型	四选以上型
初学者	S1	16	2	1	11	5	5
	S2	7	3	2	14	1	1
	S3	10	7	3	11	5	1
	S4	11	5	3	5	6	1
	S5	8	6	2	8	3	1
	S6	17	5	4	4	10	4
半职业译	S7	15	8	4	11	8	1
	S8	9	2	2	6	4	0
	S9	5	1	0	7	1	1
	S10	16	2	2	6	5	1

者	S11	8	1	4	8	6	0
	S12	15	0	0	14	2	0
职业译者	S13	12	12	4	6	5	0
	S14	15	3	4	9	6	1
	S15	4	5	3	4	6	4
	S16	5	1	0	5	1	0
	S17	4	1	0	3	2	0
	S18	12	8	1	9	2	1

表 5.14: 三类译者选项数量类型的出现次数百分比(频率)(单位: %)

被试类别	文本一			文本二		
	二选型	三选型	四选以上型	二选型	三选型	四选以上型
初学者	60.97	25.60	13.43	55.86	31.67	12.47
半职业译者	74.94	13.23	11.83	64.57	31.36	4.07
职业译者	60.81	28.82	10.37	59.62	33.19	7.19
平均值	65.57	22.55	11.88	60.01	32.07	7.91

表 5.15: 三类译者文本一、二选项数量类型出现次数百分比(频率)总均值(单位: %)

被试类别	二选型	三选型	四选以上型
初学者	58.41	28.63	12.95
半职业译者	69.76	22.29	7.95
职业译者	60.21	31.01	8.78
总平均值	62.79	27.31	9.90

根据上述数据, 选项数量特征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讨论:

第一、选项数量类型的总体分布

根据表 5.15, 总体而言, 选项数量类型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二选型, 其次是三选型, 最低的是四选以上型。可见, 大多情况下译者在解决问题时会提出两个选项进行选择。这种情况在不同类型的译者身上普遍存在: 从初学者到职业译者, 二选型的出现频率都非常高, 占一半以上; 相比之下, 四选以上型的出现频率则非常低, 约 10%左右。

第二、三类译者之间选项数量类型出现频率的比较

无论文本一还是文本二, 二选型出现频率最高的都是半职业译者(其总平均值亦比其他两类译者高出 10%左右), 三选型出现频率最低的也是半职业译者。初学者和职业译者二选型和三选型的出现频率均比较接近。四选以上型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初学者(比其他两类译者总平均值高出 4%左右)。

可见，解决翻译问题时选项数量的多少很难与翻译能力建立简单的对应关系。职业译者解决问题时提出的选项可能比初学者多，也可能少。因为，一方面，职业译者在解决问题时收集的信息量通常比较大，由此提出的备选项可能就会比较多；但是另一方面，初学者在解决问题时往往犹豫不决，不够果断，也很可能会提出很多备选项（甚至包括完全脱离原义的错误选项）。TAPs 数据中，个别初学者在解决难点问题时花费很多时间并提出很多备选译文，比如以下两例：

例 5.4 (S6/novice/V1)

(原文)：.....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TAPs)：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that goes into, 那这个creativity是什么呢，是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写一个伟大的剧作，或，一首，雄伟-庄严的-交响，交响曲/[3s]symphony是交响曲吧，.....¹⁴

△这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进而.....使人，使人类，能-够-写出，写出——伟大的制作，伟大的制作，伟大的作品吧，伟大的作品，交响~▲，
(symphony, symphony, 交响乐，交响曲，)伟大，great, great symphony,
◇[[金山词霸]]伟大的(?)，庄严的(?)，呃，great, 崇高的(?)，
还可以翻成什么.....伟大的艺术品，超乎，重要的，首要的，卓越的，卓越的(?) / (伟大的交响曲，就用伟大的吧，)△伟大的作品，卓越的交响曲，卓越的，交响曲。▲

例 5.4 中被试 S6 在翻译 “writing a great play”、“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这两个词组时，提出了很多备选项，其中 “a great play” 的备选译文有：“伟大的剧作”、“伟大的制作”、“伟大的作品”等；“a great symphony” 的备选译文有：“雄伟庄严的交响曲”、“伟大的交响曲”、“伟大的作品”、“卓越的交响曲”等，其中还包含了对修饰词 “great” 的反复抉择：先

¹⁴ 该处省略了被试解决其他翻译问题的 TAPs 报告。

提出“雄伟庄严”、“伟大的”、“庄严的”、“崇高的”，觉得都不理想，“还可以翻成什么”？接着又提出一连串选项如“超乎”、“重要的”、“首要的”、“卓越的”等等，并在最初选项“伟大的”和最后选项“卓越的”之间抉择良久，最后选择了“卓越的”。

例 5.5 (S1/novice/V2)

(原文): The elimination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s is essential to this outcome.

(TAPs): 消~, 呃-, 消~/elimination of, 北朝鲜, 朝鲜/的核实验, 的核~核实验, 消灭/◇[[金山词霸]] elimination 用-/消除, 消灭, 减少, 减少, 阻止◆/elimination of, 阻止, △阻止, 阻止朝鲜, 阻止-朝鲜进行核试验, 进行核实验, 核实验▲/is essential to this ~, 呃, 是/呃-/我们两国都乐见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而阻止是, 是-必需的/△而阻止朝鲜进行核试验则是-此——▲则是达到此目的的-必经之路, 的-必-要之举, 的-必-必不可少, 而阻止朝鲜进行核试验则是必不可少的/则是必需的/嗯-/则是必——/则是[3s]/则是, 则是/则是-/嗯-/则是必不可少/则是/△必需的↓, 必需的。▲

例 5.5 中 S1 在翻译句子“The elimination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s is essential to this outcome”时，遇到几处难点：首先是单词“elimination”的翻译，S1 先后提出了“消灭、减少、阻止”等选项，最后选定“阻止”；在翻译“is essential to”短语时，S1 进行了更艰难的选择，先后提出“必需的、必经之路、必要之举、必不可少的”等选项，并在“必需的”和“必不可少”两个选项之间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用“必需的”。

通过例 5.4 和例 5.5 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初学者在解决一些细节问题时不够果断，选择的过程中也缺乏较好的理论或原则指导，因此往往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得到的译文却仍然不够理想。比如例 5.4 中 S6 反复抉择后得出的译文“卓越的交响曲”在搭配上不够贴切；例 5.5 中 S1 将“elimination”译作“阻

止”，显然是错误的；最后将“is essential to”翻译成“必需的”，也是不准确的。

翻译过程中，选项数量不能简单体现翻译能力，数量多少所对应的译者为解决问题而收集的信息量大小之间存在多种对应情况。Wilss 指出：“信息的收集会延长翻译进程。一般来说，有用信息越多，翻译结果越好；但是译者（尤其是初学者）很可能会收集到一些对翻译毫无价值的信息。为了把主观的不确定因素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译者可能冒着浪费时间的风险，来评估大量的可能选项”（Wilss 1996:189）。也就是说，译者收集的信息在为翻译问题提供备选项的同时，也增加了译者评估、抉择选项的时间和工作量，甚至对决策过程形成不利的影 响，比如干扰译者思维，使其提出不正确的译文选项并将一时偏误延续下去（如前面所列举被试对“elimination”等词语的误译即是例子）。因此，Wilss 提出：“在教学上发展认知性的简化决策，是翻译培训的首要目标”（Wilss 1996:189）。这一看法对于翻译教学和培训很有启示：翻译培训需要提高译者的翻译能力，主要是指提高译者解决翻译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除了要求译者能针对问题提出理想的最终解决方案，还要求译者解决问题的过程不能繁琐，很多时候需要当机立断。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对翻译问题是深思熟虑反复拿捏还是当机立断信手拈来，涉及到适度考量的问题。对此，Levy（1967）提倡运用“极小极大策略”，即花费最经济的时间得出最理想的译文。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论述。

5.2.2.2 决策过程与语境层级

Verschueren 的“语言选择论”认为：语言选择过程的动态顺应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其中一方面即是不同语境对语言选择的制约。语言是动态的，根据语境来选择语言并作出顺应，这一动态性与交际双方所处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的认知心理状态有关（Verschueren 1999:147）。同样道理，翻译活动要实现预期目的，也要顺应特定的语境。语境可大可小，大到社会制度、风俗文化；小到韵律音节，字词搭配。胡庚申（2004）一言以蔽之，翻译活动需要顺应“翻译生态环境”。Newmark 指出：“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Newmark 1982:113）。Barkhudarov 也在《语言与翻

译》中专门讨论了语境的作用和意义：“在翻译过程中‘排除’语言单位多义性和选定翻译等值物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这就是：狭义上下文、广义上下文和超语言环境。不考虑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就不能理解言语产物，因而也就不能进行翻译”（参见方梦之 2004:329）。

翻译活动离不开语境的制约，而译者在解决翻译问题时，对多种选项的决策过程更要依赖语境。Wilss 提出：“决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境（受环境制约）”（Wilss 1996:185-186）。然而回顾以往文献，中外的翻译理论家对于翻译结果与语境的关系讨论得多，对于翻译过程与语境的关系讨论得少，剖析翻译问题解决时语境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更是罕见。在习惯了借助语境理论来品评译文得失的同时，我们更有必要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借助语境对不同选项进行抉择。

5.2.2.2.1 语境的层级性

语境（context）是研究语言使用和功能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多年来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语境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此同时，对于语境的层级分类也因为各自研究取向的差异而有所不同¹⁵。本文采用的是 Malinowski-Firth-Halliday 流派对语境层级的分类，因为该流派关于语境层级的分类在语言学界最有影响力。

语境这一概念首先是由英国人类学家 Malinowski 于 1923 年提出的。Malinowski 在其论文《原始语言的意义问题》（“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中，通过研究南太平洋 Trobriand 岛上土著人语言使用的场所以及不同文化的差异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认为：“话语和环境互相紧密地纠合在一起，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Malinowski 1923:296），语境一词由此而来。Malinowski 最初使用的语境是“con-text”，意思是“特定句子前后

¹⁵ 朱永生（2005:2）列举了以下种种关于语境的分类：如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与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局部语境（local context）与整体语境（global context），可能语境（possible context）与真实语境（actual context），强势语境（high context）与弱势语境（low context），静态语境（static context）与动态语境（dynamic context），显性语境（explicit context）与隐性语境（implicit context），物质语境（physical context）与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等。

的词和句子”，这是最狭义的语境，也就是上下文。Malinowski认为还需要一个术语来表达整体环境，包括语言环境和话语表述时的情景，因此自创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cf. Halliday 1985:6）。Malinowski进而规范了语境理论，将语境分成话语语境（Context of utterance）、情境语境、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三个层次。

之后，Firth在《社会中的个性和语言》（“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里对语境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继承了Malinowski关于“情景语境”的理论，并将之运用到语言学研究中，指出：情景语境不仅包括说话人说出来的话，而且还包括说话人的面部表情、手势、身体的姿势、所能参与交流的人以及这些人所处的那一部分环境（Firth 1950:37-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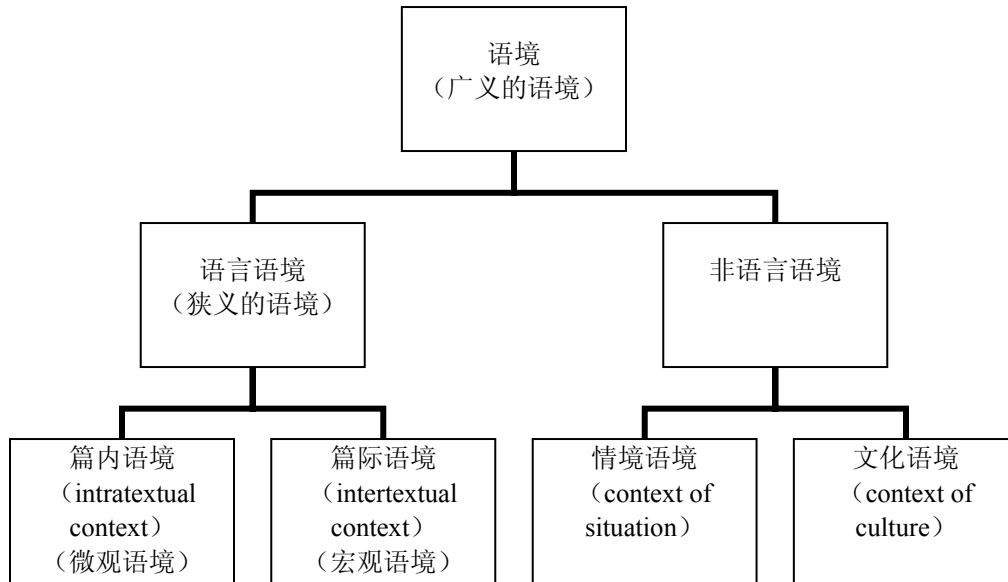
当代著名语言学家Halliday继承并发展了Malinowski和Firth的理论，他把语境划分为两大类，即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

语言语境主要指语言系统内各个语言成分之间微观和宏观的搭配结构及上下文的关系，如词与词、句与句之间临时的或稳定的种种联系形式。语言语境包括篇内语境（intratextual context）和篇际语境（intertextual context）。其中篇内语境主要指语篇内部结构之间在语义上的连贯性和粘合性。篇际语境主要指上语篇和下语篇之间在语义上的连贯性和粘合性。篇内语境和篇际语境体现着语言系统内部各语言单位的相互关系，并制约着语言表达的确切语义（Halliday 1985:49）。

非语言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指作品中的具体情景，包括人物的身份、地位，人物在具体的言语情景下的心态，说话人的语气、用词、表情及姿态等等。情景语境在文字上并不一定都有具体表现形式，却又与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密切相关，它影响和制约着作品语言的确切含义。Halliday认为，情景语境包括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语场是指语言发生的具体环境，语旨是指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关系，语式是指语言本身发挥的作用以及语言交际所采用的渠道或媒介；文化语境指语言运用的社会政治背景、历史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社会群体心理等（Halliday 1985: 12-14; 46-49）。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中对于语境类别的论述，我们将语境的分类归纳如下（见图5.3）：

图 5.3: 语境的分类



事实上语境这一术语自产生之初就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初 Malinowski 在 Trobriand 岛上进行原始语言的调查与研究，其手段就是翻译。他首先采用意译的方法翻译土著语，译文清晰明了，但未能传达原语任何语言或文化信息；而采用直译模仿原语的译文，英语读者根本无法理解。因此，他的翻译原则是为译文提供详尽的额外注解，这种注解不是传统的语文学家在编译古典文献时所作的训诂，而是增加大量关于土著人生活环境的文字解说 (cf. Halliday 1985:6)。当然，本研究探讨的英汉翻译，不需要象土著语—英语翻译那样增加长篇语境来帮助传递信息，但是，语境对翻译活动，尤其对于翻译问题解决过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基于上文的语境分类和本研究的具体目的，我们对译者在决策过程中所考量的各级语境作如下描述：

第一，语言语境（或称上下文语境）属于狭义的语境。在翻译问题解决过程中，该语境的作用一方面是帮助译者理解原作意义并消除原作歧义，另一方面是帮助读者准确理解译文所传达的信息。

第二，我们按照语境的功能区别篇内语境和篇际语境：如果译者参考该语境用以帮助处理句子内部的词汇选择、词句理解、字词搭配、句式结构、语序调整等问题，则属于篇内语境；如果译者参考该语境用以帮助处理句子或段落之间的衔接连贯、替代照应等问题，则属于篇际语境。篇内语境属于微观语境，篇际语境属于宏观语境¹⁶。

第三，情景语境在决策过程的作用是帮助译者实现原文和译文在情感、情景、语气、语体、文体等方面的对等。

第四，文化语境在决策过程的作用是解决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同语义联想、表达习惯、思维习惯和语用含义等。翻译追求的不仅仅是字面表层意义的对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两种文化的互相融合和转换寻求意义上的对等或“相当”。在翻译中，内在的文化信息有时比外在的字面意义更重要。为此Nida 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Nida 2001:47）。文化语境通常不限于文字形式，它是间接影响语义的非语言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一例外处于跨文化交际的状态中，因而文化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

表 5.16：决策过程中译者所参考的各层级语境：TAPs 实例

	篇内语境	篇际语境	情景语境	文化语境
例 1	(S5/novic/V1) (原文) : Even the simple computers of today can be geared for that. (TAPs) :就算一个简单 / 现今一些简单 / simple 不是简单吧? / simple , <u>电脑怎么简单啊?</u> 基本 ↓, 对, △ 基本的电脑。▲	(S6/novice/V1) (原文) : Even the simple computers of today can be geared for that) (TAPs) : <u>for that, that 应该指的是上面整个的——句子,</u> 就是整个计算机的思维过程, 那就是适应以上的一 / 适应以上的思维过程, 适应以上的工作方式。	(S4/novice/V1) (原文) : One must remember that human beings also can only do what they are “programmed” to do. (TAPs) :△我们必须耍, 记住 / ▲ / <u>remember that 是强调一下, 说这个事实,</u> △我们必须耍要记住这个事实 /	(S10/semi-professional/V1) (原文) : Can a computer think? (TAPs) : <u>在这边新加坡人好像喜欢选择‘电脑’, 不喜欢用‘计算机’, ‘计算机’中国的。</u>
理由	上下文的字词搭配	替代照应	语气上的对等考量	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同语言表达习惯

¹⁶ 有些论著将非语言语境也包括在宏观语境中。

<p>例 2</p>	<p>(S10/semi-professional/V1) (原文) : Our genes “program” us the instant the fertilized ovum is formed. (TAPs) :△人类的, 人类胚胎 / 细胞形成的那一刻, 这 / 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基因, 就一开始一对我们设定程序, 就开始了, 开始设定, 就开始设定我们的程序▲ / 嗯——所以我们……‘<u>开始我们的程序</u>’可能不能用, 必须加 / 呃一开始<u>设定</u> ↓, 呃, 动词 / (汉语的习惯, 加上动词) / 开始设定我们的程序 /</p>	<p>(S17/professional/V2) (原文) : As our two nations work constructively across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we are candid about our disagreements. (TAPs) :英语里面的 as 是表明一个时间状语, <u>但是我觉得在这里 / 这里隐含着</u>一层意思, 也就是有转折的含义。</p>	<p>(S8/semi-professional/V2) (原文) :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war on terror. (TAPs) : 我们共同参与, △参与反恐 / 共同参与反恐。▲ / 用<u>反恐战争</u>的话好像真的是去打仗一样, 但事实上, 并不是这样, 所以不想造成这种一误会。</p>	<p>(S14/professional/V2) (原文) : Mr. Premier,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it is my honor to welcome you to the White House. (TAPs) : Mr. Premier, 总理先生 / <u>总理先生很奇怪啊, 有没有这一说法 (?) 总—理—先—生—↑ [3s] / 嗯——我觉得还是按照中文的思维翻译成△‘<u>温总理</u>’比较好, 温总理, 不要翻译成总理 (先生) ▲</u></p>
<p>理由</p>	<p>动词的语法规则</p>	<p>逻辑连贯</p>	<p>情景上的考量</p>	<p>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同思维习惯</p>
<p>例 3</p>	<p>(S14/professional/V2) (原文) : We are full members of a world trading system that rewards enterprise and lifts nations. (TAPs) :这个 full members / 只是说, <u>也不是说‘成</u>员’, <u>只是说他们要发挥一最大的力量, 作为其中的一个分子要发挥最大的力量。</u></p>	<p>(S18/professional/V1) (原文) : If solving a mathematical problem is “thinking,” then a computer can “think” and do so much faster than a man. (TAPs) : 我为什么这儿要停顿呢, <u>我是在想 do so, 这里的 so 到底是代表前面的什么? 是代表前面的 solving a mathematical problem 吗? 还是代表 think?</u> then a computer can think. And do so-and do so much faster than a man.好, 现在我看了一遍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代表前面的 think, 因为 think 是靠近这个 do, 所以还是翻成比人的思维快得多, 而不是解题快得多, 应该是比人的思维快得多。</p>	<p>(S8/semi-professional/V2) (原文) : Our two nations seek a Korean Peninsula that is stable and at peace. (TAPs) :△seek , <u>用一个外交上比较听得多的词, 致力于▲, 嗯—— [3s] 是致力于, 使 / 嗯 / [3s] / 致力于使 / 嗯——△朝鲜半岛获得一和平, 使朝鲜半岛获得, 获得和平与 / ▲致力于使朝鲜半岛获得和平与稳定。</u></p>	
<p>理由</p>	<p>结构调整, 名词词组转换成动词词组</p>	<p>替代照应</p>	<p>语体上的考量</p>	

5.2.2.2.2 语境层级统计与讨论

我们考察了所有被试在翻译过程中为解决问题而参考的篇内语境、篇际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次数，并计算出每位被试在翻译过程中各类语境参考频率，也就是所参考的特定语境占其翻译过程中问题总数（即语境参考总次数）的百分比。最后统计出每一类被试特定语境的百分比平均值。见下列表格¹⁷：

表 5.17：三类被试文本一翻译过程中各类语境的参考频率¹⁸（单位：%）

被试	语言语境		非语言语境	
	篇内语境	篇际语境	情景语境	文化语境
初学者	81.92	10.41	9.69	1.75
半职业译者	80.74	12.64	13.20	0.83
职业译者	74.06	19.23	23.42	2.90
平均值	78.91	14.09	15.44	1.83

表 5.18：三类被试文本二翻译过程中各类语境的参考频率（单位：%）

被试	语言语境		非语言语境	
	篇内语境	篇际语境	情景语境	文化语境
初学者	88.68	9.93	6.46	3.35
半职业译者	86.67	6.31	5.36	9.85
职业译者	82.44	15.47	14.32	11.86
平均值	85.93	10.57	8.71	8.35

¹⁷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译者如何参考语境与具体翻译文本的内容和风格有一定关系，但由于本实验研究所采用的两篇文本分属科普短文与政治演说辞，无论词汇意义、句法形式、修辞手法、文化蕴含，都存在较大差别且在整体风格上各有一定的覆盖面，因此，我们认为，这二者在实验中的结合，使不同语境因素对理解和翻译的影响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均衡。因此，基于两篇文本翻译过程的相关数据进行综合式的分析，其结果应当是有效的。

¹⁸ 三类被试翻译过程中各类语境的参考频率计算方法如下：

设 A1 为被试 S1 文本一翻译过程中篇内语境的参考频率，A_n 为被试 S_n 文本一过程中篇内语境的参考频率，n 为 1-18 的自然数， $A_n = S_n \text{ 参考篇内语境的次数} / S_n \text{ 翻译问题总数} \times 100\%$ ；

初学者（S1-S6）篇内语境参考频率 = $(A_1 + A_2 + \dots + A_6) / 6$ 。

一些被试在解决具体翻译问题时既参考了语言语境，又参考了非语言语境，因此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的参考频率百分比之和会大于 100%。

表 5.19: 三类被试两种文本翻译过程中各类语境的参考频率均值 (单位: %)

被试	语言语境		非语言语境	
	篇内语境	篇际语境	情景语境	文化语境
初学者	85.30	10.17	8.07	2.55
半职业译者	83.70	9.47	9.28	5.34
职业译者	78.25	17.35	18.87	7.38
总平均	82.42	12.33	12.07	5.09

根据上述数据, 我们从三个方面讨论语境的层级问题:

第一、语境层级的总体分布

译者在进行决策时, 对语言语境的依赖性远远大于非语言语境。所有翻译问题中, 有 94.75% 的问题在决策过程中参考了语言语境, 而只有 17.17% 的问题在决策过程中参考了非语言语境。

更进一步, 语言语境中, 篇内语境的参考频率高达 82.42%, 远远大于篇际语境 (12.33%)。非语言语境中, 情景语境参考频率有 12.07%, 大于文化语境 (5.09%)。

Newmark 指出: “上下文的语言成分主要受限于搭配词 (90% 受搭配词限制); 甚至受限于整句话, 如较长的隐喻或谚语。偶尔, 一个词甚至会受到其他句子的限制” (Newmark 2005:268)。这种说法和本文的统计结果是一致的: ①当译者面对翻译问题时, 通常首先求助于最小范围的上下文, 且大部分的翻译问题都能通过考量词语搭配、语法规则、句式结构等因素获得解决; ②按照宏观语境和微观语境的划分, 参考微观语境对解决翻译问题的帮助更大, 宏观语境¹⁹虽然也对决策过程起到一定的帮助, 但被参考的次数很少。这正如 Wilss (1996: 176) 指出的, 宏观语境上的问题要比微观语境的问题更少。微观语境上的问题, 如语义模糊、句法繁复、巧妙的语篇策略 (如修辞)、主位或述位的分布、核心信息与辅助信息、隐喻表达、文字游戏、词法创新、形容词或名词的分布、介词短语、词义空缺等, 即便是富有经验的译者往往也要费尽心思, 绞尽脑汁。

¹⁹ 该处的宏观语境既可以单指篇际语境, 也可以包括篇际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者。

第二、三类被试的语境层级比较

语言语境方面：篇内语境的参考频率随着被试翻译能力的提高而降低；篇际语境的参考频率体现为“职业译者>初学者>半职业译者”的趋向，其中初学者和半职业译者的频率数值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非语言语境方面：无论是情景语境还是文化语境，其参考频率皆随翻译能力的提高而上升。

这一数据统计表明，尽管职业译者在很多问题上需要参考微观语境，但参考微观语境的次数要比半职业译者和初学者少很多；相反，参考篇际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次数则高于半职业译者和初学者。对于该现象，我们认为原因在于：职业译者具备较多的翻译经验和较熟练的翻译技巧，因此在解决问题时往往能跳出狭窄的上下文语境，考虑更为宏观的语境。统计表明半职业译者语境层级的百分比情况介于职业译者和初学者中间，但比较靠近初学者，可见半职业译者与初学者在参考语境方面比较相似。我们认为：在翻译实践能力的提高过程中，从初学者过渡到半职业译者相对容易，翻译初学者通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即可成为半职业译者；但是，从半职业译者过渡到职业译者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并非易事。

上述数据虽然体现了语境层级参考情况和翻译能力之间的关联，但二者的对应关系并非正比例函数关系——随着翻译能力的提高，微观语境的考量次数不会无限减少，宏观语境的考量次数也不会无限增加。即便是水平很高的职业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参考微观语境。

第三、被试翻译不同文本时参考的语境层级比较

语言语境方面：文本一的篇内语境参考频率小于文本二，但篇际语境的参考频率大于文本二。非语言语境方面：文本一的情景语境的参考频率大于文本二，但文化语境的参考频率小于文本二。

文本一属于科普短文，侧重说理和逻辑；文本二属于演说辞，以文辞生动、修辞丰富见长。因此在语言语境的考量上，对于科普短文往往要结合篇际语境来完成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保证译文在信息传递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对于演说辞则重在“修辞立其诚”，需要考量“措词选择”、“字词搭配”等篇内语境。在非语言语境的考量上，译者普遍较为关注科普文的文体特征，指出要用简单易懂、平实通达的语

言来表述，因此比较关注情景语境；文本二的演讲辞涉及较多外交和政治术语，比如译者会对“Mr. Premier”是直译“总理先生”还是按照汉语习惯译成“温总理”进行取舍，也会对“六方会谈”还是“六国会谈”的措词进行选择，或对“Taiwan”、“Tibet”后面要不要增加“问题”一词以补充文化信息犹豫不决，这些翻译问题的出现提高了文化语境在文本二翻译过程中的参考价值。

5.2.3 选择结果的选项分布特征

为讨论选择结果的选项分布特征，我们从两方面进行数据统计：①对于“二选型”问题，我们分别统计出选择结果是“首选项”的次数和选择结果是“末选项”的次数；②对于“多选型”问题，我们分别统计出选择结果是“首选项”、“中选项”和“末选项”的次数²⁰。

关于问题解决过程中不同备选项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三种假设：

1、备选项之间为并列关系。译者面对翻译问题时，不分主次轻重地一次性提出若干个选项，然后选出认为最理想的选项作为译文。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选择结果的选项分布应该相对平均，即首选项、中选项和末选项成为译文的机率相差不大。

2、备选项之间为递进关系。译者面对翻译问题时，越早提出的备选项越容易被后来的选项所取代，最后提出的选项往往就成为译文。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末选项成为译文的机率应该远远高于中选项和首选项，并且中选项成为译文的机率也要高于首选项。

3、直觉优势。译者较依赖大脑直觉反应的结果，对于自己最初提出的选项存在倾向性，因而面对多种备选项的权衡定夺时优先考虑选择首选项。

²⁰该处的“多选型”问题是指被试提出三个以上备选项的问题，为方便统计，我们将介于“首选项”和“末选项”之间的所有其他选项都归为“中选项”。

表 5.20: 二选型问题的选择结果在选项间的分布 (单位: 次)

类别	被试	文本一			文本二		
		问题数	首选项	末选项	问题数	首选项	末选项
初学者	S1	16	8	8	11	3	8
	S2	8	4	4	14	2	12
	S3	10	0	10	11	3	8
	S4	11	1	10	5	1	4
	S5	8	2	6	8	0	8
	S6	17	6	11	4	1	3
半职业译者	S7	15	5	10	11	0	11
	S8	9	1	8	6	2	4
	S9	5	3	2	7	0	7
	S10	16	3	13	6	0	6
	S11	8	2	6	8	2	6
	S12	15	0	15	14	1	13
职业译者	S13	12	5	7	6	0	6
	S14	15	3	12	9	0	9
	S15	4	1	3	4	1	3
	S16	5	0	5	5	0	5
	S17	4	1	3	3	0	3
	S18	12	1	11	9	0	9

表 5.21: 多选型问题的选择结果在选项间的分布 (单位: 次)

类别	被试	文本一				文本二			
		问题数	首选项	中选项	末选项	问题数	首选项	中选项	末选项
初学者	S1	3	1	0	2	10	0	2	8
	S2	4	1	0	3	2	0	0	2
	S3	10	0	1	9	6	1	2	3
	S4	8	0	2	6	7	0	0	7
	S5	8	0	1	7	4	1	0	3
	S6	9	0	0	9	14	2	2	10
半职业译者	S7	12	2	3	7	9	0	0	9
	S8	4	0	0	4	4	0	0	4
	S9	1	0	0	1	2	0	0	2
	S10	4	0	0	4	6	0	0	6
	S11	5	0	2	3	6	1	0	5
	S12	0	0	0	0	2	0	0	2
职业译者	S13	16	1	0	15	5	0	0	5
	S14	7	0	0	7	7	0	0	7
	S15	8	0	0	8	10	1	0	9
	S16	1	0	0	1	1	0	0	1
	S17	1	0	0	1	2	0	0	2
	S18	9	0	2	7	3	0	0	3

表 5.22: 三类被试二选型问题的选择结果在选项间的分布比例 (单位: %)

被试	文本一		文本二		文本一&二	
	首选项	末选项	首选项	末选项	首选项	末选项
初学者	28.23	71.77	18.97	81.03	23.60	76.40
半职业译者	24.70	75.30	10.91	89.09	17.81	82.19
职业译者	20.00	80.00	4.17	95.83	12.08	87.92
平均值	24.31	75.69	11.35	88.65	17.83	82.17

表 5.23: 三类被试多选型问题的选择结果在选项间的分布比例 (单位: %)

被试	文本一			文本二			文本一&二		
	首选项	中选项	末选项	首选项	中选项	末选项	首选项	中选项	末选项
初学者	9.72	7.92	82.36	9.33	11.27	79.40	9.52	9.59	80.88
半职业译者	3.33	13.00	83.67	2.78	0	97.22	3.06	6.50	90.44
职业译者	1.04	3.70	95.25	1.67	0	98.33	1.35	1.85	96.79
平均值	4.70	8.21	87.09	4.59	3.76	91.65	4.64	5.98	89.37

根据上述数据, 我们从以下两方面来讨论选择结果的选项分布特征:

第一、选择结果在选项间的总体分布特征

末选项作为选择结果的机率高居榜首。其中, 二选型问题中选项结果为末选项的比例是 82.17%, 多选型问题中末选项的比例是 89.37%, 多选型问题中, 选择结果在选项间分布比例按照“首选项—中选项—末选项”依次递增。

1、可以看出, 统计结果不支持前文第一种假设, 被试解决问题时提出的不同备选项之间是有主次轻重之分的, 而非并列关系。

2、从末选项最易成为被试最终译文的数据事实来看, 选项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 也就是说, 在时间序列上越靠后的备选项越有可能是令译者满意的最终答案。依照选项之间这种递进关系, 可以进而推断: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解决问题的思维多以递进式为主, 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推陈出新, 逐渐深入, 不断成熟, 后产生的译文选项往往使译者忽略或者抛弃之前的选项, 因而最后提出的选项往往也就能一锤定音。这一现象在 TAPs 中屡见不鲜, 例如以下三个例子:

例 5.6 (S3/novice/V1)

(原文): Can a computer think? That depends on what you mean by “think”.

(TAPs) : That depends on what you mean by “think”, 那 - 取决 / 那决定于,
 △那 - 取 - 决 - 于 - ▲ / 那在于 / 那在于 / what you mean, (by “think”) /
 那在于△——你觉得 - , 思考是什么意思。▲

例 5.7 (S11/semi-professional/V1)

(原文) : One must remember that human beings also can only do what they are
 “programmed” to do.

(TAPs) : 一个人必须记住 / (不行) 嗯——但是我们也必须 - / One must
 remember / that / 可是 / △可是我们 - 也 - , 可是我们 - ▲ / 我们, 必须 / 可
 是我们也 / 可是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 / 我们必 - 须 - / 明白▲

例 5.8 (S14/professional/V2)

(原文) : I am grateful for China's leadership in hosting the six-party talks which
are bringing us closer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is issue.

(TAPs) : are bringing us closer to - / 带进? / (就是) 离什么(什么) 更
 近 / △这引导我们更加接近▲

3、虽然选项之间存在递进关系, 但从首选项作为选择结果的机率有时高于中选项的数据事实看来, 直觉优势也会对部分译者或部分文本的翻译过程产生一些影响, 其主要作用表现就是译者在面对多重选项举棋不定时, 往往也愿意相信直觉所提供的首选项。例如:

例 5.9 (S1/novice/V2)

(TAPs) : 我们, full members / of a world trading system, of a ~ / 世界 - 贸易
 易... ..框架! 哎(?), system of, 系统(?) / We are **full** members of a
 world trading... .. [3s] system... ..世界 - 交易系统, that rewards enterprise
 and lifts, 我们也是 - 成员, 我们也是 / W - T - / 不是 O 哎 / We are **full**

members of a world trading / 外 ~ / 世贸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系统？框架（！），‘框架’好过‘系统’。

被试 S1 在翻译“world trading system”是，首先想到的是世界贸易框架，之后提出“世界交易系统”和常用的表达方式“世贸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但最后还是决定用最初提出的“框架”，认为“框架好过系统”。实际上，这里就是被试的直觉优势在起作用，该心理优势让被试（尤其是缺乏实践经验和准确判断力的初学者，下文还会提到，初学者的思维递进程度较低）在面对多种选项难以作出抉择的时候，偏向自己最初想到的选项。

第二、三类被试选择结果的选项分布比较

无论是二选型问题还是多选型问题，首选项作为选择结果的机率大体上随着翻译能力的提高而递减，末选项作为选择结果的机率则大体上随着翻译能力的提高而递增。我们认为这一统计结果可以说明：

1、职业译者思维的递进程度最高。二选型问题，职业译者选择末选项的机率 and 选择首选项的机率之间的差别在三类译者中最大；多选型问题亦如此，职业译者选择末选项的机率占 96.79%，而首选项和中选项均不足 2%。因此可以推断，职业译者解决翻译问题时，通常逐个提出各选项并依次以后面的选项取代前面的选项，采取逐步淘汰的策略，思维逐步推进，有条不紊。且看以下两例：

例 5.10 (S15/professional/V1)

(原文) : In that sense,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

(TAPs) : 如果是这样的话 / 在这样的定义下，如果△思考 / 的定义 (为此) / 定义为此，如果这样定义思考，如果这样定义思考的话▲ /

例 5.11 (S14/professional/V2)

(原文) : I am grateful for China's leadership in hosting the six-party talks which are bringing us closer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is issue.

(TAPs) : bringing us closer to / 带进? [2s] / 离什么什么更近 / 这引导我们更加接近, 这 / [[读译文]] 我十分感谢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主导作用, 把我们, 不要‘这’吧, 把我们, 嗯——bringing us closer, 呃 - (按照中文肯定不能说把我们更加接近这个, 我们是说 -) / [[读译文]] 我十分感谢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主导作用, 使我们, 这个问题的和平, 呃 - / 和平解决更加接近, 更加接近, 使我们, 嗯 - 离 - 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更近了一步, 这样可能好一点 / △使我们离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更近了一步。▲

例 5.10 中, 职业译者 S15 在讨论 In that sense 的翻译时, 提出了 5 种潜在选项, 从“这样的话→这样的定义下→定义为此→这样定义思考→这样定义思考的话”, 各选项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递进关系。译者先用“这样的话”作框架, 进一步增加“定义”的意思, 并推演出定义的宾语“定义思考”, 最后总结出译文“这样定义思考的话”。说明译者是沿着一条线索逐步深入地进行翻译问题的解决。

例 5.11 中, 职业译者 S14 的思维步骤也是经历了“带进, 离什么什么更近→更加接近 →使我们……更近了一步→使我们离……更近了一步”等步骤, 逐步解决翻译问题。

2、初学者选择首选项、中选项和末选项的机率差别最小, 可见其思维的递进程度最低, 而且多数初学者在解决翻译问题时的解决步骤是将各选项先铺陈、后挑选, 因此, 各选项被选中的可能性都比较大。且看以下两例:

例 5.12 (S6/novice/V1)

(原文) : Even the simple computers of today can be geared for that.

(TAPs) : (*geared* 怎么翻译?) ◇ [[金山词霸]] (*g-e-a-r*) / 调整, 使适合, 换档…… [5s] provide with *gear*, equipped…… [6s] / come adjust to, 调整好, 以利于, get ready, gear up◆ / 呃 - 为什么事情作好准备, 使适应? 使适合? / 嗯…… [4s] / (就是) 今天, 甚至最简单的, simple, 最简

易的计算机，嗯，也能够 - 适应 / 或者是 适合 / 这种工作 / *be geared for that*，可以，可以 适应 这份工作，调整好，以利于，以利于，使适合，适应 吧。

例 5.13 (S5/novice/V2)

(原文): The elimination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s is essential to this outcome.

(TAPs): *elimination* 就是 排除 或者是 消除 / is essential to this outcome / 我们两国寻求一个稳定及和平的，朝鲜半岛，去除，嗯 - 反对 / *elimination* 就是 阻止 吧，除去，消除，△消除南朝鲜，北朝鲜，北朝鲜的核武计划，核武计划就是这个合作的良好结果。▲

例 5.12 中，初学者 S6 在翻译“can be geared for that”时，首先通过词典查阅“gear”的意思，提出“调整、使适合、调整好、以利于”等选项，既而考虑上下文语境，觉得“适应、适合”较好，再尝试“调整好、以利于”等选项，最后选择“适应”。从其的思维过程看出，被试在解决问题时首先把各个备选项排列开来，然后逐个检验，作出选择。

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例 5.13 的问题解决过程中，被试 S5 首先非常肯定地认为“*elimination* 就是排除或消除”，但中间又曾犹豫，并认为“去除，反对”更符合上下文表述，还尝试选择“阻止”，最后从最初想法“排除或消除”中选择“消除”作为译文。

3、半职业译者虽然在翻译能力上介于初学者和职业译者中间，但数据反映，其选项分布方面的整体趋势特征还是偏向初学者，可见半职业译者的思维特征与初学者比较相似。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结论与通过语境层级分析出的结论一致，即：半职业译者与职业译者在翻译行为特征上的差距大于其与初学者之间的差距。

第三节 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

PACTE (2003) 将翻译能力分为五种下属次能力：①双语次能力、②言外知识次能力、③工具使用次能力、④翻译知识次能力、⑤策略次能力，其中工具使用次能力是指译者对于相关专业的参考工具的了解和使用技能。在 PACTE 小组看来，善用翻译工具对成功的翻译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技巧，而应与双语水平、翻译策略等能力等量齐观。对于这一能力的研究，也应给予充分重视。

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工具的关注集中在词典查询的类型上，采用规定性的方法，提出词典查询时应该遵循的原则，分析初学者使用词典的种种误区等。这种规定性研究的结果虽然在翻译教学中得到运用，但效果不甚理想，学生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另外，规定性的原则通常是学者自身的经验总结，不能代表职业译者作为群体在使用翻译工具时的整体趋势。本节以英译汉 TAPs 数据为依据，采用描述性的方法对比分析不同类型译者在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上的差别与特征。

5.3.1 TAPs 翻译工具研究的回顾

表 5.24: 翻译工具的 TAPs 实证研究回顾

序号	作者	年份	论著语言	出处	研究的语言对	研究内容		被试性质/人数	被试国籍	备注
						宏观	微观			
1	H.P. Krings	1986b	德语	专著	德/法	批评/方法论/综述	单位/策略/翻译工具/时耗	语言专业学生/8	德国	双语互译
2	R. Jääskeläinen	1987	英语	硕士论文	英/芬兰语	—	策略/述要/翻译工具/时耗	职业译者/2, 初学者/2	芬兰	—
3	H.G.Hönig	1988a	德语	期刊	英/法	批评	述要/翻译工具	—	—	—
4	R. Jääskeläinen	1989a	英语	论文集	英/芬兰语	—	翻译工具	职业译者/2, 初学者/2	芬兰	—
5	R. Jääskeläinen	1989b	英语	论文集	英/芬兰语	—	教学/翻译工具	职业译者/2, 初学者/2	芬兰	—

6	F. G.Königs	1991	德语	论文集	德/西班牙语	—	策略/述要/翻译工具	翻译学生/4	德国	—
7	J.Fraser	1994	英语	论文集	英/法	—	述要/教学/翻译工具/自我形象	职业译者/21	英国	—
8	F.G. Königs & R. Kaufmann	1996	法语	期刊	法/德	—	策略/教学/翻译工具	语言专业学生/3	德国	—
9	T.Luukkainen	1996	英语	硕士论文	英/芬兰语	方法论	翻译工具/耗时	翻译学生/4	芬兰	—
10	J.Fraser	1996c	英语	论文集	英/法	—	自动化/翻译工具/自我形象/态度	职业译者/33	英国	双向翻译
11	I.Livbjerg & I.M.Mees	1999	英语	论文集	英/丹麦语	方法论/综述	翻译工具	—	—	—
12	J.House	2000	英语	论文集	—	—	教学/翻译工具	语言专业学生/10	—	协作翻译
13	J.Fraser	2000	英语	论文集	英/法	—	述要/翻译工具	职业译者/33	英国	—
14	J. Wakabayashi	2003	英语	论文集	英/日	综述	策略/教学/翻译工具/耗时	翻译学生	澳大利亚	—
15	I.Livbjerg & I.M. Mees	2003	英语	论文集	英/丹麦语	—	教学/翻译工具	翻译学生/10	丹麦	Trans-log

西方 TAPs 翻译实证研究中，论及翻译工具的论著共 15 篇（本）（见表 5.24），这些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1、查询词典的次数：Jääskeläinen（1987; 1989a; 1989b），Judy Wakabayashi（2003）等均指出，非职业译者查询词典的次数多于职业译者，他们过于依赖词典来代替大脑思考，很少根据语境推断词意，遇到翻译困难频频求助于词典。

2、运用翻译工具的特点：House（2000），Fraser（1994; 2000）等均指出：职业译者属于翻译工具的高风险运用者（high-risk-taker），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否有翻译工具的辅助，均表现得相当自信；非职业译者则属于翻译工具的低风险运用者（low-risk-taker），如果没有可信赖的翻译工具，会表现得非常不自信。

3、双语和单语词典的运用情况：Kring（1986b），Jääskeläinen（1987; 1989a; 1989b）等均指出，职业译者运用双语词典的频率低于非职业译者，单语词典的运用则相反。

4、词典的运用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影响：Tina Luukkainen（1996）的研究主要对比是否运用词典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影响，结论指出：查询词典减慢了高年级学生的翻译进程，但对总体策略影响不大，对翻译质量的影响也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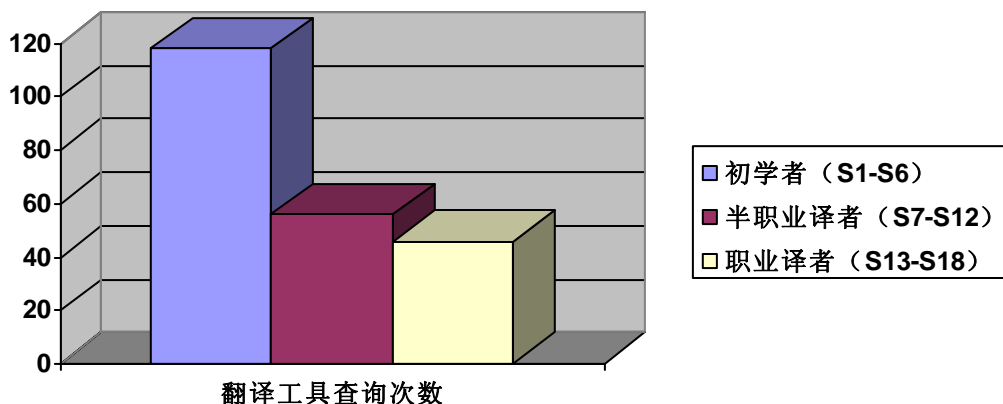
本节将根据研究数据集中探讨以下问题：①英译汉过程中翻译工具的运用情况与以上结论是否一致；②英译汉过程中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能否提供新的发现。

5.3.2 翻译工具的实验分析

本研究讨论的翻译工具主要指不同类型的词典，具体从查询次数、查询目的、查询手段、查询决策和查询满意度等5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被试的翻译工具运用与选择特征。

5.3.2.1 翻译工具的查询次数

图 5.4：两篇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工具的查询次数（单位：次）



三类被试的翻译工具查询次数由多至少为：初学者 > 半职业译者 > 职业译者，即：随着翻译职业水平的逐渐提高，翻译工具的运用次数递减。查询总次数与翻译职业水平的这种对应关系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Jääskeläinen 指出：“职业译者往往精通外语，并且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因此查阅词典的次数少于初学者”（Jääskeläinen 1989a:200）。Kovčáči 的研究也表明：“缺乏经验的译者明

显比经验丰富的译者更急于求助词典来解决问题，有经验的译者往往先从记忆中搜寻对等表述，或运用演绎推理来解决问题”（Kovčáči 1997:234）。

翻译工具查询次数随着翻译能力的提高而减少，的确与语言能力有关。我们的36个实验样本中，有两位被试（半职业译者S10、职业译者S17）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没有运用任何翻译工具。调查问卷和采访数据显示：这两位被试均为中国高校英语系讲师，S10执教写作课程，S17执教口笔译课程，两位被试在采访中均指出自己的词汇量相对较大，在理解原文和译文表达时较为自信，平时做翻译也很少用到词典等参考工具。

但语言能力只是其中一方面因素，查询次数还与翻译工具的运用效率有关。我们在统计中发现，初学者重复查询²¹的次数远大于半职业译者和职业译者。这一现象有以下原因：一方面，初学者频繁求助于翻译工具，但每次查询效率都很低，他们很少完整阅读词典义项，往往错过一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信息；职业译者虽然查询次数很少，但每次查询都能完整阅读相关释义，并常常能从冷僻义项中找到理想的问题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初学者过于依赖翻译工具，因此每次查询都匆忙进行（他们也不希望翻译时间拖延太久），加上初学者解决翻译问题时的短期记忆容量较小²²，在语码转换负荷较重的情况下，记忆效率降低，容易出现同一词汇反复查询的现象。

当然，除了以上原因，查询次数还跟译者对待翻译工具的态度有关，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

不可否认，勤于查询翻译工具是忠实原文、对译文负责的表现。Newmark曾指出：“任何有疑义的字都不要轻易放过。记住，你的脑中充斥着数以万计的字词与专有名词，其中有许多都是你从小就似懂非懂，但从来没有查证过的。所以该是查字典的时候了。专有名词和一般单字都要查”（Newmark 2005:33）。从翻译学习的角度来看，Newmark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没有把握的词汇或短语，译者不能以不求甚解的态度马虎对待。但是，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看，译者过于频繁

²¹ 重复查询是指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多次出现的同一词汇进行多次查询的现象。

²² 关于被试短期记忆的容量问题，参见本章第一节的论述。

地查询翻译工具，体现了对工具的过分依赖，这种依赖性将翻译中潜在的对等表达缩小在翻译工具提供的选项范围中，错过了特定语境下可能产生的更富创造性、更适切的翻译。同时，词典的查询行为往往会中断译者思维的连贯性，干扰其更好地运用翻译策略，尤其是整体翻译策略。

5.3.2.2 翻译工具的查询目的

“查询目的”是指被试使用翻译工具的意图和目标。传统以结果为导向的翻译研究不容易进行“查询目的”的探讨，因为被试查询行为的意图不会在译文中留下任何痕迹。TAPs 数据不但能够记录被试在任一时刻运用翻译工具的行为，还能通过思维过程的有声报告，提供被试查询目的的相关信息。

“查询目的”分“了解词义”、“求证词义”、“优化表述”和“寻求搭配”等四类，虽然不能包罗所有不同的查询目的，但大体涵盖了本研究出现的情况。下表是四项查询目的的说明和 TAPs 例证：

表 5.25: 翻译工具查询目的的说明和 TAPs 例证

查询目的	说明	TAPs 例证
了解词义	被试翻译时遇到生词或词组，完全不知晓具体意思，求助于翻译工具。	(S2/novice/V1) (TAPs): ◇ (symphony) 【金山词霸】查一下什么意思, s-y-m-p-h-o-n-y 交响乐, 交响曲, 交响乐, symphony, ◆ / symphony.....
求证词义	被试知晓某词或短语的大概意思,但不能确定,求证于翻译工具。	(S7/semi-professional/V2) (TAPs): terror 就把它翻译成恐怖势力吧? 查一下。【金山词霸】◇t-e-r-r-o-r [14s] ◆嗯, △我们共同反对恐怖行~ / 恐怖行动▲ / (反恐) /
优化表述	被试知晓某词或短语的意思,但还需要获取该词或短语自然地道的表达方式,求助于翻译工具。	(S8/semi-professional/V2) (TAPs): 我们都是世界贸易,世界贸易系统的成员,世界/世界贸易,没有系统……world trading system,容易理解为 WTO,所以要改一下,我看一下 system 这个词◇【金山词霸】[2s]◆ / ,世界贸易系统? 嗯,体系吧,我觉得体系比较好/体系的话我就用一分子,不用成员/成员好像是一个确定的组织。 (S14/professional/V1) (TAPs): judgment 翻译成评判? / 论断? / 嗯—先查一下词典看一下 judgment 还有没有别的翻译。◇【金山词霸】 judgment, judgment.....呃——意见,看法, ◆那么就可以翻译成—— / 这里竟然用到 conceive↓, conceive 一般都是说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不能仅仅只说,道德(的一个看法) / 道德——评判? 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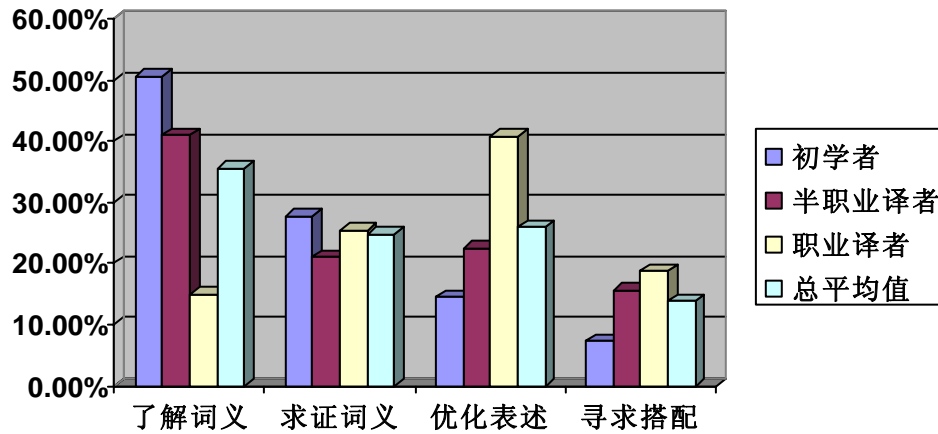
寻求搭配	被试知晓某词或短语的意思，但还需要获取该词或短语的用法和搭配，求助于翻译工具。	(S13/professional/V1) (TAPs): brilliant, 伟大的, brilliant / (brilliant) 换一个词, 换一个词, 因为前面已经有“伟大”和“杰出”了, 换一个近义词, brilliant, 查一下金山词霸 / ◇【金山词霸】~l-i-a-n-t, brilliant, 有才气的.....[2s]◆ / 才气, 才气形容人不能形容理论.....[2s]思考一个怎样的理论? / 科学理论 / 思考一个 / ◇brilliant, 辉煌的, 壮丽的, 超群的, 超群的, 卓越的, 看(一下)卓越的或者超群的科学理论。
------	---	--

关于查询目的统计结果见表 5.26 和图 5.5:

表 5.26: 翻译工具各类查询目的的比例 (单位: %)

被试类别	了解词义	求证词义	优化表述	寻求搭配
初学者	50.59	27.70	14.40	7.32
半职业译者	41.03	20.99	22.43	15.55
职业译者	15.00	25.42	40.83	18.75
总平均值	35.54	24.70	25.89	13.87

图 5.5: 翻译工具各类查询目的的比例



首先, 对比各类查询目的百分比: “了解词义” 百分比最高; “求证词义” 和 “优化表述” 的百分比相差不大, 同列第二位; “寻求搭配” 的百分比最少。

这一总体趋势体现了翻译工具的作用: 对大部分译者而言, 翻译工具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词义解释, 帮助译者了解具体词汇或短语的基本意思; 最次要的作用则是提供搭配上的帮助。

其次, 对比三类被试, 可以发现: ①随着翻译职业水平的提高, “了解词义” 的百分比减少, 且三类译者之间的差别比较显著; ②随着翻译职业水平的提

高，“优化表述”和“寻求搭配”的百分比增加，三类译者之间的差别也较为明显；③三类译者之间“求证词义”的百分比差别较小。

“了解词义”这一查询目的在三类被试间的显著差异，与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翻译习惯两方面因素相关：相比非职业译者，职业译者外语能力往往较高，词汇量较大，翻译时理解原语的能力较强，因此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陌生词汇或理解障碍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了解词义”的需要。另外，职业译者具备扎实的翻译基本功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翻译过程中表现得较为自信，在拿不准原文词汇意思时，倾向于根据语境来猜测其意义；而初学者面对原文中陌生词汇，首先想到的是求助翻译工具来“了解词义”，他们很难容忍词汇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必须确认其意思并找出译文，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翻译，因此常有根据词典条目拼凑的译文出现。

“优化表述”和“寻求搭配”这两类查询目的在不同类型的被试之间也体现了一定的差异，职业译者这两项查询目的（尤其是优化表述）的比例均高于其他译者，也高于自己“了解词义”的比例，这与职业译者对待翻译工具的态度是相关的。我们认为，职业译者并不把翻译工具看成是词汇表或术语库，而看成是能够提供多种语境的词汇参考书，他们运用词典一方面提炼原语语汇的意思，一方面为译语的对等表达提供灵感，并尽可能根据整个语篇和上下文语境体现语汇意思。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职业译者对翻译工具（尤其是词典）的类型非常在意。比如以下例子：

例 5.14 (S18/professional/V1)

(TAPs): programme, 程序怎么说, programmed, 动词, ◇《新世纪英语用法大词典》◆恰恰是这本辞典有缺点, programme 只有名词, 没有动词 / 回到“Longman”, ◇〔《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程序, 这是搭配关系 / programme, programme, / 看看怎么搭配, / 它这里有动词, set machine to play in a particular way, 调好机器, 计划 / 它这本辞典是常用辞典, 没有把电脑的一些术语放进去, / 所以还是看我自己来怎么说, 辞典不能解决。 / 就是编订的程序吧 / 人们常说, 电脑解题只是按照编定的程序进行的。

被试 S18 在这里两次查询翻译工具，并不是要了解词汇的基本意思，而是寻求该词的搭配。该例一方面说明 S18 对“寻求搭配”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 S18 在参考词典释义时非常慎重，不会随便接受词典提供的义项（下文讨论查询满意度时还会提及）。

5.3.2.3 翻译工具的查询手段

“查询手段”是指被试所借助的具体翻译工具。我们结合本研究具体情况，将查询手段分为电子双语词典、传统双语词典、传统单语词典、其他翻译工具等四类²³。四种查询手段的具体说明如下：

表 5.27：查询手段的说明

查询手段	说明
电子双语词典	主要指安装在电脑上的词典类软件，如“金山词霸”（2005 版）。
传统双语词典	包括双语双解词典和双语用法词典，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和《新世纪英语用法大词典》（第一版）。
传统单语词典	原语单语词典，如《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95 年版）。
其他翻译工具	主要包括互连网络、原文相关材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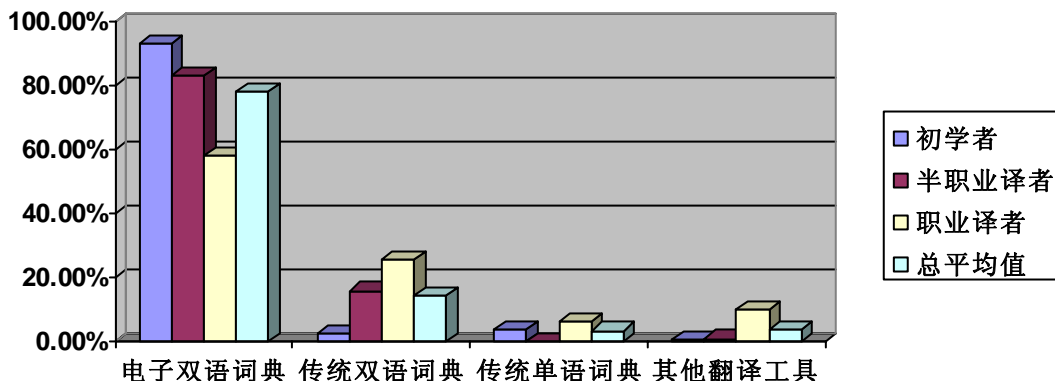
关于查询手段的统计结果见表 5.28 和图 5.6：

表 5.28：翻译工具各查询手段的比例（单位：%）

被试类别	电子双语词典	传统双语词典	传统单语词典	其他
初学者	92.97	2.39	3.88	0.76
半职业译者	83.24	15.93	0	0.83
职业译者	58.33	25.42	6.25	10.00
总平均值	78.18	14.58	3.38	3.86

²³由于本研究所有被试在翻译时均未使用电子单语词典，我们在分类统计时略去这一项。

图 5.6: 翻译工具各查询手段的比例



第一，对比各查询手段：电子双语词典使用机率最高，占总查询次数的 78.18%；其次为传统双语词典，占 14.58%；传统单语词典和其他翻译工具的使用比例比较接近，均不到 4%。

很多翻译教材指出，职业译者倾向于查单语词典，初学者倾向于查双语词典。比如周兆祥提出：“专业的译者都懂得重视单语词典。原来单双语词典各有优点和使用价值。初入行的译者，往往过分依赖双语词典，例如英译中时碰到不明白原文的地方，习惯了不加思索就查英汉词典，找到那个词的说明就照单全收，结果许多时候译出来的文字生硬又不符原文本义”（周兆祥 1997:48）。也有些译者规定性地建议：翻译培训时应当将学生的注意力从双语词典中转移出来，认识到双语词典提供的义项不是普遍适用的；翻译时应当使用原语单语词典等参考工具，因为这些工具比双语材料提供的描述更加准确完整。这种建议有点矫枉过正，如果学生的原语能力不强，查询原语单语材料时只会更困惑（Wakabayashi 2003:65）。

本实验结果表明，所有被试运用单语词典的机率都不高，不能体现职业译者为对单语词典的偏爱。我们认为查询手段与文章类型、翻译环境、个人习惯等因素都有关系。比如文学翻译中词汇的附加义、引申义、语境义较多，双语词典往往作用不大，而单语词典能提供词汇基本的描述性解释和用法提示，译者再结合原文语境，往往能得出理想的译文。科普文翻译时语言所指比较清楚，附加意义较少，译者要查询的通常是专业术语的对等表达，这种情况下，单语词典的帮助反而不大，而双语词典（尤其是专业方面的双语词典）更可胜任。翻译环境方面，我们可以结

合本研究具体情况：虽然实验中未限制时间，但多数被试还是希望按照主试提供的参考时间完成任务，保证一定的翻译效率，因此容易选择查询速度最快、使用最方便的电子双语词典。另外，被试的翻译习惯也会影响查询手段的选择。例如初学者 S1 习惯查传统单语词典，在寻求译语表述或搭配时也使用英英词典，结果并不理想，最后通过英汉双语词典来解决问题；职业译者 S18 比较注重字词搭配，因此多次运用双语用法词典。详见以下两例：

例 5.15 (S1/novice/V1)

(TAPs) : In *convinc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 呃 *convincing* - / c ~ 噢 **conceiving** / 是什么意思？查字典 / ◇ [[单语词典]] *conceive*, *conceive*.....
 [[读词典解释]] if you conceive something you can not imagine.....it's a particular thing you consider it to be that / ◆ **认为** / *conceive* / 或者 /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conceive* ~ ◇ if you conceive a play or idea you've think of it, you want to work out how it can be done. ◆ / 或者, a brilliant, △ 一个, a brilliant, 也是伟大的, 嗯——, 绝世的 ▲, scientific theory 科学理论 / 嗯, 我要查字典 [[笑]] / ◇ [[金山词霸]] (我要查看一下) *conceive*.....噢**构想!** ◆

例 5.16 (S18/professional/V1)

(TAPs) : Even the simple computers of today can be geared for that. 即使今天, **最简单的**电脑, 最——**最简单的**电脑好像不大好 / [3s] △ 即 - 使—— [8s] 今 - 天—— [8s] ▲ / 最—— / (简单的 / 简单) / **最简单的**电脑好像不大好 / 这个搭配 ~ / ◇ [[《新世纪英语用法大词典》]] *simple*, 呃——简单 / ◆**简易**的电脑会不会好一点 (?)

第二、对比三类被试，职业译者各查询手段使用比例之间差别最小，查询手段比较多样化；初学者各查询手段使用比例之间差别最大，呈现“一边倒”的现象，其中“电子双语词典”的使用次数占了所有查询手段的 93%。

职业译者查询手段的这种“多样性”特征与 Jääskeläinen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她指出：“职业译者往往同时运用多种参考资料，表现出适当的怀疑，尤其是对双语词典的怀疑”（Jääskeläinen 1989a:175-200）。我们认为：职业译者运用工具的“多样性特征”跟职业译者查询目的的多样性是相关的，比如职业译者出于“寻求搭配”、“寻求表述”等目的，更多地运用双语用法词典、互连网络及参考材料等翻译工具；更关键的是，职业译者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发现翻译问题，大到文体的语篇问题，小到措词抉择问题，并善于运用不同类型的翻译工具。这种能力难能可贵，有赖于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

5.3.2.4 翻译工具的查询决策

“查询决策”是被试根据翻译工具所提供的释义和备选项，对翻译问题进行的决策，包括“选用现成义项”、“调整义项表达”和“搁置问题”三类。选用现成义项是指被试从翻译工具中选择合适的选项直接运用在译文中，具体细分为“直接应用”和“间接选用”两种。调整义项表达是指被试对翻译工具提供的释义在保持基本意思的前提下作适当变动，以适合译文表达的需要，具体细分为“措词变换”和“释义扩展”。搁置问题是指被试查询翻译工具后仍未找到理想的译文表达，从而决定暂时搁置该问题。查询决策的说明和 TAPs 例证见表 5.29。

表 5.29: 翻译工具查询决策的说明和 TAPs 例证

查询决策		说明	TAPs 例证
选用现成义项	直接应用	被试将翻译工具提供的义项直接应用于译文。	(S7/semi-professional/V2) (TAPs): Korean Peni~ / (这应该是个政治术语吧) / 查一下 [[金山词霸]] Pen~, 韩国的一个什么。。。是不是.....◇p-e-n-n-s-u-l-a [9s] ◆朝鲜半岛。
	间接选用	被试从翻译工具提供的多个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应用于译文。	(S14/professional/V1) (TAPs): 嗯 program, ◇ [[金山词霸]] program, program, 节目? 不对 / [3s] / 节目单[6s]..... 程序? 指令? ◆..... [8s].....Our “program”, 我们的..... / (程序 / 指令) / 我们的程序↓。
调整义项表达	措词变换	被试根据行文需要, 对翻译工具提供的义项进行措词变换后用于译文。	(S16/professional/V1) (TAPs): brilliant, brilliant / (怎么~) 是明智的还是高超的还是什么呢? 查一下。◇ [[金山词霸]] 嗯——金山词霸上讲是灿烂的、闪耀的、有才气的, (都不好) ◆ / 构思一个 / 构思一个一 / 暂时用“光辉的”吧, △光辉的一科学理论 /

	释义 扩展	被试根据行文需要，对翻译工具提供的义项进行意思的派生和结构的扩展，然后用于译文。	(S6/novice/V2) (TAPs): reward/ 查一下。◇【金山词霸】酬劳，为相应的东西取得酬劳◆ / 满意的酬劳/ 这句话的意思是取得满意的酬劳/ 在其中致力于使商业机构得到满意的酬劳，满意的酬劳。
搁置 问题	—	被试通过查询翻译工具，仍未有较好的解决方案，暂时搁置该翻译问题	(S12/semi-professional/V1) (TAPs): brilliant, 就是——brilliant / 呃——brilliant 就是——, 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科学理论呢, 就是——, 嗯, 再查一下词典。◇【金山词霸】嗯? 杰出的↑, 卓越的↑ / 【咳嗽】.....[10s] 一般形容, 形容这种, 设想, 应该用一个..... (不能用杰出的、卓越的)brilliant 就是, 嗯——.....[6s]这个 brilliant / △设想一个——什么什么的, 科—学—理—论▲ / 一个——[4s], 一个理论知识很..... (一个理论知识很什么呢?) 嗯.....[5s]不知道。

关于查询决策的统计结果见表 5.30。

表 5.30: 翻译工具各查询决策的使用频率 (单位: %)

被试类别	选用现成义项		调整义项表达		搁置问题
	间接选用	直接应用	措词变换	释义扩展	
初学者	31.96	29.30	16.40	20.55	2.83
半职业译者	45.54	19.24	23.50	11.72	0.83
职业译者	38.99	4.58	25.89	27.20	7.78
总平均值	38.83	17.71	21.93	19.83	3.81
	56.54		41.76		3.81

第一、三类查询决策中，“选用现成义项”的使用频率最高，为 56.54%；“搁置问题”的频率最少，只占 3.81%。

“选用现成义项”的使用频率为 56.54%，也就是说，尚有 43.46% 的查询问题不能直接选用翻译工具提供的义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翻译工具的局限性。以词典为例，即使是最详尽的词典，释义也不可能完备无遗。词典只是提供词汇最基本的释义，而一个词在语境中的具体意义，还需要使用者去引申和衍化。因此在翻译时，译者不可能机械照搬词典义项，很多情况下，根据词典提供的线索，结合语境、语体等因素，灵活处理。

在“选用现成义项”与“调整义项表达”的四种具体决策行为中，“间接选用”百分比最高，“直接应用”百分比最低。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被试选择翻译工具提供的多种选项时，都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挑选和决策。

第二、职业译者“调整义项表达”的使用频率较高，约占 53%，高出初学者和半职业译者近 20%；初学者和半职业译者之间则相差不大。

职业译者运用翻译工具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搭配”和“优化表述”，从这两种目的出发的翻译问题难度往往较大，因其难点不是体现在识解上，而是主要体现在表述上。翻译工具对这类问题的帮助比较局限，以英汉翻译实践为例，英汉词典为一个英语词的某种用法作释义时，一般只提供两到三个汉语词对等词，这些对应词主要是起“释义”或“提示”的作用，很多情况下不能直接用到译文中去。面对这些问题，职业译者的翻译决策以“调整义项表达”为主是非常明智的，必须按照原文的内容和译文的表达习惯来变换词典义项的措词，灵活而确切地把原语的意思用地道的译语传达出来，做到求助于词典但不拘泥于词典。

第三、“直接应用”决策的频率在三类被试之间体现了显著差异，随翻译能力的提高而明显降低。职业译者“直接应用”决策的频率是其所有查询决策中最低的，不到 5%；而初学者运用该决策的频率相当高，接近 30%。

前文分析过，初学者以“了解词义”和“求证词义”为目的的查询行为较多（约占其查询行为的 3/4），这类查询行为往往是要解决一些基本的识解难点问题，因此翻译工具提供的义项大多可以直接应用到译文中。但是即便如此，由于初学者“直接应用”决策的频率高达 30%，还是凸显出他们在查询决策方面存在的弱点：有些初学者在查到一个单词后，没有耐心看完所有义项，随意从中提取一个义项用于译文，缺乏慎重选择的过程；并且，部分初学者对需要进行变通的义项也采取了“直接应用”的策略。相比之下，职业译者一方面仅仅为了“了解词义”的查询行为很少，所面对的翻译问题往往不是直接选择词典释义就能解决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识解难点问题，他们也会采用“间接选用”策略，以确保准确性。

第四、初学者“释义扩展”的使用频率虽然低于职业译者，但高出半职业译者近 10%。TAPs 文本分析表明，部分初学者喜欢想当然地对义项和解释进行释义扩展，甚至在查询方式有误的情况下，仍继续扩展释义，进行牵强附会的翻译。比如以下两例：

例 5.17 (S5/novice/V1)

(TAPs): 呃 in terms of creativity, in terms 是包括还是不包括? ◇ [[金山词霸]] in terms, 噢, 就是在相关的讨论里 ◆ / 诠释……诠释相关……的思想, 为……▲……[3s]……

(参考译文): 用创造力来界定“思考”的意义。

例 5.18 (S6/novice/V2)

(TAPs): reward/ 查一下。◇ [[金山词霸]] 酬劳, 为相应的东西取得酬劳 ◆ / 满意的酬劳/ 这句话的意思是取得满意的酬劳/ 在其中致力于使商业机构得到满意的酬劳, 满意的酬劳。

(参考译文): 这个体系旨在使企业赢利从而增加各国的收益。

初学者 S5 首先对短语“in terms of”的理解有误, 既而查阅时短语切分错误, 查到的是 in terms”即“在谈判/协商中”; 由于该解释无法契合原文语境, 于是被试对词典义项进行了自认为合理的释义扩展和引申, 提出“就是在相关的讨论里, ……诠释相关的思想为……”。S6 在翻译“rewards enterprise”这个短语时, 查到名词“reward”的常用义项之一“酬劳, 为相应的东西取得酬劳”。考虑到原文中“rewards”是动词, 于是被试对自己从词典中得来的义项进行释义扩展, 构造出“使……得到满意的酬劳”这样的句子。

初学者上述两例释义扩展策略的运用, 结果显然很不理想。进行释义扩展, 首先要基于一个准确的词典义项, 然后根据译文语境的需要对释义作一定的扩展或引申, 使译文在意思和结构上都比较完整通顺。上面举的例子中, S5 查到的义项本身就是错误的, 以此为基础的释义扩展更是离题千里; S6 没有选取最准确的释义, 如“盈利, 使……获利”, 因此扩展后的译文也不理想。

可见, “释义扩展”策略不可草率运用, 在遇到选项与原文意思不能契合时, 译者应当首先考虑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及结构把握是否准确, 切不可将错就错, 在错误义项上进行错误的引申和推衍, 以致谬以千里。

5.3.2.5 翻译工具的查询满意度

我们在统计过程中，依据被试自己在 TAPs 实验中的报告内容和相关表现，将被试对翻译工具提供的解释或选项的态度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所谓“满意”，指的是被试接受了翻译工具所提供的释义或备选项，最终应用于译文当中，如例 5.19；所谓“不满意”，指的是被试对翻译工具所提供的释义或备选项不大满意，从而考虑用其他方式获得译文，或者暂时将该翻译问题搁置，如例 5.20。被试的“查询满意度”即为“满意”占问题总数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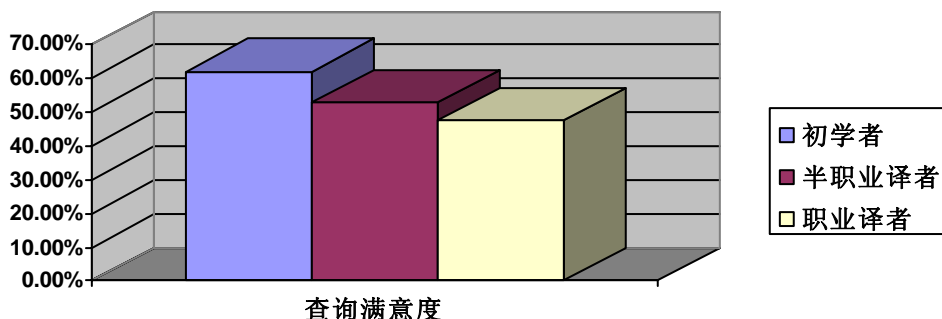
例 5.19 (S8/semi-professional/V1)

(TAPs): conceive, 或者, 嗯——叙述? 这好像不对呀 / 我查 conceive! ◇
 [[金山词霸] ◆ 构思, 哎↓—— [[表示满意] △ 或者, 构思, 一个, 绝妙 -
 的 - 科学 - 理 - 论。 ▲

例 5.20 (S16/professional/V1)

(TAPs): brilliant, brilliant / (怎么~) 是明智的还是高超的还是什么呢?
 查一下。◇ [[金山词霸] 嗯——金山词霸上讲是灿烂的、闪耀的、有才气的,
 (都不好) ◆ / 构思一个 / 构思一个 - / 暂时用“光辉的”吧, △ 光辉的 - 科
 学理论 /

图 5.7: 三类被试对于翻译工具的“查询满意度”统计



统计显示，翻译工具的查询满意度随职业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首先，“了解词义”在初学者的各查询目的中占了 50%左右，这在三类被试中是最高的。由于往往从翻译工具中获得答案就可以达到了解词义的目的，因而查询决策通常也采用“选用现成义项”，也就是说，初学者有很大一部分翻译问题是能够从翻译工具中直接获得帮助的，因此对翻译工具的满意度自然比较高。“了解词义”在职业译者的各查询目的中仅占 15%，是三类被试中最低的，而“优化表述”、“寻求搭配”等所占比例则是最高的。以“优化表述”或“寻求搭配”为查询目的而解决的翻译问题往往是词汇上的一些表述难点问题，即译者虽然了解原语意义，但译语中很难形成贴切的表达，于是尝试从翻译工具中寻求提示。翻译工具对这类翻译问题的帮助很小，很多情况下需要译者结合语境等因素，对翻译工具提供的义项进行修改或调整，才能运用到译文中。因此，职业译者对翻译工具的查询满意度是三类译者中最低的。

其次，职业译者对译文表述的要求较高，不会轻易采纳翻译工具提供的备选项。因为翻译有点象是在连续不断的挣扎徘徊中，寻找适当的字词搭配（Newmark 2005:298）。翻译中的一些搭配和表达往往需要反复斟酌，面对这些难点问题，就得花时间以研究的态度去解决，尤其在职业译者看来，太容易满足于词典提供的选项和解释，不容易得出理想的译文。这就是职业译者对工具查询的满意度最低但译文评估成绩反而最好²⁴的原因。

5.3.3 翻译工具帮助解决的问题

本节研究的翻译工具主要指各种不同种类的词典。由于这些翻译工具对译者翻译过程的帮助主要体现在词语的问题上，下文简单讨论三种不同类型的词语问题：

第一、识解难点问题

识解难点问题主要来自一些对被试而言较为生僻的词语（如专业术语等）。比如文本一的“fertilized ovum”，对很多被试来说，都不属于常用词语，因此查

²⁴ 关于三类被试译文评估成绩的比较，参见第四章第二节。

询率很高（18 位被试中有 12 位进行了词典查询，其中初学者对该词语的查询率为 100%）。表 5.31 列举了实验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识解难点词语。

表 5.31: 针对识解难点词语的翻译工具查询次数、目的、决策和满意度（单位：次）

词汇	查询次数	了解词义	求证词义	寻求搭配	优化表述	选用现成义项	调整义项表达	搁置问题	满意	不满意
ethical	5	2	2	1	0	4	1	0	4	1
fertilized ovum	12	11	0	0	1	11	0	1	9	3
commerce	5	2	2	0	1	4	1	0	4	1
Peninsula	5	5	0	0	0	5	0	0	5	0

一般情况下，识解难点问题不难解决，这些词语意义比较单一，引申含义较少，翻译工具提供的选项往往可以直接用于译文中。因此，译者在遇到这类问题时的查询目的以了解词义为主，查阅手段以电子双语词典为主，通常能选用翻译工具所提供的现成义项，查询满意度非常高，甚至个别词语达到 100%（比如“Peninsula”）。

第二、表述难点问题

表述难点问题主要来自一些常见但用法灵活、义项较多的词语。本研究的两篇文本中最典型的表述难点问题是“program”的翻译。这是一个常用词，但在文本一中前前后后出现的 5 次都各有其义：3 次用作动词，2 次用作名词；1 次用于描写电脑，4 次用于描写人类。原文作者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使得该词在具体语境中的译文表述较为困难。由于翻译工具无法提供直接可用的选项，被试只能结合上下文不断进行表述调整，如在不同语境中译成“输入……程序”、“按照‘程序’办事”、“给我们编好了‘程序’”等。表 5.32 列举了实验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表述难点词语。

表 5.32: 针对表述难点词语的翻译工具查询次数、目的、决策和满意度（单位：次）

词汇	查询次数	了解词义	求证词义	寻求搭配	优化表述	选用现成义项	调整义项表达	搁置问题	满意	不满意
judgment	6	2	1	2	1	2	4	0	3	3
program	14	0	0	5	9	4	10	0	3	11
lift	8	1	1	2	4	2	6	0	0	8
full	5	1	0	1	3	3	1	1	3	2

被试解决表述难点问题，查询目的以寻求搭配、优化表述为主；常常用到多种查询手段；决策主要以调整义项表达为主；因为翻译工具提供的基本解释往往不能直接运用到译文中，被试对于查询的满意程度通常不会太高，个别词汇的查询满意度甚至为零。

第三、识解兼表述难点问题

这类问题兼具识解和表述双重难点，解决起来有较大难度。比如下列词语：

表 5.33：针对识解兼表述难点词语的翻译工具查询次数、目的、决策和满意度（单位：次）

词汇	查询次数	了解词义	求证词义	寻求搭配	优化表述	选用现成义项	调整义项表达	搁置问题	满意	不满意
gear	10	3	5	0	2	0	10	0	2	8
enterprise	7	3	3	0	1	3	3	1	5	2
straightforward	9	4	3	2	0	6	3	0	4	5
candid	7	6	0	0	1	0	7	0	2	5
ruthless	9	6	3	0	0	4	5	0	4	5
reward	4	2	1	0	1	3	1	0	2	2

这类问题体现的难点有三类：①词汇所指繁多，需要结合语境和语旨，选择词典解释中最贴切的表述，比如“straightforward”；②词组意义较难理解，比如“rewards enterprise”是很多被试的翻译难点之一，构成这个动宾词组的单词均为常用词，但整个词组用在特定语境中，意义较难理解，也因此很难找到贴切的表述；③翻译工具所提供的解释不能直接用于译文，需要进行表述上的调整，比如“gear”，无论是名词义项“齿轮，传动装置”，还是动词义项“调整，（使）适合，换挡”等，均不能直接拿来翻译“can be geared for that”，而是需要在领会其基本意义的同时，结合语境灵活表述，译成“也能胜任这一工作”，“也能做到这样”等。在查询目的方面，很自然地，解决识解兼表述难点的问题通常是以了解词义或求证词义为主要目的，因为被试查阅翻译工具的最初动因是完全不懂或不能准确把握某词语的意思；在查询策略的运用上，“选用现成义项”的使用频率往往不及“调整义项表述”，并且三类译者会运用各自不同的策略来解决问题，译文质量也相差较大。

5.3.4 本节研究成果在教学和实践中的意义

传统关于翻译工具的研究，大多基于学者个人的教学或实践经验，规定性地提出一些建议，其中有些建议是有助于初学者提高翻译技能的，有些建议却因脱离具体情境而不能普遍适用于实践。本节基于 TAPs 数据，第一次采用描述性的方法，对比分析了三类译者翻译工具的使用次数、查询目的、查询手段、查询决策和查询满意度等方面的差别，总结出译者选择与运用翻译工具的一些特征：①查询次数随着翻译能力的提高而减少；②译者的职业水平越高，查询目的越少为“了解词义”，越多为“优化表述”和“寻求搭配”；③职业译者查询手段较多，体现出工具运用的“多样性”特征；④职业译者的查询决策很少为“选用现成义项”，较多为“调整义项表达”，表明职业译者是以研究的态度运用翻译工具；⑤翻译工具的查询满意度随职业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基于上述特征，我们对翻译教学和实践提出几点建议：

1、初学者不能过分依赖翻译工具，在难以准确把握原语词汇意义时，不要急于求助翻译工具，尝试借助语境、语法和词法等知识对词义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往往能解决部分翻译问题；其次，查询翻译工具时，认真删选各种义项，避免错过最合适的表达，并减少重复查询行为。

2、初学者可以进行概述原文或书写原文摘要的训练，丢弃“只有明白全部意思，才能进行翻译”的观念，逐步提高翻译的自信心。职业译者往往就是凭借他们高度的自信，容忍翻译中出现的个别模糊意义，从而使翻译过程得以顺畅进行，足以见得，把握原文整体含义对译者来说极其重要。

3、初学者需要尝试多种查询手段，因为每种翻译工具都有优点和缺点，根据问题特征选择最恰当的翻译工具才是提高翻译效率的关键。

4、初学者应当学会以研究的态度进行查询决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选用现成义项”，什么时候需要“调整义项表达”，调整幅度应该多大。翻译工具不是万能的，其提供的备选项常常需要进行调整才能用于具体语篇，但是调整的时候也要掌握分寸，不能跳脱原语的基本义项。

第六章 翻译过程策略模式

第五章基于定量统计结果讨论了英译汉过程中翻译单位的选择、决策过程的选择和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本章将通过对不同译者在解决翻译问题时选择的翻译策略元素和策略结构的比较和定性分析,结合 TAPs 数据和译文评估数据的定量验证,尝试构建翻译过程的策略模式。

第一节 翻译策略模式的构成

根据 Lörcher 的看法,翻译策略由一些解决问题的最小步骤组成,这些最小步骤称为翻译策略元素,策略元素按照特定方式排列构成策略结构,而翻译策略则是一个或多个翻译策略结构的集合体(Lörcher 1991a:107)。Lörcher 在这里所谓的翻译策略是宏观的概念,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整体策略,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策略模式。

什么是模式(pattern/model)?通常认为,模式指的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即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就形成了模式。但实际上,要给模式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目前还是颇有争议的。这一方面因为模式可以有不同的种类,范围可以从图像模式到概念或理论模式,另一方面是当前理论家或对于模式的分类很少有一致的意见(Baker 2000:154)。《译学词典》对模式给出的定义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即事物、实践活动或动作的定型样式(方梦之 2004:255)。在这个定义中,模式是一种指导,它有助于任务的完成,有助于提出最优化的设计方案,有助于获得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

具体到翻译研究领域,翻译模式(models of translation)大体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考察:①将理论模式作为翻译研究中的探索工具;②运用图解模式或类比模

式来表现翻译的某些方面；③将翻译过程看成是一种模式化的行为；④考察模式和准则（norm）之间的关系（Baker 2000:154-155）。《译学辞典》指出翻译模式（models of translation）是全部翻译理论体系赖以形成的基本思想的高度集约化和条理化，是微观研究的综合结果。翻译理论基本模式通常被视为某种理论体系的构架核心。人们可以通过基本理论模式来检验、推导或论证整个翻译理论体系的合理性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基本理论思想之是否始终一贯（方梦之 2004:56-57）。翻译理论家提出了不少关于翻译过程的模式，如 Nida 基于转换生成理论提出的转换模式（transformational model）；Catford 根据系统语法提出的语言综合情境模式（situational model）；Gutt 结合关联理论提出的关联翻译模式（relevance model）等。这些翻译过程模式虽然能概括动态翻译过程的某些方面，但又都不完全。因为翻译过程并不是按照单一的模式进行的。

我们所要讨论的翻译过程策略模式，首先应该是策略元素和策略结构的集合体；其次还包括策略元素之间，策略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尝试通过不同译者在解决翻译问题时不同策略元素与策略结构的对比分析，归纳出其中的最优策略结构和各种策略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翻译过程的策略模式。该模式也可以作为一种指导，帮助非职业译者更加有效地执行翻译任务。

6.1.1 翻译策略元素

德国语言学家 Færch 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主要是内省法）研究二语习得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在《界定交际策略的两种方式》（“Two ways of defin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Færch 1984）中提出了口语表达时潜在的策略标记。尽管这些标记并非针对翻译过程，但被不少 TAPs 翻译研究者所接受，因为 TAPs 本身记录的就是译者在翻译时用口语表述的思维信息。

表 6.1: Færch 关于口语表达的潜在策略标记 (Færch 1984:60) (中文内容笔者译)

Temporal Variables (时间变量)	Implicit strategy markers (内隐策略标记)
—Rate of articulation (语速)	
—Pauses (停顿)	
—Repetitions (重复)	
—Self-repairs (自我修正)	
—Slips (口误)	
—Handicap signals (障碍信号)	

Færch 提出的潜在策略标记非常笼统, 继他之后, Krings 较为具体地提出了翻译策略元素的 11 种标记, 见表 6.2。

表 6.2: Krings 关于翻译策略的标记 (Krings 1986: 267) (中文内容笔者译)

No.	Strategy Indicator	策略标记
1	The subjects' explicit statement of problems	被试对问题有明确陈述
2	The use of reference books	运用参考书
3	The underlining of source-language text passages	在源语文本段落下划线
4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source-language text items	对源语文本对象作语义分析
5	Hesitation phenomena in the search for potential equivalents	寻找等值选项时的犹豫现象
6	Competing potential equivalents	比较各种潜在的等值选项
7	The monitoring of potential equivalents	监控各种潜在的等值选项
8	Specific translation principles	特定的翻译原则
9	The modification of written target-language texts	修改或润色已写出的译文
10	The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chosen translation	评估译文质量
11	Paralinguistic or non-linguistic features (groaning or sighing)	副语言或非语言特征 (如低吟或叹息)

Lörscher 在其代表作《翻译的行为、过程与策略》(Lörscher 1991a) 中提出了组成翻译策略的 25 种基本策略元素。

表 6.3: Lörscher 的翻译策略元素 (Lörscher 1991a:96-107) (中文内容笔者译)



No.	Element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翻译策略元素
1	RP: <u>R</u> Realizing a Translation <u>P</u> roblem	发现翻译问题
2	VP: <u>V</u> Verbalizing a Translation <u>P</u> roblem	陈述翻译问题
3	→SP: <u>S</u> Search for a (possibly preliminary) <u>S</u>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 <u>P</u> roblem	寻找初始解决方案

4	PSP: <u>P</u> reliminary <u>S</u> olution to a <u>T</u> ranslation <u>P</u> roblem	初始解决方案
5	SPa,b,c: <u>P</u> arts of a <u>S</u> olution to a <u>T</u> ranslation <u>P</u> roblem	部分初始解决方案
6	SP: <u>S</u> olution to a <u>T</u> ranslation <u>P</u> roblem	解决方案
7	SP \emptyset : A <u>S</u> olution to a <u>T</u> ranslation <u>P</u> roblem is still to be found (\emptyset)	尚无解决方案
8	SP= \emptyset : <u>N</u> egative (\emptyset) <u>S</u> olution to a <u>T</u> ranslation <u>P</u> roblem	消极解决方案
9	PSL: <u>P</u> roblem in the <u>R</u> eception of <u>SL</u> Text	原文理解上的问题
10	MSL/MTL: <u>M</u> onitoring of <u>SL</u> or <u>TL</u> Text Segments	监控原语或译语片断
11	REPHR. SL: <u>R</u> e <u>p</u> hrasing of <u>SL</u> Text Segments	改述原文片断
12	REPHR. TL: <u>R</u> e <u>p</u> hrasing of <u>TL</u> Text Segments	改述译文片断
13	CHECK SL/TL	检查原文与译文是否对等
14	CHECK TL/TL	在初步方案之间作选择
15	CHECK BSL/SL	回译检验
16	CHECK CT	检验译文是否符合语境
17	CHECK ANALOG	考察近义表达
18	OSL: <u>M</u> ental <u>O</u> rganization of <u>SL</u> Text Segment	原文片断的思维组织
19	OTL: <u>M</u> ental <u>O</u> rganization of <u>TL</u> Text Segment	译文片断的思维组织
20	REC: <u>R</u> eception of <u>SL</u> Text Segments	读取原文片断
21	[TS]com: <u>C</u> omment on a <u>T</u> ext <u>S</u> egment	评论文本片断
22	Trans: <u>T</u> ransposition	调整词语或语序
23	T: <u>T</u> ranslation	直接翻译
24	→T2, 3,..n: <u>C</u> onceiving a <u>S</u> econd, <u>T</u> hird, etc. <u>T</u> ranslation <u>V</u> ersion	思考第二、第三种译文
25	ORG: <u>O</u> rganization of <u>T</u> ranslational <u>D</u> iscourse	组织译文语篇

在 Krings 和 Lörcher 等人之后, Kiraly (1995) 也提出一套系统的策略元素, 运用了 20 个图标并备有注解。在此基础上, Kiraly 画出了不同译者的 TAPs 数据图 (Protocol Diagrams)。相比 Lörcher (1991a) 的翻译策略流程图, Kiraly 的数据图不但直观易懂, 还能清楚反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策略元素之间的排列组合, 体现译者逐步运用策略元素进行问题解决的过程。

本文的翻译策略元素主要参照 Kiraly (1995) 的设计, 选择了 20 个图标中的 15 个, 又结合英译汉 TAPs 数据中体现的具体策略元素, 另增 10 个图标并附加注解。本研究采用的翻译策略元素的标记与注解如下:

表 6.4: 本研究采用的翻译策略元素标记及注解

翻译策略元素标记	策略注解 (英语)	策略注解 (汉语)
A,B,C,...	Non-problem sequence	非问题序列
1,2,3,...	Problem sequence	问题序列
	Read a ST segment	阅读原文片断
	Identify a translation problem	发现/识别翻译问题

	Intuitional solution	直觉方案
	Interim solution	临时方案
	Judgment on interim solution	考量临时方案
	L1-L2 dictionary search	L1-L2 词典查询
	Monolingual dictionary search	单语词典查询
	Proposed dictionary solution	词典提供的方案
	Unsuccessful dictionary search	词典查询失败
	Attempt syntactic reconstruction	尝试句法重构
	Rephrase ST segment	改述原文片断
	Refer to the above context	参照上文语境
	Refer to the following context	参照下文语境
	Refer to collocation	考量字词搭配
	Refer to extra-linguistics context	参考超语言语境
	Refer to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参照翻译原则与理论
	Monitor for TL accuracy	检测译语准确性
	Refer to translation expectation structure	参照译文期望结构
	Uncertainty regarding acceptability	怀疑方案可接受性
	Comment/analyze on a ST segment	评论/分析原文片断
	Revise the above translation	修改前面译文
	Repeat the above translation	复述前面译文
	Consideration lasting over 5 seconds	长时间思考（10 秒以上）
	Break off translation and restart	搁置某问题并考虑新问题
	Accept intuitional/interim solution	采纳直觉/临时方案

表 6.5 对职业译者被试 S18 在翻译文本一第三段时的 TAPs 数据作了简要分析与说明:

表 6.5: 被试 S18 (Professional) 文本一第三段翻译过程的 TAPs 数据及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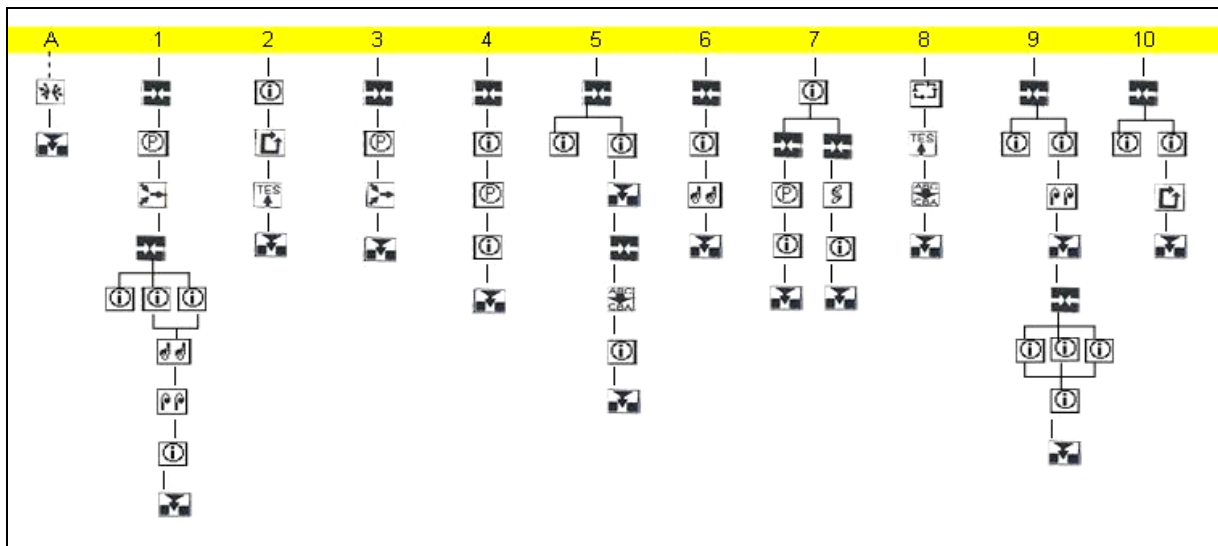
序列	原文	被试 TAPs	说明
A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还是我这个，这个，我们的程序，△我们，我们……这个都是加引号的，程……▲如此的复杂， enormously complex。	被试接受直觉提供的译文。

1	though,	<p>这个“但是”放到前面去，（这个后面就不象汉语了）。然而，不过，还是然而好……还是但是？↑ / 然而。△[2s] 然而我们的程序▲[3s]如此的，复杂，极为，如此地极为复杂，但是我们的程序复杂—之极！复杂之极，△复杂—之一极，[2s]▲ 但是我们的程序复杂性 / 之极。[2s]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 in terms ~ /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我们的程序复杂之极，以……然而我们的程序复杂之极 / [2s]。</p>	<p>被试发现翻译问题。先根据汉语习惯表达，调整“though”的译文的句法位置。接着考虑应该如何译出“though”的语义，提出三个临时方案，结合上下文语境，选出备选临时方案。</p>
2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p>以至于，以至于我们……[5s] …… we define, we might like to, 我们，我们 / 以至于总喜欢— / △我们总喜欢 / [3s] 喜欢[4s]▲ / 以至于我们总喜欢 / [3s] / △用，用创造性来界定思维这个词，▲（加个词）创造 / 用，用创造性，（这个没有引号噢）。创造性 / 以至于我们总喜欢用创造性来 / △界一定，来界定……▲ 界定？（Yeah, ok）。以至于我们总喜欢用创造性来界定，“thinking”，还是有引号的 / △思维， / 还是加一个“这个词”吧，尽管重复一点。</p>	<p>针对“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被试提出一个临时译文方案，然后参考译文期望结构（加引号的特殊含义）对该方案进行评判，又结合译语表述的需要，在译文中增加‘这个词’。</p>
3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p>但是 / （……个词）▲ 还是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句子，一个 / 后面太长了，状语这么长，状语是从句 / 分成两个句子 / 然而我们的程序复杂之极，以至于我们总喜欢用创造性来界定思维 / 这个词。</p>	<p>被试遇到拆分句子的问题。因为原语单句太长，状语成分太多，被试主张对原文进行句法重构，即将原文的一个句子在译文中拆为两个。</p>
4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p>[4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 [2s] / 创造性 / 这个创造性（会）常常出现在 / 重复一遍吧 / △创造，创造性▲，往往指的是，△指—的一是—▲ / 往往指的是— / 后边 / 。</p>	<p>被试先提出一个临时方案“常常出现在”。又考虑下文，结合译文期望结构，决定重复“创造性”一词，于是否定之前的方案，改成“往往指的是”。</p>
5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p>[3s] 人们在 / △[2s]在▲ / 创作一个剧本—— / △在▲ / 往往指的是（是）人们在 / △创作剧本▲，创作 / 一部大戏，或者在……[3s]…… a great play / [2s] / △创作，（不是创造）▲ / 创作，△一出，大戏，一出，创作一出大戏……顿号▲[4s] 创作一出大戏！一部……交响乐！[5s]……△一部，交响乐，这“大~”这“great”就不用要了吧 / 交—响—乐。▲ 创造性往往指 / 往往指的是人们在创作一出大戏、一部交响乐……</p>	<p>针对“writing a great play”的翻译问题，被试提出两个临时方案，并选择了“创作一出大戏”。接着考虑“a great symphony”是否逐字翻译的问题，被试决定改述原文，根据汉语意合的特点，省略修饰“symphony”的“great”。</p>

6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p>.....[5s]..... 一个，精妙绝伦的，brilliant，构思一部.....[3s] / 构思，（换一个词） / △构思，创作，这个这个构思—▲[2s] 一个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 / 一个—精—彩—绝—伦，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理论▲ / 。</p>	<p>针对“conceiving”的翻译问题，先提出临时方案“构思”，并结合上文的译文，认为没有与上文的“创作”重复，决定接受该临时方案。</p>
7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p>抑或.....[4s]..... 一个，深奥的.....道德，道德准则。构思一个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 / 或 / 精彩绝伦和这个深奥？△.....深奥.....[3s]..... 深刻.....也用四字格吧▲ / ethical judgment，道德 / judgment，标准，译成标准好一些吧。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对称啊↑ / △抑或.....[4s].....抑或一个，加上“一个”吧，这样对称，对偶好一些▲ / 抑或一个.....[4s].....Profound，深奥的 / 这里也用四字格吧 / 深刻.....深刻—到位！△深刻.....[4s].....▲ / profound，这个词，（这想想用什么） / 道德标准，抑或一个深刻.....[6s].....深刻，profound.....[4s].....深刻的，精彩绝伦 / 深刻 / △（译成到位）▲ / 深刻到位的 / [4s].....伦理，标准？↑△伦理，标准，[4s].....伦理标准。▲</p>	<p>被试提出一个临时方案“深奥”，但发现该方案存在不足：一方面是“深奥”与“精彩绝伦”的字数不对称，于是根据自己的翻译原则，用“深刻到位”替换“深奥”；另一方面是 ethical judgment 的翻译，考虑字词搭配效果，先将“准则”换成“标准”，最后将“道德”换成“伦理”。</p>
8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p>.....[5s] 创造性往往指的是人们在创作一出大戏、一部交响乐，构思一个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抑或一个深刻到位的伦理标准时↓ / △所 / 动用的 / 【哑嘴声】 / 动用的——▲[2s] 动用的，脑力思维 / 脑力工作 / △动用的脑力工作。▲</p>	<p>被试重新整合前面的译文，发现句意不够完整，于是根据译文期望结构，在原来的译文中增加了“动用的脑力工作”一语。</p>
9	In that sense,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p>[3s]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脑.....如此说来，in that sense，如此说来 / 更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如此说来△ / （那一个更好？） / 说—来—▲ / 如此说来，如此说来，电脑当然，不能思维，而大部分 / 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说来，电脑，电脑▲ / can't，不可能，不能.....[3s]（做不到好一些） / 电脑就 / 还是加个“就”字 / 就，做不到，思维了 / 就不可能，就不能，不可能，△不—能 / 就不能，去▲ / 如此说来电脑就不能去△[2s] —思维[4s] / 思维了。（加个“了”好一些。）▲</p>	<p>针对“in that sense”的翻译问题，被试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如此说来”两个选项之间选择，并根据下文语境选定“如此说来”。紧接着考量“can't”的措词表达，提出三个临时方案，又均否定，最后提出新的方案“就不能去.....了”，并最终确定。</p>
10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	<p>而，[2s] / 大部分人也做不到。△大部分▲ /[3s]芸芸众生，△芸芸~[4s]▲ / 芸芸众生好一些，（就是）老百姓喽 / △芸芸—众—生，也—难以做到，也—难以—做—到▲[4s]。</p>	<p>被试在“大部分人”和“芸芸众生”两个方案之间作选择，通过目的语语感的评判，选定“芸芸众生”。</p>

根据表 6.5 所绘制的 TAPs 数据图见图 6.1。

图 6.1: 被试S18 (Professional) 文本一第三段TAPs数据图¹



6.1.2 Lörcher 的翻译策略结构

Lörcher (1991a) 提出的翻译策略模式包括基本结构 (basic structures)、扩展结构 (expanded structures) 和复杂结构 (complex structures) 三个层级。Lörcher 认为, 翻译策略无论如何复杂, 都可以拆分为若干个简单结构。应用这种生成原则也可以将基本结构转变为扩展结构和复杂结构。Lörcher (1991a) 关于翻译策略的基本结构如下:

表 6.6: Lörcher (1991a) 翻译策略的基本结构 (中文内容笔者译)

单纯形式	Type I	RP- (P) SP#/SPØ	发现问题→马上获得 (初步) 解决方案/暂时无法解决
	Type II	RP-→SP- (P) SP#/SPØ	发现问题→三秒以上的搜索→ (初步) 解决方案/暂时无法解决
	Type III	(RP) -VP- (P) SP#/SPØ	(发现问题) →陈述问题→ (初步) 解决方案/暂时无法解决
	Type IV	(RP- (→SP)) -VPa- (→SP) - (P) SP#/SPØ	(发现问题→搜索方案) →陈述问题→ (搜索方案) → (初步) 解决方案/暂时无法解决

¹ TAPs数据图中实线连接问题序列中的各个策略元素, 虚线连接非问题序列中的直觉方案, 以及两个跨序列策略元素。三类译者文本一第三段翻译过程的TAPs数据图见附录八。

	Type V	(...) (P) SPa/SPaØ (...) (P) SPb/SPbØ (...) (P) SPc/SPcØ - (...)	发现问题→部分解决方案 (a) →部分解决方案 (b) →部分解决方案 (c)
	Type V a	RP- (→SP) - (P) SPa/SPaØ→SP- (P) SPb/SPbØ→SP- (P) SPc/SPcØ - (...)	发现问题→(搜索方案) →部分解决方案 (a) →部分解决方案 (b) →部分解决方案 (c)
	Type V b	RP- (→SP) - Vpa- (→SP) - (P) SPa/SPaØ- (→SP) - VPb- (→SP) - (P) SPb/SPbØ- (→SP) - (...)	发现问题→(搜索方案) →陈述问题→部分解决方案 (a) →陈述问题→部分解决方案 (b) →陈述问题→部分解决方案 (c)
	Type V c	RP- (→SP) - (Vpa) - (→SP) - (P) SPa/SPaØ- (→SP) - (VPb) - (P) SPb/SPbØ- (→SP) - (...)	Type V a 与 Type V b 的结合, 连续解决问题过程中, 部分陈述问题, 部分未陈述问题。
单纯形式+插入元素		Type I ...Type V + <MSL/ MTL/ REPHR.SL/ REPHR.TL/...>	单纯形式增加插入元素, 插入元素包括: 原文/译文监控, 原文/译文改述
单纯形式+粘着元素		Type I ...Type V + CHECK/ (P) SP+/ MTL/ REPHR.TL	单纯形式增加粘着元素, 粘着元素包括: 检验解决方案, 监控/改述译文
单纯形式+插入元素+粘着元素		Type I ...Type V + <MSL/ MTL/ REPHR.SL/ REPHR.TL/...> + CHECK/ (P) SP+/ MTL/ REPHR.TL	单纯形式与插入元素及粘着元素的组合

上表显示, Lörcher (1991a) 翻译策略中的每个基本结构均由一系列的核心元素组成, 这些元素能以不同方式组合; 扩展结构则由若干基本结构组成; 复杂结构则由若干基本结构或扩展结构组成。

这种由基本结构、扩展结构和复杂结构组成的翻译策略模式可以描述所有的翻译过程, 可谓万能策略模式, Lörcher 本人使用该模式是用来发掘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策略。但是, 这种研究没有按被试水平进行分类, 也没有对不同被试的翻译策略进行比较, 其关注的是不同策略类型的使用频率, 以及不同翻译方向之间的策略比较。因此, Lörcher 总结的 5 种基本结构以及由此展开的扩展结构和复杂结构在不同类型译者的使用过程中难以体现差异, 不适合用于本文的研究。

第二节 策略结构与策略结果

我们通过 TAPs 数据分析发现，职业译者与初学者的主要差别在于译者如何解决翻译问题以及问题解决的效果，而不在于翻译问题的数量多少。翻译问题的数量具有两面性：问题较多，可能是因为译者缺乏翻译技巧，翻译能力或语言水平较低，也可以是因为译者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善于发现潜在的问题；同样，问题较少，可以是译技娴熟、水平高超的标志，也可能是草率行事、匆忙应付的结果。因此，我们在下文重点关注不同译者解决同一翻译问题时使用的策略元素、策略结构和策略结果的差别。

6.2.1 翻译策略结构比较

对翻译策略结构作定性比较，首先需要对被试数据进行抽样分析。因为在庞杂的数据面前，调查者难以对每一件事物都作详尽的观察，能看到的仅是整个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观察到的其实是所能看到的全部事物的一个样本。桂诗春指出，定性研究所采用的是有目的的抽样（purposive sample）：选择那些你认为最有助于了解你的研究对象的样本来进行观察（桂诗春 1997:101）。Li（2004）提出的 TAPs 翻译研究 12 条可信度保障条款中，也包括有目的的抽样。我们在分析时具体采纳其中的定额抽样（quota sample）法²，从三类被试的 TAPs 语料中各选取一位代表，分别是 S18（professional）、S9（semi-professional）和 S2（novice），这三位被试无论是翻译能力还是在实验过程中的表现，在各自所属的译者类型中均比较典型，因而可以作为三类被试的代表。我们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考察三位被试对实验一文本第三段的翻译过程，对比他们在解决同一语言单位时所采用的不同策略结构，进而归纳出最理想的策略结构，最后运用 TAPs 统计数据或译文评估数据来

²定额抽样法是有目的的抽样的一种，桂诗春指出：“如果所观察的事物、人群、过程有明显的界线，就可以采用定额抽样的方法，使不同类型的单位都能包括到样本里”（桂诗春 1997:101）。

讨论三类译者的差别。另外，我们将具体从意义层面、结构层面和功能层面比较三类的译者的策略结构差别，上述三个层面可以涵盖译者解决翻译问题时实施的大部分策略结构，至于三个层面之外的策略结构，如监控策略结构，则会专门展开讨论。

6.2.1.1 意义层面策略结构比较

所谓意义层面策略，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解决意义层面的问题而实施的翻译策略。我们对三类被试代表在翻译同一段落时的 TAPs 数据作定性考察，得出译者在意义层面的策略主要集中于四个侧重点，即语义的表述与完善，语义的辨析与搭配，语义的润饰与修辞，语义的检索与评估。我们从这四点出发，结合以译文评估成绩为基础的策略结构效果评介，对整个意义层面策略结构作对比分析，总结出不同译者在意义层面策略结构上的差异。

6.2.1.1.1 语义表述与完善

表 6.7: 策略结构对比—语义表述与完善

被试	序列	原文	被试 TAPs	说明
S18 职业译者	2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以至于，以至于我们……[5s] …… we define, we might like to, 我们，我们 / 以至于总喜欢— / △我们总喜欢 / [3s] 喜欢[4s]▲ / 以至于我们总喜欢 / [3s] / △用，用创造性来界定思维这个词，▲（加个词）创造 / 用，用创造性，（这个没有引号噢）。创造性 / 以至于我们总喜欢用创造性来 / △界一定，来界定……▲界定？（Yeah, ok）。以至于我们总喜欢用创造性来界定，“thinking”，还是有引号的 / △思维， / 还是加一个“这个词”吧，尽管重复一点。	针对“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被试提出一个临时译文方案，然后参考译文期望结构（加引号的特殊含义）对该方案进行评判，又结合译语表述的需要，在译文中增加‘这个词’。
S9 半职业译者	2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然后，加上“但是”，因为尽管和但是肯定是同时出现。△但是我们▲， might like to define, might 在这里是表示一种可能，所以这里我就翻译成“可能”，△我们可能会▲define “thinking” in, 那么—在汉语里面应该用一个把字句，define 把什么定义成，△把—思考—一定—成▲ / 。	被试根据汉语语法习惯添加关联词“但是”。针对“might like to”这一翻译问题时，被试参考了译文期望结构（“表示一种可能”）。翻译“define ‘thinking’ in”时被试提出调整原文语序，采用“把字句”。

S2 初学者	A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如果，△如果—我们—认定—思考，思考，▲就是……[3s]……创造，△创造……创造。	被试接受直觉提供的译文。
-----------	---	--	---	--------------

从上表看出，针对原文小句“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的翻译问题，三位译者的策略结构各不相同，译文质量也存在明显差别。职业译者 S18 的翻译多次运用了增补法，使语义的表达尽可能准确而完善；半职业译者 S9 与初学者 S2 均未能准确完整地译出原文。该处对比体现了不同译者在“语义表述与完善”上的差别。

S18 为了准确传达语义，在得出初步翻译结果之后，结合译文期望结构，对表述的准确性反复考量（甚至考虑到标点符号等细节），并根据汉语表述的需要相应地添加“这个词”作为补语。S9 把“might like to”译为“可能会……”虽在意义上略有偏差，但这不是导致最后误译的关键原因；被试一开始考虑把“define thinking”翻译成“把思考定义为……”是可取的，可惜由于对自己的理解没有足够的把握，最后译为“把思考与创造力联系起来”，修改后的译文让人难以接受。S2 凭直觉翻译了这句话，看似轻松解决问题，但译文漏洞百出：比如将“define”翻译为“认定”，将“might like to”翻译成“如果”，将“creativity”翻译成“创造”。究其原因，S2 准确理解或表述语义的能力较弱，也缺乏较好的策略来完善译文表达。

6.2.1.1.2 语义辨析与搭配

表 6.8: 策略结构对比—语义辨析与搭配

被试	序列	原文	被试 TAPs	说明
S18 职业译者	6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5s]……一个，精妙绝伦的，brilliant，构思一部……[3s] / 构思，（换一个词） / △构思，创作，这个这个构思—▲[2s]一个精彩绝伦的 科学理论 ↑△ / 一个—精—彩—绝—伦，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理论▲ / 。	针对“conceiving”的翻译问题，先提出临时方案“构思”，并结合上文的译文，认为没有与上文的“创作”重复，决定接受该临时方案。

	7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抑或.....[4s].....一个，深奥的.....道德，道德准则。构思一个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 / 或 / 精彩绝伦和这个深奥？△.....深奥.....[3s].....深刻.....也用四字格吧▲ / ethical judgment ，道德 / judgment，标准，译成标准好一些吧。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对称啊↑ / △抑或.....[4s].....抑或一个，加上“一个”吧，这样对称，对偶好一些▲ / 抑或一个.....[4s].....Profound，深奥的 / 这里也用四字格吧 / 深刻.....深刻一到位！△深刻.....[4s].....▲ / profound，这个词，（这想想用什么） / 道德标准，抑或一个深刻.....[6s].....深刻，profound.....[4s].....深刻的，精彩绝伦 / 深刻 / △（译成到位）▲ / 深刻到位的 / [4s].....伦理，标准？↑△伦理，标准，[4s].....伦理标准。▲	被试提出一个临时方案“深奥”，但发现该方案存在不足：一方面是“深奥”与“精彩绝伦”的字数不对称，于是根据自己的翻译原则，用“深刻到位”替换“深奥”；另一方面是ethical judgment的翻译，考虑字词搭配效果，先将“准则”换成“标准”，最后将“道德”换成“伦理”。
S9 半职业译者	8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然后这一，△创造力，涉及，到，▲.....[3s]这一创造力涉及到创作一部伟大的剧作，谱写，谱写，△一部伟大的交响乐，交响乐▲，然后.....[3s]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孕育，conceiving我还是翻译成“孕育”，△呃，一个，▲ / brilliant，scientific theory科学理论，那么这个brilliant用什么形容词比较好，孕育一个，嗯——[6s].....，嗯——[3s].....，精妙↓，我觉得精妙比较好，△孕育一条一 / 这个介词噢量词用“条”，一条精妙的，科学，理论。▲	针对“conceiving”，被试先参照上文语境，提出一个临时方案“孕育”并将该方案自然带入下一个问题。被试提出“brilliant”如何翻译的问题，在考虑了较长时间之后决定使用“精妙”一词。
	9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最后或者，嗯——[3s]..... a profound，profound△翻译成“深刻”▲。judgment，呃——ethical，ethical应该是 / 宗教 / （不是宗教） / ◇【金山词霸】◆ethical，道德，伦理，或者一[2s]，嗯 / [3s] / 道德伦理判断，我 / 量词，或者.....还是用“一个”吧，△一个深刻一的一道德判断。▲	被试对该短语采取逐词翻译的方法，遇到不能确定的单词，查询电子词典，并从词典义项中选择译文，最后确定该短语的量词。
S2 初学者	6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读原文】 In <i>convin</i> ~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4s].....呃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 profound，什么是profound？◇【金山词霸】p-r-o-f-o-u-n-d，渊博的.....◆ethical judgment↑.....[2s].....伦理学家？↑.....◇【金山词霸】e-t-h-i-c-a-l，(judgment) / e-t-h-i- / e-t-h-i- / e-t-h-i-c-a-l / 伦理↑◆.....社会伦理学家↑(?) / ◇【金山词霸】judgment，j-u-d-g-m-e-n-t，社会伦理学.....[5s].....◆噢—↓【查到“judgment”的一个义项为“标准”，但未说出】	被试主要借助翻译工具来解决“profound”和“ethical judgment”的翻译问题。三次查阅双语词典，并直接选择词典提供的义项。
	C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一（个）.....[3s].....brill~ brilliant scientific△科学理论，杰出的。▲	被试采纳直觉提供的译文。

7	conceive	(7) In <i>convincing</i> , ◇ 《金山词霸》 c-o-n-c-e-i-v-e.....[11s] 《单词输入错误, 耽误了一部分时间》in <i>convincing</i> 不对, c-o-n-c-e-i-v-e, c-o-n-c-e-i-v-e.....[4s] 《看词典解释并作出选择, 但未说出》 ◆	被试第一次查阅电子词典时单词输入错误, 再次查阅时获得解决方案。
8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profound judgment / In that sense,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 cannot think and neither can / most ~ / In <i>conceiving</i> 是对比的意思吗? / △考虑, 从一个, 伟大的科学理论, 或者一个, profound 的伦理标准, 标~▲ / 一个深刻的 / 一个意义深远的伦理标准.....[18s].....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 (先写出来再说吧, 等一下再~) / △对一比一, 一个, 对于一个, 杰出, 杰出的.....[3s].....伟大杰出的科学理论, 伟大—杰出—科学—理—论, 伟大杰出的科学理论, 或者—是—项—意义—深远—的—伦—理—标—准▲ / 以至于我们比较, 呃, 但是我们的基因程序却要复杂得多.....[3s]	被试首先错误地认为“in conceiving”是对比的意思, 但又犹豫是不是“考虑”。最后结合动词所搭配的宾语, 认为应该译成“对比”, 或“对于”。

翻译过程中, 语义的辨析与搭配是很重要的工作。职业译者 S18 在这方面的能力也胜人一筹。

词组“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是整个段落中最需要考虑语义辨析与搭配的部分, 动词 *conceiving*, 形容词 *brilliant* 和 *profound*, 以及名词短语 *ethical judgment* 均在一定程度上给译者设置了障碍, 很多译者在这些词汇的辨析与选择上煞费苦心, 频频求助于词典或参考资料。

职业译者 S18 没有查阅任何词典, 因其词汇量较大, 且善于借助语境推断词义。S18 在词汇选择上最费心的是形容词“profound”的翻译, 他明白该词的基本意义, 但为了坚持自身的翻译原则, 希望能够用四字格来修饰, 与前文“一个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相对应, 最后选定“深刻到位”。这里暂不讨论“深刻到位”是否最佳选择, 或者“四字格”处理是否最为恰当; 值得注意的是, S18 的翻译标准意识在这里有明显体现。半职业译者 S9 选词相对随意, 虽然也琢磨过“conceiving”和“brilliant”的翻译, 但最后选定的“孕育”和“精妙”显然不够理想。初学者 S2 在这些词汇的翻译上, 多次进行词典查询, 并直接采纳词典现成的解释, 这不但体现了 S2 词汇量较少, 而且在语义辨析上缺乏与具体语境的结合。S2 在翻译“in conceiving……”结构时还存在一个错误的先入之见, 即把“in conceiving”结构

当成是“in contrast with”短语，因此虽然查到“conceive”一词有“考虑”的义项，却不愿直接运用，继续将自己的主观理解结合到上下文表述中，得出错误的译文：“以至于与一套杰出的科学理论或者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伦理标准相比”。S2对于这一结构的误解，误导了他对整个句子的翻译，可见语义辨析也是以准确理解原文为基础的。

6.2.1.1.3 语义润饰与修辞

表 6.9: 策略结构对比—语义润饰与修辞

被试	序列	原文	被试 TAPs	说明
S18 职业译者	9	In that sense,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3s]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脑……如此说来，in that sense，如此说来 / 更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如此说来△ / （那一个更好？） / 说一来—▲ / 如此说来，如此说来，电脑当然，不能思维，而大部分 / 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说来，电脑，电脑▲ / can't，不可能，不能……[3s]（做不到好一些） / 电脑就 / 还是加个“就”字 / 就，做不到，思维了 / 就不可能，就不能，不可能，△不能 / 就不能，去▲ / 如此说来电脑就不能去△[2s]—思维[4s] / 思维了。（加个“了”好一些。）▲	针对“in that sense”的翻译问题，被试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如此说来”两个选项之间选择，并根据下文语境选定“如此说来”。紧接着考量“can't”的措词表达，提出三个临时方案，又均否定，最后提出新的方案“就不能去……了”，并最终确定。
	10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	而，[2s] / 大部分人也做不到。△大部分▲ / ……[3s]芸芸众生，△芸芸～[4s]▲ / 芸芸众生好一些，（就是）老百姓喽 / △芸芸—众—生，也难以做到，也—难以—做—到▲[4s]。	被试在“大部分人”和“芸芸众生”两个方案之间作选择，通过目的语语感的评判，选定“芸芸众生”。
S9 半职业译者	11	In that sense	最后一句话【读原文】In that sense,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 In that sense，照这样，呃我觉得这 / 呃，结合上下文，翻译成照这样 / △这样来看，或者照这样来看，照这样来看。▲	阅读全句之后，被试重点关注词组“in that sense”，并提出三个临时方案。然后结合下文语境，选定第三个方案“照这样来看”。
	12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那么△计算机，当然，不能思考，▲ /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很，大多数，most 是翻译成大多数，neither can 它是倒装句，那么翻译时候还是用正语序，△大多数人—也—不能—思考—了，我觉得加上这个“了”比较通顺一点。▲	被试先译出该句前半部分。翻译后半部分时，被试遇到问题，决定对原文进行句法结构重组。
S2 初学者	10	In that sense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in that sense，嗯，△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	被试提出两个临时方案，随之选择了后者。
	11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那么，计算机▲ / 不可能，certainly can't think……[2s] / certainly，绝对，△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能，不能够思考▲。	被试先提出部分翻译方案，遇到“certainly can't”的翻译问题，依次提出四种选项，选定第四种。

12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9s].....△大多数一人一也一一样，大多数人▲ /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计算机绝对不能够，绝对不能够思考.....我们中的大多~ / [2s] / 大多数人，△大多数人类，大多数人类也.....▲基本的现在已经翻译完了。	被试先提出部分译文，遇到翻译问题，提出两种方案，随后选定第一种。
----	--------------------------------------	---	----------------------------------

上表中“*In that sense,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是一个句意比较简单的并列句，但是不同的译者对此有不同的翻译态度，运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职业译者 S18 在翻译该句时，无论是对“*in that sense*”、“*can't*”的反复考量，还是对“*most humans*”的推敲用词，均体现出在语义润饰上的认真态度，被试还希望通过四字格的形式来增加译文的表达效果，提高可读性。相比之下，半职业译者 S9 和初学者 S2 在翻译该句时没有花费太大精力在语义润饰与修辞上。我们结合被试对该问题的后期采访发现：S18 外语（即英语）水平高于 S9 与 S2，加上长期的翻译训练与实践，在原文理解上往往比较顺利；而如何优化译文表达，使之更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却是 S18 始终关注的重点。因此 S18 在整体翻译过程中，时间和精力都处于较为平衡的状态，他不会为理解或分析复杂句子或文章难点而大伤脑筋；也不会对简单问题掉以轻心，总能分配时间考量语义的润饰和修辞。S2 在翻译过程中明显体现出时间和精力分配不均的现象：疑难问题上往往耗时无数，简单问题上往往不假思索。

6.2.1.1.4 语义检索与评估

翻译工具的运用（以查询词典为代表），主要体现了被试的语义检索与评估策略。我们在分析 TAPs 数据图时发现，被试在这方面的策略结构存在以下四种情况：

1、直接反应型，即被试遇到问题马上求助词典，获得词典方案马上运用到译文中。

具体结构表现为：发现问题→查询词典→词典提供方案→采纳方案或拒绝方案。

2、思前型，即被试遇到问题，先作进一步分析并提出一些临时方案，再进一步求助词典，获得词典方案马上运用到译文中。

具体结构表现为：发现问题→提出临时方案（或其它分析策略）→查询词典→词典提供方案→采纳方案或拒绝方案。

3、想后型，即被试遇到问题马上求助词典，获得词典方案后，采用评估策略对此进行评估和选择，再将决策结果运用到译文中。

具体结构表现为：发现问题→查询词典→词典提供方案→考虑字词搭配（或其它评估策略）→采纳方案或拒绝方案。

4、思前想后型，即被试遇到问题，先作分析并提出一些临时方案，再进一步求助词典，获得词典方案后，采用评估策略对此进行评估和选择，再将选择结果运用到译文中。

具体结构表现为：发现问题→提出临时方案（或其它分析策略）→查询词典→词典提供方案→考虑字词搭配（或其它评估策略）→采纳方案或拒绝方案。

我们结合 TAPs 数据图，对词典查询的四种策略结构进行统计，结果见下表：

表 6.10: 词典查询的四种策略结构统计（单位：人）

	思前型	想后型	思前想后型	直接反应型	查询总人次
职业译者	0	1 (20.00%)	3 (60.00%)	1 (20.00%)	5 (100.00%)
半职业译者	4 (33.33%)	4 (33.33%)	2 (16.67%)	2 (16.67%)	12 (100.00%)
初学者	1 (4.76%)	6 (28.57%)	1 (4.76%)	13 (61.90%)	21 (100.00%)

职业译者的词典查询次数是最少的，这在第五章“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部分已经作过定量分析，但在这有限的 5 次词典查询中，职业译者有 3 次查询属于思前想后型，这一种策略结构的百分比在三类译者中是最高的。这说明他们通常在词典查询前有针对性，查询后有评估和检验。初学者直接反应型的策略结构占了最高的比例，在查询前缺乏针对性，查询后缺乏评估策略。半职业译者则思前型和想后型的比例最高。

思前想后型是语义检索与评估的最优策略结构：查询前的分析，避免了语义检索的盲目性，并能快速缩小义项范围，检索到适当的义项；查询后的评估，既可以帮助译者筛选多重义项，又可以检验义项与原文是否对等，与译文语境是否对应。

6.2.1.1.5 意义层面策略效果

上文从语义表述与完善、语义辨析与搭配、语义润饰与修辞、语义检索与评估四个方面分析了职业译者与其它译者的差别，总体而言，职业译者善于运用上述策略结构来理解、搜索、表达和评估意义层面的翻译问题。译文评估中，我们列出了专门针对意义层面的评分项目，借此来辅助验证策略结构的运用效果：

表6.11：意义层面评估成绩总平均分（单位：分）

被试类别	词句理解（满分 10 分）	遣词造句（满分 10 分）
初学者	5.33	5.25
半职业译者	6.92	7.00
职业译者	7.83	7.92

上表显示，初学者在词句理解和遣词造句等方面的总平均分最低，而职业译者总平均分最高，这从译文评估的角度说明，职业译者在意义层面实施的策略结构，获得了最理想的翻译效果。

6.2.1.1.6 小结

职业译者在运用意义层面策略进行问题解决时，有“简单问题复杂化”和“复杂问题简单化”两种趋势：前者往往体现职业译者在传达原文语义方面精益求精的优化意识，后者则反映职业译者对原文语义具备较强的理解能力和高效的传达技巧。

需要强调的是，表面上看，面对较简单的翻译问题时，非职业译者也有繁复的处理步骤和冗长的思索过程；同样地，面对较复杂的翻译问题时，非职业译者也不乏不假思索、挥洒自如的风范。那么既然如此，凭什么单单职业译者“简单问题复杂化”和“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做法就值得给予肯定呢？

事实上，仔细分析被试 TAPs 内容就可以发现，职业译者所谓“复杂化”或“简单化”的处理方法，既不是对所有翻译问题一视同仁，平均用力，也不是被问题牵着鼻子走，被动决策，繁则必无法简、简则必无法繁。而非职业译者采取“简单问题复杂化”或“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法，多数情况下，要么因为翻译水平有限，小问题变成大问题，要么因为没有精益求精的能力和意识，匆匆了事，不求甚解，也不求完善，他们在解决这些翻译问题时，通常处于“不得不繁”或“不得不简”的被动状态。

以实验文本一第三段的“most humans”为例。半职业译者 S9 和初学者 S2 不约而同地都将之直译作“大多数人（类）”，这一译文是在被试完成对原文的阅读与理解之后轻松地脱口而出的，而且译出后就再也没有考虑修改，译文没有错误，也没什么亮点，可谓无功无过。职业译者 S18 当然也能够准确理解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义，直译亦完全可行，但他在说出“大部分人”之后，立刻决定改译，并提出“芸芸众生”这一在文字上增添润色修饰的译法。S18 整个决策过程非常迅速，TAPs 显示其在决定改译时只有 3 秒停顿（而且包括打字输入的动作耗时），可见这里的“简单问题复杂化”主要复杂在考虑“是否”改译，而不在“如何”改译，这反映出译者认真的翻译态度，出色的语言能力，和高超的职业水平。在这一类翻译问题上，职业译者之所以作“复杂化”处理，不是因为有能力简化（被试显然已经说出简单可行的直译译文），而恰恰是因为有能力将译文润色打磨，更上一层楼。同样道理，在翻译工具（词典）的使用上，职业译者善用“思前想后”型决策方式，通常能使译文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而更重要的是，虽然既思前又想后，其决策耗时却少于其它两类译者，说明他们的策略结构是有选择的、有目的的、有控制的。

再以实验文本一第二段的“Even the simple computers of today can be geared for that.”一句为例。职业译者 S18 在读完句子的同时就十分顺畅地汇报出译文“今天即使最简单的电脑也可以这样做”，余下的一些零碎的反复汇报则大多是由于伴随打字输入导致的。S18 的口头汇报中没有出现该句译文的任何备选项，翻译过程较为简化，思维轻松自然，从读取原文到得出译文，几乎一气呵成。相比之下，半职业译者 S9 和初学者 S2 都在该句的翻译上耗费不少精力和时间——S9 在“of

today”、“can be”、“for that”这三个短语上都缺乏足够的自信，颇为它们花了一些功夫；S2 则首先在“gear”词义的理解上就遇到麻烦，使整个问题解决过程不包含词典查询和查询决策的内容，因而策略结构变得非常复杂，决策过程也显得拖沓。

6.2.1.2 结构层面策略结构比较

所谓结构层面策略，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解决结构层面的问题而实施的翻译策略。衔接性（cohesion）和连贯性（coherence）是语篇应具备的两个主要的篇章结构特征（de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3-7），因此，为了将不同译者在结构层面的策略结构作对比分析，我们从衔接手段的处理、语篇连贯与结构调整这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6.2.1.2.1 衔接手段的处理

Halliday 认为，“衔接性（cohesion）是一组可能性，一种潜能，它存在于语言中，促使文本结合，说者或作者可以自行将之安排处置”（“the set of possibilities that exist in the language for making text hang together: the potential that the speaker or writer has at his disposal.”）；他还强调，“衔接性”既代表语言系统中的一种关系（“a relation in the system”），同时也是一个过程（“also a process”），因为它是这一系统关系在语篇中的证明（Halliday & Hasan, 1976: 17-18）。

衔接手段是语言的外部接应，主要与有形的语言连接方式有关，是语言使用的表层行为。翻译中出现的译文不流畅现象，往往就是衔接手段使用不当造成的。Halliday 和 Hasan 总结出了协助建立连贯一致语篇机制的五种衔接手段，即：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指称/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词（conjunction）。下面举例分析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结构。

表 6.12: 策略结构对比—衔接手段的处理—词汇衔接

被试	原文	被试 TAPs	说明
S18 职业译者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人们在 / △[2s]在 ▲ / 创作一个剧本—— / △在 ▲ / 往往指的 (是) 人们在 / △创作剧本▲, 创作 / 一部大戏, 或者在..... ----- / 往往指的是人们在创作一出大戏、一部交响乐..... -----[5s]..... 一个, 精妙绝伦的, brilliant, 构思一部.....[3s] / 构思, (换一个词) / △构思, 创作, 这个这个构思—▲[2s]一个精彩绝伦的 科学理论 ↑ ----- 抑或.....[4s].....一个, 深奥的.....道德, 道德准则	被试发现翻译问题 (即原文中四个并列关系的举例, 下同), 顺势将其处理成 ‘两个动词各引导两个宾语’ 形式, 汉语结构对称, 通过两个双音节动词使这小段文字前后衔接得天衣无缝, 语义非常明晰。
S9 半职业译者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writing a great play, 把思考与, 嗯.....[5s]嗯—, △创作↓, writing a play, 因为它是 a great play 一部伟大的剧作, 所以用动词“创作”而不是“写” / △创作一部, 伟大的一剧作▲ ----- 或者.....[3s]composing, 呃—.....[5s]谱写↓, △因为它是 symphony 所以用动词“谱写”, 谱写一部, 伟大的, 交响乐▲ ----- 然后.....[3s]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孕育, conceiving 我还是翻译成“孕育” △孕育一条— / 这个介词噢量词用“条”, 一条精妙的, 科学, 理论。▲ ----- 最后 “或者” △一个深刻—的一道德判断。▲	被试发现翻译问题, 未考虑对原文衔接方式做更适合汉语的改动, 遵照原文, 将后两例共用一个动词来衔接。
S2 初学者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比如说.....[2s]写, 一个, ▲ / 呃.....[3s]..... △写一部, 写一部—戏—剧 ----- 或者说▲.....编.....[6s].....嗯 / △编 / 一首 / 编一曲, 一曲▲..... ----- 嗯, △或者, 编, 一曲, 非常不错的▲.....[5s]..... 编交响乐? ↑.....[2s].....△谱, 用谱比较好一点 / 谱出, 一曲, 非常不错的 交响乐 ↓。▲ ----- in conceiving 是对比的意思吗? / ----- 伟大杰出的科学理论, 或者—是—项—意义—深远—的一—伦—理—标—准—▲ ----- /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这个意思应该是, 跟前面的对比, 怎样把它组织起来?对比一套杰出的科学理论或者一项 / 意义深远的伦理标准 /[5s].....ok 把它放前面去, 可能比较符合习惯 / △以至于与一套杰出的科学理论, 或者是 / 相比	被试发现翻译问题, 亦未考虑对原文衔接方式做更适合汉语的改动。但出现对 “in conceiving” 的理解错误, 造成误译。

这段由一个特长句构成的文字是该文本中的一个难点所在。原文采用的是三个动词引导四个宾语（后两个宾语共用一个动词）的结构，举例论述了人们对所谓“创造力”这一概念的几种理解，这几个例子之间以三个动词（及其引导的动词短语）衔接起来，构成并列的语法形式和语义关系。

职业译者 S18 明显经验老道，顺势将原文结构巧妙处理成‘两个动词各引导两个宾语’的形式，译为“创作一出大戏，一部交响乐，构思一个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抑或一个深刻到位的伦理标准”。一方面，把原文的衔接性很好地体现了出来，语义传达天衣无缝；另一方面，也使译文自身结构对称，两个动词，每个动词又都是双音节（“创作”，“构思”）。从动词的翻译和宾语的翻译都可以看到，S18 的译文在语气上似乎更像是一篇相应的汉语科技小品文，明白通达，没有丝毫刻意修饰的感觉。

半职业译者 S9 未考虑对原文衔接方式做任何调整，遵照原文，将后两例共用一个动词来衔接，译为“创作一部伟大的剧作，谱写一部伟大的交响乐，孕育一条精妙的科学理论，或者一个深刻的道德判断”。成功之处在于细节处理得当（比如三个衔接动词全部选用双音节词：“创作”，“谱写”，“孕育”），完整再现了原文中的词汇衔接，译文前后贯通。

初学者 S2 同样未考虑对原文衔接方式做任何调整。遗憾的是，被试只草率地选用了几个单音节词“写”、“编/谱”，使其译出的汉语的衔接性大大降低，译文显得过分随意（“写一部戏剧或者谱出一曲非常不错的交响乐”）；甚至出现致命的理解错误（将 *in conceiving* 误解为“对比”的意思），不但直接导致语义歪曲，而且由于只剩下两个动词，使这段语篇的衔接性更进一步受到严重破损。

表 6.13: 策略结构对比—衔接手段的处理—连接词 “though”

被试	序列	原文	被试 TAPs	说明
S18 职业译者	1	though	这个“但是”放到前面去，（这个后面就不象汉语了）。然而，不过，还是然而好……还是但是？↑ / 然而。△[2s] 然而我们的程序▲[3s]如此的，复杂，极为，如此地极为复杂，但是我们的程序复杂—之极！复杂之极，△复杂—之一极，[2s]▲ 但是我们的程序复杂性 / 之极。[2s]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 in terms ~ /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我们的程序复杂之极，以……然而我们的程序复杂之极 / [2s]。	被试发现翻译问题。先根据汉语习惯表达，调整“though”的译文的句法位置。接着考虑应该如何译出“though”的语义，提出三个临时方案，结合上下文语境，选出备选临时方案。
S9 半职业译者	1	though	然后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al~ / enormously complex, 然后△我们的，程序 is so much more, 那么肯定是一个比较了，那就是我们的程序 complex, 要复杂得多。▲ / 【读原文】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4s]……这个 though 一般是—— / 一般是针对前面的来表示转折，所以我把 though 放在前面，句子的最前面，尽管△我们的程序要复杂得多。▲	被试发现翻译问题。结合下文语境，对“though”的用法进行分析，然后提出语句结构上的解决方案，即把“though”放至句首。
S2 初学者	(无)	though	(无)	(无明确的解决问题的过程)

连接词 “though” 是实验一翻译的难点，很多被试都在该问题上盘桓良久，甚至掉进理解的陷阱而出现误译。三位被试策略结构的差别就明显体现在该词的处理上。

职业译者 S18 和半职业译者 S9 都把 “though” 作为翻译问题进行解决，并且都结合了翻译原则或语法知识的指导。比如 S18 认为：“这个‘但是’放到前面去，后面就不象汉语了”。半职业译者 S9 指出：“这个 though 一般是—— / 一般是针对前面的来表示转折，所以我把 though 放在前面，句子的最前面”。

半职业译者对衔接手段的考量不如职业译者充分，决策效果也不如职业译者理想。“though” 在原文中是一个语气较弱的转折词，并非所有的汉语转折连词都

能与之产生对等效果。职业译者对该词考虑良久，先后提出“不过”、“然而”、“但是”等方案，最后选择的“然而……以至于”较能体现原文微弱的转折关系。半职业译者选择的“尽管……但是”不但语气强烈，在意思上也与原文不符。我们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位半职业译者 S11 的案例来说明上述情况：

例 6.1 (S11/semi-professional/V1)

(TAPs) : (2)³ 呃……[4s]……以至于, so-that, 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们可能会—— / (这里) though,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3s]我们仍然 / (要复杂的多) / 是不是可以不用去翻译这个though。

(译文) 我们人类的这种‘程序化’比电脑的程序要复杂得多。我们在考虑如何定义‘思考’的时候可能会用是否具有‘创造性’作为思考活动的标准……

被试 S11 的决策结果是将连接词“though”略去不译，这样的决策导致其译文缺少转折连词，在表述上生硬而不流畅。

初学者在连接词“though”的处理上自始至终未有明确的问题解决过程，可见并没有对这一关键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为其最终误解原文、译文逻辑混乱埋下了伏笔。

我们统计了所有被试对“though”所体现的衔接手段的关注情况，80%以上的职业译者均对该衔接手段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考虑，50%的半职业译者也对该衔接手段进行了认真的考虑，但只有30%左右的初学者关注到“though”作为衔接手段的重要性。这一统计分析结果与定性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职业译者对于衔接手段的关注程度高于半职业译者和初学者，决策效果也往往最佳。

³ 注：圆括号内的数字为该被试在译文一第三段TAPs数据图中的问题序列编号，下同。

6.2.1.2.2 语篇连贯与结构调整

语篇连贯的基础是语篇意义所涉及的长期记忆中知识概念的连贯，语篇表现形式是用来描述和传达那些知识的。语篇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被文本表述激活的知识中存在着一种“意义连续体”（a continuity of senses）；语言学家 de Beaugrande 和 Dressler 将之界定为“连贯性”，即语篇世界（textual world）中概念与关系结构（configuration of concepts and relations）互相影响、互相关联（mutual access and relevance）的方式。

通常来说，若读者不能在语篇中发现连贯性（即意义连续体），是因为语篇所表现的概念关系结构与读者的先有世界知识（prior knowledge of the world）严重不吻合，这种情况的语篇也便是无意义的了（de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84）。

可见，连贯性是语篇之所以成为语篇的必要条件。因此，在翻译中，为了让译语读者能够对译文中的知识体系和概念关系结构有着与源语读者大致相同的理解与接受，译者就必须担负起将源语语篇的连贯性在译语语篇中再现出来的责任。下面就从语篇连贯这一角度，对比分析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结构。

语篇连贯涉及人的思维。说话要言之有理，表述上不能存在矛盾冲突、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这首先当然需要运用正确的语言手段，但更重要的是作者本身的思维逻辑。因此语篇连贯往往与逻辑相关，属于话语表述的深层概念。由于语篇连贯涉及到文章的布局谋篇，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主要体现在从原文到译文的结构调整上。我们借助被试在结构调整上的不同策略来分析译者的语篇连贯意识。

表 6.14: 策略结构对比—语篇连贯与结构调整

被试	序列	原文	被试 TAPs	说明
S18 职业译者	3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但是 / (.....个词) ▲ 还是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句子，一个 / 后面太长了，状语这么长，状语是从句 / 分成两个句子 / 然而我们的程序复杂之极，以至于我们总喜欢用创造性来界定思维 / 这个词。 (问题序列 4、[4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 [2s] / 创造性 / 这个创造性 (会) 常常出现在 / 重复一遍吧 / △创造，创造性 ▲，往往指的是，△指一	被试遇到拆分句子的问题。因为原语单句太长，状语成分太多，被试主张对原文进行句法重构，即将原文的一个句子在译文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的一是一▲ / 往往指的是— / 后边 / 。)	中拆为两个。
S9 半职业译者	5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然后，因为它是与什么什么联系，它的 / 其实它的中心词应该是 <i>creativity</i> ，那么我这里直接用“ 的 创作力”好像，嗯，就不是，就没有显~，嗯，就是没有把这个创造力表现出来，所以我就是再加上“ 所需要的 ”，△加上这个词以后，好像突出了这个创造力↓ / 呃让读的人，虽然这个句子结构比较复杂，但是读的人可以▲ / 最后还是能发现这个中心词应该是创造力↓。	被试在得出译文后发现不符译文期望结构，需要修改，因而在原译文中添加了“所需要的”。
	6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2s]那么这个句子我又看了一下，这个句子比较长，所以我把，“或者”前面“伟大的剧作”再用一个逗号 / 但是我们可能会把思考与创造 / 创作 一部伟大的剧作或者谱写一部伟大的交响乐所需要的创造力，△ 联系起来 ，in terms of，联系起来。.....嗯↓。（真是长啊。）▲	被试考虑将“creativity”之前的主句“与后面“that”引导的从句结合起来，进行句子重构。
	7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然后它后面 还有 ，【读原文】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那 / 看来这个也是，也是这个创造力的，创造力的范畴，所以我还是要补充一下↓。我们可能会把.....[3s]嗯，这个句子实在太长了，会把思考与创造——[2s].....这样我把，还是把创造力放在，放在前面，△但是我们可能会把思考与—创—造—力—联系起来。然后补充一下，句号句掉▲。	被试阅读下文，发现后面一部分内容逻辑上是紧跟前文的，于是为了将原文语义补充完整，再次考虑重新组织句子，决定把原文的一个句子转化成两个来译。
S2 初学者	9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读原文】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i>enormally</i> complex / we / though /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i>enormally</i> complexed, <i>the</i> ~ /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 /[9s]..... /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这个意思应该是，跟前面的对比，怎样把它组织起来？.....对比一套杰出的科学理论或者一项 / 意义深远的伦理标准 /[5s].....ok 把它放前面去，可能比较符合习惯 / △以至于与一套杰出的科学理论，或者是 / 相比，我们 更倾向于 ，更倾向于，认定，思考，就是创造，比如说，写一部▲ /	被试在逐个获得词汇或词组的译文之后，考虑把零散的部件组织成句子。

上表翻译策略结构的比较，体现出职业译者 S18 善于调整句子结构，在翻译过程中有强烈的连贯意识。原文是一个长句子，主句后面是一个“so...that”从句，从句中的关键词“creativity”又有长定语修饰。这种典型的英语形合句子翻译成中文时，需要在适当的地方把句子打断，拆成多个汉语句子，并根据汉语意合的特征，适当增加信息以保持句意连贯。

S18 处理该问题时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当机立断在“creativity”后面进行断句，并在下文增加“这种创造性”作主语，以保持语篇信息连贯。半职业译者 S9 处理该问题时反复进行了三次问题解决：问题序列 5 确立“创造力”为“so...that”从句的中心词；问题序列 6 主张将“创造力”的修饰语前置，以符合汉语的“定中”结构；问题序列 7 发现“创造力”的修饰语太长，决定以“创造力”为分界线切分句子。S9 同样从考虑语篇的逻辑连贯出发，进行句式结构的调整，但因其在原文理解上不如职业译者准确而高效，必须通过反复调整，才能最终确定语篇的逻辑关系。初学者 S2 一开始没有对原文长句进行断句，在逐步译出全句细节之后，才考虑对句子进行组织。这种类似于先堆砖头再搭框架的做法，不利于处理复杂句式，因此在 S2 的译文中，出现了严重的逻辑连贯问题。

该处策略结构比较还体现了三类译者在处理“结构与内容”，或者说“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上的先后顺序。职业译者 S18 通常是决定句子结构、把握宏观问题在先，处理细节内容、微观问题在后，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策略模式，这一策略模式与 Nord 在功能翻译理论中提出的翻译问题的处理方式是一致的（参见张美芳 2005:64）。半职业译者 S9 总体而言采纳的也是“自上而下”的策略模式，只是贯彻得不够彻底，在考虑结构时也会分散精力考虑细节，因此需要对原文进行反复分析，才能确定结构。当然，半职业译者也存在能力上的局限，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把握原文结构，需要借助对内容的理解来分析结构。初学者 S2 的案例充分体现了“自下而上”策略模式，即首先采用检索策略获取句子所有的内容细节，最后才考虑句式的组织与整合。

结合 18 位被试在该问题上的表现，我们发现，职业译者普遍重视并能有效地对句子结构进行调整，译文语篇连贯性强，文从字顺。比如下例：

例 6.2 (S14/professional/V1)

(TAPs): (5) 嗯——怎么来想一想 / 尽管我们 / 实际上如果我不
要后面那些定语, 就是说 -, 我们要——用创造力, 来定义我们的思维, 思
维.....[3s] 后面只是说明是什么样的创造力 / 对, 那就把这些都放在后面,
这样子句子看起来就比较精简一点, 没这么复杂。

(6) 我们的程序是非常的复杂, 尽管我们 / △可能.....[3s]需要.....▲
用.....[5s] △创造力.....▲来定义——思维.....[4s]△创造力, 来定义 - 思
维。▲ / 然后把后面的定语全部放到后面来说明 - 是什么样的创造力 /

初学者关注句子结构调整的人数较少, 只有 1/3 的被试提出要进行结构调整,
另外, 初学者调整的效果也不理想, 比如被试 S3 调整后的译文:

例 6.3 (S3/novice/V1)

(译文): 虽然我们可能觉得思考就应该是创作, 可能是编写一部伟大的
剧本, 或是谱写一曲美妙的乐章, 发现一个天才的科学理论, 伟大的道德
审判, 但其实我们的“程序”比这些都要复杂的多。

S3 对译文作了大幅度的结构调整 (原文第一个分句放到了译文句末), 但这
一“大手笔”导致的偏差也不少: 原文的因果逻辑关系在这里成了转折关系; 原文
句首与上文句末关于“人脑”和“电脑”的对比, 在译文中成了“人脑”和“人的
创造性活动”的对比。可见, 初学者即便关注到句式调整的重要性, 也不一定能在
决策过程中准确、快速、有效地获得解决方案。这体现了职业译者和初学者在解决
语篇连贯和结构调整等宏观问题上的能力差别。

6.2.1.2.3 结构层面策略效果

上文从衔接手段的处理、语篇连贯与结构调整两方面分析了职业译者与其它译者的差别，总体而言，职业译者善于运用上述策略结构来组织、调整结构层面的翻译问题。译文评估中，我们列出了专门针对结构层面的评分项目，借此来辅助验证策略结构的运用效果：

表 6.15: 结构层面评估成绩总平均分（单位：分）

被试类别	衔接手段（满分 10 分）	逻辑连贯（满分 10 分）
初学者	6.08	6.00
半职业译者	6.58	6.83
职业译者	7.83	7.92

上表显示，初学者在衔接手段和逻辑连贯等方面的成绩最低，而职业译者最高，这说明，职业译者在结构层面实施的策略结构，获得了最理想的翻译效果。

6.2.1.2.4 小结

职业译者较为重视结构层面的策略，并且在决策过程中始终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小到衔接词语的选择，大到篇章结构的调整，职业译者都给予充分的重视，而且十分善于处理，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职业译者在结构层面的策略特点是“把握整体”并“关注重点”。

我们可以从职业组被试 S13 在翻译文本一第三段时的 TAPs 看出职业译者对篇章结构的整体把握：

例 6.4 (S13/professional/V1)

(TAPs)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如此的复杂 / 噢，工程如此浩大，so much more.....[3s]though, 尽管，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 我们，might like to, define, 我们可以设置，思考，这个概念，in terms of, 在这个 creativity 创造性这方面去设置，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3s]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这个创造力可以去写一部伟大的剧本，或者去谱写一曲伟大

的交响乐,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 [2s] / 确信, 思考, 一个,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一个伟大的, 思考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 或者一个非常复杂的伦理的判断, 在那种意义上,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是不能够思考的,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 嗯, 也是, and neither can, 呃 - 大多数人类也是不行的,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是不能思考的, neither can most humans, 大部分人类△.....要复杂 / (噢)。

这一节 TAPs 为时 94 秒, TAPs 内容显示, 被试在完成整体把握之后才开始仔细翻译并打字输入译文, 可见此时被试并没有进行正式的翻译, 而是把眼界放宽至整段文字, 意在作一番提纲挈领式的把握。这段原文包含一个长达 44 个单词的长句, 结构非常复杂(含有结果状语从句、定语从句等数个从句以及若干多样的不定式结构)。被试显然已经有所注意, 于是先通过阅读的方式, 一方面完成初步理解, 一方面努力对语篇的组成结构有个整体概念。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这种“先睹为快”的做法在其他译者(包括非职业译者)中并不罕见, 但职业译者 S13 除了同其他个别译者一样做到了对原文意思有个大致领悟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还成功地把握了原文的逻辑形式和语句结构, 这一点在 TAPs 中的主要表现是他对原文某些“关节点”词语所做的“半译半读”的处理, 比如: “though, 尽管”, “in terms of, 在这个 creativity, 创造性方面去设置”, “在那种意义上”, 等等。

相比之下, 非职业译者在结构层面的策略水平明显较低, 具体表现有两类: 一类是缺乏整体安排结构的意识。尤其是初学者, 关注词语衔接及语句结构的人很少, 只有 1/3 的被试在口头汇报中曾提出要进行结构调整, 而且很多是在问题解决的半途中由于翻译受阻才产生的想法, 所以仍然是一种被动决策。另一类是缺乏掌控能力, 顾此失彼, 耗时多而收效少, 或者干脆想当然地随性处置, 易致偏误。比如半职业译者 S11 解决“though”的翻译问题的案例:

例 6.5 (S11/semi-professional/V1)

(TAPs): (2) 呃.....[4s].....以至于, so-that, 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们可能会—— / (这里) though,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3s]我们仍然 / (要复杂的多) / 是不是可以不用去翻译这个 though。

(译文) 我们人类的这种‘程序化’比电脑的程序要复杂得多。我们在考虑如何定义‘思考’的时候可能会用是否具有‘创造性’作为思考活动的标准.....

在遇到“though”这个连接词难点时, S11 曾经尝试解决问题, 但屡试不爽, 于是决定将该词略去不译, 这样无奈又武断的决策, 导致其最终译文缺少转折连词, 没有完整地传达出原文含义, 表述略显生硬, 语句也欠通畅。

6.2.1.3 功能层面策略结构比较

这里所说的功能层面策略即译者为解决语用功能层面的问题而实施的翻译策略。对译者来说, 功能层面的策略需求主要来源于翻译述要和译文期望结构。如何贯彻翻译述要, 如何落实译文期望结构, 体现出译者的功能层面策略结构的特征。

6.2.1.3.1 翻译述要的贯彻

“translation brief”在汉语中有不同的翻译, 仲伟合(1999)译为“翻译要求”, 张美芳(2005)译为“翻译纲要”, 李德超(2005)则译为“翻译述要”。事实上, 追溯“brief”本身的出处, 它和“授权”(commission)、“任务”(assignment)、“指导”(instruction)几个术语都是译自德语Übersetzungsauftrag一词, 指的是同一个概念, 即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鉴于“translation brief”既是对翻译任务的概述说明, 又是对译者提出的要求, 本文暂采用“翻译述要”这一汉语表述。

在TAPs翻译研究中, 翻译述要指的是进行TAPs实验之前, 研究者就即将进行的翻译任务对被试所作的具体说明和要求。TAPs翻译研究证明了功能主义者的观点, 即翻译述要的确对译者的翻译过程——包括翻译策略和翻译步骤的确定, 都有很大的影响(李德超 2005:32)。

Gerloff 提出：“成功翻译的关键之一在于营造和保持一种语境意识，且这种语境意识的营造主要靠译者对翻译述要的了解和在翻译过程中不断与之保持一致”（Gerloff 1988:159）。Jääskeläinen（1987; 1989a）认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述要的运用和敏感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的翻译水平或对翻译工作的熟练程度。Jääskeläinen（1989a:90-91）通过对两组译者（职业和非职业）的TAPs实验发现，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诉诸于翻译述要作为确定决策的一个标准（如决定整篇译文的风格），这在他们决定增删译文内容时更是如此；非职业译者则因为大脑的认知处理大多用于原文理解上，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无暇关注翻译述要，只有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偶尔会参考翻译述要进行决策。Fraser（1993）在TAPs实验中非常关注翻译述要的研究，她第一次通过12位社区译者翻译政府公文的过程发现：对于部分职业译者，即便在实验前没有获悉翻译述要，他们在解决特定的翻译问题时均能自己假设一种翻译述要，并把它贯彻始终。Fraser（1994）再次通过对21位自由职业译员的TAPs实验证明翻译述要确实对职业译者的翻译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德超作了如下总结：“相对于非职业译者而言，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注重翻译述要对自己翻译决策的指导作用。在职业译者的翻译过程中，小到词汇层面的翻译问题，大到整篇译文的风格或增删译文的原则都要参考翻译述要；而非职业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则往往忽略了翻译述要，或只是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才会求助于翻译述要，这就往往使他们的译作风格前后不一致”（李德超 2005:32）。

本文虽然没有专门针对翻译述要进行研究，但是不同被试英译汉过程的TAPs材料，还是体现了他们对翻译述要的不同重视程度。我们在实验前为被试提供的翻译述要包括：译文一和译文二分别拟可发表于大众期刊的科普栏目和名人演说辞栏目。被试翻译的参考时间为每篇30分钟，共一小时，但被试可以依据任务的完成情况适当提前或延后交稿。当然，正如Fraser（1993）指出的那样，翻译述要还包括

被试自己假设的翻译要求，这在我们的统计和分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通过对译文一全文TAPs数据⁴的定量统计，我们获得以下结果：

表 6.16：三类被试在文本一翻译过程中考虑翻译述要的次数

	人数（人）	考虑翻译述要的次数（次）
职业译者	6	10
半职业译者	6	7
初学者	6	0

上表显示，职业译者和半职业译者在TAPs数据中均有多次论及翻译述要，而所有初学者的TAPs文本均未出现考虑翻译述要表述和迹象，可见初学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述要不够重视。同样关注翻译述要的职业译者和半职业译者，前者更善于参考翻译述要来解决问题，我们通过定性比较来体现这种差别：

例6.6（S15/professional/V1）

（TAPs）：第一句就是，△电脑 / 电脑可以思考吗 / 这大概没什么问题 / 这取决于你怎么样 / 定义思考▲是说这取决于思考的定义还是说你怎样定义思考，…… [2s] 如果是学术论文的话可能就是说，取决于思考的定义，但是我觉得这个文章的笔调好像不是特别的学术，所以就是说，先暂时翻译成 / 这取决于△你怎样定义思考吧 / 如果不对的话等一会儿再看 / ▲嗯，这个我也有点受到汉语的影响，因为汉语的很多文章，就是我们看很多汉语的文章也讨论这个问题。

例 6.7（S15/professional/V1）

（TAPs）：这样的步骤在今天一些 / 那么，在今天一些非常简单的电脑就已经可以完成 / **这样的**步骤在今天甚至一些非常简单的电脑就已经（可以完成）。△这样的步骤在今天，甚至一些▲非常简单的电脑就已经可以完成。 / 嗯，这个地方用得比较口语化，就暂定为这篇文章是一个科普文吧，

⁴ 该处考虑到译文一第三段数据所体现的翻译述要数目不足以体现三类译者的差别和趋势，故取译文一全文的翻译述要统计数据。

因为它讲的内容好像是比较（普及性的）。当然许多数学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机械地多次重复一些简单的步骤，**这样**…… [4s] ……而这 / 在今天甚至 ~ 就已经可以完成 / **这样的过程** / **这一过程** / **这一过程** ↓ △ 这一过程在今天 / 这一 / 这一 / 这样的过程 / 这样的过程在今天 / 这样的过程在今天甚至是（非常简单的电脑就已经可以完成）。嗯，看一下原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章……ok，因为它注里面写说这个作家是一个——科普小说作家，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读者，所以这个翻译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翻译得比较通俗一点。

例 6.8 (S9/semi-professional/V1)

(TAPs): “process”过程，看一下“process”（查金山词霸），翻译这种科技的文章，一般不大确定的词都要查一下，它在这种科技文中就有别的意思。通过重复一定的……直接……处理。在辞典里面“process”特别注了一条，在计算机的术语里面就是“处理”的意思，那么我就把它翻译成“处理”。

例 6.9 (S9/semi-professional/V1)

(TAPs): 然后，受精卵一形成的时候，我把它改成形成伊始，这样好像听起来文学性强一点，否则太大白话了。

职业译者 S15 在翻译过程中，能较好地利用翻译述要来辅助解决翻译问题，而且能把翻译述要贯彻始终；半职业译者 S9 虽然也能利用翻译述要来解决问題，但不能贯彻始终。比如例 6.8 中 S9 已经提出这是一篇科技文的翻译，主张用计算机术语来翻译文章中的词汇，但在例 6.9 中却不考虑科技文体翻译的一些基本要求，把原本平实的表述改为富有文学性的表述，使译文在修改后留下措词问题。

6.2.1.3.2 译文期望结构的落实

德国功能学派在论述其理论观点时经常用到的词汇有 *skopos*（目的）、*aim*（目标）、*purpose*（目的）、*intention*（意图）和 *function*（功能）等。为了避免混淆概念，Nord 提议归类为“意图”和“功能”：“意图”是从发送者的角度定

义,“功能”这是指根据接受者的期望、需求、已有知识和环境条件来决定使用文本的功能。Vermeer 在其目的论框架中指出,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译文所意旨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Nord 1997: 12)。Nord 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建基于 Reiss、Vermeer 等功能理论,其“忠诚”(loyalty)主要指“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责,对原文信息发送者(或发起人)和目标读者负责”(Nord 1991: 28-30)。

译者对翻译述要的贯彻体现了译者对原文信息发送者的忠诚,译者对目标读者负责的忠诚则主要体现在译文期望结构的实现上。Nord 指出,要准确了解读者对译文的期望也不容易,因为此方面仍然欠缺广泛的实验式研究。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译者必须依赖于自己的推测及从客户与读者那里得到的少之又少的反馈信息来决定翻译策略(Nord 1997:125)。我们的 TAPs 数据也存在这种情况,即被试无从获知读者真实具体的反馈信息,因此在他们的报告中主要依赖自己的推测来进行翻译决策,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把读者期望结构表述为译文期望结构,意指“被试通过自身推断所提出的译文应当具备的期望结构”。

通过对译文一全文TAPs数据的定量统计,我们获得以下结果:

表 6.17: 三类被试在文本一翻译过程中考虑译文期望结构的次数

	人数(人)	考虑译文期望结构的次数(次)
职业译者	6	24
半职业译者	6	21
初学者	6	3

上表显示,职业译者考虑译文期望结构的次数最多,半职业译者其次,初学者最少。这说明,译文期望结构的落实与翻译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

我们发现,译者在考量译文期望结构时,关注最多的是“汉语表达方式”,比如:

例 6.10 (S15/professional/V1)

(TAPs):先单独看一下汉语符合不符合中文的习惯;这地方汉语应该强调一下吧。

例 6.11 (S17/professional/V1)

(TAPs):这样的话就更符合汉语里面的一些习惯;同样道理,也是把英语里面的被动句转换为汉语里的主动句,更加符合汉语的习惯。

例 6.12 (S18/professional/V1)

(TAPs):按照中国习惯是,这个得加一点。

例 6.13 (S14/professional/V1)

(TAPs):应该按照中文的习惯;这个句子应该放到前面来,符合汉语习惯。

例 6.14 (S7/semi-professional/V1)

(TAPs):好像是,中文会觉得比较近一点吧。

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少译者以译文通顺作为期望结构,比如:

例 6.15 (S15/professional/V1)

(TAPs):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地通顺,我感觉;换成两句可能会比较通。

例 6.16 (S18/professional/V1)

(TAPs):这脑力工作是我加进去的,否则就不顺了。

例 6.17 (S7/semi-professional/V1)

(TAPs):这样翻可能顺一点;计算机能思考吗? 嗯, 那可以加一些会让它通顺嘛。

例 6.18 (S9/ semi-professional/V1)

(TAPs): 那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思考, 这样翻译起来比较通顺一点;It is frequently said 如果把它翻译成怎么怎么说好像不是很自然, 所以翻译成众所周知。

在调查问卷中, 我们专门设计了这样的问题: “在这次实验中, 当思维中出现多种译语选项时, 我通常根据 _____ 来进行选择。” 选项包括语感、语境、译语表达习惯、译文语体风格、是否准确、是否通顺等。调查结果如下:

表 6.18: 调查问卷显示的被试的决策依据 (单位: 次)

被试类别	语感	语境	译语 表达习惯	译语 文体风格	是否准确	是否通顺	其它
初学者	3	2	1	0	1	1	1 ⁵
半职业译者	0	1	3	2	0	1	0
职业译者	0	1	2	2	1	2	0
合计	3	4	6	4	2	4	1

调查结果显示, 有 1/3 的被试认为“译语表达习惯”是其作决策时的主要依据; 而这些被试中, 又以半职业译者和职业译者为主。“是否通顺”的标准占了 2/9, 与语境、译语文体风格等选项并列第二。调查数据结果和 TAPs 数据的定性分析结果说明, 译者对译文最基本的期望结构是“译语符合汉语表达方式, 并且通顺流畅”。

6.2.1.3.3 功能层面策略效果

⁵ 初学者S1 在回答该问题时, 除了选择“语感”作为其决策的依据, 还选择了“其它”, 并指出是“字典”。

上文从翻译述要的贯彻、译文期望结构的落实两方面分析了职业译者与其它译者的差别，总体而言，职业译者善于运用上述策略结构来解决功能层面的翻译问题。译文评估中，我们列出了与功能目的相关的评分项目，借此来辅助验证策略结构的运用效果：

表 6.19: 功能层面评估成绩总平均分（单位：分）

被试类别	语体风格（满分 10 分）	功能目的（满分 10 分）
初学者	6.00	6.42
半职业译者	6.50	6.83
职业译者	8.00	7.83

上表显示，初学者在语体风格和功能目的等方面的总平均分最低，而职业译者总平均分最高，这从译文评估的角度说明，职业译者在功能层面实施的策略结构，获得了最理想的翻译效果。

6.2.1.3.4 小结

毫无疑问，优秀的译者应当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信息传递者。通过对比三类被试在功能层面的策略结构可以发现，相对于半职业译者和初学者，职业译者具备更强的职业责任感，心理上更重视自己的译者身份。

译者既要准确理解并转述原文意思，又要运用译语进行恰当地表达，因此，他们必须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任务、翻译目的、译文目标等有所关照。从这方面看，职业译者的长处往往体现为对于翻译述要和译文期望结构的高度敏感性。前文例 6.6 和例 6.7 中被试 S15 的 TAPs 实例对此已有很强的说服力。以下我们再来对比职业译者 S17 和初学者 S6 的两段 TAPs 文本：

例 6.19 (S17/ professional/V1)

呃 - 第三段 / 第一句话，非常长的句子 / 句子结构也非常复杂 / 其实有好些转折关系，连词 / 〔读原文〕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这句话大概意思是说 - / 我们人类这种程序很显然比计算机要复杂很多 / 因此呢 - / 我们对所谓思维的定义, 是要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定义的 / (更严谨一点) / 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思维进行定义。这句话, 尽量 / 英文原来句型, 尽量 / 翻译汉语, 句型跟英文对应, 尽可能短句, (汉语里面主要短句为主) / 尤其科技文, 长句 ~ / 按意群, 对长的断句。

例 6.20 (S6/ novice/V1)

第三段。〔读原文〕 Our “program”.....[5s].....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哇这句好长啊。) Our “program”,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so much more.....enormously, (什么意思?) / ◇〔金山词霸〕enormously, enormous 巨大的, 庞大 enormously, 巨大的, 非常的◆ / ◇〔金山词霸〕**greatly**, greatly◆ / greatly, enormously, 前面还加个 so much more, 那就是超出常规的喽, 非常非常的, 或者是超出想像的 /

职业译者 S17 通过阅读, 迅速获取了原文大意, 并且马上对该文的翻译有了整体把握。接下去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考虑文体风格, 适用于该文体的句型, 根据句型而调整的断句方法, 以及译语表达习惯等; 最终的译文也在功能上达到了翻译的要求。

初学者 S6 在最基本的语义理解上就存在不少问题。初读原文时首先对长句产生戒备心理, 对句中的一些词汇意义也比较模糊, 一再通过词典查询来获得词义和句意的理解。被试 S6 费时费力地完成该段翻译任务, 自始至终没有提及任何翻译述要或译文期望结构。

可以看出, 非职业译者在更大程度上把翻译视为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或必须应付的挑战, 在翻译过程中, 他们所付诸努力的不是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架起沟

通的桥梁，而只是以译者的身份完成读者所做的事。换句话说，对非职业译者来讲，在把原文翻译成译文的过程，与其说是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原文，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信息，不如说他们只是在通过另一种语言表达并确认自己对原语文本的理解。这显然也和非职业译者在翻译能力上的欠缺不无关系。一般情况下，具备较高职业水平的译者，基本上不存在对原文的理解困难，因而可以很自然地把眼光放到诸如原文文体、作者旨意、译语习惯、译文风格、读者期望等更高层次的需求上来。

6.2.1.4 监控策略结构

表 6.20: 策略结构对比—监控策略结构

被试	序列	原文	被试 TAPs	说明
S18 职业译者	8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5s] 创造性往往指的是人们在创作一出大戏、一部交响乐，构思一个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抑或一个深刻到位的伦理标准时↓ / △所 / 动用的 / 【哑嘴声】 / 动用的——▲[2s] 动用的， 脑力思维 / 脑力工作 / △动用的脑力工作。 ▲	被试重新整合前面的译文，发现句意不够完整，于是根据译文期望结构，在原来的译文中增加了“动用的脑力工作”一语。
S9 半职业译者	10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嗯这个翻译还是要，等一下还是要推敲一下，这个搭配好像有点问题。那么这个句子很长，呃—我把它分成了两个句子，嗯—前面一个 though 这里虽然、但是，虽然我们的程序要复杂得多，但是我们可能会把思考与创造力联系起来。然后后面这个，很长的这个分句，我把它分成另外一个句子，补充说这个创造力涉及到什么。	被试再次对上文的一个长句子作了分析，以理清自己在句子结构上的思路。
S2 初学者	9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读原文】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 we / though /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e~ /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 /[9s]..... /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这个意思应该是，跟前面的对比，怎样把它组织起来？.....对比一套杰出的科学理论或者一项 / 意义深远的伦理标准	被试在逐个获得词汇或词组的译文之后，考虑把零散的部件组织成句子。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5s].....ok 把它放前面去，可能比较符合习惯 / △以至于与一套杰出的科学理论，或者是 / 相比，我们更倾向于，更倾向于，认定，思考，就是创造，比如说，写一部▲ /	
--	--	--	--

监控策略结构是指译者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监测两者是否达到功能对等，以及译文是否符合读者的阅读期望等。具体来说，翻译过程中的监控策略主要是译者的元认知⁶在起作用。通过元认知实施的监控策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能跳出具体问题本身，站在元认知层面，观察和反思自己在翻译中认知过程的各个环节，以便及时洞察其中问题，自觉调整认知活动方式，减少错误，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三类译者在实施监控策略结构方面的差别如下：

职业译者 S18 在解决句子所有细节问题之后，下意识地使用监控策略检查句子的翻译的完整性。当他发现译文表述不够完整时，从读者的阅读期待出发补充原文隐含的内容，使译文明晰化（explicitation）。半职业译者 S9 也采取了对译文的整体监控，其监控策略的重点放在宏观结构上。整个过程中该被试都在自我说服，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初学者 S2 没有实施监控策略，在步骤 9 以前，他所有的工作都在实施检索策略与推理策略，包括词义查询、搭配处理等，步骤 9 是 S2 对句子结构的第一次组合。由于缺乏必要的监控策略，S2 机械组合得出的译文与原文在意义上大相径庭。

结合 TAPs 数据图，我们统计出不同类型的被试对该复杂句式使用监控策略的情况，70%左右的职业译者在解决该复合句的细节问题之后，均实施监控策略对此进行修整和核查，50%左右的半职业译者也使用了监控策略对复杂句进行完成和调整，但只有 17%左右的初学者在该句翻译时使用了监控策略。这表明，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监控策略的频率最高，而初学者则基本上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对于微观问题的关注远大于对问题或文本的全局把握与监控。统计结果支持个案比较时的分析，即译者的翻译职业水平越高，对翻译问题的宏观监控意识越强。

⁶ “元认知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关于自己思维活动和学习活动的认知和监控”（董奇 1989: 73），换言之，元认知是以个体自己的认知活动本身作为对象来展开的又一层面的认知活动，因此可以简单定义为“对认知的认知”，其实质是人对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控。

此外，TAPs 语料还表明，职业译者在实施监控策略时往往采取换位思维的方法，站到原语作者的角度审视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或者站在译语读者的角度来监控译语的表达。

例 6.21 (S14/professional/V1)

(TAPs): (In that sense,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and)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 大多数的人，也不~也不行.....[3s] 那么——好像要把这个后面的，大多数的人和计算机一起作一个主语，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数的人和计算机都不具备思考~，这个，这样子比较好，这样比较符合汉语表达。△大-多-数-的-人，和计算机，当然▲.....[3s]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计算机当然不具备思考能力/△[2s]▲/嗯↓，不行↓，还是放在后面，因为它有一个-反讽的效果，计算机是当然不具备，那实际上大部分人也不具~，所以放在后面具有反讽的效果，这样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计算机当然不具备思考/然而!对，它本来是用的 and，但是因为要实现它的反讽效果，所以最好是说一个转折一下，△然而-大多数-的-人/也是如此.....对↓/.....▲

例 6.21 中译者 S14 首先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表述的需要，决定将英文的并列句翻译成汉语的简单句，以符合汉语表达。就在被试准备键盘输入时，监控策略开始起作用，被试换位站在原文作者的角度，发现原文需要传达一种反讽效果，于是考虑对最初构思的译文进行调整，以图在译文中传递这种反讽效果。在译文表达时，译者又换位站在译文读者的角度，发现英文中以倒装形式表达的反讽效果在汉语中必须借助词汇手段，需要将并列连词“and”用转折连词“然而”来翻译。上例这种角色转换策略在职业译者实施监控策略时相当常见，译者分别站在不同的角色对“理解”和“表达”进行反思，一方面是对阅读理解的监控，防止自己的主观性导致对原作意义的曲解；一方面增强译文与读者的适应性，减少源语表达习惯对译语表达的干扰，消除读者在信息接收和处理上的障碍。当然理解和表达在思维过程中往往同时发生，上例为了说明问题把两者刻意作明显的分割。

6.2.1.5 翻译技能意识

翻译的技能意识，指翻译者能够力求以翻译理论（包括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的自觉性，能够或力求以翻译理论的准绳（常表现为某种技能规范）自觉地指导或检验自己的译作以及整个翻译过程（刘宓庆 1999:252）。Newmark 指出：“译者会比其他职业的实践者更多地面对各种选择……在作选择时，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某种理论”（Newmark 1988: 8）。有的翻译家，尽管没有强烈的理论意识，但他（她）们都遵循自己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正如李芒先生所说的：“您问我在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时，有没有比较明确的追求和标准，我想不管在翻译一篇作品之前，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多年的实践中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主张”（参见许钧 2001:28）。这里指的“一套主张”，实际上就是翻译家已经内在化（immanentization）了的，由必然转化成了自由的翻译技能规范或原则，

不少学者通过TAPs实验对翻译技能意识进行了分析，Tirkkonen-Condit & Laukkanen（1996）认为口头报告中的评估性表述反映了被试头脑中的主观翻译理论，例如下面这段 TAPs 数据就反映了被试头脑中潜在的理论原则，以及面对多种翻译述要时犹豫抉择的现象：

Translation teacher/TAPs: oh heck (9.0) but *I don't have to aim at a perfectly (.) natural English format* as this is (.) as it will be known that it's a (4.0) translation (.) translation and that it (7.0) belongs to a corpus of sample texts .

（Tirkkonen-Condit & Laukkanen 1996:50; 斜体部分为原文作者标注）

Professional translator/TAPs: SULKAVA HOLIDAY CENTER (1.0) this is *still a bit problematic* but I wonder if I should put this in Finnish or in English *it would depend on the employer and his wishes because there are of course two ways of doing it.*

(Tirkkonen-Condit & Laukkanen 1996:49; 斜体部分为原文作者标注)

Tirkkonen-Condit (1997) 的研究发现, 翻译的熟练程度可以反映在被试所表述的理论与原则中。具体而言, 职业译者会比较明确地根据自身掌握的理论与原则进行决策, 而非职业译者缺乏理论与原则的指导。这说明: 翻译理论与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为职业译者专业技能的一部分。

Jääskeläinen (1999) 提出: 职业译者比非职业译者在口头报告中提到更多的翻译原则……职业译者总能汇报出清晰的原则和指导标准, 非职业译者报告中的翻译原则往往含糊不清。并且非职业译者对于读者有怎样的期待不是非常明确, 他们也不确定应当遵循何种翻译原则。比如下面的问题:

Layman/TAPs: should one think about that as well, that this would be good Finnish or like just getting the idea translated? (Jääskeläinen 1999:182)

在我们对比分析的三类译者数据中, 同样发现了翻译理论与原则对译者行为的指导。比如例6.22的职业译者S18在解决问题时提出:

例6.22 (S18/professional/V1)

(TAPs): 这个“但是”放到前面去, 后面就不象汉语了。……但是, 还是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句子, 后面太长了, 状语这么长, 状语从句, 分成两个句子。

对比三位译者文本一第三段的 TAPs 数据图发现, 职业译者S18在10次问题解决行为中, 有3次策略行为考虑到了翻译理论与原则; 半职业译者S9在11次问题解决行为中, 有1次策略行为考虑了翻译理论与原则; 而初学者S2的12次问题解决行为均没有提及翻译理论与原则。因此, 我们假设, 在三类译者当中大体存在这样的趋势: 职业译者参考理论与原则的频率最高, 半职业译者其次, 初学者最低。这一假设可以借助文本一第三段的TAPs数据图进行小规模的验证, 统计数据如下:

表 6.21: 三类被试在文本一第三段翻译过程中使用翻译理论与原则的次数与频率

	问题总数 (个)	翻译理论与原则的 使用次数 (次)	翻译理论与原则的 使用频率
职业译者	50	13	26.00%
半职业译者	58	12	20.69%
初学者	62	1	1.61%

表6.21的数据支持了前面的假设, 即: 在问题解决过程中, 职业译者参考理论和原则的频率最高; 半职业译者次之, 但与职业译者相差不大; 初学者最少, 参考理论与原则的频率与前两类译者相距甚远。由于这是基于18位被试作为三类译者的总体比较, 因而我们认为, 该统计结果足以反映出不同译者在翻译理论与原则的运用方面的差异与趋势。

对于形成这一趋势的原因, 我们认为可能是:

在三类译者中, 职业译者通常来说有着较为扎实的翻译理论基础, 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翻译原则与风格。考虑翻译理论及原则, 对他们来说能够起到更加明显的帮助作用, 使他们得以更有效地解决翻译问题。例6.23职业译者S17的TAPs 数据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例 6.23 (S17/professional/V1)

(TAPs): **尽量** / 尽量, 能够, 采取英文原来句型, 尽量使汉语的翻译句型和英文的翻译句型进行对应, 同时尽可能使用短句, 因为汉语里面主要以短句为主, 而英语里长句居多, 尤其是在科技文里面长句居多, 所以尽可能按照意群, 来对英语里的长句进行断句。

一般而言, 半职业译者也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以及这些理论的应用实践经验, 但是通常情况下, 他们在对理论的理解程度和应用能力上达不到职业译者的水平。正是由于对理论原则的熟练程度并不太高 (甚至偶尔出现误用), 他们的翻译原则没有像职业译者那样固定下来, 没有完全形成一贯的风格或稳定的思路, 因此, 针对不同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同类问题, 依然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原则去处理。这样的做法很容易使翻译质量得不到保障, 译文水平不够稳定。

和以上两类译者相比，初学者的翻译理论修养不高，更称不上自己的翻译原则和风格，因此他们的翻译问题解决行为的随意性比较大，始终就事论事，针对眼前某一问题进行判断和决策，不考虑一类问题的处理原则。这也正是初学者译文质量欠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6.2.1.6 极小极大原则

极小极大策略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指对弈者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力求最优的对抗策略，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得益最大化。翻译既然是作选择的过程，必然存在“得”与“失”的矛盾对抗，译者必须根据具体情境，选择最佳的办法，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Levy 在 1967 年最先提出在翻译过程中发展极小极大策略，他指出：

翻译理论有标准化的趋势，来指导译者作出最优选择。真正的翻译工作是注重实效性的，译者面对各种潜在选项进行决策时，应当使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效果，即所谓的极小极大策略。

例如，过去人们往往认为翻译诗歌时毫无疑问应该在音韵上保留原诗的元音，因为元音可能在表达诗歌情感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最主要的）。但在译文中保留元音势必使任务复杂化，译者为此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所以现代译者宁肯抛弃这种做法。（Levy 2000:156）

Levy 认为，由于翻译工作的重实效性基于极小极大策略，所以人们应当而且可能利用相应的数学方法推算出译者在决策过程中优先考虑的因素（Levy 2000:156-159）。他设想建立一个翻译的生成模式（generative model），从而有可能明确、详细地指出译者在翻译不同类型的材料时，所有影响决策过程的因素。

我们认为，Levy 提出的极小极大策略是对整个翻译决策过程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是策略结构选择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区别本文论及的其它策略结构，我们主张用“极小极大原则”（minimax principle）来代替“极小极大策略”的表述。同时我们将Levy的极小极大策略作进一步的拓展：即极小极大原则不但体现在职业译

者的决策过程中，也体现在职业译者的决策结果上。具体而言，极小极大原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翻译过程中大部分理想的策略结构都是译者遵循极小极大原则的结果，该原则不但体现在意义、结构、功能等内部的策略结构选择上，也体现在意义、结构、功能之间的取舍上。

其次，译者在使用监控策略结构，或者根据不同的翻译理论或原则进行决策时，参照的也应当是极小极大原则。

最后，理想的翻译行为是译者遵循极小极大原则的产物，因此译者的翻译结果与翻译耗时也应该体现极小极大原则，即运用最经济的时间获得最佳译文。

由于极小极大策略或极小极大原则是从翻译过程的策略或结果中抽象出来的，因此基本上不会明显体现在 TAPs 数据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 TAPs 语料库中找出下面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例 6.24 (S18/professional/V1)

(TAPs) :以至于我们总喜欢用创造性来界定，“thinking”，还是有引号的 / △思维， / 还是加一个“这个词”吧，尽管重复一点。

例 6.24 的极小极大原则体现在意义层面的决策上。被试 S18 在翻译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时，最初考虑尽量保持原文的形式和内容，但发现英文原文中 “thinking” 是 “有引号的”，这表明它所指的是 “思维” 这个名词及其意义，而非思维这种行为本身，译成汉语 “以至于我们总喜欢用创造性来界定思维” 就会显得表义不明；而增加 “这个词” 又显然是额外之举，有重复之嫌。权衡之下，被试决定以避免语义模糊为重，于是在译文中增加了 “这个词”。

其实上文的例 6.21 也体现了极小极大原则的作用。被试 S14 遇到遵循译语表达习惯与传达原文修辞效果之间的矛盾。按照译语的表达习惯，译者认为应该作结构调整，把 “计算机” 和 “大多数的人” 放在一起作主语；但同时发现原文将计算

机和人类分别叙述，在意义上“具有反讽的效果”，有必要在译语中传达出来。权衡之下，放弃前者，保留后者，努力实现译文效果最优化。笔者借用例 6.21 除了体现极小极大原则的作用之外，还想说明，极小极大原则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翻译过程所有的选择行为，当然也包括译者实施的监控策略结构。

6.2.2 翻译策略结果比较

我们主要通过译文评估成绩和被试翻译耗时来衡量策略结果。译文评估成绩参照译文评分表的总体评价，翻译耗时为被试翻译文本一第三段所耗费的时间。三位译者的译文、翻译耗时和评估成绩见下表：

表 6.22: 三位被试 (S2、S9、S18) 译文、评估成绩与翻译耗时

被试	译文	“总体评价” 平均分 (分)	耗时 (分钟)
S2 初学者	但是我们的基因程序却要复杂的多，以至于与一套杰出的科学理论或者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伦理标准相比，我们更倾向于认定思考其实就是创造，比如说写一部戏剧或者谱出一曲非常不错的交响乐。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计算机绝对不能够思考，大多数人类也一样。	5.5	11.45
S9 半职业译者	尽管我们的程序要复杂得多，但是我们可能会把思考与创造力联系起来。这一创造力涉及到创作一部伟大的剧作，谱写一部伟大的交响乐，孕育一条精妙的科学理论，或者一个深刻的道德判断。照这样来看，计算机当然不能思考，大多数人也不能思考了。	7	9.65
S18 职业译者	然而，我们的“程序”复杂之极，以至于我们总喜欢用创造性来界定“思维”这个词。创造性往往指的是人们在创作一出大戏、一部交响乐，构思一个精彩绝伦的科学理论抑或一个深刻到位的伦理标准时所动用的脑力工作。如此说来，电脑就不能去“思维”了，而大部分芸芸众生也难以做到。	8.5	9.55
<p>原文: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In that sense,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p> <p>参考译文: 不过，我们的“程序”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更喜欢用创造力来界定“思考”的意义。有了这种创造力，就能写出伟大的剧本，创作不朽的乐章，提出卓越的科学理论，创立深奥的伦理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脑当然不能思考，人类的大多数也做不到。（孙致礼译）</p>			

初学者 S2 是以上三位被试中翻译该段原文耗时最多的，但其译文评估成绩却最低；职业译者 S18 耗时最少，但译文评估得分最高。因此我们假设，通过有效

实施各项翻译策略，职业译者能以最少的时间，获得最高的译文成绩。我们将通过所有被试两篇文本的翻译耗时和评估成绩来论证上述假设：

表 6.23：18 位被试的译文评估成绩与翻译耗时对照表

类别	被试 编号	译文一		译文二	
		“总体评价” 平均分（分）	耗时 （分钟）	“总体评价” 平均分（分）	耗时 （分钟）
初 学 者	S1	6.00	30.52	5.50	44.23
	S2	5.50	30.45	5.00	36.08
	S3	6.00	40.22	6.25	42.30
	S4	6.50	32.42	5.75	39.27
	S5	4.75	22.77	4.75	21.70
	S6	6.25	50.73	6.50	61.43
半 职 业 译 者	S7	8.00	39.43	8.00	42.32
	S8	5.75	32.35	6.75	49.17
	S9	7.00	26.40	7.25	28.65
	S10	6.75	33.52	7.00	34.08
	S11	7.50	35.53	6.75	36.68
	S12	5.75	37.92	7.00	27.58
职 业 译 者	S13	7.00	37.92	7.50	30.63
	S14	7.50	41.65	7.75	33.90
	S15	8.25	36.78	8.75	46.38
	S16	8.25	30.85	7.50	31.52
	S17	8.00	20.08	8.25	22.88
	S18	8.50	37.62	8.50	33.58

表 6.24：三类被试的译文评估成绩与翻译耗时统计

被试类别	译文一		译文二	
	“总体评价” 平均分（分）	耗时 （分钟）	“总体评价” 平均分（分）	耗时 （分钟）
初学者	5.83	34.52	5.63	40.84
半职业译者	6.79	34.19	7.13	36.41
职业译者	7.92	34.15	8.04	33.15

表 6.24 显示，译文一的三类被试耗时总平均差别很小，但译文评估总平均值体现为职业译者 > 半职业译者 > 初学者。译文二的三类被试耗时总平均值有较大差别，体现为职业译者 < 半职业译者 < 初学者，译文总平均值的大小关系与译文一相同，为职业译者 > 半职业译者 > 初学者。通过评估成绩和翻译耗时的对比，我们得出：通常情况下，职业译者能以较少的时间获得较高质量的译文；初学者则相反，花费了不少时间，往往还得不到理想的译文。因此，相比其它类型的译者，职业译

者的翻译结果也符合极小极大原则，即他们能以最少的时间获得最佳效果的译文，翻译效率高于其它译者。

第三节 翻译过程策略模式

通过第二节策略结构的比较，我们尝试构建职业译者的翻译过程策略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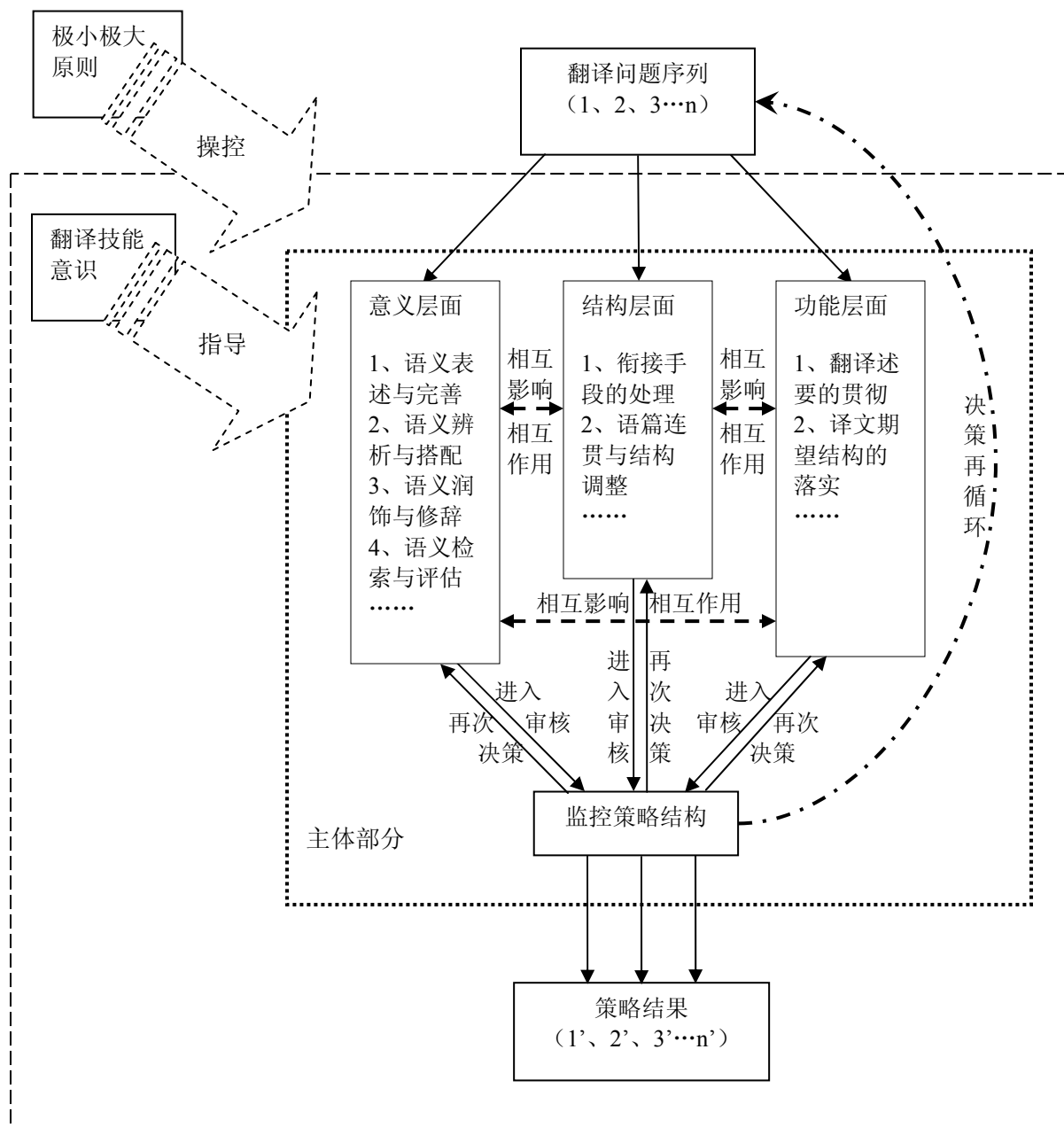
首先，翻译过程的策略模式不同于翻译过程模式，它是由翻译策略结构组成的，而翻译策略结构又由翻译策略元素构成。每一个翻译策略结构都代表一个问题解决过程，而每个问题解决过程都涉及理解与表达；翻译过程模式中的理解和表达也是互相联系、往返反复的过程，不能截然分开。当译者在理解的时候，他（她）已经不自觉地挑选表达手段；当译者在表达的时候，他（她）又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因此，我们在构建翻译策略模式时不采用“理解与表达”的翻译过程模式（cf. Nida 1969）。

其次，Bell（1991）关于翻译过程的心理模式是按照“分析与综合”模型来构建的，其中“分析”包括从句法、语义到语用的分析，“综合”包括从语用、语义到句法的综合。但是，这样的翻译心理过程模式是一种微观的⁷、理想化的模型，不适合用来描述职业译者翻译过程的策略模式。

本文尝试构建的翻译过程策略模式见图 6.2。

⁷ Bell的整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模型只用于解释一个小句的翻译过程。

图 6.2: 翻译过程策略模式图



该翻译过程策略模式图的构建主要基于本章第二节的分析与讨论。下面对模式图作简要说明。

第一、翻译过程策略模式的结构出发点是翻译问题序列，而不是翻译原文。第二章我们已经说明，翻译过程包括问题序列和非问题序列，其中问题序列与非问题序列分别对应 Lörcher (1991) 的策略型翻译与非策略型翻译。由于我们尝试构建的模式是翻译过程的策略模式，并非整个翻译过程模式，因此，同样从原文出发的非问题序列就不能包含在该模式中。也就是说，我们构建的策略模式只针对从问题序列出发、需要采用翻译策略的翻译过程。

第二、策略模式的主体部分是四个主要层面的策略结构：意义层面策略结构、结构层面策略结构、功能层面策略结构和监控策略结构。意义层面策略结构包括语义表述与完善、语义辨析与搭配、语义润饰与修辞、语义检索与评估等；结构层面策略结构包括衔接手段的处理、语篇连贯与结构调整等；功能层面策略结构包括翻译述要的贯彻、译文期望结构的落实等。每个层面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除了图中所列的主要结构，还可以适当补充其它策略结构。策略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下：首先，意义、结构和功能层面的策略结构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在模式图中我们以双向箭头表示。再者，问题序列经过意义、结构或功能等层面的决策过程，其解决方案将通过监控策略结构的审核与把关。决策结果通过监控策略结构，分流出三方面的去向：①直接反馈到策略结构本身进行再次决策；②反馈到翻译问题序列并再次进行决策循环；③确定为翻译结果。

第三、尽管翻译技能意识在翻译过程的 TAPs 数据中不容易明确地体现出来，但它时刻作用于职业译者（尤其是实践经验和理论非常丰富的职业译者）的决策行为中。职业译者在实施意义、结构、功能甚至监控策略结构时，其行为背后的依据往往是翻译技能意识，即根据自身掌握的翻译理论知识和长期实践总结的原则进行决策与选择。

第四、模式图的最外围，是极小极大原则对职业译者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的操控。极小极大原则属于翻译最宏观的意识层面，它不如翻译技能或翻译原则具体，但随时随处对翻译行为或结果实施影响；理想的翻译行为或翻译结果，应当遵

循极小极大原则。具体而言，极小极大原则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操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极小极大原则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不同层面的抉择与取舍提供了原则性的依据。这一原则不但可以作用在诸如近义词选择、句式调整、增译或者减译等具体技巧的选择上，还可以作用在翻译理论和原则的选择上：比如译者在译文的“归化”和“异化”之间难以取舍时，就可根据极小极大原则，结合具体翻译涉及的语言、文化、社会语境、赞助者、读者群等各方面因素，权衡“归化译文”与“异化译文”的得与失，最后确定应该付诸何种努力。其次，极小极大原则也为译者的整体翻译行为提供了效率参考。作为职业译者，不仅要具备译出优秀译文的能力，在翻译速度上也应当超过非职业译者，体现其熟练的翻译技能和高效率的翻译行为。因此，多数情况下，称职的译者在平衡时间与译文质量的关系时，遵循的还是极小极大原则。

第七章 结论

行文至此，本研究报告一段落。前面六章的描写、分析与论述，从文献回顾到理论概述，从研究方法的探讨到实验前测和实验设计，以及本研究最核心的研究成果，包括翻译单位的选择、决策过程的选择、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翻译策略模式的构建，完成了对英译汉过程中译者选择行为的一次较为全面的实证研究。本章首先总结本论文的研究成果，继而对翻译过程的选择行为作进一步的思考，最后对本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简要说明并对研究前景提出几点展望。

7.1 研究总结

本研究成果可以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本研究探讨了英译汉过程中译者对翻译单位的选择。通过对被试 TAPs 文本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数据统计时把翻译单位划分为“主观翻译单位”和“客观翻译单位”两种，以便更加真实细致地对翻译单位进行考察。数据分析表明：英译汉过程中翻译单位具有“指标性”和“动态性”两种特征。具体而言，“指标性”体现在主、客观翻译单位两方面，即随着翻译能力的提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运用的主、客观翻译单位均较大。职业译者运用的客观翻译单位大于非职业译者，表明其更有能力解决具体细微的翻译问题，翻译过程中因出现问题而转移认知关注点的频率低于非职业译者；职业译者的主观翻译单位也较大，表明其对原文有较宏观的把握。不同译者在翻译单位的“动态性”上的差别体现出各自认知策略的不同：职业译者的认知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在整体把握语篇意义的前提下，关注具体细节

的处理；初学者的认知模式则往往是自下而上的，首先关注字词句的翻译，遇到在词语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才会求助语境和语篇。通过分析译者对翻译单位的选择情况，我们认识到不同类型译者在翻译时所关注的不同语言单位，以及所体现的不同认知模式。这些认识在理论上是构建翻译认知心理过程的基本素材，在应用上可用于设计教学方案，逐步提高翻译学习者把握宏观翻译单位的能力。

第二，本研究探讨了译者在英译汉决策过程中的选择，分别从翻译问题特征、选项数量与决策过程特征、选择结果的选项分布特征三部分讨论。

1、翻译问题特征，包括问题的数量特征和层级特征。结果表明，就总体趋势来看，翻译问题数量随着译者翻译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具体而言，常规任务情境下，问题数量和翻译水平的对应关系与总体趋势一致；不过，在非常规任务情境下，问题数量和译者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明显。关于翻译问题的层级特征，“备用单位层级”（词和短语）的问题多于“使用单位层级”（小句和句以上）的问题，这表明译者翻译时通常将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微观层面的问题。但相比于亲属语言翻译，译者在非亲属语言翻译时考虑的翻译问题更宏观；对比三类译者可以看出，随着翻译水平的提高，译者考虑翻译问题的眼光更加宏观。综合以上结论：三类译者中，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翻译问题数量最少，但考虑的翻译问题最宏观；初学者的翻译问题最多，考虑的大部分是相对微观的问题。

2、选项数量与决策过程特征。这部分讨论的是译者在解决翻译问题时选项数量的特征和影响决策过程的语境层级的特征。研究发现，解决翻译问题的选项数量多少不能简单对应翻译能力的高低，因为前者只体现出译者为解决问题而收集的信息量大小，不能体现这些信息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而翻译能力的高低与选项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关系。语境层级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有以下两类表现：一方面，决策过程中译者参考语言语境的机率远高于非语言语境，表明前者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大于后者；另一方面，职业译者参考微观语境（主要指篇内语境）的机率低于非职业译者，这与职业译者所考虑的微观问题较少这一事实不无关系。

3、选择结果的选项分布呈现了这样的特征：末选项作为选择结果的机率最高。这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即选项之间存在递进关系；进而推断，译者解决翻译问题的思维方式主要是递进式的，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深入，不断成熟。此外，三类被

试选项分布对比结果表明：职业译者思维的递进程度最高，在解决翻译问题时通常采取逐步淘汰的策略；初学者思维的递进程度最低，很多问题的解决步骤是将各选项先铺陈、后挑选。

第三，本研究从查询次数、查询目的、查询手段、查询决策、查询满意度五个方面探讨了译者对翻译工具的运用与选择。结果表明，与非职业译者相比，职业译者对翻译工具的查询次数最少，查询目的以“优化表述”和“寻求搭配”为主，查询手段体现了“多样性”特征，查询决策大多是“调整义项表达”，此外，他们对翻译工具所提供的释义或选项的满意度最低。基于此，我们建议初学者①降低对翻译工具的依赖性，在翻译过程中尝试借助语境、语法和词法等知识来解决语汇问题，并注重提高翻译工具的使用效率；②进行概述原文或书写原文摘要的训练，提高整体把握原文意思的能力；③查询手段应该多样化，选择恰当的工具解决翻译问题；④以研究的态度对查询结果进行决策，善于调整翻译工具提供的备选项。

第四，本研究以定性分析的方式对不同译者的策略结构和结果进行了比较，具体包括意义、结构和功能层面的策略结构，监控策略结构、翻译技能意识和极小极大原则等，最后构建出翻译过程的策略模式。

1、职业译者在运用意义层面策略结构解决翻译问题时，体现出“简单问题复杂化”和“复杂问题简单化”两种趋势：前者表明职业译者在传达原文语义方面精益求精的优化意识，后者反映职业译者对原文语义较强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职业译者所谓“复杂化”或“简单化”的处理方法，既不是对所有翻译问题一视同仁，平均用力，也不是被问题牵着鼻子走，被动决策，繁则必无法简、简则必无法繁。相比之下，非职业译者对于“简单问题”缺乏精益求精的能力和意识，匆匆了事，不求完善；对于“复杂问题”则缺乏高效的解决能力，处理步骤繁复而冗长。

2、职业译者在运用结构层面策略结构解决翻译问题时，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小到衔接词语的选择，大到篇章结构的调整，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妥善的处理。多数情况下，职业译者结构层面的策略特点是“把握整体”并“关注重点”。相比之下，非职业译者结构层面的策略水平明显较低：一方面缺乏整体安排结构的意识；另一方面是缺乏掌控全局能力，顾此失彼，耗时多而收效少，或者想当然地随性处理翻译问题。

3、在考虑翻译功能方面，职业译者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信息传递者，因此具备更强的职业责任感，心理上更重视自己的译者身份。在解决翻译问题的过程中，职业译者对翻译要求和目的、译文目标和读者期待等均有较多考虑。非职业译者在更大程度上把翻译视为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或必须应付的挑战，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所付诸努力的不是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架起沟通的桥梁，而只是以译者的身份完成读者所做之事。他们的翻译与其说是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原文，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信息，不如说只是在通过另一种语言表达并确认自己对原语文本的理解。这显然也和非职业译者在翻译能力上的欠缺有关。一般情况下，具备较高职业水平的译者，基本上不存在对原文的理解困难，因而可以很自然地把眼光放到诸如原文文体、作者旨意、译语习惯、译文风格、读者期望等问题上。

4、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监控策略的频率最高，而初学者则基本上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对于微观问题的关注远大于对问题或文本的全局把握与监控。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监控策略实际上是其元认知在起作用。元认知监控帮助译者从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等具体的翻译认知活动中跳出来，站在另一高度审视翻译过程，调节和控制各种认知活动和认知策略，从而减少错误，提高翻译质量。此外，职业译者在实施监控策略时往往采取换位思维的方法，站到原语作者的角度审视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或者站在译语读者的角度来监控译语的表达。这种换位思维的方法可以避免译者本人因理解和表达上的认知障碍而导致的翻译问题，更好发挥监控策略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5、职业译者具备较强的翻译技能意识。通常来讲，他们有较为扎实的翻译理论基础，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翻译原则与风格，因此能运用翻译理论和原则等自觉地指导或检验自己的译作以及整个翻译过程。半职业译者也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理论应用经验，但他们对理论的理解程度和应用能力不如职业译者。正是由于对理论或原则的应用不够熟练（甚至偶尔出现误用），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缺乏统一的风格和稳定的思路，针对不同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同类问题，会使用不同的原则去处理。因此半职业译者的翻译质量没有保障，译文水平不够稳定。初学者的翻译理论修养不高，更称不上自己的翻译原则和风格，因此他们解决翻译问

题的随意性比较大,始终就事论事,针对眼前某一问题进行判断和决策,不考虑一类问题的处理原则。这也正是初学者译文质量欠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6、极小极大原则不但体现在职业译者的决策过程中,也体现在职业译者的决策结果上。具体表现为:①翻译过程中大部分理想的策略结构都是译者遵循极小极大原则的结果,该原则不但体现在意义、结构、功能等内部的策略结构选择上,也体现在意义、结构、功能之间的取舍上;②译者在使用监控策略结构,或者根据不同的翻译理论或原则进行决策时,参照的也应当是极小极大原则;③理想的翻译行为是译者遵循极小极大原则的产物,因此译者的翻译结果与翻译耗时也应该体现极小极大原则,即运用最经济的时间获得最佳译文。

7、本研究尝试构建翻译过程的策略模式。该模式显示,翻译过程策略系统从翻译问题序列出发,通过意义层面策略结构、结构层面策略结构、功能层面策略结构和监控策略结构四方面的决策过程,产生翻译结果或反馈到翻译问题序列进行再次决策循环。在该模式中,我们强调了翻译技能意识对职业译者决策行为的辅助作用:职业译者在实施意义、结构、功能甚至监控策略结构时,其行为背后的依据往往是翻译技能意识,即根据自己掌握的翻译理论知识和长期实践总结的原则进行决策与选择。同时我们认为,极小极大原则始终对职业译者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进行操控:一方面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不同层面的抉择与取舍提供原则性依据;一方面为译者的整体翻译行为提供效率参考。

第五,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归纳出几点规律:

首先,职业译者的选择行为体现了所谓“宏观”倾向。在翻译单位层面,无论是主观翻译单位还是客观翻译单位,职业译者的选择均比非职业译者更宏观。在翻译问题特征上,尽管职业译者的问题数量最少,但其考虑的翻译问题最宏观,参考宏观语境(包括篇际语境、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的频率也最高。翻译工具主要用来解决词汇或短语问题,译者运用翻译工具时呈现的特征与翻译单位特征、翻译问题特征等是一致的:职业译者关注的翻译单位较大,关注的翻译问题的层级较高,因此对于一些意义难以确定的语汇,不急于借助翻译工具来解决,体现出职业译者运用翻译工具的“高风险”特征,具体表现为求助翻译工具的次数很少。职业译者

选择行为的这种“宏观”倾向，是基于其自上而下的认知模式的，即在整体把握语篇意义的大前提下，有目的、有计划地关注具体细节。

再者，本研究通过观察并对比三类不同被试，试图分析译者在翻译能力提高的过程中各种选择行为的发展趋势。半职业译者的大部分翻译行为特征介于职业译者和初学者之间，但具体偏向哪一类译者，情况各有不同。我们发现这样的现象：在翻译单位大小、翻译问题的层级大小，以及解决问题时关注的语境层级大小等方面，半职业译者的行为特征明显偏向初学者；而在考虑翻译述要、译文期望结构以及理论与原则等方面，半职业译者的特征却明显偏向职业译者。我们认为：对译者而言，在翻译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提高的过程中，不同阶段难度不同。初学者的翻译理论知识非常薄弱，缺乏运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翻译技能意识；而半职业译者通过翻译理论知识和翻译技巧的学习，往往就能在实践中比较充分地体现翻译技能意识，因此在涉及翻译理论等的行为特征上自然与初学者拉开了距离，偏向职业译者。但是职业译者能把握更大的翻译单位（特别是客观翻译单位）、关注更宏观的翻译问题、耗费较少的时间译出高质量的译文，这些行为特征，表面上看是其长期翻译实践的结果，实际上是其技能意识和翻译实践结合的成果，是其在强烈的技能意识指导下，取法于理论的规范，就正于实践的体验和经验的启迪，锲而不舍所获得的成就。

如果把三类译者比作翻译习得（包括翻译理论知识和翻译实践能力）过程的三个不同阶段，那么从初学者发展为半职业译者的阶段，学习者获得了必要的理论知识，对翻译活动的基本规律有了一般的认识，但这些知识都是外在的，学习者对其认识也是表面而肤浅的，辄待进一步深化。从半职业译者发展为职业译者的阶段，学习者以学到的翻译理论知识作为指导，从事有目的的翻译实践，使外在理论知识内在化，同时深化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大幅度提高翻译能力。另外，翻译习得的整个过程是学习者的翻译技能从低质、低效到高质、高效的过程。其中涉及到质量与速度是否同步提高的问题。初学者或半职业译者对翻译知识和技巧的掌握比较肤浅，似乎要翻译得好，就得舍得花时间，所谓“慢工出细活”，这种现象在本研究的初学者被试群体中尤其普遍。但是职业译者的技能已然纯熟，翻译时眼界开阔，文思敏捷，翻译质量和翻译速度往往能够同步，即能在较短的时间译出高质量的译文。这也是本研究第六章通过翻译结果的比较得出的结论，即职业译者的翻译结果也符

合极大极小原则，能最高效的获得理想译文。上述结论对翻译教学的启示是：加强对学习者进行翻译技能意识的启蒙，诱导和激发学生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运用翻译的基本技能规范和原则来指导翻译实践，逐步培养和提高翻译技能意识。

7.2 关于翻译过程中选择行为的思考

通过对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在获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我们对翻译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我们认为翻译过程中的选择行为可以有两种：其中一种选择行为称为规范指导型选择，这种选择行为受翻译规范（包括翻译理论、原则和标准等）的指导而进行，其实施过程也受翻译规范的指引；另一种选择行为则称为语感指导型选择，是在语感的指导下进行的。

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出，职业译者的选择行为既包括规范指导型选择，也包括语感指导型选择，换句话说，他们实施选择行为，既受翻译规范激发，也受语感要求促成，在选择进程中既受翻译规范指引，也经语感平衡帮助决策；半职业译者的选择行为也同时包括上述两种选择，但由于其规范指导型的选择方式还不够成熟，因此选择的结果和效率往往不够理想；初学者的选择行为主要属于语感指导型选择，由于缺乏对翻译理论的掌握和翻译原则的总结，或者说缺乏基本的翻译技能意识，初学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行为呈现“一边倒”的状况，即只能单纯凭借对两种语言的语感进行选择与决策。这种依赖语感经验的选择模式在本研究 TAPs 数据中有清晰的体现：初学者的大部分选择行为缺乏决策的理由和依据，至多提出简单且模糊的类似于“我认为用某某词更好”等的解释，而难以说出明确的、规范式的决策理由。

由此我们认为，在所有译者的选择行为中，语感指导型选择方式是自发性的，是普遍存在于翻译活动中的，无论何种译者、何种文本、何种具体的翻译过程，或多或少都会有语感来辅助选择；而规范指导型选择方式的应用情况则与被试的类别有关，译者的职业水平越高，该选择就在两种类型的选择行为中占据越重要的地位，

成效也越明显。这一点也说明，从选择行为角度来看，翻译教学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学习者进行指导型选择的能力，而不是进行语感型选择的能力，后者则属于语言教学的任务。

第二，我们认为翻译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与制约的结果。翻译过程中的选择或决策行为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下的选择（胡庚申 2004）。影响与制约选择行为的因素很多，大的方面如译语的社会与文化系统，小的方面如原语或译语的上下文语境，其它还包括译者本身具备的翻译理论修养、认知体验以及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翻译辅助工具等。译者在进行选择与决策时，首先要考虑到上述诸多因素的存在，其次明确各种因素在选择行为当下的主次轻重，最后尽快得出方案，努力保证较高的决策效率。

显然，译者不但要顾及影响决策的多重因素，还需要以较快的速度理清各种因素的轻重缓急，果断地作出决定。在这个选择决策过程中，速度与质量互相抗衡，选择行为的目标就是要在速度与质量二者之间达到最优化的平衡。这其中，译者需要贯彻始终的一个依据就是极小极大原则。当然，如何灵活、恰当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运用该原则，使之效应发挥在选择行为的方方面面，是对译者翻译能力提出的最高要求。

第三，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翻译过程中的选择行为，不仅是一种策略性行为（strategic behavior），更是一种构成性行为（constitutional behavior）。

所谓策略性行为，指的是这种行为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只充当一种工具式的策略，它以帮助解决临时出现的具体翻译问题为应用目的；所谓构成性行为，指的是这种行为本身是翻译过程内在固有的组成部分，是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之一。通常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将选择行为视为一种策略性行为，因为相比之下，较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具体的翻译问题时，往往通过选择行为来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的实证部分对这种策略性的翻译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论述，第六章第三节总结出的翻译过程的策略模式，即是选择行为作为一种策略性行为的体现。

然而问题在于，选择行为在翻译过程中只发挥策略性的功能吗？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马上会有这样的推论，作为一种工具式的策略性行为，是可以被另一种工具策略所取代的；那么，选择行为如果作为翻译过程中的策略性

行为之一，是否可以被另一种或几种策略性行为取代？翻译过程中是否可以缺少选择行为？本研究通过实证数据表明，这种可能性不存在；相反，选择行为在不同类型译者的不同文本翻译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结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选择行为在翻译过程中实际上应当是一种构成性行为，是翻译活动中译者必然操作的、不可能不为之的行为。如同心脏之于人体那样，选择行为是翻译过程内在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翻译模式的核心，是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说翻译过程中译者实施选择行为，这种操作的实质，不是临时拿某种策略来使用，或临时生成某种策略供使用，而是对翻译活动本身特质的激活和运行。

上述关于“规范指导型选择”和“语感指导型选择”的论述是对翻译过程选择行为在方法论上的总结；关于翻译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是多重因素影响与制约的结果，是对翻译过程选择行为在认识论上的总结；而认为选择行为是翻译过程的构成性行为，是对翻译过程选择行为在本体论上的总结。这三方面的总结，是本论文通过英译汉的实证研究，对翻译过程中选择行为的整体、全面、系统的思考。

7.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验数据量仍有待扩充。本项研究的前测被试 6 人，样本 20 份；正式实验被试 20 人，样本 40 份；其中有效被试 18 人，有效样本 36 份；建立的英译汉TAPs转写文本数据库约 15 万字，译文数据库约 1.5 万字；并在分析和论证时结合使用了多种方法和数据（即三元数据分析模式）。因此在翻译过程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规模较大的一项研究¹。但是，与其它领域的实证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实验规模还有

¹ 根据笔者观察，本研究在被试人数和实验样本数量等方面的规模仅次于Lörscher（1993；1996）；在英汉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中，目前还未见到在规模上超过本研究的论著。另外，Englund Dimitrova认为其研究基于 9 位被试获得 9 个实验样本，在过程研究中不算小样本，而算是大样本；加上其实验文本较长，在方法上采用了三元数据分析模式，因此在翻译过程研究中是一个大规模的项目（Englund Dimitrova 2005: 239）。参照Englund Dimitrova的说法，本研究完全可以作为大规模的项目

待进一步扩大。希望今后能出现更多这方面的实证调查，以期更全面地了解不同类型译者在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特征及其差别。

第二、缺乏长期跟踪调查。本研究是笔者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项目，客观上存在研究期限问题。限于时间因素，本研究对所有被试的观察分别只有一次，并未展开长期跟踪调查。当然，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第四章也提到，笔者会与被试保持联系，并计划在今后的研究中跟踪调查，延长观察时间，增加观察次数，获得更加稳定、更有规律的数据。

第三、受当前技术限制（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 TAPs 数据的解码器），TAPs 实验数据的转写和赋码工作只能依靠人工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过，为了最大程度地做到客观公正，本研究中笔者事先制定转写及赋码规范，然后严格遵循该规范，认真完成 TAPs 数据的转写和赋码工作，并邀请了一位在语料处理方面比较有经验的研究者担任本研究实验数据的第二解码者，辅助核查 TAPs 转写文本和变量赋码的结果。

笔者始终认为，一部好的博士论文，不仅在于能够出色地完成学位论文任务，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后还可以将研究课题继续伸展，发掘更大的价值。于此论文即将完成之时，笔者对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第一、方法论层面的展望。本文第三章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作了充分的论述，并总结出适合英译汉过程研究的两种研究模式。由于软件技术上的原因，本研究未能收集电脑击键记录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英译汉过程的研究与电脑击键技术无缘。科技日新月异，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研究中，一定会找到适用的技术成熟的软件，用于英译汉过程的实证研究。届时，结合了 TAPs 数据和击键记录数据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将会为包括本研究在内的英译汉过程研究再添一臂之力。

第二、研究内容的拓展。限于篇幅，本研究重点讨论了 TAPs 数据较为明显体现的一些现象及其规律，论述了英译汉过程中翻译单位的选择、决策过程的选择等

目。况且笔者作为独立研究者，在研究经费、研究设备等客观条件受限的情况下，获得这些样本和数据诚非易事。

四个方面。事实上必定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隐藏在实验数据背后。举例来说，笔者在收集到的英译汉 TAPs 数据中发现被试会对某一短语或片断的译文进行反复念诵，本文只关注被试反复念诵的具体内容，但这种重复现象本身也可以借助话语分析的方法作进一步的考察：①被试通过重复阅读，借用语感来检验该译文在语义上是否符合译语的地道表达；②被试或许在该处或其上下文遇到翻译难点，思维受到阻碍，借用重复的出声报告来拖延思考时间；③被试在重复念诵译文的同时，实际上在寻找与上下文最恰当的衔接手段，使译语语篇表达连贯。这些通过 TAPs 数据形式反映出来的思维信息，我们希望在将来的研究中借助特别的分析手段予以讨论。

此外，研究翻译过程也需要关注阅读理解，尤其是阅读过程。比如阅读理解（reading-for-comprehension）和翻译阅读(reading-for-translation)之间的关系；翻译阅读的不同策略：“逐步加工策略”（successive processing strategy）和“译前解难策略”（pre-translation relief strategy）（Krings 1986: 263–275）；翻译阅读的不同技巧：跳读技巧（skimming technique）和连续阅读（serial reading）；以及影响翻译阅读的外在因素，比如 1) 对主题的熟悉程度；2) 在该主题领域的翻译经历；3) 对文本类型的熟悉程度；4) 文本宏观结构的复杂性以及文本长度等。正如 Zhao (2004) 所述，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比较缺乏，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亟待发掘的课题。笔者会将该课题作为日后的研究重点，有针对性的安排实验设计，单独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第三、研究数据的展望。本研究构建了英译汉过程的小型 TAPs 数据库，其中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是英译汉翻译过程研究非常有价值的语料和数据。目前从事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学者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物资集中在实验数据的收集上，并且通常在完成一个研究项目之后，该数据很难得到再次应用，或者为其它领域的研究者借用。因此笔者设想，仿照其它研究领域在语料库方面的建设方法（如国际儿童口语语料库，简称 CHILDES），翻译过程研究未尝不可制定出自己的一整套较为通用的转录、赋码和解码规范，建构不同语种翻译的 TAPs 或电脑击键记录数据的语料库，集众人之力，共同探索翻译过程这个棘手的“黑匣子”问题。同时，基于这种语料库的研究，翻译的普遍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研究也会取得更大的突破和发展。

参考文献

- Alves, Fabio and José Luiz V.R.Gonçalves. "A Relevance Theory Approach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Inferential Process in Translation,"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3-24.
- Alves, Fabio(ed.).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 Alves, Fabio. "Veio-me um 'click' na Cabeça: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the Design of a Psycholinguistically Oriente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German-Portuguese Translation Processes," *Meta* 41.1 (1996) :33-44.
- Anderson, John R.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San Francisco: W.H.Freeman and Co., 1980.
- Asadi, Paula and Candace Séguinot. "Shortcuts, Strategies and General Patterns in a Process Study of Nine Professionals," *Meta* 50:2 (2005) :522-547.
- Baker, Mona (ed.). *The Routledge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 Barbosa, Heloisa G. and Aurora M.S. Neiva. "Using Think-aloud Protocols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Foreign Language Users and Experienced Translators,"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 137-155.
- Bell, Roger Thomas.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 Bereiter, Carl and Marlene Scardamalia. *The Psychology of Written Composi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7.
- Bernardini, Silvia.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Achievements, Limits, Future Prospects," *Target* 13.2 (2001) :241-263.

- Biguenet, John and Rainer Schulte (eds.). *The Craft of Transla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9.
- Börsch, Sabine. "Introspective Methods in Research o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edited by Juliane Hous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pp.195-210.
- Bühler, Karl. "Tatsachen und Probleme zueiner Psychologie der Denkvorgabnge: Iüber Gedanken," *Archivfür diegesamte Psychologie* IX (1907) :297-365.
- Chesterman, Andrew. "Causes, Translation, Effects". *Target* 10.2 (1998) :201-230.
- Cohen, Andrew. "Studying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How Do We Get the Informa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5 (1984) :101-112.
- Corbin, Ruth M. "Decisions That Might Not Get Made," in *Cognitive Processes in Choice and Decision Behavior*, edited by Thomas S. Wallsten. Hillsdale, N.J.:Erlbaum, 1980, pp. 47-67.
- Crystal, David. *The Cambridge Encyclopaedia of Languag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ancette, Jeanne. "Comprehens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 Analysis of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2. Insights, Aims, Versions*, edited by Cay Dollerup and Annette Lindegaar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1994, pp.113-120.
- Dancette, Jeanne. "Mapping Meaning and Comprehension in Translatio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Issues," in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dited by Joseph H. Danks, Gregory M. Shreve, Stephen B. Foutain, and Michael K. Mcbeath. London: Sage, 1997, pp.77-103.
- Danks, Joseph H., Gregory M. Shreve, Stephen B. Foutain, and Michael K. Mcbeath.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London: Sage, 1997.
- De Beaugrande, Robert-Alain and Wolfgang Ulrich Dressler.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1.

- Englund Dimitrova, Birgitta. "Semantic Change in Translatio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Translation and Knowledge*, edited by Yves Gambier and Jorma Tammola.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Centr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93, pp.285-296.
- Englund Dimitrova, Birgitta. *Expertise and Explici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5.
- Ericsson, K. Anders and Herbert A. Simon. *Protocol Analysis - Verbal Reports as Data*.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1984.
- Færch Claus and Gabriele Kasper. "One Learner-Two Languages: Investigating Types of Interlanguage Knowledge," i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Tübinger Beiträge zur Linguistik 272.], edited by Juliane Hous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pp. 211-228.
- Færch Claus and Gabriele Kasper. "Two Ways of Defin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Language Learning* 34 (1984) : 45-63.
- Firth, John Rupert. "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 *Sociological Review* 42 (1950) :37-52.
- Fraser, Janet. "Professional Versus Student Behaviour," in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3, edited by Cay Dollerup and Vibeke Appe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pp.243-250.
- Fraser, Janet. "Public Accounts: Using Verbal Protocols to Investigate Community Transla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14.4 (1993) :325-341.
- Fraser, Janet. "The Broader View: How Freelance Translators Define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n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edited by Christina Schäffner and Beverly Adab.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 51-62.
- Fraser, Janet. "Translating Practice into Theory: A Practical Study of Quality in Translator Training," in *ITI Conference 7 Proceedings*, edited by Catriona Picken. London: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94, pp.130-142.
- Fraser, Janet. "What Do Real Translators Do?: Developing the Use of TAPs from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111-120.

-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Gerloff, Pamela. "From French to English: A Look a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Students, Bilinguals,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 Gerloff, Pamela. "Identifying the Unit of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ome Uses of Think-aloud Protocol Data," in *Introspe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edited by Claus Færch and Gabriele Kasper.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7, pp.135-158.
- Gerloff, Pamela.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Reports on the Interpretive Process: Talk-aloud Protocols of Translation," i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edited by Juliane Hous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pp.243-262.
- Gero, John S. and Hsien-Hui Tang. "Differences between Retrospective and Concurrent Protocols in Revealing the Process-oriented Aspects of the Design Process," *Design Studies* 21.3 (2001) :283-295.
- Gerzymisch-Arbogast, Heidrun. "Identifying Term Variants in Context: The SYSTEXT Approa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edited by Mary Snell-Hornby et a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2a, pp.279-290.
- Gleason, Henry A. G. "Why the Grammars Don't Help Very Much". *Meta* 25.4 (1980) : 409-420.
- Gorlee, Dinda L.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to Charles S. Peirce*. Amsterdam/Atlanta, GA: Rodopi, 1994.
- Grabner, R.; C. Brunner, R. Leeb, C. Neuper & G. Pfurtscheller. "Event-related EEG theta and alpha band oscillatory responses during language translation". *Brain Research Bulletin* 72 (2007) :57-65.
- Graham, Angus C. *Poems of the Late T'ang*.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 1963.
- Guan, Zhiwei et al. "The Validity of the Stimulated Retrospective Think-aloud Method as Measured by Eye Tracking," in *Proceedings of ACM CHI 2006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06, pp.1253-1262.

- Guba, Egon G. "Criteria for Assessing the Trustworthiness of Naturalistic Inquiries,"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Journal* 29 (1981) : 75-92.
- Halliday, Michael A. K. and Ruquiaya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1976.
- Halliday, Michael A. K. and Ruquiaya Ha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1985.
- Hansen, Gyde (ed.) .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
- Hansen, Gyde. "Controlling the Proces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Research into Translation Process,"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25-42.
- Hansen, Gyde. "Experience and Emotion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Research with Think-Aloud and Retrospection," *Meta* 50.2 (2005) : 511-521.
- Hayes, John R. and Linda S. Flower. "Identifying the Organization of Writing Processes," in *Cognitive Processes in Writing*, edited by Lee W. Gregg and Edwin R. Steinber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0.
- Heiden, Tanja. "Blick in die Black Box: Kreative Momente im Übersetzungsprozess: eine experimentelle Studie mit Translog," *Meta* 50.2 (2005) : 448-472.
- Holmes, James et al. (eds.) .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Studies*. Leuven: Acco, 1978.
- Holmes, Jame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1988.
- Hönig, Hans G. "Holmes' 'Mapping Theory' and the Landscape of Mental Translation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Proceedings from the First James S. Holmes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Kitty M. van Leuven-Zwart and Ton Naaijken. Amsterdam: Rodopi, 1991, pp.77-89.
- Hönig, Hans G. "Übersetzen lernt man nicht durch Übersetzen: Ein Pläoyer für eine Propäeutik des Übersetzens," *Fremdsprachen lehren und lernen* 17 (1988b) : 154-167.

- Hönig, Hans G. “Wissen Übersetzer eigentlich, was sie tun?” *Lebende Sprachen* 1 (1988a) :10-14.
- House, Julian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übingen:Gunter Narr, 1986.
- House, Juliane. “Consciousness and the Strategic Use of Aids in Translation,”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149-162.
- House, Juliane. “Talking to Oneself or Thinking with Others? On Using Different Thinking Aloud Methods in Translation,” *Fremdsprachen lehren und lernen* 17 (1988) :84-98.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and Sonja Tirkkonen-Condit. “Automatised Processes in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1, pp. 89-109.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Features of Successful Translation Processes: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Unpublished licentiate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1990b.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Focus on Methodology in Think-aloud Studies on Translating,”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71-83.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Hard Work Will Bear Beautiful Fruit: A Comparison of Two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ies,” *Meta* 41.1 (1996a) :60-74.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Recent Trend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Research*,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John Laffling. Joensuu: University of Joensuu, 1993, pp.99-120.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apping the Process: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th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Factors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Ph.D. diss., University of Joensuu Faculty of Arts, 1999.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eaching How to Use Reference Material in Translator Training: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Special Languages and Second Languages:*

-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Anita Nuopponen and Rolf Palmberg. Vaasa: AFinLA, 1989b, pp. 69-78.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he Role of Reference Material in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Empirical Studies in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Stephen Condit. Finland: University of Joensuu, 1989a, pp.175-200.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ies into Transl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Target* 14:1 (2002) :107-136.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Mona Bak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265-269.
- Jääskeläinen, Riitta. "What Happens in a Translation Process: Think-aloud Protocols of Translation," Progradu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1987.
- Jac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On Translation*, edited by Reuben.A.Br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232-239.
- Jakobsen, Arnt Lykke and Lasse Schou. "Appendix: Translog Documentation," in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 edited by Gyde Han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 pp.151ff.
- Jakobsen, Arnt Lykke. "Effects of Think Aloud on Translation Speed, Revision and Segmentation,"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69-95.
- Jakobsen, Arnt Lykke. "Logging Target Text Production with Translog," in *Prob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 edited by Gyde Han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b, pp.9-20.
- Jakobsen, Arnt Lykke. "Translation Drafting by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by Translation Student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Process and Product*, edited by Gyde Hansen. Denmark: Samfundslitteratur, 2002, pp.191-204.
- Jensen, Astrid. "The Effects of Time on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Strategies in Translation," Ph.D.diss.,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2000.

- Jensen, Astrid. "Time Pressure in Translation," in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 edited by Gyde Han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 pp. 103-119.
- Jonasson, Kerstin. "Degree of Text Awareness in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in *Translators' Strategies and Creativit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Prague, September 1995*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27.], edited by Ann Beylard-Ozeroff, Jana Králová and Barbara Moser-Mercer.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p. 189-200.
- Kaiser-Cooke, Michèle. "Translatorial Expertise-A Cross Cultural Phenomenon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edited by Mary Snell-Hornby et a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2, pp. 135-139.
- Kiraly, Donald Charles. "Think-Aloud Protocols and Construction of a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Self-concept," in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dited by Joseph H. Danks, Gregory M. Shreve, Stephen B. Foutain and Michael K. Mcbeath. London: Sage, 1997, pp. 137-160.
- Kiraly, Donald Charles. "Towards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kills Instruction," Ph.D.diss.,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90.
- Kiraly, Donald Charles. *Pathways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Process*.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önigs, Frank G. "Dem Übersetzen den Prozess machen?: Psycholinguistische Überlegungen zum Übersetzen und ihre didaktische Konsequenzen," in *Begegnung mit dem 'Fremden': Grenzen-Traditionen-Vergleiche. Akten des VIII. Internationalen Germanisten-Kongresses, Tokyo 1990*. (Vol. 5.) , edited by Eijiro Iwasaki. München: iudicium verlag, 1991, pp. 132-142.
- Königs, Frank G. and Reinhard Kaufmann. "Processus mentaux étudiés chez des sujets allemands apprenant le français lorsqu'ils sont en train de traduire," *Meta* 41.1 (1996) :7-25.

- Kovčáči, Irena. "A Thinking-aloud Experiment in Subtitling," in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Mary Snell-Hornby, Zuzana Jettmarová and Klaus Kaind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7, pp. 229-238.
- Kovčáči, Irena. "Thinking-aloud Protocol-Interview-Text Analysis,"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37.],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 97-109.
- Krings, Hans-Peter. "The Use of Introspective Data in Translation," in *Introspe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edited by Claus Færch and Gabriele Kasper.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87, pp.158-176.
- Krings, Hans-Peter.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Advanced German Learners of French (L2)," i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Juliane Hous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a, pp. 263-276.
- Krings, Hans-Peter. "Wege ins Labyrinth - Fragestellungen und Methoden der Übersetzungsprozessforschung im Überblick," *Meta* 50.2 (2005) :342-358.
- Krings, Hans-Peter. *Was in den Köpfen von Übersetzern vorgeht: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zur Struktur des Übersetzungsprozesses an fortgeschrittenen Französischlernern*[Tübinger Beiträge zur Linguistik 291.] .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b.
- Kussmaul, Paul. "Translation through Visualization," *Meta* 50.2 (2005) :377-391.
- Kussmaul, Paul. *Training the Translator*.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 Kuusela, Hannu and Pallab Paul. "A Comparison of Concurrent and Retrospective Verbal Protocol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3.3 (2000) :387-404.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 1999.
- 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aukkanen, Johanna. "Affective and Attitudinal Factors in Translation Processes," *Target* 8.2 (1996) :257-274.
- Laukkanen, Johanna. "Affective Factors and Task Performance in Translation," Unpublished licentiate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7.
- Laukkanen, Johanna. "Routine vs. Non-routin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Unpublished postgraduate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3.
- Laviosa, Sara.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Findings, Applications*.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2.
- Lederer, Marianne. *La traduction aujourd'hui*. Paris: Hachette, 1994.
- Leech, Geoffrey. *A Glossary of English Gramma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ee-Jahnke, Hannelore. "New Cognitive Approaches in Process-Oriented Translation Training," *Meta* 50.2 (2005) :358-377.
- Leijten, Marielle and Luuk Van Waes. "Inputlog: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Logging of On-Line Writing," in *Computer Key-Stroke Logging and Writ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edited by Kirk P.H. Sullivan and Eva Lindgren. Oxford: Elsevier, 2006, pp.73-94.
- Leppihalme, Ritva. *Culture Bumps: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of Allusion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 Levy, Jiri.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To Honor Roman Jakobson, Vol.2*. The Hague: Mouton, 1967, pp.1171-1182. Also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148-159.
- Li, Defeng. "Trustworthiness of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4 (2004) :301-313.
- Livbjerg, Inge and Inger M. Mees. "A Study of the Use of Dictionaries in Danish-English Translation," in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 edited by Gyde Han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 pp.135-149.

- Livbjerg, Inge and Inger M. Mees. "Patterns of Dictionary Use in Non-domain-specific Translation,"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123-136.
- Lörscher, Wolfgang. "A Psych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Meta* 41.1 (1996) : 26-32.
- Lörscher, Wolfgang. "Investigat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eta* 37.3 (1992a) :426-439.
- Lörscher, Wolfgang. "Process-oriented Research into Trans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eaching," *ITR* 5.1 (1992b) :145-161.
- Lörscher, Wolfgang.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Requirements for a Model of Analysi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w Horizons in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 Lörscher, Wolfga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ethods and Problems of Its Investigation," *Meta* 50.2 (2005) : 598-608.
- Lörscher, Wolfgang. "Translation Process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and Knowledge*, edited by Yves Gambier and Jorma Tommola.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Centr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93, pp. 195-212.
- Lörscher, Wolfgang.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1a.
- Luukkainen, Tiina. "Comparisons of Translations Made with and without Reference Material.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6.
- Malinowski, Bronislaw.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1 in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 edited by Charles K. Ogden and Ivor A. Richards. London: Kegan Paul, 1923.
- Mallory, James P. and Douglas Q. Adams.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Illustrate edition) . Chicago and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 Malmkjær, Kirsten.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Routledge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Mona Bak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 Martikainen, Kati. "What Happens to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Relating to Comprehension in the Processes and Products of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9.
- Matrat, Corinne Marie. "Investigat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inking-aloud versus Joint Activity," Ph.D.diss.,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92.
- Miller, George Armitage et al. *Plans and the Structures of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 Mondahl, Margrethe and Knud Anker Jense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a Translation Task," *Multilingua* 11.2 (1992) :195-215.
- Mondahl, Margrethe and Knud Anker Jensen. "Lexical Search Strategies in Translation," *Meta* 41.1 (1996) :97-113.
- Mondahl, Margrethe. "Lexical Search Strategies: A Study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in a Brief Text," *Multilingua* 14.2 (1995) :183-204.
-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Newell, Allen and Herbert A. Simon. *Human Problem Solv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2.
-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London/ Toronto/ Sydney/ Tokyo: Prentice Hall, 1988.
-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2.
- Nida, Eugene A. "A Fresh Look at Translating," in *Investing Translations*, edited by Allison Beeby et a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3-12.
- Nida, Eugene A. and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1969.
- Nida, 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Nord, Christine.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1991.

- Nord, Christi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 O'Brien, Sharon. "Eye Tracking and Translation Memory Matche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4 (2006) :185-205.
- PACTE Group. "Building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 43-66.
- PACTE Group.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Meta* 50.2 (2005) : 609-619.
- Peden, Margaret S. "Building a Transl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Business: Poem 145 of Sor Juana Ines De La Cruz," in *The Craft of Translation*, edited by John Biguenet and Rainer Schult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3-27.
- Rabassa, Grogory. "No Two Snowflakes Are Alike: Translation as Metaphor," in *The Craft of Translation*, edited by John Biguenet and Rainer Schult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12.
- Reiss, Katherina.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Decision Making in Translation," *Poetics Today* 2.4 (1981) :121-131.
- Richards, Ivor A. "Towards a Theory of Translating," in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edited by Arthur E. Wri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247-262.
- Ronowicz, Eddie, Joanna Hehir, Toshihiro Kaimi, Keiko Kojima and Deok-Shin Lee. "Translator's Frequent Lexis Store and Dictionary Use as Factors in SLT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Spe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fessional, Paraprofessional and Novice Translators," *Meta* 50.2 (2005) : 580-596.
- Rothe-Neves, Rui. "Using Think-aloud Protocols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Foreign Language Users and Experienced Translators,"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97-119.
- Rydning, Antin F. "The Return of Sense on the Scen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Light of the Cognitive Blending Theory," *Meta* 50.2 (2005) :392-404.

- Scott-Tennent, Christopher et 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ranslation Solutions: Design of a Teaching Prototype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ts Results," in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edited by Allison Beeby et a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p. 107-116.
- Séguinot, Candace (ed.).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oronto: H.G. Publications, 1989c.
- Séguinot, Candace. "A Study of Stud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1, pp.79-88.
- Séguinot, Candace. "Some Thoughts about Think-aloud Protocols," *Target* 8.1 (1996) :75-95.
- Séguinot, Candac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edited by Candace Séguinot. Toronto: H.G. Publications, 1989, pp. 21-53.
- Shaw, R. Daniel. *Transculturation: The Cultural Factor in Translation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Tasks*. Pasadena, Californi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88.
- Shreve, Gregory M. "Knowing Translation: Cognitive and Experiential Aspects of Translation Expert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tise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Discipline*, edited by Alessandra Riccard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50-171.
- Shreve, Gregory M., Christina Schäffner, Joseph H. Danks and Jennifer Griffin. "Is There a Special Kind of 'Reading' for Transla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eading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arget* 5.1 (1993) :21-41.
- Snell-Hornby, Mar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6.
- Snell-Hornby, Mar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8.
- Steinberg, Danny D. *Psycholinguistics: Language, Mind, and World* (Longman Linguistics Library, no. 28) . London: Longman, 1982.
-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ullivan, Kirk P.H. and Eva Lindgren. *Computer Key-Stroke Logging and Writ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Elsevier, 2006.

- Tirkkonen-Condit, Sonja and Johanna Laukkanen. "Evaluations - A Key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Affective Dimension of Translational Decisions," *Meta* 41.1 (1996) :45-59.
- Tirkkonen-Condit, Sonja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eds.).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 Tirkkonen-condit, Sonja. "Choice in Translation: A Challeng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in *Recent Trend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Research*,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John Laffling. Joensuu: University of Joensuu, 1993, pp.5-9.
- Tirkkonen-Condit, Sonja.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edited by Candace Séguinot. Toronto: H.G. Publications, 1989, pp. 73-85.
- Tirkkonen-condit, Sonja. "The Monitor Model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Process Research," *Meta* 50.2 (2005) :405-414.
- Tirkkonen-Condit, Sonja. "What Is in the Black Box?: Professionalism in Translational Decisions in the Light of TAP Research," in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im Umbruch: 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Wilss zum 70. Geburtstag*, edited by Angelika Lauer, Heidrun Gerzymisch-Arbogast, Johann Haller and Erich Steiner.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6, pp. 251-257.
- Tirkkonen-Condit, Sonja. "Who Verbalises What: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AP Texts," *Target* 9.1 (1997) :69-84.
- Toury, Gideon. "'EVERYTHING HAS ITS PRICE': An Alternative to Normative Conditioning in Translator Training," *INTERFAC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6.3 (1992) : 60-72.
- Toury, Gideon. "Experiment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chievements, Prospects and Some Pitfalls,"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1, pp. 45-66.
-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Also published b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van Someren, Maarten W., Yvonne F. Barnard and Jacobijn A.C. Sandberg. *The Think Aloud Method: A Practical Guide to Modelling Cognitive Process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4.
- Vermeer, Hans J.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translated by Andrew Chesterman) ,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221-232.
- Verschuereen, Jef.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Wakabayashi, Judy. “Think-aloud as a Pedagogical Tool,” in *Beyond the Ivory Tower: 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Scholarly Monograph Series Volume XII.], edited by Brian James Baer, Geoffrey S. Kob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61-82.
- Wallsten, Thomas S. (ed.) . *Cognitive Processes in Choice and Decision Behavior*, Hillsdale NJ: Erlbaum, 1980.
- Widdowson, Henry G. *Explora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Wilss, Wolfram. “A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 in Translation,” *Target* 6.2 (1994) :131-149.
- Wilss, Wolfram.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6.
- 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2.
- Zhao, Ran. “Processes of Translating: A Comparison of Expert and Student Translators Translating an Expository Text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2004.

(比利时) 耶夫·维索尔伦 (Jef Verschueren) 著, 钱冠连等译《语用学诠释》(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德) 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著, 甘阳译《人论》(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德) 约翰·哥特弗里特·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著, 姚小平译《论语言的起源》(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法) 玛丽雅娜·勒代雷 (Marianne Lederer) 著, 刘和平译《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美) 坎特威茨 (Barry H. Kantowitz) 等著, 杨治良等译《实验心理学——掌握心理学的研究》(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苏) 巴尔胡达罗夫 (Barkhudarov) 著, 蔡毅等译《语言与翻译》(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 (英) 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 著, 赖慈芸编译《翻译教程: 翻译的原则与方法》(台北: 台湾培生教育发行出版, 2005)
- (英) 戴维·克里斯特尔著 (David Crystal), 任明等译《剑桥语言百科全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蔡寒松, 郭嘉钥〈英语双重否定句汉译过程的心理语言学个案研究〉, 见《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年第11期, 页8-10。
- 蔡寒松, 刘葆婷〈英语因果关系句汉译过程的心理语言学个案研究〉, 见《外语研究》, 2000年第3期, 页32-38。
- 蔡寒松〈心理学口语报告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 见《上海科技翻译》, 2000年第3期, 页1-4。
- 蔡新乐〈《翻译适应选择论》简评〉, 见《中国科技翻译》, 2006年第1期, 页58-59。
- 陈德鸿, 张南峰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陈宏薇主编《汉英翻译基础》(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崔霞《译者的翻译过程探讨》(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 2004)
- 范祥涛, 刘全福〈论翻译选择的目的性〉, 见《中国翻译》, 2002年第6期, 页25-28。
- 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9)
- 方梦之主编《译学词典》(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桂乾元编著《翻译学导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 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何元建，卫志强〈描写译学的研究与运用〉，见罗选民，屠国元主编《阐释与解构：翻译研究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页1-18。
-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黄宣范《翻译与语意之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 姜秋霞，杨平〈翻译研究实证方法评析—翻译学方法论之二〉，见《中国翻译》，2005年第1期，页23-28。
- 蒋素华〈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见《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3期，页55-58。
- 金圣华《认识翻译真面目》（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
-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查正贤译〈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见许宝强，袁伟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页358-382。
- 李德超〈TAPs翻译过程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见《中国翻译》，2005年第1期，页29-34。
- 李德超〈TAPs翻译研究的前景与局限〉，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页385-391。
- 李淑琴〈语境——正确翻译的基础〉，见《中国翻译》，2001年第1期，页42-46。
- 李亚舒，黄忠廉〈别开生面的理论建构——读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见《外语教学》，2005年第6期，页95-96。
- 李运兴《翻译语篇引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 梁宁建《当代认知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廖七一编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大词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 刘立香《翻译过程的实验研究》（曲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 刘宓庆〈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建设谏议〉，见孔慧仪，朱国藩主编《各师各法谈翻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页139-148。
-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5）
-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
- 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 刘润清编《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 刘云虹，许钧〈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翻译适应选择论》评析〉，见《中国翻译》，2004年第6期，页42-25。
- 吕俊，侯向群编著《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苗菊《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发展（英文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 苗菊《探索翻译过程与译者（英文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苗菊〈西方翻译实证研究二十年（1986-2006）〉，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5期，页45-48。
- 苗菊〈有声思维—翻译内在过程探索〉，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6期，页43-46。
- 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见《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页31-34。
- 彭克宏主编《社会科学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 任洁，许尚侠〈当代心理学对口语报告的研究评述〉，见《心理科学》，1998年第21期，页77-78。
- 司显柱〈翻译单位研究〉，见《翻译学报（香港）》，2001年第5期，页75-100。
- 宋志平〈翻译：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见《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页19-23。
- 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 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谭鑫田主编《西方哲学词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 谭载喜《翻译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谭载喜编译《新编奈达论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 涂纪亮主编《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王金铨〈应用语言学框架下的翻译研究——《翻译过程的专业知识以及显形化》〉，
见《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6期，页18-21。
- 王金铨〈英语定语从句汉译过程的个案研究〉，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6期，页471-475。
- 王甦、汪安圣主编《认知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见《中国翻译》，2005年第5期，页15-20。
-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b）年第2期，页82-89。
- 王寅〈认知语言学与两代认知科学〉，见《外语学刊》，2002（a）年第1期，页9-14。
- 文军，邓萍〈文化介入翻译过程的实验研究〉，见《外语学刊》，2005年第1期，
页81-88。
- 文军，孙三军〈论使用出声思维研究翻译过程〉，见《外语学刊》，2006年第3期，
页93-97。
- 吴义诚〈《口/笔译的认知过程》评介〉，见《现代外语》，2001年第3期，页324-330。
- 吴义诚，李英垣〈贝尔的《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评介〉，见《中国翻译》，
1998年第5期，页55-56。
- 吴义诚〈翻译研究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翻译》，1997年第2期，页2-6。
- 萧立明《新译学论稿》（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 徐莉娜〈认知与翻译单位〉，见《中国翻译》，2004年第6期，页15-19。
- 许钧，袁筱一等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许钧〈《翻译思考录》序〉，见许钧主编《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许钧〈翻译之选择〉，见《外国语》，2002年第1期，页62-69。
- 许钧〈简论翻译过程的实际体验与理论探索〉，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b）年第4期，页33-39。
- 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a）
- 许渊冲〈谈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中国翻译学落后于西方吗？〉，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页52-54。
- 许渊冲〈译学要敢为天下先〉，见《中国翻译》，1999年第2期，页4-9。
- 颜林海〈西方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概述〉，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页116-119。
-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 张健《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 TAPs 语料研究》（北京：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4）
- 张美芳〈功能加忠诚——介评克里丝汀·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见《外国语》，2005年第1期，页60-65。
- 张泽乾《翻译经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 郑冰寒，谭慧敏〈英译汉过程中翻译单位的实证研究〉，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2期，页145-154。
- 郑冰寒〈洞悉翻译过程的辅助工具—Translog 程序介评〉，见《中国科技翻译》，2006年第4期，页22-26。
- 仲伟合，钟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见《中国翻译》，1999年第3期，页47-49。
- 周亚莉《探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基于二十名中国大学翻译专业学生的有声思维调查报告》（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 周兆祥编著《专业翻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 朱嫣华主编《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指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朱智贤，林崇德，董奇，申继亮《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附录一、实验说明

1.1 实验说明（被试手册）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关于英汉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您的参与是对这项研究的莫大支持。整个实验和调查过程需要大约 90 分钟，希望您能谅解并配合，自始至终保持认真的态度。我们十分感谢您为此付出的宝贵时间！

本实验与调查所得的一切数据均以匿名方式处理：我们将以编号代替您的姓名；任何针对数据的分析报告都会严格保密您的个人信息；研究论述也与个人评价无关。因此，希望您在实验和调查过程中的所有表现尽可能做到如实、自然，不要将翻译实验当成翻译考试，只需当作您平常的翻译工作来对待。

本次实验和调查具体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有声思维实验（约 80 分钟）

请您根据前几天实验培训时的要求，从主试提供的一篇英语短文中任选语段作有声翻译热身练习，时间 5-10 分钟。您可以通过这个热身练习适应环境、调节心态，使自己处于较为轻松自然的状态。

热身练习之后，稍作休息，进入正式实验。请您对主试提供的文本进行翻译并作有声思维报告，具体翻译要求参见实验文本。实验文本为两篇英语短文，每篇的翻译时间大约需要 30 分钟，共约 60 分钟。该时间仅供参考，您也可以适当提前或延后递交译文。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您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所有参考资料、网络和电脑软件等，如临时有特别需要，请向主试寻求帮助。

第二部分、调查问卷（约 5 分钟）

请您在主试提供的调查问卷上如实填写个人资料与相关问题。

第三部分、采访（约 5 分钟）

请您就主试提出的几个问题作如实、简洁地回答。

非常感谢您的合作与支持！

1.2 实验说明（主试手册）

整个实验与调查过程按照实验说明、实验热身、正式实验、调查问卷和采访五个步骤进行，共需大约 90 分钟的时间。实验场所备有电脑（具备网络和相关软件）和参考资料，录音设备放置于被试实验桌下方隐蔽处。实验过程中，主试应尽量帮助被试解决临时需求，并负责全程记录被试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尤其是被试未报告出或报告不完全的行为（例如求助翻译工具、报告停顿等）。

步骤一：主试播放关于实验说明的录音，并提供“被试手册”供被试阅读。（约 3 分钟）

步骤二：主试提供一篇英文短文，让被试任选其中语段作有声翻译热身练习，目的是帮助被试调整状态，适应实验环境。（约 5-10 分钟）

步骤三：热身练习之后，主试打开相关实验仪器并逐篇提供实验文本（共两篇），示意被试开始翻译并作有声思维报告。主试退居后方，在不干扰被试的前提下，观察并记录被试的实验行为。对于一些不符合实验规范或不利于数据收集的被试行为，主试应当及时给予提醒，尤其要避免被试在有声报告前的浏览时间过长（一般指超过 1 分钟），或有声报告中的停顿时间过长（一般指超过 10 秒）等。（约 60 分钟，被试可以适当提前或延后提交译文并结束实验。）

步骤四：主试提供调查问卷，示意被试填写。（约 5 分钟）

步骤五：主试对被试进行采访。（约 5 分钟）

采访完毕，本实验与调查正式结束。

附录二、前测实验文本

2.1 前测实验一、请将下文翻译成中文。

When the history of our era is written a century or two from now I suspect th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may be the second story in that history. The first story in that history may be the dramatic developments on the Asian continent over the last quarter century and the next, and at the center of that story is your country, China. This is surely a moment of promise, of risk, and of opportunity in China.

(Excerpted from the welcome speech to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by Chancellor of Harvard Univ.)

2.2 前测实验二、请将下文翻译成中文。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brain and a computer can be expressed in a single word: complexity.

The large mammalian brain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thing, for its size, known to us. The human brain weights three pounds, but in that three pounds are ten billion neurons and a hundred billion smaller cells. These many billions of cells are interconnected in a vastly complicated network that we can't begin to unravel as yet.

Even the most complicated computer man has yet built can't compare in intricacy with the brain. Computer switches and components number in the thousands rather than in the billions. What's more, the computer switch is just an on-off device, whereas the brain cell is itself possessed of a tremendously complex structure. (Excerpted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Brain and a Computer*)

2.3 前测实验三、请将下面这段话翻译成英文。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几位同志为鬼戏鸣不平，说是神戏上演了，所谓妖也上舞台了，唯独鬼戏未见登台。一位同志脱口而出：“这叫‘神出鬼没’”。妙语解颐，举座风生。（《文汇报》1979年2月10日第4版）

附录三、实验文本

3.1 实验一、请将下列短文翻译成中文。

Can a computer think? That depends on what you mean by “think”. If solving a mathematical problem is “thinking,” then a computer can “think” and do so much faster than a man. Of course, most mathematical problems can be solved quite mechanically by repeating certain straightforward processes over and over again. Even the simple computers of today can be geared for that.

It is frequently said that computers solve problems only because they are “programmed” to do so. They can only do what men have them do. One must remember that human beings also can only do what they are “programmed” to do. Our genes “program” us the instant the fertilized ovum is formed, and our potentialities are limited by that “program”.

Our “program” is so much more enormously complex, though, that we might like to defin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creativity that goes into writing a great play or composing a great symphony, in conceiving a brilliant scientific theory or a profound ethical judgment. In that sense, computers certainly can’t think and neither can most humans.

3.2 实验二、请将下列短文（摘自布什致辞欢迎温家宝的讲话）翻译成中文。

Mr. Premier,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it is my honor to welcome you to the White House. Your visit reflects the increasing ties of cooperation and commerce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America and China share many common interests.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war on terror. We are fighting to defeat a ruthless enemy of order and civilization. We are partners in diplomacy working to meet the dangers of the 21st century. We are full members of a world trading system that rewards enterprise and lifts nations.

Our two nations seek a Korean Peninsula that is stable and at peace. The elimination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s is essential to this outcome. Realizing this vision will require the strong cooperation of all North Korea's neighbors, I am grateful for China's leadership in hosting the six-party talks which are bringing us closer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is issue. And my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China as it plays a constructive role in Asia and in the world.

As our two nations work constructively across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we are candid about our disagreements. The growing strength and maturity of our relationship allows us to discuss our differences, whether over economic issues, Taiwan, Tibet, or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a spirit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附录四、实时观察记录实例

13:20

句 1:

译作“电脑会思考吗？”但将“会”字用斜体标记。

13:28

句 3:

... and do so much faster than a man:“那么速度会比人更快”。又考虑改译为“会比人脑更快”；又去掉“会”字，将“那么”改成“而且”。

13:29

句 4:

译为“绝大多数的计算问题可以通过重复的机械性的工作……”。

solve: “处理”？“计算”？

(看整个句子的翻译，停顿思考时间较长。)

决定译为“……机械性地重复简单工作来完成”，记录的同时口头说明“重复”在这里改译作动词了。

13:40

翻译遇到困难，决定看一看不要求译的文章后半部分（在第二页纸上）。

13:53

句 7:

译作“他们只能够按照人的命令行事”，打字记录时将“他们”改为“它们”。又将“人的命令”改译作“人的意志”，于是又将整体改译为“它们只能够执行人的意志”。

13:55

句 8:

首先看了一遍句 8，返回将句 6 改为“……因为它们被预先设计成这样”。

句 8 译为“人的生长也是被预先‘设计’好的”，于是又返回将句 6 改译作“……被预先设计好了”。

又考虑将“设计”改作“设定”，决定后如是改动了句 6 和句 8。

14:00

句 9:

译到“program” us 时停顿下来。暂时思考不出满意的译法，故决定将 the instant 引导的状语从句提前译，念叨“从……一刻起就决定了”。

附录五、调查问卷

编号：（ ）

日期：（ ）

请如实填写以下各项内容。谢谢合作！

性别：_____ 年龄：_____

学历：_____ 专业：_____

职业：_____

请在相应方框内打勾（√）：

1. 我 _____ 翻译理论或翻译实践的课程。

未修过 修过（或正在修）1门 修过2-3门 修过4-5门 修过6门以上

2. 我从事翻译实践约_____。（区分业余翻译和职业翻译）

（业余） 1年以下 1-2年 3-4年 5年以上 （职业） 1年以下 1-2年 3-4年 5年以上

3. 我从事翻译教学约_____。（针对有翻译教学经验者）

1年以下 1-2年 3-4年 5年以上

4. 我从事翻译实践的累计字数约 _____。（翻译字数以中文计）

3万字以下 3-10万字 10-20万字 20-30万字 30-50万字 50万字以上

5. 我通常翻译的领域是 _____。(可多选)
 文学翻译 科技翻译 政论翻译 商务翻译 学术翻译
 其它 (请写明: _____)
6. 通常在进行翻译时我较多使用 _____。(可多选)
 单语词典 双语词典 电子词典 网络词典
 其它 (请写明: _____)
7. 在这次实验中, 相比而言, 我更熟悉 _____ 的翻译任务。
 实验文本一 实验文本二
8. 在这次实验中, 我主要是以 _____ 为单位进行翻译的。(可多选)
 词 短语 小句 句子 段落
 其它 (请写明: _____)
9. 在这次实验中, 当思维中出现多种译文选项时, 我通常根据 _____ 来进行选择。(可多选)
 语感 语境 译语表达习惯 译文语体风格
 是否准确 是否通顺 其它 (请写明: _____)
10. 在这次实验中, 我对自己的翻译能力 _____。
 很有自信 比较自信 一般自信 比较不自信 很不自信
11. 在这次实验中, 我认为有声报告方式 _____ 影响我的翻译过程。
 毫不 有点 不太 比较 非常
12. 在这次实验中, 我说出了 _____ 关于思维过程的信息。
 90%以上 90%-80% 80%-70% 70%-60% 60%以下
13. 我认为这次实验的可信度为 _____。
 90%以上 90%-80% 80%-70% 70%-60% 60%以下

附录六、采访提要

1. 请您回忆刚才翻译过程中的您作停留或修改的地方（可参照译文更改记录显示出的标记），说一说原因，尽量描述一下当时的思维过程。
2. 请您指出一例刚才翻译过程中译得顺利/成功的地方，并解释一下您这样认为的原因。
3. 请您指出一例刚才翻译过程中译得不顺利/不成功的地方，并解释一下您这样认为的原因。
4. 您通常在翻译过程中作思考和选择的主要依据是什么？遇到翻译问题时您通常运用什么策略来解决？
5. 您觉得，对于像刚才那篇文本，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6. 您认为一篇好的译文应当具备哪些特征或符合哪些标准？
7. 相比之下，您认为遵循原文旨意更重要还是考虑读者接受性更重要？
8. 您在翻译前通常做哪些准备工作？会去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及其它作品吗？如果是，通过什么办法？
9. 您在平时翻译时会用到哪些参考资料？通常需要运用互联网或图书馆来获取信息吗？为什么？
10. 您平时翻译阅读时会大声读出或小声念叨吗？会把心理过程说出来吗？

附录七、译文更改记录实例

译文修改:

电脑有能力思考吗? 这取决于你认为“思考”是什么含义。如果你认为解决一个数学问题是“思考”的话, 那么电脑就有能力“思考”, 而且比人思考得快得多。当然, 通过一而再, 再而三地重复某些直线进行的程序, 大多数数学问题能够以相当呆板的方式得到解决。甚至今日最简易的电脑也能够适应以上的工作方式。

Deleted: 能

Deleted: 一台

Deleted: 一个

Deleted: 多次

人们常常说, 电脑能够解决问题只是因为它们被“指令”成去完成这些任务。它们只能做人要求它们做的事。但不能忘记, 人类也只能去做被“指令”去做的事。在受精卵形成的那一瞬间, 我们的基因就开始“指令”, 并且我们的潜在可能性也被这些“指令”所限定。

Deleted: 被编程好了

但是, 虽然我们的“指令”超出想象地复杂, 我们可能仍然倾向于用“创造性”来界定“思考”。因为这种创造性进而能使人类写出伟大的作品、卓越的交响曲, 孕育出才思横溢的科学理论或深邃渊博的道德判断。在这个意义上, 显然电脑和大多数人二者都不具备思考的能力。

Deleted: 尽管

Deleted: 但

Deleted: 深奥

Deleted: 不仅

Deleted: “

Deleted: ”

Deleted: , 而且大多数人类也不具备。

译文修改:

布什总统:

总理先生、各位代表团成员, 荣幸地欢迎你们来到白宫。这次访问表明了我们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双边合作与商贸往来。

Deleted: .

Deleted: 诸

Deleted: 很

Deleted: 你们的

Deleted: 击败

Deleted: 残忍仇恨

Deleted: 得到满意的酬劳

Deleted: 稳定与

Deleted: 和平

Deleted: 拥有这一远见必须获得

Deleted: 强有力的合作

Deleted: 由于

美国与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我们正在反恐战争中并肩工作; 我们正在努力制服那些仇恨文明与秩序的暴徒; 我们在外交工作中是合作伙伴, 以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种种危机; 我们也都是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 在其中致力于使商业机构取得合理收益, 并提升每个国家的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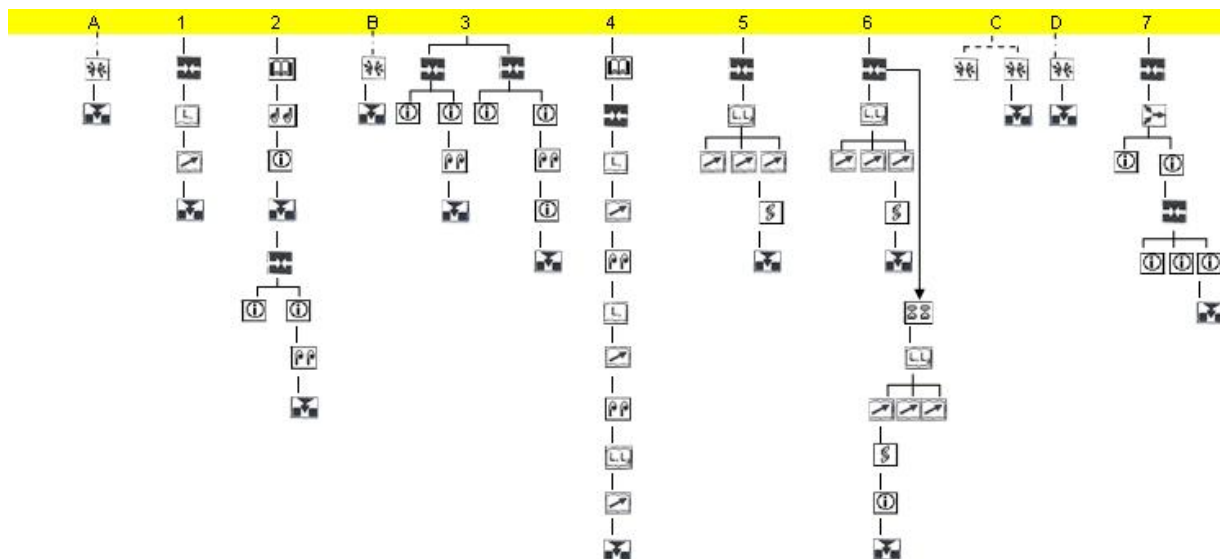
我们两国正在寻求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而北朝鲜核危机的消除对此至关重要。北朝鲜的周边国家应当通过有力的协作来表明这一远见, 因此我对中国在主持六方会谈中的领导才能深表感谢, 这将使我们在和平解决北韩问题的过程中更加亲密。鉴于中国政府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扮演的这种建设性角色, 我们将继续与之合作。

由于在许多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内互相促进, 我们才可以对不同意见开诚布公。随着两国之间亲密关系的成熟与巩固, 我们可以在互相理解与尊重的前提下讨论诸种不同: 比如经济议题, 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 和宗教信仰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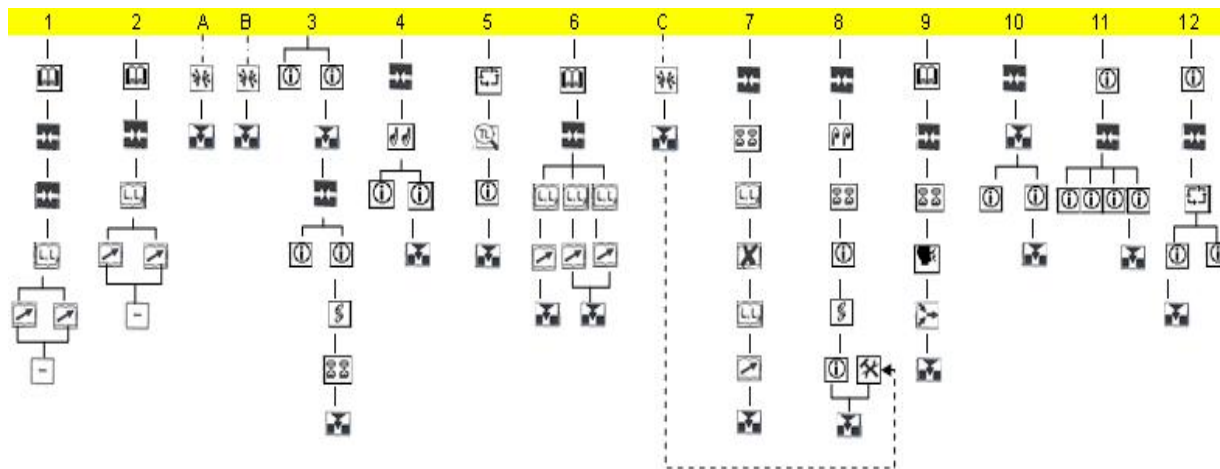
附录八、TAPs 数据图 (Protocol Diagrams)

S1-S6: 翻译初学者 (Nov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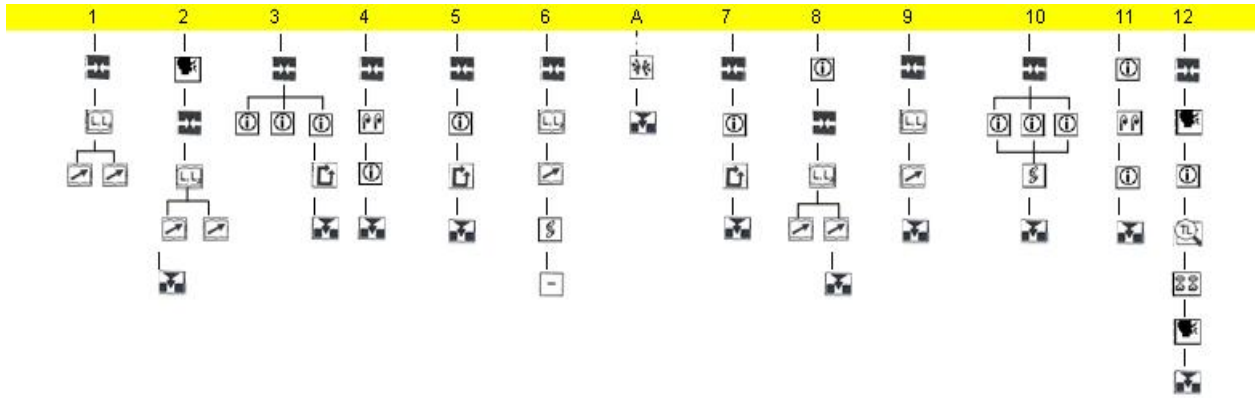
S1 (Novice): (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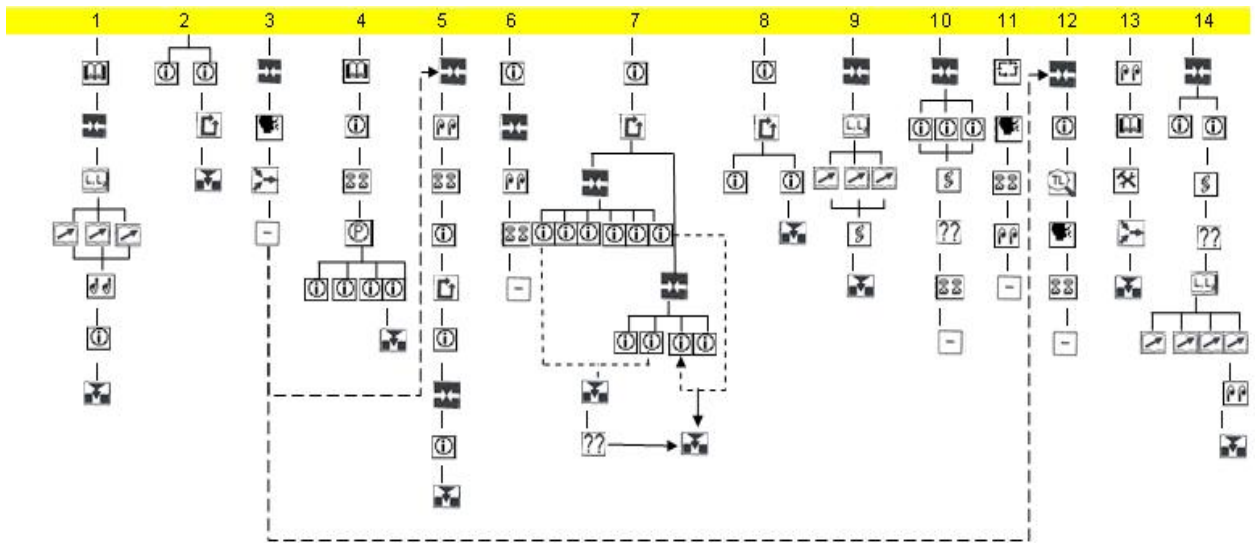
S2 (Novice): (11:27)



S5 (Novice): (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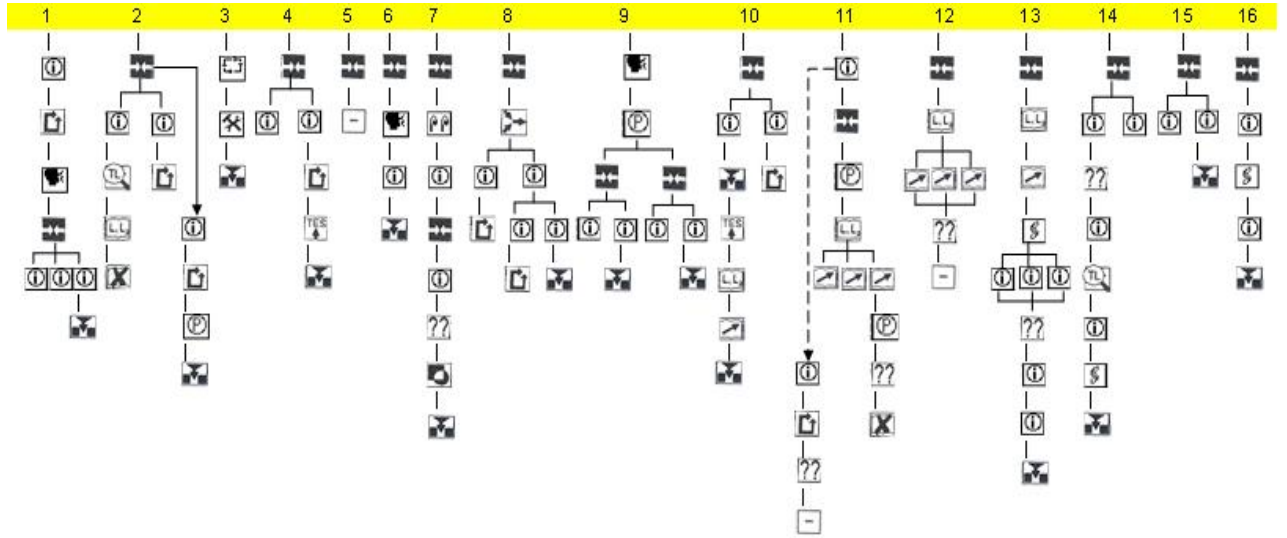


S6 (Novice): (18: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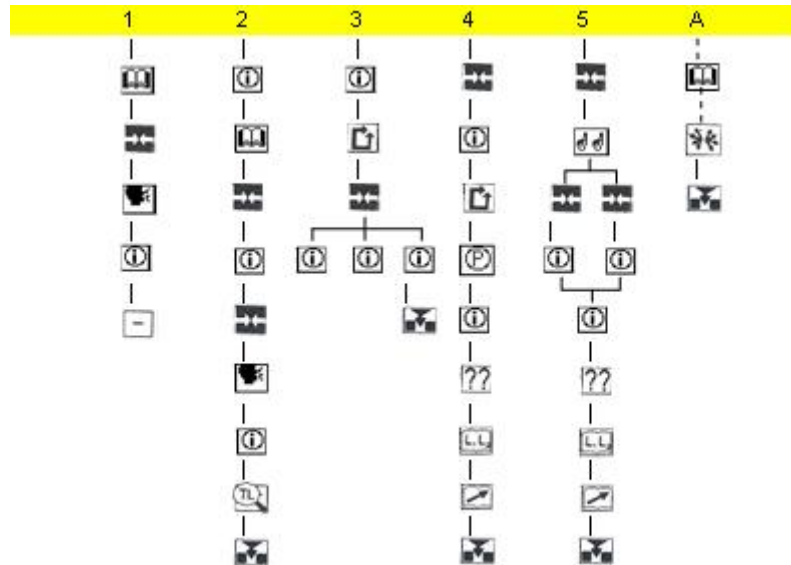


S7-S12: 半职业译者 (Semi-profess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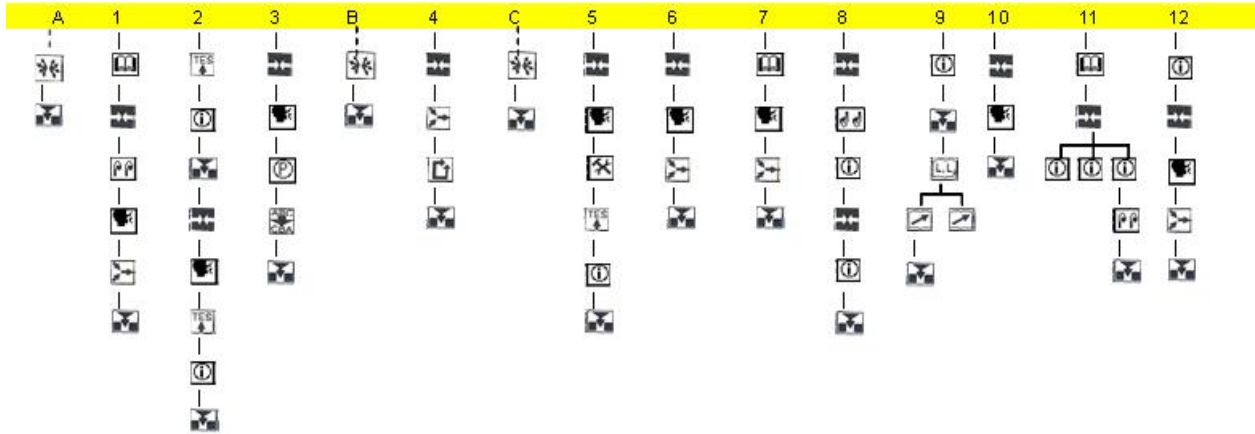
S7 (Semi-professional): (1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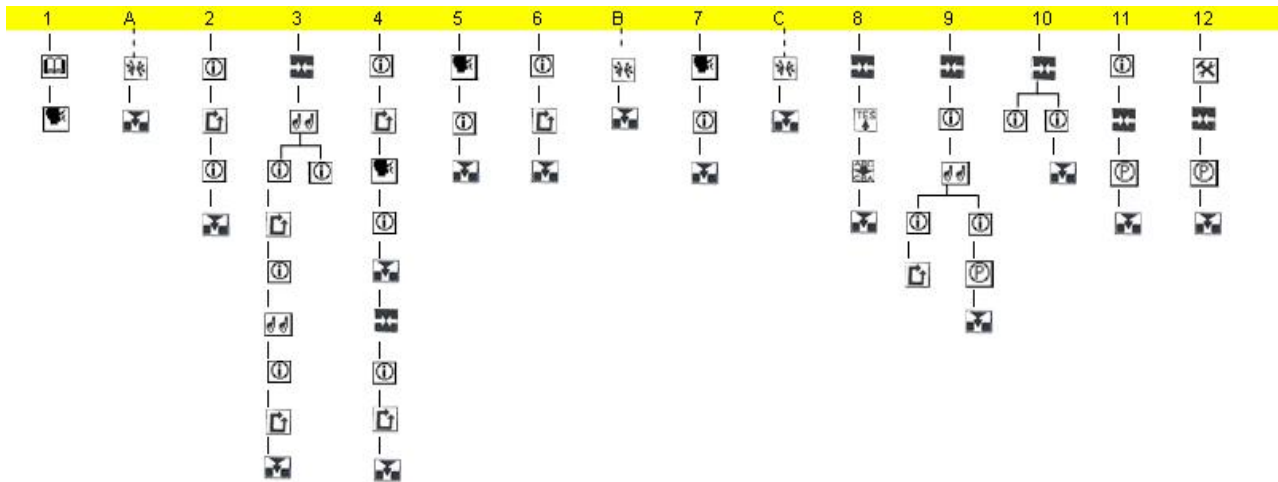
S8 (Semi-professional): (7:43)



S9 (Semi-professional): (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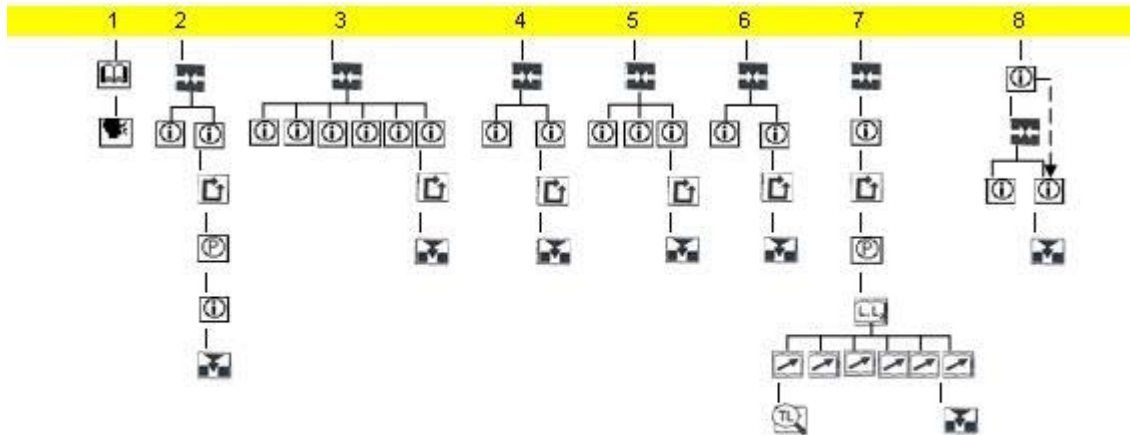


S10 (Semi-professional): (1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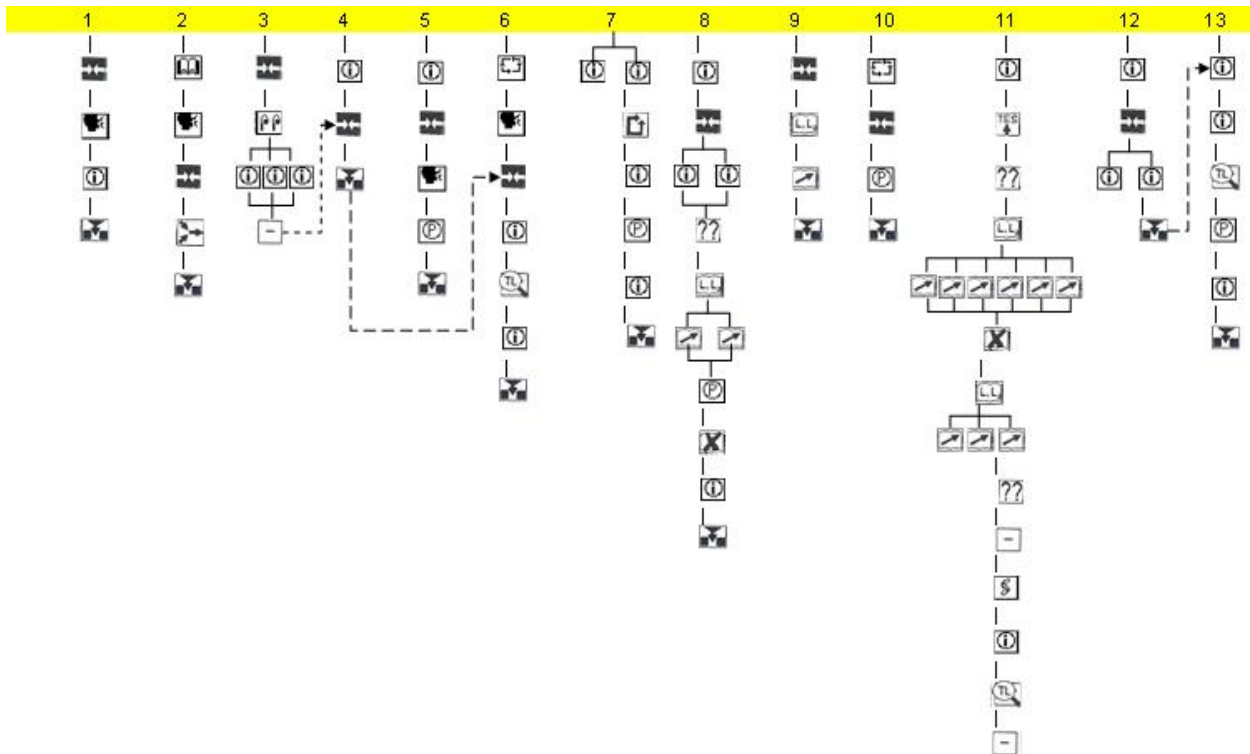


S13-S18: 职业译者 (Profess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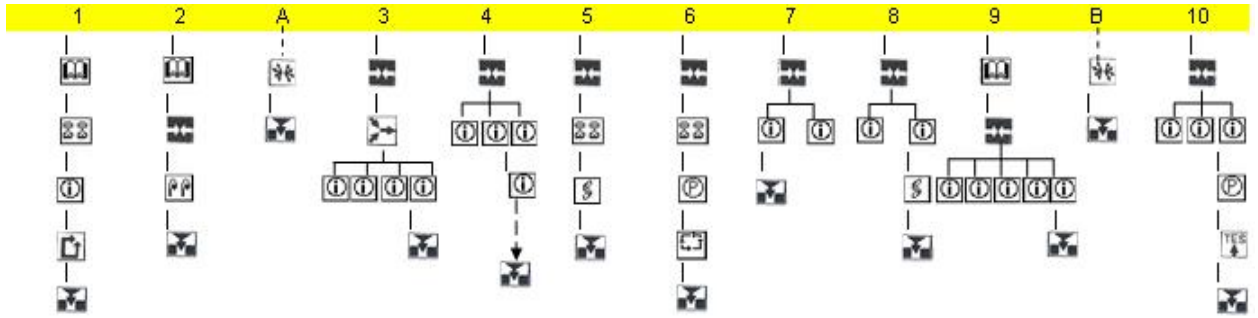
S13 (Professional): (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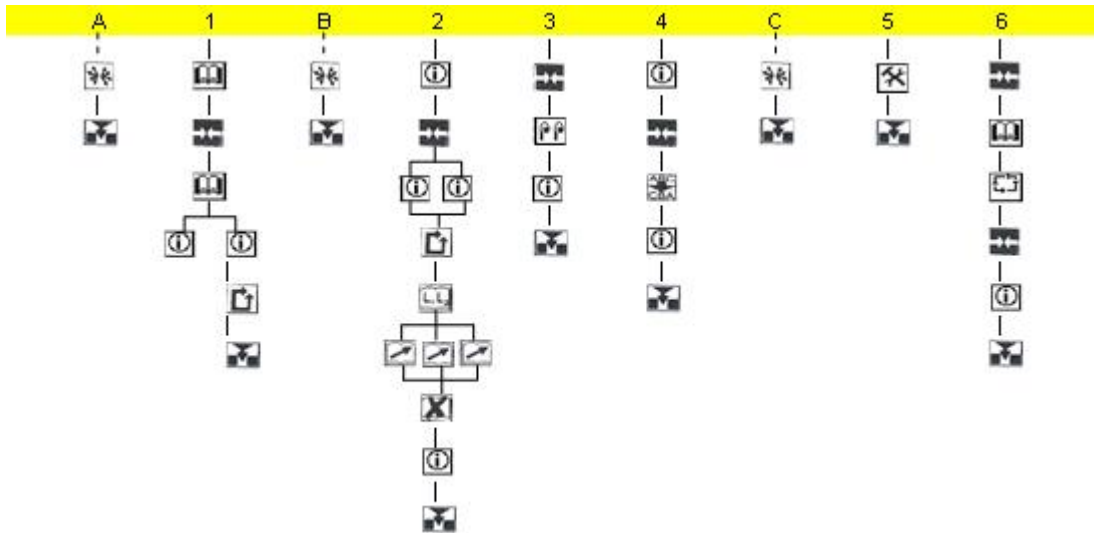
S14 (Professional) :(1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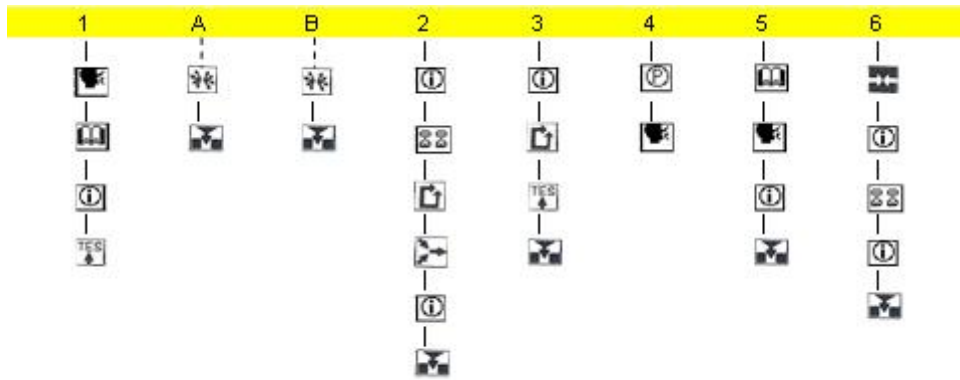
S15 (Professional): (8: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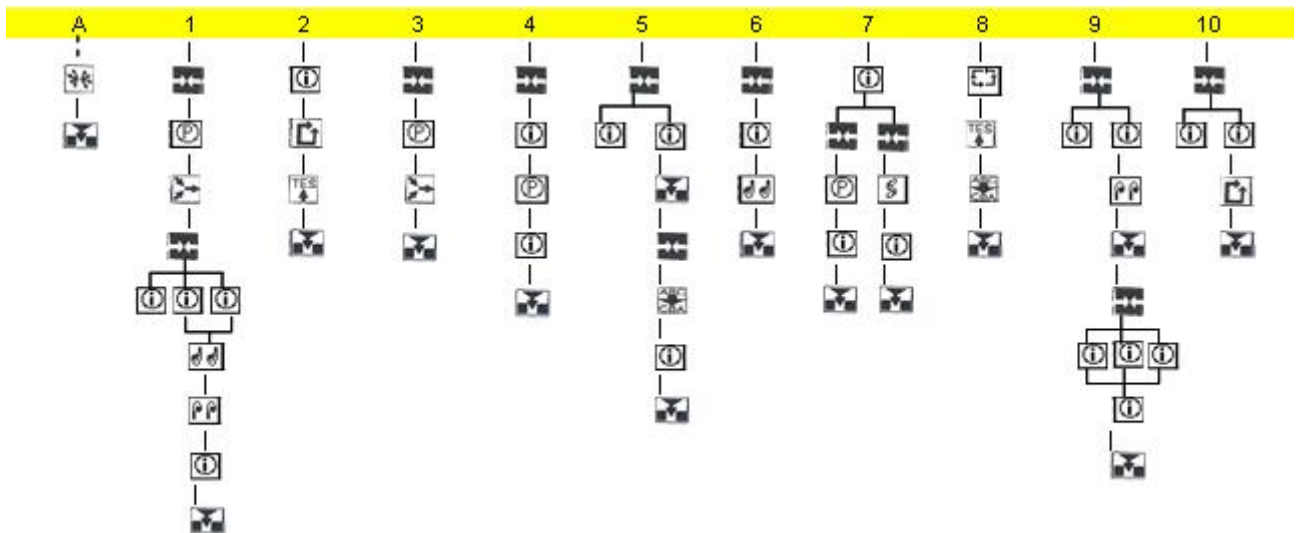
S16 (Professional): (8:22)



S17 (Professional): (6:34)



S18 (Professional): (9:33)



附录九、TAPs 翻译过程研究文献

9.1 Jääskeläinen (2002) 关于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文献: 108 篇 (本)

1. Alves, Fabio. “Veio-me um ‘click’ na Cabeça: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the Design of a Psycholinguistically Oriented ,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German-Portuguese Translation Processes,” *Meta* 41.1 (1996) :33-44.
2. Bernardini, Silvia.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Achievements, Limits, Future Prospects,” *Target* 13.2 (2001) :241-263.
3. Dancette, Jeanne. “Comprehens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 Analysis of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2. Insights, Aims, Versions*, edited by Cay Dollerup and Annette Lindegaar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4, pp.113-120.
4. Dancette, Jeanne. “Mapping Meaning and Comprehension in Translatio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Issues,” in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dited by Joseph H. Danks, Gregory M. Shreve, Stephen B. Foutain, and Michael K. Mcbeath. London: Sage, 1997, pp.77-103.
5. Dancette, Jeanne and Nathan Ménard. “Modèles empiriques et expérimentaux en traductologie: questions d’espistémologie,” *Meta* 41.1 (1996) :139-156.
6. Dechert, Hans W. “Analysing Language Processing through Verbal Protocols,” in *Introspe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edited by Claus Færch and Gabriele Kasper.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7, pp.96-111.
7. Dechert, Hans W. and Ursula Sandrock. “Thinking-aloud Protocols: The Decomposition of Language Processing,” in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edited by Vivian Cook. Oxford-New York etc.: Pergamon, 1986, pp.111-126.
8. Englund Dimitrova, Birgitta. “Semantic Change in Translatio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Translation and Knowledge*, edited by Yves Gambier and Jorma Tammola.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Centr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93, pp.285-296.

9. Fraser, Janet. "Public Accounts: Using Verbal Protocols to Investigate Community Transla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14.4 (1993) :325-341.
10. Fraser, Janet. "Translating Practice into Theory: A Practical Study of Quality in Translator Training," in *ITI Conference 7 Proceedings*, edited by Catriona Picken. London: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94, pp.130-142.
11. Fraser, Janet. "The Translator Investigated: Learning from Translation Process Analysis," *The Translator* 2.1 (1996a) :65-79.
12. Fraser, Janet. "Mapp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Meta* 41.1 (1996b) :84-96.
13. Fraser, Janet. "What Do Real Translators Do?: Developing the Use of TAPs from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111-120.
14. Gerloff, Pamela.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Reports on the Interpretive Process: Talk-aloud Protocols of Translation," i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edited by Juliane Hous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pp.243-262.
15. Gerloff, Pamela. "Identifying the Unit of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ome Uses of Think-aloud Protocol Data," in *Introspe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edited by Claus Færch and Gabriele Kasper.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7, pp.135-158.
16. Gerloff, Pamela. "From French to English: A Look a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Students, Bilinguals,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17. Hansen, Gyde (ed.) .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
18. Hönl, Hans G. "Wissen Übersetzer eigentlich, was sie tun?" *Lebende Sprachen* 1 (1988a) :10-14.
19. Hönl, Hans G. "Übersetzen lernt man nicht durch Übersetzen: Ein Pläoyer für eine

- Propäeutik des Übersetzens,” *Fremdsprachen lehren und lernen* 17 (1988b) : 154-167.
20. Hönig, Hans G. “Holmes’ ‘Mapping Theory’ and the Landscape of Mental Translation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Proceedings from the First James S. Holmes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Kitty M. van Leuven-Zwart and Ton Naaijken. Amsterdam: Rodopi, 1991, pp.77-89.
21. Hönig, Hans G. “Vom Selbst-Bewusstsein des Übersetzers,” in *Traducere navem: Festschrift für Katharina Reiss zum 70. Geburtstag*, edited by Justa Holz-Mänttari and Christiane Nord. Tampere: University of Tampere, 1993, pp.77-90.
22. House, Juliane. “Talking to Oneself or Thinking with Others? On Using Different Thinking Aloud Methods in Translation,” *Fremdsprachen lehren und lernen* 17 (1988) :84-98.
23. House, Juliane. “Consciousness and the Strategic Use of Aids in Translation,”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149-162.
24. Jääskeläinen, Riitta. “What Happens in a Translation Process: Think-aloud Protocols of Translation,” Progradu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1987.
25.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he Role of Reference Material in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Empirical Studies in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Stephen Condit. Finland: University of Joensuu, 1989a, pp.175-200.
26.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eaching How to Use Reference Material in Translator Training: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Special Languages and Second Languages: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Anita Nuopponen and Rolf Palmberg. Vaasa: AFinLA, 1989b, pp. 69-78.
27.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ranslation Assignment in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edited by Candace Séguinot. Toronto: H.G. Publications, 1989c, pp. 87-98.
28. Jääskeläinen, Riitta.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Professionals’ vs. Novices’

- Translation Processes: Reactions to the Translation Assignment,” in *Proceedings from the 2nd Finnish Seminar on Discourse Analysis, Oulu, September 27-28, 1988*, edited by Heikki Nyysöen, Leena Kuure, Elise Käkkäinen and Pirkko Raudaskoski. Oulu: University of Oulu, 1990a, pp. 43-51.
29. Jääskeläinen, Riitta. “Features of Successful Translation Processes: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Unpublished licentiate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1990b.
30. Jääskeläinen, Riitta.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Recent Trend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Research*,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John Laffling. Joensuu: University of Joensuu, 1993, pp.99-120.
31. Jääskeläinen, Riitta. “Käkkäinenprosessin tutkimus,” in *Käkkäinen isentutkimuksen päivät Oulussa 14.-15.12.1993*, edited by Irma Sorvali. Oulu: Oulun yliopisto, Pohjoismaisten kielten laitos, 1994, pp.67-77.
32.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hinking Aloud as a Data Collection Method,” in *Principles of Accessibility and Design in English Texts: Research in Progress*, edited by Heikki Nyysöen and Leena Kuure. Oulu: University of Oulu, 1995, pp. 207-228.
33. Jääskeläinen, Riitta. “Hard Work Will Bear Beautiful Fruit: A Comparison of Two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ies,” *Meta* 41.1 (1996a) :60-74.
34.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he ‘Human Translator’ in the Light of Verbal Report Data,” in *Basic Issu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dited by Albrecht Neubert, Gregory M. Shreve and Klaus Gommlich.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b, pp. 135-144.
35.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Mona Bak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265-269.
36.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apping the Process: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th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Factors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Ph.D. diss., University of Joensuu Faculty of Arts, 1999.
37. Jääskeläinen, Riitta. “Focus on Methodology in Think-aloud Studies on Translating,”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71-83.
38. Jääskeläinen, Riitta. and Sonja Tirkkonen-Condit. “Automatised Processes in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1, pp. 89-109.
39. Jakobsen, Arnt Lykke. forthcoming. “Effects of Think Aloud on Translation Speed, Revision and Segmentation,” in *Translating the Millennium: Corpora, Cognition and Cultur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II International Brazilian Translators’ Forum*, edited by Fabio Alves, Celia Magalhaes and Adriana Pagano. MG, Brazil: Belo Horizonte, 2001.
40. Jakobsen, Arnt Lykke and Lasse Schou. “Appendix: Translog Documentation,” in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 edited by Gyde Han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 pp.151ff.
41. Jensen, Astrid. “Time Pressure in Translation,” in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 edited by Gyde Han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 pp. 103-119.
42. Jensen, Astrid. “The Effects of Time on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Strategies in Translation,” Ph.D.diss.,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2000.
43. Jensen, Astrid and Arnt Lykke Jakobsen. “Translating under Time Pressur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roblem-solving Activity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y Non-professional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in *Translation in Context: Selected Contributions from the EST Congress, Granada 1998*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39.], edited by Andrew Chesterman, Natividad Gallardo San Salvador and Yves Gambier,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 105-116.
44. Jensen, Elisabeth Halskov. “Complejidad y comprensión en la traducción jurídica,” in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 edited by Gyde Han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 pp. 69-82.

45. Jonasson, Kerstin. "Förståelse och överföring av ett flertydigt textavsnitt," in *Språkförståelse: Rapport från ASLAs hörsymposium. Lund, 9-11 november 1995*, edited by Gisela Håkansson and Ulrika Nettelbladt. Uppsala: Repro HSC, 1996, pp. 111-125.
46. Jonasson, Kerstin. "Norm and Varia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French into Swedish," in *Norm,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Language: Proceedings of the Centenary Meeting of the Nyfilologiska Sällskapet. Nedre Manilla, 22-23 March 1996* [Stockholm Studies in Modern Philology 11.] .Stockholm: Acta Universitatis Stockholmiensis, 1997, pp. 85-107.
47. Jonasson, Kerstin. "Degree of Text Awareness in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in *Translators' Strategies and Creativit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Prague, September 1995*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27.], edited by Ann Beylard-Ozeroff, Jana Králová and Barbara Moser-Mercer.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p. 189-200.
48. Kiraly, Donald Charles. "Towards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kills Instruction," Ph.D.diss.,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90.
49. Kiraly, Donald Charles. *Pathways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Process*.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0. Kiraly, Donald Charles. "Think-Aloud Protocols and Construction of a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Self-concept," in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dited by Joseph H. Danks, Gregory M.Shreve, Stephen B.Foutain and Michael K. Mcbeath. London: Sage, 1997, pp.137-160.
51. Königs, Frank G. "Der Vorgang des Übersetzens: Theoretische Modelle und praktischer Vollzug. Zum Verhtnis von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Lebende Sprachen* 1 (1986) : 5-12.
52. Königs, Frank G. "Was beim Übersetzen passiert: Theoretische Aspekte, empirische Befunde und praktische Konsequenzen," *Die Neueren Sprachen* 86.2 (1987) :162-185.

53. Königs, Frank G. “Dem Übersetzen den Prozess machen?: Psycholinguistische Überlegungen zum Übersetzen und ihre didaktische Konsequenzen,” in *Begegnung mit dem ‘ Fremden ’ : Grenzen-Traditionen-Vergleiche. Akten des VIII. Internationalen Germanisten-Kongresses, Tokyo 1990.* (Vol. 5.) , edited by Eijiro Iwasaki. München: iudicium verlag, 1991, pp. 132-142.
54. Königs, Frank G. and Reinhard Kaufmann. “Processus mentaux étudiés chez des sujets allemands apprenant le français lorsqu’ils sont en train de traduire,” *Meta* 41.1 (1996) :7-25.
55. Kovčaći, Irena. “Thinking-aloud Protocol-Interview-Text Analysis,”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37.],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 97-109.
56. Krings, Hans-Peter.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Advanced German Learners of French (L2) ,” i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Juliane Hous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a, pp. 263-276.
57. Krings, Hans-Peter. *Was in den Köpfen von Übersetzern vorgeht: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zur Struktur des Übersetzungsprozesses an fortgeschrittenen Französischlernern*[Tübinger Beiträge zur Linguistik 291.] .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b.
58. Krings, Hans-Peter. “The Use of Introspective Data in Translation,” in *Introspe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edited by Claus Færch and Gabriele Kasper.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87, pp.158-176.
59. Krings, Hans-Peter. “Blick in die ‘Black Box’-Eine Fallstudie zum Übersetzungsprozess bei Berufsübersetzern,” in *Textlinguistik und Fachsprache: Akten des internationalen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lichen AILASymposiums, Hildesheim, 13.-16. April 1987*, edited by Reiner Arntz. Hildesheim: Olms, 1988a, pp. 393-412.
60. Krings, Hans-Peter. “Thesen zu einer empirischen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in

- Translationstheorie-Grundlagen und Standorte* [Studia translologica, Ser. A, Vol. 1.], edited by Justa Holz-Mänttari. Tampere: University of Tampere, 1988b, pp.58-71.
61. Kussmaul, Paul. "Creativit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Empirical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edited by Kitty M. van Leuven-Zwart and Ton Naaijken. Amsterdam: Rodopi, 1991, pp. 91-101.
62. Kussmaul, Paul. *Training the Translator*.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63. Kussmaul, Paul. "Die Bedeutung des Verstehensprozesses für das Übersetzen," in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im Umbruch: 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Wilss zum 70. Geburtstag*, edited by Angelika Lauer, Heidrun Gerzymisch-Arbogast, Johann Haller and Erich Steiner.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6, pp. 229-238.
64. Kussmaul, Paul. "Die Erforschung von Übersetzungsprozessen: Resultate und Desiderate," *Lebende Sprachen* 2 (1998) : 49-53.
65. Kussmaul, Paul and Sonja Tirkkonen-Condit. "Think-aloud Protocol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TR—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 8.1 (1995) : 177-199.
66. Lauer, Angelika. "Lautes Denken und Übersetzen: Fehlerlinguistik, die LD-Methode und die Analyse von Übersetzungsfehlern," in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im Umbruch: 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Wilss zum 70. Geburtstag*, edited by Angelika Lauer, Heidrun Gerzymisch-Arbogast, Johann Haller and Erich Steiner.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6, pp. 239-250.
67. Laukkanen, Johanna. "Routine vs. Non-routin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Unpublished postgraduate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3.
68. Laukkanen, Johanna. "Affective and Attitudinal Factors in Translation Processes," *Target* 8.2 (1996) :257-274.
69. Laukkanen, Johanna. "Affective Factors and Task Performance in Translation," Unpublished licentiate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7.

70. Livbjerg, Inge and Inger M.Mees. "A Study of the Use of Dictionaries in Danish-English Translation," in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 edited by Gyde Han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 pp.135-149.
71. Lorenzo, María Pilar. "Apuntes para una discusión sobre métodos de estudio del proceso de traducción," in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 edited by Gyde Han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a, pp. 21-42.
72. Lorenzo, María Pilar. "La seguridad del traductor profesional en la traducción a una lengua extranjera," in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 edited by Gyde Han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b, pp. 121-134.
73. Lörcher, Wolfgang.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i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Juliane Hous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Tübingen:Gunter Narr, 1986, pp. 277-292.
74. Lörcher, Wolfgang. "Modelles des Übersetzungsprozesses: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Fremdsprachen lehren und lernen* 17 (1988) :62-83.
75. Lörcher, Wolfgang. "Models of Translation Process: Claim and Reality," *Target* 1.1 (1989) : 43-68.
76. Lörcher, Wolfgang.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1a.
77. Lörcher, Wolfgang. "Thinking-Aloud as a Method for Collecting Data on Translation Process,"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1b, pp. 67-77.
78. Lörcher, Wolfgang. "Translation Process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and Knowledge*, edited by Yves Gambier and Jorma Tammola.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Centr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93, pp. 195-212.
79. Lörcher, Wolfgang. "A Psych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Meta* 41.1 (1996) : 26-32.

80. Luukkainen, Tiina. "Comparisons of Translations Made with and without Reference Material.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6.
81. Malmkjær, Kirsten. "Postscript: Multidisciplinarity in Process Research,"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37.],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163-170.
82. Martikainen, Kati. "What Happens to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Relating to Comprehension in the Processes and Products of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9.
83. Matrat, Corinne Marie. "Investigat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inking-aloud versus Joint Activity," Ph.D.diss.,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92.
84. Mondahl, Margrethe. "Lexical Search Strategies: A Study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in a Brief Text," *Multilingua* 14.2 (1995) :183-204.
85. Mondahl, Margrethe and Knud Anker Jense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a Translation Task," *Multilingua* 11.2 (1992) :195-215.
86. Mondahl, Margrethe and Knud Anker Jensen. "Lexical Search Strategies in Translation," *Meta* 41.1 (1996) : 97-113.
87. Nagy, U. "Zum Übersetzungsprozess: Eine Protokolluntersuchung der Unterschiede beim Hin- und Her-Übersetzen von fortgeschrittenen Deutschstudente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Finland:University of Joensuu,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89.
88. Olshtain, Elite. "Translating Noun-compounds from English into Hebrew," i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Tübinger Beiträge zur Linguistik 272.], edited by Juliane Hous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pp. 229-242.
89. Pötinen, Tuija and Tiina Romanov.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or: A

-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Joensuu,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89.
90. Sandrock, Ursula. “‘Thinking-aloud Protocols’ (TAPs) -Ein Instrument zur Dekomposition des komplexen Prozesses ‘Übersetzen’,” Unpublished Diplomarbeit, University of Kassel, 1982.
91. Schmid, Annemarie. “Gruppenprotokolle-ein Einblick in die black box des Übersetzens?” *TextConText* 9 (1994) :121-146.
92. Séguinot, Candace. 1989.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edited by Candace Séguinot. Toronto: H.G. Publications, 1989, pp. 21-53.
93. Séguinot, Candace. “Some Thoughts about Think-aloud Protocols,” *Target* 8.1 (1996) :75-95.
94. Séguinot, Candace. “Accounting for Variability in Translation,” in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pplied Psychology: Individual, Social, and Community Issues 3.], edited by Joseph H. Danks, Gregory M. Shreve, Stephen B. Fountain and Michael K. McBeath. Thousand Oaks etc.: Sage, 1997, pp.104-119.
95. Séguinot, Candace. “Management Issu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37.],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a, pp.143-148.
96. Séguinot, Candace. “Knowledge, Expertise, and Theory in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in Context: Selected Contributions from the EST Congress, Granada 1998*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39.], edited by Andrew Chesterman, Natividad Gallardo San Salvador and Yves Gambier.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b, pp. 87-104.
97. Tirkkonen-Condit, Sonja.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CDEF 86: Papers from the Conference of Departments of English in Finland* [Publica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7.], edited by Heikki Nyyssönen, Riitta Kataja and Vesa Komulainen. Oulu:University of Oulu, 1987, pp. 39-49.
98. Tirkkonen-Condit, Sonja. “Tekstin tulkinta käännöprosessin osana,” in *Kielen*

- käyttämisen jaymmärtämisen ongelmia/Problems in Language Use and Comprehension* [AFinLA yearbook 46.], edited by Leena Laurinen and Anneli Kauppinen. Helsinki: AFinLA, 1988, pp. 145-155.
- 99 . Tirkkonen-Condit, Sonja.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edited by Candace Séguinot. Toronto: H.G. Publications, 1989, pp. 73-85.
- 100 . Tirkkonen-Condit, Sonja. “Professional vs. 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Learning, Keeping and Using Languag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8th World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Sydney, 16-21 August 1987*, edited by Michael A. K. Halliday, John Gibbons and Howard Nichola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1, pp.381-394.
101. Tirkkonen-Condit, Sonja. “The Interaction of World Knowledge and Linguistic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Translation and Meaning, Part 2*, edited by Barbara Lewandowska-Tomaszczyk and Marcel Thelen. Maastricht Rijkshogeshool: Facult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92, pp. 433-440.
102. Tirkkonen-Condit, Sonja. “What Happens to a Uniquely Finnish Particle in the Processes and Products of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Knowledge*, edited by Yves Gambier and Jorma Tommola.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Centr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93, pp. 273-284.
- 103 . Tirkkonen-Condit, Sonja. “What Is in the Black Box?: Professionalism in Translational Decisions in the Light of TAP Research,” in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im Umbruch: 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Wilss zum 70. Geburtstag*, edited by Angelika Lauer, Heidrun Gerzymisch-Arbogast, Johann Haller and Erich Steiner.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6, pp. 251-257.
104. Tirkkonen-Condit, Sonja. “Who Verbalises What: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AP Texts,” *Target* 9.1 (1997) :69-84.
105. Tirkkonen-Condit, Sonja. “Uncertainty in Translation Processes,” i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37.],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 Riitta Jääskeläine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123-142.
106. Tirkkonen-Condit, Sonja and Johanna Laukkanen. "Evaluations - A Key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Affective Dimension of Translational Decisions," *Meta* 41.1 (1996) :45-59.
107. Toury, Gideon. "Experiment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chievements, Prospects and Some Pitfalls,"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1, pp. 45-66.
108. Wilton, Antje. "Bilinguals and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Unpublished Magisterarbeit, Gerhard- Mercator- Universität, Duisburg, 1996.

9.2 笔者补充的西方关于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文献：38 篇（本）（按时间排序）

109. Færch Claus and Gabriele Kasper. "One Learner-Two Languages: Investigating Types of Interlanguage Knowledge," i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Tübinger Beiträge zur Linguistik 272.], edited by Juliane Hous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pp. 211-228.
110. Hölscher, Anke and Dorothea Möhel. "Cognitive Plans in Translation," in *Introspe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edited by Claus Færch and Gabriele Kasper.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7, pp. 113-134.
111. Zimmermann, Rüdiger and Klaus P. Schneider. "The Collective Learned Tested: Retrospective Evidence for a Model of Lexical Search," in *Introspe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edited by Claus Færch and Gabriele Kasper.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7, pp. 177-196.
112. Séguinot, Candace. "A Study of Stud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Sonja Tirkkonen-Condit.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1, pp. 79-88.
113. Lörcher, Wolfgang. "Investigat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eta* 37.3 (1992) :426-439.
114. Shreve, Gregory M., Christina Schäffner, Joseph H. Danks and Jennifer Griffin. "Is There a Special Kind of 'Reading' for Transla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eading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arget* 5.1 (1993) :21-41.
115. Lam, Jacqueline K. M. "Thinking-aloud Protocol," in *An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edited by Chan Sin-wai and David E. Pollar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904-917.
116. Fraser, Janet. "Professional Versus Student Behaviour," in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3*, edited by Cay Dollerup and Vibeke Appe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pp. 243-250.
117. Kussmaul, Paul.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and Translation: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in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Mary Snell-Hornby,

- Zuzana Jettmarová and Klaus Kaind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7, pp. 239-247.
118. Jensen, Elisabeth Halskov. *Oversætteren og den juridiske tekst* [The Translator and the Legal Text], Ph.D. diss.,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1999.
119. Fraser, Janet. “The Broader View: How Freelance Translators Define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n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edited by Christina Schäffner and Beverly Adab.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pp. 51-62.
120. Koby, Geoffrey S. “Translation Research Using a Computer-aided Think-aloud Protocol: An Update,” *The ATA Chronicle* 29.4 (2000) :21-27.
121. Breedveld, Hella. “Translation Processes in Time,” *Target* 14.2 (2002a) :221-240.
122. Breedveld, Hella. “Writing and Revising Processes in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3.1 (2002b) :91-100.
123. Jääskeläinen, Riitt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ies into Transl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Target* 14:1 (2002) :107-136.
124. Jarvella, Robert J., Astrid Jensen, Elisabeth Halskov Jensen and Mette Skovgaard Andersen. “Towards Characterizing Translator Expertise, Knowledge and Know-how: Some Findings Using TAPs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Discipline*, edited by Alessandra Riccard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72-197.
125. Colina, Sonia. “Towards an Empirically-based Translation Pedagogy,” in *Beyond the Ivory Tower: 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Scholarly Monograph Series Volume XII.], edited by Brian James Baer, Geoffrey S. Kob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 33-60.
126. Wakabayashi, Judy. “Think-aloud as a Pedagogical Tool,” in *Beyond the Ivory Tower: 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Scholarly Monograph Series Volume XII.], edited by Brian James Baer, Geoffrey S. Kob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61-82.
127. Barbosa, Heloisa G. and Aurora M.S. Neiva. “Using Think-aloud Protocols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Foreign Language Users and Experienced

- Translators,”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 137-155.
128. Alves, Fabio and José Luiz V.R.Gonçalves. “A Relevance Theory Approach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Inferential Process in Translation,”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3-24.
- 129 . Livbjerg, Inge and Inger M.Mees. “Patterns of Dictionary Use in Non-domain-specific Translation,”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123-136.
130. Jakobsen, Arnt Lykke. “Effects of Think Aloud on Translation Speed, Revision and Segmentation,”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69-95.
131. Hansen, Gyde. “Controlling the Proces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Research into Translation Process,”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25-42.
132. Rothe-Neves, Rui. “Using Think-aloud Protocols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Foreign Language Users and Experienced Translators,”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97-119.
133. PACTE Group. “Building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in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edited by Fabio Alv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pp. 43-66.
134. Li, Defeng. “Trustworthiness of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4 (2004) :301-313.
135. Englund Dimitrova, Birgitta. *Expertise and Explici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5.

136. Krings, Hans-Peter. "Wege ins Labyrinth - Fragestellungen und Methoden der Übersetzungsprozessforschung im Überblick," *Meta* 50.2 (2005) :342-358.
137. Lee-Jahnke, Hannelore. "New Cognitive Approaches in Process-oriented Translation Training," *Meta* 50.2 (2005) :358-377.
138. Kussmaul, Paul. "Translation through Visualization," *Meta* 50.2 (2005) :377-391.
139. Rydning, Antin F. "The Return of Sense on the Scen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Light of the Cognitive Blending Theory," *Meta* 50.2 (2005) :392-404.
140. Tirkkonen-Condit, Sonja. "The Monitor Model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Process Research," *Meta* 50.2 (2005) :405-414.
141. Heiden, Tanja. "Blick in die Black Box: Kreative Momente im Übersetzungsprozess: eine experimentelle Studie mit Translog," *Meta* 50.2 (2005) : 448-472.
142. Hansen, Gyde. "Experience and Emotion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Research with Think-Aloud and Retrospection," *Meta* 50.2 (2005) : 511-521.
143. Asadi, Paula and Candace Séguinot. "Shortcuts, Strategies and General Patterns in a Process Study of Nine Professionals," *Meta* 50:2 (2005) :522-547.
144. Ronowicz, Eddie, Joanna Hehir, Toshihiro Kaimi, Keiko Kojima and Deok-Shin Lee. "Translator's Frequent Lexis Store and Dictionary Use as Factors in SLT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Spe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fessional, Paraprofessional and Novice Translators," *Meta* 50.2 (2005) : 580-596.
145. Lörcher, Wolfga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ethods and Problems of Its Investigation," *Meta* 50.2 (2005) : 598-608.
146. PACTE Group.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Meta* 50.2 (2005) : 609-619.

9.3 笔者补充的中国关于 TAPs 翻译过程研究的文献：23 篇（本）（按时间排序）

1. 蒋素华〈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见《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 年第 3 期，页 55-58。
2. 蔡寒松〈心理学口语报告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见《上海科技翻译》，2000 年第 3 期，页 1-4。
3. 蔡寒松，郭嘉钥〈英语双重否定句汉译过程的心理语言学个案研究〉，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 年第 11 期，页 8-10。
4. 蔡寒松，刘葆婷〈英语因果关系句汉译过程的心理语言学个案研究〉，见《外语研究》，2000 年第 3 期，页 32-38。
5. 吴义诚〈《口/笔译的认知过程》评介〉，见《现代外语》，2001 年第 3 期，页 324-330。
6. 王金铨〈英语定语从句汉译过程的个案研究〉，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 年第 6 期，页 471-475。
7. 苗菊《探索翻译过程与译者（英文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8. 崔霞《译者的翻译过程探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04）
9. 张健《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 TAPs 语料研究》（北京：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4）
10. Zhao, Ran. “Processes of Translating: A Comparison of Expert and Student Translators Translating an Expository Text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2004.
11. 李德超〈TAPs 翻译研究的前景与局限〉，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 年第 5 期，页 385-391。
12. 姜秋霞，杨平〈翻译研究实证方法评析—翻译学方法论之二〉，见《中国翻译》，2005 年第 1 期，页 23-28。
13. 李德超〈TAPs 翻译过程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见《中国翻译》，2005 年第 1 期，页 29-34。
14. 文军，邓萍〈文化介入翻译过程的实验研究〉，见《外语学刊》，2005 年第 1 期，页 81-88。
15. 苗菊〈有声思维—翻译内在过程探索〉，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 年第 6 期，

页 43-46。

16. 苗菊〈西方翻译实证研究二十年(1986-2006)〉, 见《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年第5期, 页45-48。
17. 苗菊《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发展(英文版)》(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18. 刘立香《翻译过程的实验研究》(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6)
19. 周亚莉《探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基于二十名中国大学翻译专业学生的有声思维调查报告》(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6)
20. 文军, 孙三军〈论使用出声思维研究翻译过程〉, 见《外语学刊》, 2006年第3期, 页93-97。
21. 郑冰寒〈洞悉翻译过程的辅助工具-Translog 程序介评〉, 见《中国科技翻译》, 2006年第4期, 页22-26。
22. 颜林海〈西方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概述〉, 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6年第3期, 页116-119。
23. 王金铨〈应用语言学框架下的翻译研究——《翻译过程的专业知识以及显形化》〉, 见《山东外语教学》, 2006年第6期, 页18-21。